

目 錄

第一章	右翼工党分子的真面目	1
一	工人貴族是工党机会主义的基礎.....	1
二	工党和工会.....	7
三	工党上層分子和英國統治階級的关系.....	32
第二章	从費边机会主义到“民主社会主义”	47
一	費边主义——工党思想的基礎.....	47
二	工党——右翼社会党人的領導党.....	60
三	“民主社会主义”.....	63
四	右翼工党分子的經濟观点.....	78
第三章	工党的國有化的实質和結局	90
一	社会主义國有化和資本主义國有化.....	91
二	工党國有化的真实內容.....	103
三	工党的國有化的目的.....	113
四	在賠償費的幌子下对英國人民進行掠夺.....	130
五	同業联合公司——壟断資本家在國有化 部門当中的管理形式.....	140
六	工党实行國有化的結果.....	147
七	关于工党的“混合經濟論”.....	158
第四章	所謂“監督”、“充分就業”和“計劃化”	165
一	右翼工党分子是怎样“批評”壟断組織的.....	165
二	工党主义和凱恩斯主义.....	179
三	工党“計劃”后面掩盖着什么?.....	197

第五章	劳动者貧困化的加深以及在工党“平衡收入”的借口下壟断組織利潤的增長	210
一	工党政府預算中的直接稅和間接稅.....	210
二	工党政府預算开支的目的是什么.....	228
三	劳动者生活水平的降低，利潤的提高，軍备競賽.....	240
第六章	工党分子与殖民主义	251
一	右翼工党分子的殖民主义思想.....	251
二	工党政府的殖民政策.....	258
第七章	右翼工党分子与帝國主义侵略計劃	287
一	“防禦”幌子下的軍备競賽政策.....	287
二	宣揚帝國主义者之間的團結。英美矛盾的尖銳化.....	301
第八章	“民主社会主义”的破產以及工党的危机	328
一	英國無產階級的战斗的傳統.....	328
二	工党内部矛盾的尖銳化及其政策的危机.....	338
三	工党危机的進一步發展.....	350

第一章

右翼工党分子的真面目

一 工人貴族是工党机会主义的基礎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僅在中欧和东南欧，而且在西欧各國都發生了深刻的階級变化。在西欧一些極重要的國家內，工人階級的大多数已進而採取和資本家坚决斗争的方針。这种变化表現为共產党和工人党的势力蓬勃增長，右翼社会党人在这些國家的無產階級基本羣众中威信顯著下降。

在英國，情况有些不同。英國工党的上層分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快告終結和战后时期得以暫時保持住自己的羣众基礎。

这里產生了一个我們应当回答的完全合理的問題：为什么右翼社会党的一个变种——工党直到現在仍然能够保持自己在工人階級羣众中的影响？由此又產生第二个問題：在全英國的环境下所存在的必然而且正在使工党主义走向徹底失敗的基本过程和主要矛盾是怎樣的？工党之暫時保持住自己的羣众基礎，顯然是和英國資本主义所处的一般环境相矛盾的。英國資本主义所处的环境是：英國資本主义發生了深刻的、經久的危机，顯然在走向衰落，工人階級渴望着社会主义，各个殖民地的人民進行着大規模的解放斗争，反动帝國主义陣营的力量在民主社会主义陣营力量蓬勃增長的条件下急剧地削弱下去。

是什么原因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党領袖又能够影响英國無產階級呢？是什么原因使英國恰恰在工党政府时代成为資本

主义反动势力在欧洲的極其重要的支柱之一呢？

帝國主义資產階級用壟斷利潤來收買工人階級的上層分子。这便是机会主义的經濟基礎。英國的特点首先是：資產階級化的工人上層在英國远在其他各國工人貴族產生之前就形成了。其次是：在英國这一階層的人數一向比其他國家多。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說道：“同志們強調英國工人貴族比其他任何國家的都更強有力些。事實的確如此。要知道，工人貴族在英國的歷史已經不是 10 年而是 100 年了。那里資產階級具有極其豐富的經驗——民主的經驗，——它善於收買工人，在工人中間建立了一個大階層，它在英國比起在其他國家來大些，但比起廣大工人羣眾來，仍不算大。”[⊖]

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表明，十九世紀後半叶工人貴族階層之所以能够在英國生存，是由英國的工業和殖民壟斷的地位所決定的。英國資產階級以廉價工業品向全世界推銷而獲得大量超額利潤。資產階級把這些超額利潤拿出一部分來收買工人階級的上層分子。十九世紀最后 25 年，英國虽然失掉了工業的壟斷地位，但工人貴族存在的基礎却並沒有消失。在壟斷資本主义时期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千百万人民的剝削，对英國資產階級說來是最大限度的利潤的極其重要的來源。靠着這些最大限度的利潤，資產階級在失掉工業的壟斷地位以后，仍然能豢養那些高工資的工人上層分子，使他們樂於維護資產階級制度，使他們的經濟地位和其他無產階級羣眾对立起來。

殖民地的大量貢賦（每年几億英鎊）使英國資產階級有可能把工人貴族階層變成一個人數眾多的階層。

工人貴族階層浸透了行會的思想，浸透了崇拜資產階級思

⊖ “列寧全集”俄文版第 31 卷第 236 頁。

想和資產階級制度的精神。工人貴族雖然在英國工人階級中只占微不足道的少數，但是他們却在精神上支配着被資產階級殘酷剝削的工人羣眾。

英國資產階級在几十年之間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手腕：倚靠工人貴族，倚靠他們的職工會的首領、合作社的首領、以及工黨的領袖，在政治上統治工人階級，在思想上奴役他們。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說道：“在一定的國度內，資產階級民主的統治愈長久，愈完全，愈巩固，則資產階級愈能做到用那些為他們所訓練出、為他們的觀點和成見所滲透、並往往為他們直接間接所收買的人們去充當領袖職位。”^①

列寧說明機會主義者和社会一帝國主義者是工人貴族的代表，或資產階級化的工人的代表。

工人貴族又是工黨上層分子依靠來使英國廣大的工人羣眾在思想上受資產階級支配的階層。

毫無疑義，在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英國工人貴族的人數和成分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首先是英國資產階級剝削殖民地所獲得的殖民地貢賦減少了。斯大林在1926年談到英國的時候說，“超額利潤減少了，落入英國工人首領腰包的零頭快要沒有了，關於英國工人階級生活水平下降的呼聲愈來愈頻繁了。‘和平繁榮’的時代已為衝突、同盟歇業和罷工的時代所代替了。英國工人開始左傾，愈來愈頻繁地採取和資本直接鬥爭的方法了。”^②壟斷資本家從自己的最大限度利潤中拿出來收買工人貴族的那些小恩小惠的數量，也受到這個情況的影響。並且由於生產技術的改變——採

① “列寧文集”人民出版社版，第6冊第238頁。

② “斯大林全集”第8卷195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41頁。

用傳送帶、生產的標準化和大規模生產的發展——高工資工人的數目減少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在意大利、德國、法國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通貨膨脹引起了高度熟練工人和普通熟練工人的生活水平的降低。他們的生活水平有嚴重降低的趨勢。

接着，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期，特別在英國，由於大量的失業，工業走向衰落，一些部門發展，另一些部門萎縮，形成了幾十年期間工業深刻停滯的整個區域（所謂“蕭條區域”），工人貴族的成分發生了變化，自不待說工人貴族的絕對人數也減少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快結束時及結束以後，由於英國發生通貨膨脹，熟練工人、不熟練工人、半熟練工人的工資的差額縮小了。

根據牛津統計學院公報的材料（1951年4月以前）可以計算出熟練工人工資和不熟練工人工資的比例，如果不熟練工人的工資是100，那麼熟練工人的工資便是：

年 份	建築工程	造船業	機器製造業	鐵路
1900	150	192	173	—
1920	123	130	127	122
1950	119	122	115	137

1920年是通貨膨脹最嚴重和熟練工人、不熟練工人工資差額縮小得最多的一年。1920年以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熟練工人和不熟練工人的工資之差額重新加大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除開鐵路和其他一些部門（烤麵包、商業）而外，兩種工人工資的差額再一次地縮小了，和1920年相比較，兩種工人的工資還要接近些。毫無疑問，熟練工人的工資和不熟練工人的工資之間的接近，並不是通過把不熟練工人的工資提高到熟練工人的工資水平，恰恰相反，而是通過減低熟練工人工資的

途徑達到的。這証明了熟練工人的生活狀況不是改善而是惡化了。熟練工人工資之降低及其接近半熟練工人和不熟練工人的工資這一事實表現了工人貴族人數縮減的過程，這是由於英國資產階級殖民地利潤的減少。利潤的減少特別表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

但是如果從熟練工人和不熟練工人工資差額之縮小而得出結論說工人貴族消失了，像某些工黨經濟主義者所硬說的那樣，那便是不正確的了。這是幻想，它是和現實毫無共同之點的。

事實上，英國的工人貴族人數雖然減少了，但總數還有幾十萬人。英國資產階級在收買羣眾和欺騙羣眾方面有豐富的經驗，他們用盡各種各樣的手段來保全工人貴族階層。保持高工資的工人上層分子，這對於英國資產階級說來乃是非常重要的問題。如果在無產階級佔居民極大多數的英國沒有工人貴族——資產階級在工人階級中的社會支柱，資產階級就不可能保持他們的階級統治。

資本家用多種多樣的的手段來收買高度熟練的工人（各種獎勵老工人的獎金、勞績金等等）。就拿工黨政府過去所進行的住宅建築來說，這種建築絲毫也不能滿足千百萬居住在貧民窟及沒有住宅的工人的需要。對已經建成了的住宅，又規定了低工資工人不可能支付的高額房租，因而他們不可能居住。實際上，工黨政府所建築的住宅是供資產階級階層及工人貴族之用的，這也是收買工人貴族的手段之一。

英國資產階級虛偽的統計學總是把工資的真實情況掩蓋起來，把一切隱藏在平均數字後面。資產階級平均工資的統計學數字完全掩蓋了高工資工人和低工資工人的工資之間的差額。英國資產階級竭力保全高工資工人階層這一點可以從下列事實看出來。直到現在還保留行會工會（行會工會的會員熱心地捍衛

着自己的优越地位)。例如,在铁路运输方面,除了全国铁路员工联合会——包括职工会中已经组织起来的基本工人群众,共计有455,000会员以外,还有(一)机车司机和司炉联合会,大约有77,000会员;(二)铁路办事员工会,大约有89,000会员;(三)此外尚有由37个单独的工会组成的造船和机器制造工人工会联合会。37个工会中的一部份会员是在铁路上工作的。行会工会的高工资会员拒绝和全国铁路员工联合会联合起来,理由是那个联合会的会员是低工资工人。

在英国许多工业部门中,至今还存在着职工运动涣散的状态,工会是根据行会的职业原则而不是生产原则建立起来的;毫无疑问,这是由工人贵族用行会工会把自己和其他工人群众隔绝而造成的。例如,在建筑工业中有好几个熟练工长的工会和三个不熟练工人的工会,还有基本上由熟练工人组成的工会,这些工会阻挠不熟练工人参加联合工会。

英国工会结构本身证明熟练工人工资和不熟练工人工资之间差额很大的事实不仅存在着,而且它是工人贵族在许多部门中保留旧行会的关门主义的极重要的原因。

还有不少其他事实可以推翻某些工党的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所作出的工人贵族在英国似乎是消失了的断言。例如在炼钢业、煤矿业、机器制造业和其他工业部门中高等熟练工人工资和其他工人工资之间差额很大。

再举一个例子。在印刷工业中根据行会工会和企业主的协议,规定整个工序的工资额,在这里,平均工资掩盖了资本家用高工资收买一小群特权工人而把他们分化出来的政策。

其次,战后在国内市场工作的高工资工人在各个部门的人数都减少了,同时,在那里由于输出的增长使垄断资本家获得特别大的利润的出口部门中,工人贵族阶层增长了。在依靠国库获

得大批定貨，和大量的施捨物的軍用工業中存在着一定的高工資的熟練工人階層。

當然，和二十世紀相比較，英國工業中工人貴族的人數是減少了，但是和法國、意大利以及西歐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比較起來，減少得並不多。英國資產階級用多種多樣的的手段來收買在數量上減少了的工人貴族。

英國工人貴族和工人官僚雖然和整個工人階級羣眾比較起來，人數很少，但和歐洲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相比較，人數卻是比較多的，這就是工黨的相當“穩定狀態”以及它在英國廣大工人羣眾中還能保持自己的勢力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二 工黨和工會

工黨的所特有的機構及其和工會官僚互相勾結乃是工黨的特點，這一特點使工黨有可能直到最近還控制着廣大工人羣眾，使它們處於資產階級統治下面。

英國工會在十九世紀的幾十年的時期中形成和鞏固了。十九世紀末期以前這些工會主要是工人貴族的團體，並且浸透了行會精神。眼光狹小的、聽命於資產階級政黨的工會官僚在工會機關中把持一切，使工人羣眾屈服於資產階級的思想 and 勢力下。

工會首領認為只有捍衛工人的直接的、“細小的”利益才是自己的任務。英國的工會主義是十九世紀工人運動自發發展的產物。如果說強大的工會本身曾經是英國工人階級的巨大的成就，那麼脫離馬克思理論影響的工會的自發的發展的結果，却使它產生了工聯主義的意識。自發論是工聯主義的思想體系。

英國工會的官僚建立了並保存了行會的狹隘思想，維持實際上完全依賴於資產階級政黨、依賴於資產階級思想的虛偽的

“獨立”。斯大林在 1924 年闡明西方工會和社會主義政黨之間的关系時指出，西方工會局限於自己的行會實踐並敵視社會主義，因為它們是在各國社會主義政黨建立以前產生的，是在沒有社會主義政黨之下發展起來的，它們慣於以自己的“獨立”自傲，把行會的利益放在階級利益之上，除了“在一個先令上加幾個便士”而外，什麼也不願意承認。它們在精神上是保守的，並且敵視一切革命創舉，因為領導它們的是受資產階級豢養的工會貴族，這些人並隨時準備使工會為帝國主義效勞。

這些話首先是指英國的工會。英國是閉門主義的和反動的工會的祖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歐洲大部分國家的職工運動發生了根本的改變。中歐和東南歐各國消滅了資本家的政權，建立了人民民主制度，工人階級克服了改良主義所引起的職工運動的分裂。這些國家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職工運動在共產黨和工人黨的領導下開展起來了。在法國和意大利，大多數工人聯合在正在進行階級鬥爭的工會組織中了。世界工會聯合會的會員現有 8,000 萬人以上，佔全世界有組織的工人的絕大多數。

對於英國無產階級說來，不幸的是英國工會現在仍然是由舊工會官僚來領導的。

計件工資的熟練工人以“自己的工資”來僱用按日給酬的學徒這種幾乎是中世紀殘余的手段，也常常被用來進行從各方面使工人受資產階級影響的目的。現在，一些工人僱用另一些工人的作法仍然被個別的工會承認和批准。這種使一部份工人和另一部分工人對立的制度是資產階級破壞工人階級的力量和瓦解工人階級的隊伍的政策的一部分。

工會的渙散削弱了無產階級的力量。1951 年末，參加職工大會的有 186 個工會共 7,827,945 個會員。同時還有幾百個工

会有 130 万以上的工人沒有加入职工大会，也沒有联合在职工大会总委员会之下。到現在某些工業部門的行会工会还掌握着半数工人，甚至大多数工人。由於一些工会按照行会的特点來联合工人，所以資本家有可能唆使一个工会來反对另一个工会。在各个單独的行会工会之間產生了關於劳动工資和劳动条件等問題的糾紛和斗争，等等。

工会官僚的保守主义，他們的力圖保留任何習慣了的东西，他們只关心个别工人团体的狹隘的、局部的利益，而不关心整个工人階級共同的利益，所有这些至今都是資產階級拿來破坏和瓦解英國工人階級力量的强有力的武器。

十九世紀后半叶的几十年期間，在政治上工会是跟随自由資產階級的、成为自由資產階級政党——英國工厂主的政党的單純的附屬品。

1858年10月7日恩格斯致馬克思的書信談到英國人时說，“……这一个在所有民族中最資產階級化的民族，归根結底似乎除了資產階級而外，还有資產階級化的貴族和資產階級化的無產階級。这對於剝削整个世界的民族說來在一定程度上实在是自然的。”^①

同时，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英國基本工人羣众的生活是窮困的。在十九世紀60—80年代，甚至当英國資產階級还處於世界工業發展的頂峯的时候，資產階級既不能鎮压工人运动，也不能麻痺工人运动。

这一时期，由於工人階級的斗争，資產階級实行了10小时工作制，擴大了选举权（在1867年和1884年）。这是工人階級的勝利是沒有疑問的。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22卷第360頁。

但只是在十九世紀90年代初，當英國失掉了自己原來是“世界工場”的地位，企業主開始廣泛進攻工人的生活條件時，工會當中才產生了建立特殊的工人政治組織的要求。這並不是取消舊的工會的成見和政策。在資本家進攻工人階級，進攻工人階級的罷工權利，進攻他們的工資，進攻工會組織的情況下，在工會支持下小自由黨完全支持企業主。這種情況引起了羣眾的不滿，甚至工會的反應領袖也不能不考慮到這種情緒。

工會官僚決定建立一個特殊的政治組織，並不想把這一組織變成工人階級的战斗的政黨。他們關心的仍然是自己狹隘的行會的利益。工會的領袖要建立這一組織是為了要它給工會保證議會中的代表人數。同時工會上層份子絕對不願意這一政治組織（或是政黨）實行獨立自主的階級政策。他們把這一組織看成是自由黨的附屬品，它只能在工作日、工資等問題上保護工會的利益。

這就是列寧所闡述的工會主義的政治，他說，“……一切工人都想從政府那里爭得某些能減輕工人地位所特有的困苦，但決不是消滅這種地位即勞動受資本支配的地位的設施……。這個趨向確實是仇視社會主義的英國工會會員，天主教工人，‘祖巴托夫主義的’工人等等共同的趨向。”^①

斯大林在其“俄國共產黨（布）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的工作總結”報告中闡明了俄國和西方的黨與各國工會之間的关系的區別。“西方各國的工會和黨之間的相互关系和我們俄國的情況大不相同。我們这里工會的出現是在工人階級政黨之后並且是以這一政黨為中心的。當黨及黨的組織不單是已經領導工人階級的政治斗争而且也領導經濟斗争，一直領導到小的罷工和最

^① “列寧文選”兩卷集中文本第1卷第213頁，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

小的罢工的时候，我們还没有工会。这主要說明了在二月革命以前我們的党与我們当时到处都在產生的工会的萌芽比較起來享有大得多的威信。”^①

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紀初在列寧的領導之下，俄國馬克思主义的党、新型的党形成了。俄國工会在党成立以后產生了、發展了和巩固了，並且和党建立了友誼。

布尔什維克党善於把工人階級羣众团結在自己的周圍。布尔什維克党把工人运动同社会主义結合起來、把馬克思列寧主义的理論和工人运动的實踐結合起來向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不断進行極其尖銳的斗争，布尔什維克党利用俄國歷史發展的优良条件，訓練並引導工人階級率領劳动農民去冲击沙皇制度，去推翻資本主义。

在英國無論是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或是二十世紀初，直到1920年共產党誕生，無產階級都沒有自己的革命的馬克思主义政党，沒有与羣众密切联系的、以对無產階級的階級任务的覺悟來武裝無產階級的、發動並領導無產階級去和資本主义進行斗争、去推翻資本主义的馬克思主义政党。

包括工人羣众成分的政党乃是由工会建立的，是从工会發展起來的，它的領導和工会的領導同样是反动的。斯大林在比較俄國的和西方的工会和党之間的关系时寫道：“工人运动中社会改良主义分子的力量不僅在於他們拥有社会民主党，与其这样說，毋寧說他們的力量在於倚靠工人职工会。只要剝夺了他們这个支柱，那么他們就会站不住脚了……。我國工会的產生却是在党出現之后，是在党已經來得及在工人中間獲得巨大的威望並且威望已經巩固了之后。我們的工会是党的力量所栽培出

① “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7卷第103頁。

來、是黨的領導之下、在黨的幫助下組織起來的……。我們所看到的西方却完全是另一種圖景。西方工會之出現與工人階級的政黨比較起來要早得多。當西方工會領導工人罷工、組織工人並幫助工人為捍衛自己的利益去同資本家做鬥爭時，還沒有黨。不僅如此，並且西方的黨是從工會產生出來的。”^①

以前英國沒有過革命的、能夠領導工人階級羣眾並和工會聯系的馬克思主義政黨。1883年建立的社會民主同盟患了宗派主義病，它不善於在工會中進行工作，沒有本事和工人階級的羣眾聯系。恩格斯曾尖銳地批評過這一點。

列寧寫道：“恩格斯在許多年里一直堅決認為在漢德曼領導下的英國社會民主黨犯有錯誤，它採取了宗派主義態度，不善於同不自覺的、但具有深厚的階級天性的工會聯系，它把本來應該當作‘行動的指南’的馬克思主義變成了教條。”^②

社會民主同盟內有忠誠的工人和知識分子，如威廉·摩里斯，湯姆·曼，愛蓮諾·艾維林等人，但其中也有野心家和冒險主義者漢德曼之流。社會民主同盟脫離羣眾，它沒有能夠和不熟練工人爭取加入工會所謂（“新工聯主義”）的萌芽運動聯系起來。恩格斯祝賀1888年礦工聯盟的建立（它的會員在幾年之內就增長到20萬人）八十年代末碼頭工人和煤氣工人的罷工，祝賀不熟練工人之加入從前人數很少的貴族團體。恩格斯尖銳批評社會民主同盟脫離羣眾運動。

社會民主同盟的宗派主義的性質以及其本身之脫離工會運動造成了嚴重的後果。工人階級的政治組織的要求促使工會除“獨立勞工黨”之外，又創立了一個儘管比過去前進了一步，但絕

① “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7卷第236—237頁。

② “列寧全集”俄文版第15卷第214頁。

不是英國工人階級所需要的政黨的組織。

在九十年代期間，工會領導者們一致認為必須建立自己的議會代表機關。1893年，職工大會提出募集自己的基金作為競選下議院和地方自治機關代表的經費。這筆基金要保證工會候選人競選的開支。1900年，在工會、合作社、“獨立工黨”和費邊社的代表會議上建立了“勞工代表委員會”，1906年改名工黨。該委員會的任務是保證獨立的工人候選人在下議院和地方自治區選舉中當選。

提出保護工人的政治利益作為自己的任務的政黨的建立，比起過去毫無疑問是前進了一步，過去滲透行會思想、工聯思想的工會是維護自由黨（英國工廠主的政黨）的。工黨本身的結構和面貌雖然絕對不是英國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所要求的那樣，但是，馬克思主義者對工黨的建立這一事實仍然是歡迎的，馬克思主義者在這一問題上是以馬克思主義關於“現實運動前進的每一步比一打綱領還要重要些”的原理為指南的。

列寧在1908年分析二十世紀初英國工人運動的發展時寫道：“當着阻止提高無產階級羣眾的政治覺悟性和階級獨立性的客觀條件還存在的時候，必須善於耐心地，不屈不撓地，親密地對他們進行工作，既不在原則上讓步，也不放棄深入到無產階級羣眾當中的活動。後來的事變的發展証實了恩格斯的教訓。儘管英國工會是關門主義的、貴族式的、庸俗的、利己主義的、敵視社會主義的、為了大臣的地位把同志出賣給資產階級的、工人階級的公開的叛徒（如不可救藥的伯恩斯輩），但它總是靠近社會主義的，儘管是拙笨的、不徹底的、扭扭捏捏的，但總是靠近社會主義了。”^①

① “列寧全集”俄文版第16卷第214—215頁。

列寧認為工黨的建立比起工會直接擁護自由黨時期來，是羣眾運動中前進的一步。同時他又極其激烈而尖銳地批評了這個政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機會主義及其領導的叛賣活動。“勞工代表委員會”和工黨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時只不過充當了自由黨的尾巴，它是由工會和極端機會主義的“獨立工黨”的建立議會聯盟而形成的。工黨是沒有任何綱領性原則的“廣泛的工人政黨”。1905年革命以後，這樣的政黨的建立俄國孟什維克曾幻想過。

列寧在1912年關於工黨寫道：“應該指出，構成議會中‘工人政黨’的不單是‘獨立工黨’的代表，而且有工會選出的代表。這些代表並沒有參加‘獨立工黨’，他們自稱為工人的代表和‘工人政黨’的黨員。英國的機會主義者實現了其它國家的機會主義者長久向往的事實：把機會主義‘社會主義’的代表們跟似乎是非黨的工會的代表們聯合起來。1906—1907年某些孟什維克在我國談到的臭名昭彰的‘廣泛的工人的政黨’，在英國、而且只是在英國實現了。”[⊙]

正如列寧所預見的一樣，英國所建立的“廣泛的工人的政黨”在保持、鞏固和挽救英國壟斷資本擺脫無產階級革命的危險中起極重要的作用。正是由於工黨的“廣泛性”，完全沒有綱領性原則，使工黨的機會主義的領袖有最大的可能勾結資產階級，犧牲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在“廣泛的工人的政黨”的掩飾下，工會首領支持議會中的自由黨人，而“獨立工黨”的領袖們則詛咒反對資本的階級鬥爭的思想，並且通過該黨的首領和書記麥克唐納的言論，宣稱資本主義“一点一点地”“長入”社會主義了。

在“廣泛的”工黨的掩飾下，該黨的反動首領同工會的首領

⊙ “列寧全集”俄文版第18卷第332頁。

支持 1914—1918 年的世界帝國主義大戰，並參加了領導這個強盜戰爭的聯合政府。正是這個“廣泛的”工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幫助英國資產階級以最便利的武器來分化工人，瓦解工人階級，使工人階級喪失領導者，撲滅無產階級革命高潮。正是這一“廣泛的”工黨的領袖和工會領導聯合起來才得以領導 1926 年英國工人的總同盟罷工，目的是在資產階級需要的時刻破壞罷工，讓工人階級的英勇的隊伍——礦工——對整個資產階級孤軍作戰。罷工以後，這些領袖們曾經幫助礦主摧毀礦工的罷工。

現在讓我們來考察一下工黨的組織結構是怎樣發展起來的。1918 年以前，工黨是工會的議會代表機關。整個工會組織集體參加了工黨。同時，工黨黨員差不多全都是工會會員。當時還沒有個人黨員。1900 年在建立“勞工代表委員會”時，其會員 376,000 人中有 353,000 人是工會會員。其餘的 23,000 人是“獨立工黨”（列寧稱之為自由黨人的附屬品）、社會民主同盟和資產階級費邊社的成員根據聯盟的原則參加工黨的。1904 年“勞工代表委員會”聯合了 165 個工會，將近 100 萬會員，而聯合起來的政治組織的會員人數，卻幾乎沒有改變。

第一次世界大戰快結束時，英國的階級鬥爭的尖銳化、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對英國工人階級的影響、英國資本主義長期衰落的時期的到來把工黨變成英國資產階級的一個主要政黨的遠景，所有這些情況使工黨的領導人得出結論：為了要保持自己的領導，必須明確地改變工黨的結構和成分。第一次世界大戰快告終結時，英國無產階級羣眾的革命的日益高漲，使工黨和工會的領袖相信，黨的純粹的工人成分在新的情況下可能造成不良的對於英國資產階級說來甚至是危險的後果。純粹是工人成分的“廣泛的工人政黨”，即使二會的領導掌握在忠於資本家的官僚分子，在巨大的歷史變革和國內階級鬥爭尖銳化的條

件下，它也可以而且必然是一座防止羣眾的憤怒情緒的不牢固的堤防。工黨的領導害怕在工黨當中存在着各種不同派別（包括革命者在內）進行鬥爭的較大的可能性的條件下喪失威信。英國社會黨也加入了工黨。1911年創立的英國社會黨的有前社會民主同盟和一些小集團。1913年英國社會黨清除了社會沙文主義份子；從英國社會黨領導機構中趕走了當時公開支持英帝國主義的漢德曼派。

早在第一次大戰以前的幾年內，漢德曼就公開捍衛軍備競賽，主張英帝國主義需要“強大的艦隊”。

大家都知道，列寧認為，英國共產黨人應該利用工黨的特殊、半工會的、半政治的性質，它的聯盟的性質。列寧建議共產黨根據聯盟的原則要求加入工黨。因為共產黨集體地、以獨立政黨的資格加入工黨，就能夠利用當時在工黨中存在的在觀點上進行廣泛鬥爭的可能性，在內部領導工人為擺脫該黨的右翼首領的影響而鬥爭。參加工黨的條件必須是共產黨保留宣傳自己的思想的權利，保留組織上和政治上的獨立性。

純粹無產階級成分的工黨的舊的結構，儘管是由右翼首領領導的，並且是沒有任何綱領的；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條件下，它對工黨領袖——韓德遜、麥克唐納、湯姆斯等等說來，仍然是用來制止羣眾革命情緒的不充分的保證。1919—1920年的事變正是證明了這一點，當時英國工人階級表現了無比的英勇和革命的主動精神。在這種情況下，工黨的首領和工會的首領甚至不得不支持以反對英國武裝干涉蘇聯為宗旨的“行動委員會”，只不過他們是為了以後扼殺它，工會首領在工人羣眾要求的強大的浪潮面前不得不建立（1926年）英蘇統一委員會，他們的目的是在適當的時機摧毀它。1918—1926年，當工黨的領袖採取公開的反動立場的時候，工會領袖往往採取左的手段。

后來在1931年第二次工党政府倒台以及麥克唐納和湯姆斯轉變到保守黨人的陣營后，工黨領導為了避免在羣眾面前被揭穿，加緊聳惑人心的宣傳，極力搬弄一些“社會主義”和“計劃化”等等“左傾”詞句。與此同時，工會領導却公開支持化學托辣斯的首領蒙特關於建立“工業世界”的計劃。

這時，在工黨和工會的上層分子中間建立了一定的“勞動分工”，目的在於把羣眾掌握在自己的勢力之下。

當然，工會的上層分子和工黨的領袖從來沒能夠完全窒息工人階級中的進步潮流。整個英國工人運動史是進步的集團和進步的潮流反對得以在幾十年時期內保持工會和工黨中的領導作用的妥協分子的鬥爭史。

第一次世界大戰快結束時，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大規模的階級鬥爭迫使工黨的領袖採取另一種辦法來保持自己成為資產階級在工人階級中的主要社會支柱的作用。他們為了要減少在本黨內喪失威信的危險，為了要保證自己的領導，1918年在工黨年會上通過了新的黨章，根據這一黨章，除了工會集體參加黨的原則外，作了吸收個人黨員的規定。同時工黨地方組織可以很容易地吸收每一個願意參加的人。實行新黨章的結果是，在黨內湧現了資產階級分子——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

斯大林在1927年論工黨的性質時說，“事實上英國工黨是工人和城市小資產階級聯盟的政黨。事實上這個政黨是兩個階級聯盟的政黨，如果說到在這個黨內誰的影響大，是把自己和資產階級對立起來的工人的影響大，還是小資產階級的影響大，那麼應該說小資產階級的影響在這個黨內是佔優勢的”^①。工黨的

①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25頁人民出版社出版。

領導恰恰是代表小資產階級的利益的，而且他們多半是从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个人黨員的規定和保留工会的集体黨員並存，在这些条件下意味着小資產階級分子首先湧入党内。成千成万的小資產者親自嘗受到英國資本主义衰落的結果，跑到工党來，希望它执政以改善自己的光景。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參加工党，指^望在該党内獲得担任議會議員、新聞記者、思想家等等賺錢的肥缺。后來，随着英帝國主义危机的發展，明顯地表現出，工党变成了一个代替資產階級第二大党自由党的政党了。資產階級各个階層的代表紛紛湧到这个党里面來了。該党的隊伍除了小資產階級分子的羣众而外，开始挤進中等資產階級甚至是大資產階級的代表人。

1952年工党有黨員5,775,000人，其中有875,000人是以个人黨員的資格，參加工党的地方組織的。其余是工会集体加入的。875,000名个人黨員中，一部分是沒有集体參加工党的那些工会工人會員。其余是小資產階級者、中等資產階級者、大資產者以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列寧寫道：“‘社会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經濟基礎是一个：工人运动的少数‘上層’分子和‘自己的’民族資產階級聯盟反对無產階級羣众；資產階級的奴僕与資產階級聯盟反对受資產階級剝削的階級。”^①这种聯盟也反映在居民中的資產階級分子參加工党本身作为个人黨員这一事实上面。

資產階級分子和工人貴族及工会官僚的密切的聯盟，使工党上層分子能够有时掌握通过这些工会集体加入工党的几百万工会會員羣众。

同工会一起，合作党也以集体黨員資格參加工党。合作党

① “列寧全集”俄文版第21卷第404頁。

之建立是英國合作运动特殊發展的產物，合作运动是和空想主义者欧文的名字分不开的，是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發展起來的。

合作社的上層分子和工党密切联系着。消費合作社社員的总人数比工会會員的人数多（1945年，消費合作社有940万社員，工会有780万會員）。合作党的黨員也是根据集体黨員的原則入党的，人数是750万人，超过了工党黨員人数。“全國劳动委员会”的成員过去和現在都有合作党的首領，他們曾担任过工党政府的大臣，和工党有密切的联系。工党、工会和消費合作社的上層分子構成一种使工人羣众服从資本的力量。

英國共產党綱領“英國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指出，英國以工人階級为首的劳动人民是多么巨大的政治力量，这一綱領指出：“而現在，这个具有强大潛在力量的政治势力却四分五裂，被統治階級的宣傳，被工党、工会和合作組織的右翼領袖們的政策和观点所蒙蔽。这些右翼領袖們实际上是支持統治階級的，他們使工党政府为資本主义的利益服务。”

工会上層分子的力量是以工会官僚的力量和影响为基础的。工会官員大部分是具有反动思想的一羣人，他們是从來不更換的。通常，在工会中（印刷工人协会、全國运输工人和不熟練工人联合会、全國礦工联合会等等）工会的職員是联合会执行委员会所指定的；而且是終身职。联合会書記的职务常常由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会指定，因此工会官僚与工会會員羣众是毫無关系的。为了要保証工会执行委员会的反动成份，他們經常限制能够选入这个機構的人們的类别。例如，在机器制造工人联合会和全國运输机器制造工人联合会中，只有高度熟練工人組的組員才能被选入执行委员会。在某些工会中禁止提升共產黨員到領導的职位。为了要保持工人貴族和工会官僚在工会中的領導，他們就这样採取一切極端不民主的手段。

为了說明工会官僚和右翼工党的官僚怎样支持会员的消极情绪，並竭力培植这种消极情绪，我們引用几件关于由貝文建立的、由狄金領導的运输工人和不熟练工人联合会的生活的事实。

这是英國最大的工会。它总共有 1,137,000 会员，大約佔英國职工大会全体会员的七分之一，佔工党会员总人数的五分之一以上，这一联盟的上層分子是右翼工党最上層的支柱。

运输工人和不熟练工人联合会和其它几个最大的工会——全國鐵路員工联合会（384,000 名会员）、公共事業工人和粗工工会（647,000 名会员）、貿易和分配系統工作者联合会（201,000 名会员）、礦工联合会（613,000 名会员）一起，既決定英國职工大会的決議，也決定工党年会的決議。

首先談談运输工人和不熟练工人联合会的机构。当中有 50% 基層分会是拥有会员 500 名以上的，有 31 个分会是拥有二千多名会员的，有好几个分会是拥有四千个会员的，有一个分会有九千多个会员；由於联合会会员工作的地方和住所隔得很远，使他們参加联合会的會議和生活極为困难。联合会的会员表现出非常消极的情绪。我們引用的那本书的作者（雅各遜“英國工联政府”，1952 年出版，狄金序），在長期观察狄金所領導的联合会的生活之后，援引了一个名叫 I A A A 分会的例子。在四年之内，1,000 名联合会会员中間，出席全体大会的平均是 27 人，1941 年出席大会的人数，最多是 67 人。全体大会一般都是在不能容納 50 多个人的房子里面召开的。37 个人出席了第一次會議，会上提出了在联合会中担任正式职务的 10 名候选人。

一小撮拿薪金的官僚代替会员决定联合会的事情，而不征求他們的意見。工会官僚所培养的那种“民主”的真實性質，从

下列事实可以看出來：

在选举中央机构——联合会执行委员会、总委员会——时，工会官僚自己分配选票、自己填寫选票，而不征求会员的意见。不言而喻，他們是投票贊成有利於他們的反动領導的候选人的。

甚至在使用这种鬼蜮伎倆的条件下，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的选举在十年之內投票人数平均数字从来未超过37%。投票贊成当选者的人数平均是17%。狄金以具有投票权总人数的22%被选为联合会的終身总書記。

这样，他們採取各种各样的不民主的方法，使工人羣众实际上不能参加工会的領導，参加解决政治問題。

同时工会官僚手里掌握着影响普通工人的經濟槓桿，工人在疾病的时候、在失業的时候、在家人死亡的时候只能从工会領到少量津貼。工会在几十年期間用工人的工会会費積累了巨大的基金，用这笔基金來支付津貼。这笔基金是由工会官僚支配的。其次，个人工資的确定，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掌握在工会官僚的手中。所有这些都是工会官僚利用來保障自己的地位並進行資產階級的工会政策的。

他們用一切手段使通过工会集体参加工党的工人羣众不能参加工党的生活。工党的当权上層分子企圖把一切普通工人“加入”該党的意义限於交納党費和投票选举工党的候选人。工党上層分子一貫实行的出賣工人階級利益的政策的条件，正是使千百万羣众大批加入工党的工会会员政治上消極並使他們不能参加党的生活。因此，工党工会上層分子竭力設法不讓普通工人参加党的生活。

最近几年工人們开始出現的政治積極性使工党的危机增長起來，这完全是自然的，因为这种積極性的增長必然要反对机会

主义的領導政策的。

討論党的生活問題政治代表會議，在一些工会中兩年只舉行一次；在這種代表會議上通過的決議，對於那一屆黨代表會議的日程，不發生多大的影響。工会往往不舉行選舉來選出參加工黨年會的代表，在這樣情況下，黨代表會議的代表事實上是工会理事會从工会官僚中指定的。代表會議通常每年開會一次，在通過決議時，各代表團的票數等於各該代表團所屬工会的會員人數。每一個工会代表團不是單獨投票，而是按代表團、按集團集體投票的。各工会總書記代表各該工会投票。同時，如果一個代表團中有少數人反對工黨執行委員會所提議的決議，那麼在計算投票結果的時候，這種票是不單不計算在內，而且甚至把這些票算作贊成執行委員會的議案的票數。

各個大工会的總書記和工黨領導有密切關係，實際上正是他們在決定着投票的命運，儘管从1954年以後，在歷屆工黨年會上工会代表團內部的強烈的對黨的政策的不滿情緒逐年增長起來。

工黨上層分子所實行的不民主的投票方法，是保證代表會議一定要通過他們所需要的議案，不讓工人羣眾的真正的情緒反映到正在通過的議案里的補充手段。當議會上展開了威脅着工黨領導的討論時，執行委員會就用盡一切辦法來結束這種討論，而不合意的議案就干脆不許表決。比方說，1949年在南港舉行的工黨年會上，發生過這樣的事情，工黨執行委員會不滿意的議案不予討論並不予表決。向代表會議提出的選舉綱領草案“工黨黨員相信英國”沒有經過任何討論就全部通過，該草案非常露骨地捍衛壟斷資本的利益，激起了許多普通代表的憤怒。工黨和工会官僚的聯盟保證通過領導工黨的改良主義者集團所需要的議案。

說明工黨首領和工會首領聯合起來壓制由於工黨首領的政策所引起的不滿情緒的另一个例子是 1950 年 10 月在馬爾加特舉行的一次工黨年會。最近幾年來以個人黨員為基礎的工黨地方組織中存在着極大的不滿情緒。原因是，集體參加工黨時，只需要大多數工會會員通過決議表示贊成，可是工會全體會員都要向工黨繳納黨費。如果工人拒絕這樣做就要呈遞特別聲明書。並不是所有的工會會員都參加了工黨。大約在參加職工大會的 800 萬工會會員中有 490 萬人參加了工黨。這些沒有參加工黨的工會的一部分會員用個人方式參加了工黨的一個地方組織。

在馬爾加特年會（1950 年）上，以個人會員為基礎的地方組織的代表的發言暴露了工黨政府政策所引起的工人羣眾的極大的不滿情緒。在工會，工會會員羣眾並不討論代表會議的問題，工會官僚干脆就以代表的資格自居，他們保證年會通過有利於執行委員會的議案。

比方說，有 370 個議案列入馬爾加特工黨代表會議的預定的議事日程中。這些議案包括各種各樣的問題——住宅建築、國有企業和對外政策的領導等等。

關於工資、價格、利潤和生活費用的問題提出了 83 個議案。所有這些決議都是批評工黨的政策。32 個住宅建築的議案當中極大部分是要求改變工黨政府在這一個問題上的政策。幾十個對外政策問題的議案要求發展對人民民主國家的貿易關係、發展對蘇聯友好的政策。這些議案表明在每個工黨組織的許多普通黨員和右翼工黨的上層分子中間是存在着裂痕的。

執行委員會不顧大多數地方組織明白表示的立場，照舊使用各種詭計（取消一部分議案、壓制執行委員會和總委員會的會員代表團等等）並依靠某幾個最大的工會代表團的支持使它的

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問題的总结报告得以通过。

1951年10月工党年会上，領導用宣佈議會选举的办法来达到从議事日程中整个取消討論党的各个地方組織和工会的代表會議的議案的目的。这些議案大多数是指責工党政策的各个方面的。年会的全部工作只是通过当前的选举綱領。工党“民主”的真正的內容就是这样的。現在在工党中，过去所謂討論自由和批評自由，連影子也不存在了。

最近几年，工人羣众对工党領袖的政策的不滿情緒日益增長，並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現出來了，右翼工党的領導对工党代表會議的代表愈來愈施用粗暴的压力以及恫嚇手段，採取了各种方法来阻撓或干脆制止代表們对右翼領導的整个政治路綫和个别問題上所提出的批評。例如，1952年秋天在莫坎比举行的工党年会上，事实眞象暴露了。原來工党地方組織按規定可选七个人参加执行委員會，它們选出了六个比万反对派的代表作执委，狄金和杜遜於是公开威脅这些不馴服者，以分裂和工会对工党停獲补助金作为威脅手段。

最近几年，工党代表會議建立了一种限制普通代表發言時間的制度，这种制度，取消了普通代表發表意見的可能性。同时，主席团的人員以及过去的大臣們却滔滔不絕地替反人民的領導政策作辯护。阻撓普通代表來討論極其重要的政治問題的另一手段是在代表會議上常常發表与代表會議所討論的問題沒有任何关系的談話。这样，工党的右翼領袖在“言論自由”的掩护下造成这样一种情况，使代表會議的基本代表羣众閉上了嘴巴，从而剝夺了他們的似乎是右翼工党領袖所关切的言論自由。泰晤士河岸的斯特雷福和京斯頓的工党地方組織在1952年9月29日到10月3日在莫坎比所举行的年会的議案中，不得不承認工党代表會議帶有“檢閱的性質”，它絕對不是制定政治路綫的會

議。

工党代表會議所討論的那些議案也表現了右翼工党領導方法的特点。从各地方組織向代表會議所提出的許多議案中拟定一个“部分議案”提出來討論和表決。在編纂这部分議案时，工党的領導竭力在可能範圍內删除其中所有他們不喜欢的地方組織議案。

右翼工党的領導人追隨着踐踏了自由主义和資產階級自由的原則的資產階級，粗暴地踐踏該党內部的民主原則。他們害怕工人的階級意識增長，竭力麻痺羣眾的積極性。

發言反对右翼領導的政策的人常常被工党領袖們驅逐出党。被驅逐的都是維護和平、反对戰爭販子、支持斯德哥尔摩禁止原子彈的宣言、拥护五大國締結和平公約的人。1950年6月工党执行委員會通过了一項決議，声明積極拥护和平和留在工党內兩者不可得兼。英苏友好协会会员被开除党籍（1944年和1948年工党代表會議对這問題都有过決議）。爭取和平並反对政府政策的左翼工党黨員議會代表們相繼被开除出党。

操縱工党的一批首領竭力压制那些對於他們的政策不滿的人。在迫害進步分子方面，工党是其他資本主义國家右翼社会党的“榜样”。

工会上層分子是工党首領在和進步分子作斗争的忠实的同盟者。工会的旧思想，工人只應該关心“微小的利益”，而解决一般任务則是有產者的权利——和以前一样仍然在工会普通会员的头腦中，頑強地存在着，尽管表現的形式有所不同。如果說，过去工会官僚在議會选举当中保證投票贊成自由党时，欺騙工人說，“有学識的人”（即資產階級）替他們去搞政治，那么，現在他們就竭力向工人說，工党上層分子替他們去搞政治了；說工党領袖既然是社会主义者，工人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說他

們在政府里也好，站在反对党也好，关怀的都是工人的政治利益。旧的行会的狭隘思想、工联主义的思想就是这样在新的条件下通过工党首領和工会官僚起了帮助英國金融寡头統治英國工人羣众、分裂工人階級的作用。

以前工会上層分子站在較之工党上層分子更“左”的立場，或者工党上層分子比工会上層分子更“左”。現在，他們之間一致起來了[⊖]。工党执行委員會的成分在組織上保證了这一情况。执行委員會由工党年会选出，其中有12个工会代表，一个是参加党的合作社組織的代表，7个是工党地方組織代表和5个工党妇女部代表。此外，党总書記摩根·菲利浦斯从一屆代表會議到另一屆代表會議自动成为执行委員會的委員。工党議會党团的領袖是执行委員會的委員。

除了执行委員會以外，为了要“協調”工会总委員會、合作党和工党的活动，又由这3个組織各派8人共24人組成一个“全國劳工委員會”。它的任务是討論需要合作的問題，並發表一般政治問題的声明。

党的領導机关的機構本身保證了工会上層分子、合作党上層分子与工党上層分子的联盟。

和工会上層分子联盟給現在的工党的領導一种組織上的和政治上的力量，使工党領導得以籠絡羣众，压迫進步分子，使英國壟断資本家的政策得以实现。

在英國工会集体加入工党成为工党黨員的条件下，这种工党上層分子和工会上層分子的联合，正是工党对英國工人階級

⊖ 这决不是說，在資產階級統治受威脅的时期，工党上層分子和工会上層分子在分工中决不能在个别問題上重新採取不同的立場——一个比另一个更“左”些。工党上層分子的内部的情况也是这样的。

羣众仍然还發生影响的一个極其重要的原因。

右翼工党分子依靠着英國的工会机关，依靠着工会官僚，因此他們对資產階級說來，仍然有用。那些跟工人階級格格不入的家伙們，現在还能够保持自己在羣众中的影响，秘密就在这里。

列寧再三指出过，如果資本家不通过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領袖把工会掌握在自己手里，而实行資本家們的政策，整个資本主义的机器很快就会垮台了。

包括許多分支的工会的总机关及其和工人、工人儲金会經常的联系、它百年來的傳統，乃是帮助工党使羣众服从資本家，实行壟断組織的政策和欺騙工人的力量。

由於右翼社会党人在意大利、法國的工会中失掉了大多数，因此他們就被“懸在半空中”，在这些國家工人階級的基本羣众中丧失了威信。抓住了工会的領導权的英國工会上層分子比起大陸上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來，却大大地加强了工党的力量，正是因为英國工会参加了工党，几百万工人被集体地吸收到工党里面來，同时又無法影响工党的政策。

法朗西斯·威廉斯在艾德禮所著“工党的前途”一書（1948年出版）的序言中宣称，正是工党政府和工会上層分子之間的“合作”才使工党分子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全民的政策”，而“避免了內部巨大的震动和丧失威信”。威廉斯承認，如果沒有工会上層分子的支持，那么，英國資本家在工党政府的“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得以实现的加强剝削和提高劳动强度，就不可能了。

从“冻结”工資的事实可以看出工会官僚和工党上層分子的联盟在实现壟断政策方面起着什么样的作用。1948年，职工大会总委员会同意工党政府在“冻结”工資問題上的政策。这是为了壟断組織的利益对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進攻。1949年11月，

在实行英鎊贬值之后，总委员会不顧物价不断上漲，号召工会放棄提高工資的要求。但是，在1950年1月执行委员会的年会上，僅僅以 625,000 票多数通过了总委员会的这一路綫。在此以前，工会的許多極重要的代表會議在羣众的強大的压力之下，不顧工会首領的压制，通过了反对“冻结”工資政策的要求的決議（例如，在1950年1月初，在礦工联合会代表會議上就曾經通过这样的決議）。

在以后的几个月中，許多联合会（机器制造工人联合会、商業雇員联合会等等）通过了要求適應生活費用增長來提高工資的決議。

在布萊頓工会年会上（1950年9月初），职工大会总委员会在工資問題上的态度受到了斥責，會議以 377,000 票多数通过了工会得以在本身企業中要求提高工資的权利的決議而不顧艾德礼号召軍备競賽，号召工人勒緊褲腰帶，拥护自己工会代表會議的決議的那些工会代表团，投票反对总委员会和工党政府的政策。

这絕不是說，工会的領導者轉变了，並走上反对工党和总委员会上層分子的立場了。这不过是手腕而已。

迫使資本家提高工資，最低限度要適應物价的增長的唯一现实的手段乃是罢工斗争。但是宣佈工人的罢工是非法的正是工党政府。为了禁止罢工，甚至採用了十九世紀的法律。比方說，为了处罰1950年末領導煤氣企業工人罢工的7个領導者，採用众所周知的1875年頒佈的“保护私有財產法”，这条法律規定罢工要坐牢和罰款。只是由於引起了工人的憤怒、由於害怕工人，法庭才宣告罢工的領導者無罪。

1940年夏季，邱吉尔—艾德礼联合政府頒佈了全國仲裁法令（1305号法令）和特殊的“条例”，根据法令和条例，建立了

由資本家、官僚和工会代表組成的特殊的仲裁法庭。凡是不經過仲裁法庭批准的罢工都被宣佈为非法。工党政府掌握政权后，法令延長到無限期。这些法庭事实上是壟断組織進攻工人階級的工具。企業主和工党政府利用这些法庭來剝奪罢工权利，任何一个罢工都被宣布为非法。工党政府採用1920年的非常法令，調遣軍隊破坏正在举行的罢工（比方說，对付碼頭工人罢工、倫敦運輸工人等罢工就是这样的）。法庭一切活动的特点是作出判決，維護資本家的利益，反对工人。

取消1305号仲裁法令乃是为提高工資而斗争的極其重要的条件。

工会官僚根据代表會議的決議，決議上是有正式的义务投票反对凍結工資的政策，但他們却不顧許多代表的憤怒，以相当多数的票拒絕關於取消1305号法令的建議。反动的“泰晤士报”代表倫敦城[⊖]的立場，報導了（1950年9月8日）代表大会上有关仲裁問題的表決，它这样寫道：“强制仲裁仍然保留下來了，因此仲裁机关將要和从前一样根据政策的要求照顧國家的利益……。工会像过去一样，並不願意跟政府为难，它將注意政府的观点，即使現在工会自己的中央組織不再領導它們；当然，工会的首領要想限制过分的要求是会更加困难的，並且过一个时候，这方面的压力会愈來愈大……。投票支持强制仲裁这一事实表明工会（事实上是它們的右翼上層分子——德伏尔金注）並不反对自願接受对工資的控制，它們認為这是有益的。”

这个英國資產階級最老的机关報的声明的意思是很明白的。羣众行动起來了，工会首領在耍手腕。他們由於害怕工

⊖ 英國的金融中心。——譯者

人羣眾而被迫投票反對工黨政府的政策，事實上他們是支持這一政策的。強制仲裁保證了這一政策，事實上他們是支持這一政策的。強制仲裁保證了這一政策的實行。“泰晤士報”害怕的並不是工會官僚，這是自己人。英國壟斷組織機關報放心了，因為強制機構是可以順利地為壟斷組織服務的。“泰晤士報”害怕的是什麼人呢？它害怕工人羣眾，因為工人羣眾的憤怒連 1305 號法令也一併會取消的。為了要防止這一情況，倫敦城的機關報在上述這篇文章中對工會領導者們作了詳盡的說明，告訴他們以後怎樣籠絡工人。

布萊頓職工大會年會後還不到一個半星期，工黨政府首領艾德禮就在議會上聲明，由於急劇加強備戰，因此得繼續向工資發動進攻，並聲明政府並不打算限制利潤和物價，職工大會在它的決議中要求的正是這一點。

工黨政府只是在 1951 年夏天，看到無產階級的憤怒大大地增長起來，並由於害怕喪失在羣眾中的威信才取消了 1305 號法令的。現在右翼工黨分子、職工大會總委員會的首領和資本家們指望着工會本身的工會官僚能保證在每一個企業中和資本家協議破壞罷工。

1951 年秋，議會大選後，英國職工大會總委員會的反動領導支持保守黨政府“凍結”工資的路綫，他們的理由是必須要為“共同的利益”而犧牲，即為了壟斷組織的利益而犧牲。1952 年 9 月初，在英國職工大會年會上這些右翼領導在“支持”增加工資的旗幟下，違背工會會員羣眾的意志，偷偷地作出了相應的決議。

值得指出的是，某些在自己工會代表會議上公開決定投票反對“限制”工資政策的工會首領（比方說，成衣企業工人聯合會）卻投票贊成這一政策。

這部以“凍結”工資為中心的鬥爭史鮮明地說明了工會上層

分子和右翼工党分子之間的分工，說明了他們在軍備競賽和工人羣眾不滿情緒正在增長的情況下是如何靈巧地來完成壟斷組織減低實際工資的要求。

威廉斯在前面提到的艾德禮所著那本書的序言中寫道，正是由於工党政府和工会首領的密切聯系（這是麥克唐納沒有取得的），工党政府終於避免了麥克唐納第二屆政府在1931年所遭到的那種破產。對於工党領袖和工会領袖說來，最可怕的是共產主義者在英國工会會員羣眾中間影響的增長。因此，和1947年向工人階級實行進攻的政策同時，對共產黨員開始了野蠻的進攻，在工会當中特別嚴重。

工党和工会領袖向共產黨進攻首先是从工会開始的。1947年11月19日工党總書記摩根·菲利浦斯開始發動這一進軍。菲利浦斯的談話全部都是誣蔑英國共產黨的鬼話，他號召工会官僚免除共產黨人在工会中的一切職務。他歇斯底里地要求採用一切辦法不容許共產黨員和普通工党黨員以及工会會員之間有任何聯系。

這是工党政府實行“凍結”工資政策、“清洗國家機關”和“檢查忠誠態度”的方法，把共產黨員從國家機關中驅逐出去的開始（1948年3月）。

但是，右翼工党分子的號召在大部分工会組織中間，並沒有取得結果。於是在紙幣貶值兩個月以後，在壟斷組織向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發動新的進攻的前夕，總委員會號召工会“根除共產主義”，禁止把共產黨員選進工会和擔任職務。這些號召仍然沒有得到壟斷組織所希望的結果。

運輸工人工会總書記狄金發表演說誣蔑共產黨，要求禁止共產黨的活動。所有這些狄金分子、杜遜分子、勞瑟分子等等起來反對共產黨的原因是由於他們為壟斷資本効勞，反對工人階

級的政策而在羣眾中引起了嚴重的不滿情緒。

壟斷組織向工人階級發動進攻，支持軍備競賽，大大地縮小了工會上層分子提出任何改良問題來欺騙羣眾的可能性。因此他們為了實現壟斷資本家的要求而採用的一切鎮壓和欺騙的手腕愈來愈粗暴了。

英國工會的首領一心要破壞世界工會聯合會——全世界工人在歷史上最大的職工聯盟。當着這一政策在全世界工人階級面前被揭穿的時候，英國職工大會總委員會上層分子以狄金與勞瑟等為代表，不顧由於這種行動而激起的憤怒的普通工人的意志，宣布英國工會退出世界工會聯合會。

和美國工會勞聯和產聯的右翼分子一起，1949年用美國百萬富翁的錢，在他們的指使下，建立了“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在這一“國際”大會上，它的首領們主要是誣蔑共產黨，誣蔑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頌揚美“援”，並為軍備競賽作辯護。

三 工黨上層分子和英國統治階級的關係

上面我們已經考察了工黨上層分子與工會（和合作黨）上層分子的聯繫和關係，考察了使工黨能掌握羣眾使其服從資本的工黨的機構。現在我們應當來考察一下工黨上層分子的另一個方面或另一付面孔——工黨上層分子和英國統治階級的關係。

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指出過，英國工會首領、整個英國工人貴族的特点，乃是向資產階級卑躬屈節，力圖在一切方面——無論是在日常生活還是在社會生活方面摹倣“上等階級”。

恩格斯在1889年12月7日致左爾格的信中曾寫道：

“這裡最令人作嘔的是浸透到工人骨髓里的資產階級的‘體面’。社會被劃分為數不清的、無疑是大家公認的等級，其中每

一个单独的等級又都有自己的‘高貴’，每一个等級又都浸透着尊敬‘优秀的’和‘上等的’等級的天賦感情。这种社会等級划分是如此悠久和如此穩固，資產階級不需費多大力气，就可以欺騙羣众。比方說，我着实不相信，在約翰·伯恩斯內心里使他感到自豪的，是他在本階級里的名望，而不是在曼寧紅衣主教、市長以及一般說來在資產階級那里享有的名望……甚至連湯姆·曼本人——我認为他是这些人当中的佼佼者——也喜欢說，他將怎样去市長大人那里吃早点。”^①

列寧和斯大林曾經不止一次地指出过英國工党分子对有產者的政权的卑躬屈節和諂媚。

斯大林說，英國工党和工会的領袖是被資本主义色彩蒙住了眼睛、被資本的威力征服了的首領。这些首領幻想“出入头地”並和“富有者”結合。

毫無政治气節——这是力圖迎合資產階級的結果。机会主义者之所以毫無政治气節是由於他們那种迎合資產階級的口味、討好“老爺們”、博得他們讚賞的強烈的願望。顯然，無論在过去和現在，这都是資產階級收買工人“首領”的基礎。

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表述工人貴族的本性時曾指出：問題的實質在於資產階級收買工人上層分子。至於收買的形式則是極其多种多样的。列寧說，一切問題都可歸結为收買。这是通过数千种不同方式而實現的：通过提高最大中心城市的文化，成立教育机关，为合作党首領、工会首領、議會首領安排下几千个空缺。

工会和工党職員的理想一向都是得到肥缺，而最終理想則是爬進“上層社会”。

^① “馬恩全集”俄文版第28卷第165頁。

比方說，1935年“新政治家與民族”周刊赤裸裸地問道：“如果出類拔萃的工黨黨員到上層社會的客廳里，在資本主義主人賞給他們的甜東西面前搖尾巴，流口水”，人們將會怎樣理解工黨關於社會平等的宣言呢？

這些，恕我說，工人領袖很快就脫離了把他推選出來的工人隊伍，並且很容易地浸透資產階級思想，沾染資產階級習氣，把博得資本家的讚揚，承認他們的“體面”即資產階級的“威儀”當作最大的成就，這是一點也不奇怪的[⊖]。

上面指出，自1918年工黨通過新黨章後，許多小資產階級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湧入了工黨。工黨對資產階級隊伍中形形色色的騙子手和野心家敞開了大門。下面的一個事實正好說明了這一點，比方說，工人的最兇惡的敵人、壟斷資本的代表、百萬富翁法西斯分子摩斯里加入工黨以後不久，在1928年伯明翰工黨代表大會上就以工黨首領之一的身分出現並立刻被選入執行委員會。

為資本服務以及這個“廣泛的黨”的整個結構使工黨分子往往把貴族和壟斷組織上層分子的直接代表提拔為議會的代表。現在讓我們看看“英國工黨的面貌”一書作者、德國右翼社會民主黨人魏特海默是怎樣描述工黨的這些特點的：“工黨為了要保

⊖ 議會議員工黨分子摩里遜於1935年曾寫過：“當出身微賤的工黨分子進入下議院時，上等階級的尊敬把他感化了。如果他成了一個重要人物，他就能在皇宮里、俱樂部里、客廳里和城郊別墅里和偉大的著名人物見面。”

英國的進步歷史學家摩爾頓指出，1906—1914年勞合·喬治內閣時期，在階級沖突尖銳化時期，工黨“從來不敢確定獨立的政策，是想採取足以威脅政府生存的任何行動。唯一的一次，這一次工黨分子真的發怒了，——這是因為愛德華七世認為無須邀請工黨的某些首領到白金汗宮參加正式宴會。”（摩爾頓著“英國史”第421頁，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1950年版。）

証自己在大選中獲得勝利，力圖尋找能夠稱為‘民族’人物的候選人，如果找不到这样的人，那至少也要是除了有个人的动人之处以外，还要有头衔、社会地位或巨額財富的人，最好是三者兼備的人……錢、地位和头衔与个人功績相結合——这就是工党在挑选自己的候选人时遵循的原則。我們發生过数十次这样的事，这就是推举那些表示同意担負全部或部分个人选举費用的人們做候选人。实际上，这就讓金融寡头鑽入了工党。”^①但因为工党領導屬於議會党团，这就是說，議會党团对工党的政策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最近 15 年來，工党上層分子隊伍中不僅有中等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而且還有壟斷資本的直接代表。同时，由於工党变成了英國資產階級的第二基本政党，並由於工党已經執政，於是出現了工党和工会首領和英國的金融寡头直接合流的局面。合流的完整意义是：它們之間確立了个人的联合。

工党一面保持資產階級在工人階級中的主要社会支柱的作用，一面通过以个别黨員為基礎而建立的地方組織系統，通过工党的上層分子和居民中的資產階級集团，特別是和金融寡头結合起來了。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八大股份公司的領導人愛米爾·戴維斯，英國金融寡头大代表人物之一、費邊社社員約翰·凱德伯里这样的大資本家，却在工党上層分子中佔据了顯要的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貴族和金融寡头的許多代表加入了工党。構成英國金融寡头核心的大銀行团的領導人——洛希尔勳爵就是一个例子。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工党執政不久

① 魏特海默著“英國工党的面貌”第 142 頁，蘇聯國家社會經濟出版社 1931 年版。

加入工党的。这位國際銀行团的代表在回答記者提出的他加入工党是否和他的商業利益矛盾問題時說，他的生意和他的工党黨員的身分相处的非常和睦。这种答复的意思是：这对作为資本家的他是有利的。勳爵兼銀行家洛希尔很快就得到了好处。他被任命为“英國航空交通公司”和“海外糧食儲備公司”的經理。从而洛希尔就有了合法掠奪國庫的可能性。“海外糧食儲備公司”經理洛希尔在和东非种花生的組織進行的投机活动中，以及在由該公司在國有旗帜下組織的進一步掠奪英國在非洲的殖民地的居民的事業中“賺了”不少錢。工党分子內还有这样一些財政資本上層分子的代表人物：如“英國鋼鐵公司”經理、16个大壟斷公司的經理哈德尔，“化妝品工厂主协会”主席李翁納德·莫特岑，銀行家、工党議員洽萊特，旅館業托辣斯和許多出版社的主人依普曼勳爵和其他等人。

工党的領導機構反映了工党一工会領導对英國統治階級的从屬性。

1949年，为了慶祝工党成立50週年，工党的領導出版了述說該党歷史和政策的三卷集。在該書第三卷中特別記載了該党領導幹部人員的材料[⊖]。該卷援引了構成工党上層分子的48个党执委会委員和大臣的自傳材料。

48个領袖当中有40%过去是英國資產階級古老的政党——保守党和自由党的成員。工党領袖艾德禮过去是保守党黨員。工党思想家拉斯基过去是自由党黨員。工党政府前內政大臣卡特尔·艾得是从自由党跑到工党里來的。他曾禁止工人遊行，袒護法西斯匪徒，这一切得到了他过去所屬的自由党方面的

⊖ 參看 “The British Labour Party, It's History, Growth, Policy and Leaders”, 第三卷, 1948年倫敦出版。

完全贊同。工党政府前民用航空大臣溫斯特勳爵和英國前上議院議長周埃特以及其他等等都是自由黨員。

這些前自由党黨員和保守党黨員轉到工党來絕對並不需要拋棄自己的階級觀點。他們好像換衣服一樣輕易地換了党。他們仍然是和過去一樣的有產者。他們帶着成為英國資產階級的特征——政治上的偽善，毫不費力地就打扮成工人之友。難怪艾德禮常常強調說，工党是旧自由党的繼承人。這種比喻可能使從前的資產階級民主自由派以及為廢除糧食法而鬥爭的鬥爭同盟感到氣憤，因為他們是十九世紀為反對地主和托利党[⊙]激烈地鬥爭過的，這至少是他們的功勞，可是工党上層分子和保守党人在基本問題上的立場是完全一致的。

工党領袖按其出身說來是和英國統治階級密切聯系着的。工党領袖艾德禮是從大商業資產階級出身的。在我們所談到的三卷集工党官方文件中，大吹大擂地說“艾德禮的商人出身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紀以前”。工党分子的另一領袖摩里遜是倫敦警察的兒子，三卷集特別着重指出摩里遜繼承了自己的父親的“善行”，在這個家庭里，人們把執行警察長的指令和“體面”看成“至寶”。

工党里面還有一個台柱克利浦斯（死於1952年），過去任財政大臣時為英國壟斷組織的刊物不斷的讚揚過，他出身於一個擁有若干大輪船公司的古老的貴族家庭。工党經濟問題“專家”和前工党内閣成員麥休是大工廠主的兒子。工党政府前“國防”大臣辛威爾是大成衣商的兒子。前糧食大臣和前陸軍大臣約翰·斯特拉徹是大資產階級刊物“旁觀者”所有主的兒子。海克特·馬克一尼爾，有一個時期曾經代表英國出席聯合國，后任

⊙ Tory, 保守党的前身。——譯者

工党政府蘇格蘭事務大臣，出身於巨大的造船業資本家的家庭。許多以前英國大臣和黨的領導者都是從牧師和商人的家庭出身的。因此，按出身來說，英國工黨的許多領袖都是和英國的大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密切聯繫着的。

現在我們來談談48個工黨領袖的職業。

工黨的許多領導人是律師（13個律師）和資產階級教授。這些人大約占工黨領袖的一半，大家知道，大公司的律師、法律顧問和壟斷組織密切聯繫着的。他們是憑着資本家服務的名望而飛黃騰達的。他們料理公司的事務，往往自己就是股東，他們和金融寡頭有千絲萬縷的聯繫。艾德禮、克里浦斯、周埃特勳爵等都是大資本主義公司的律師或法律顧問。工黨主義的思想家休·達爾頓、亞瑟·格林伍德等等都是資產階級教授，他們把壟斷資本的經濟家和政治家的思想帶到工黨文獻中來，並以費邊主義和工黨主義的“社會主義”巧妙地掩飾它的思想。但是在工黨領導的組成中也有公開代表英國大資本家的人。諾爾·伯克爾是機器製造業公司“伯克爾·伯金斯有限公司”的大律師；前供給大臣約翰·斯特勞斯是以他得名的“斯特勞斯五金公司”的股東；下議院前預算委員會副主席法朗西斯·鮑爾斯是大保險公司“比爾保險公司”的律師；蓋茲克爾最初是燃料和電力大臣，然後做過財政大臣，他是藝術翻印公司的經理和電影製片業企業主辛迪加的顧問。

因此，金融寡頭在工黨內閣中不僅有自己的代理人，而且也有壟斷公司的大律師和壟斷公司的成員。

英國壟斷資本家之所以讓工黨政府執政，不但是因為他們相信工黨政府一定會捍衛他們的利益，還因為工黨政府大部分成員都受到相應的教育。大家知道，伊頓、牛津、劍橋，都是貴族學校，這些學校培養出英國的資本家和貴族的“精華”。英帝國

主义的最反动的活动家——奠基在剝削千百万人民的殖民掠夺和奴役制上的狂妄無耻的代表都是从这些学校出身的。現在工党的領導大部分也是伊頓、牛津、劍桥出身的。

艾德禮，彼蒂克·勞倫斯——前印度和巴基斯坦事務秘書長，前工党政府軍事大臣約翰·斯特拉微、拉斯基、达尔頓、周埃特、蓋茲克尔等等都在牛津和伊頓受过教育。所有工党内閣的大臣和領導者有一半以上（48人中有25人）在國內極其貴族化的学校受过教育、訓練。因此，他們之竭力为英國金融寡头的利益“工作”並且替英帝國主义歌功頌德（尽管英帝國主义日暮西山气息奄奄，但却是“本國的”）又有什么奇怪呢？

列寧關於帝國主义时代的政府和大資本的上層分子的关系寫道：“……甚至有关著名政治活动家、議會議員、高級負責人等等的个人成分的材料都顯露了經濟統治和政治統治的不可分割的联系……”^①

所有關於工党領導上層分子的个人成分的材料都表明了該党和英國統治階級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但是問題不單在於前任大臣和工党执行委員會委員，問題還在於这些人下面还有人数众多的議員——下議院議員。金融寡头在工党的議會小集团中有自己許多公开的代表。他們加入各个議會委員會，利用这些委員會可以通过法律草案，或者当法律草案在議會通过时加以適當的修改。

工党議會党团的成員中除了律師、商店法律顧問，新聞記者等外，还有不少是企業家、股份公司股東、壟斷企業的經理和董事。比方說，工党議員約翰·戴蒙是金融寡头著名人物之一；16个公司的經理約翰·麥克戈文、麥凱及其他等人都是大工業家

^① “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十九卷第212頁。

或大股東、食利者。

在1945年被選入工黨議會黨團的成員中有136個工會官僚，156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代表，照例這些人都出身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另外還有41個資本家。

在1950年2月23日被選入工黨議會黨團的成員中有121個工會官僚，12個事務所和保險公司職員，40個律師，60個不同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代表（新聞記者、醫生、教授），22個資本家（企業主、股份公司經理等）。

工黨在最近一次普選（1951年10月）的候選人名單里有48個大資本家——大資本主義公司的經理和管理員。

但是，工黨上層分子與壟斷資本的聯繫並不僅限於此。工黨的所有機關刊物，直到中央機關報“每日先驅報”都與壟斷組織有聯繫。1911年倫敦印刷工人在罷工時以公報形式創刊“每日先驅報”，工黨把它變成了自己的官方報紙。“每日先驅報”的編輯蘭斯伯里成了工黨的首領之一。1922年，私商“奧登出版有限公司”成了“每日先驅報”的主人，掌握股票51%，而職工大會總委員會只擁有股票40%。股票持有人在報館內部的力量對比表現在董事會的組成中。董事長和五個董事都是由康采恩任命的，而總委員會任命的只有四個董事。這樣，報上只能看到與佔有報紙的壟斷資本家的利益和觀點一致的東西。

以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為對象的工黨機關刊物“新政治家與民族”周刊，是巧克力糖廠主百萬富翁拉溫特里的財產。英國銀行的前任經理與最著名的壟斷資本的經濟學家——凱恩斯勳爵，直到逝世為止，一直是“新政治家與民族”雜誌公司的主要股東之一。

工黨執政後的必然結果是議員及不少工人貴族出身的工黨分子和小資產階級分子進入國家機關。現在在任何地方，在所有

的資本主義國家里，國家機關都是服從壟斷組織的。這就說明了列寧和斯大林曾多次指出過的情況：英國資產階級具有豐富的政治經驗並善於駕馭工人貴族、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等等，善於欺騙羣眾。大家知道，工黨分子基本上保留了保守黨人任命的官員。但是工黨政府总是用自已人部分地充實了國家機關。這意味着數萬工黨分子獲得了國家機關中的地位，並通過許多方法與“企業界”，與大資本聯繫起來。初出茅廬的工黨官僚極力保持與加強國家機關，他們在國家機關中得到了不少的津貼。同時他們有可能從企業家、康采恩獲得鉅額賄賂，請求執照，請求許可建築，請求協助領補助金等。

工黨政府在英國執政六年的事實本身已給工黨官僚的成長造成了最廣泛的可能性，並為壟斷組織收買工黨和工聯官僚开辟了新的各色各樣的道路。

與進行帝國主義戰爭和準備新戰爭，使國家機關服從壟斷組織相聯繫的資產階級國家官僚機關的擴大，對工人貴族和官僚的上層分子說來是有利的。這個集團關心的就是使國家進一步地服從壟斷組織。在這種條件下，擴大國家壟斷機關，乃是收買工人官僚的形式之一。

上面已經指出，由於英國資產階級從剝削殖民地中取得的殖民地貢賦的縮減，部分地削減了高工資工人上層分子的人數。英國的金融寡頭用大量增加工會官僚——不同等級和不同類型的工黨官僚、議員、新的勳爵等等來補償減少的工人貴族的數目。收買工黨（和工會）上層分子中的這一部分人是依靠國庫即依靠增加工人階級的稅額來實現的。通過直接稅和間接稅來掠奪工人——這是戰後時期工黨和工會官僚人數增長的來源。除了這些“合法的”收買工人貴族的形式以外，資本家還通過許多廣大羣眾不熟悉的形式，即採取在工黨官僚和生意人之間簽訂

合同的形式來直接收買工黨上層分子。在工黨執政時，特別廣泛地採用了這種形式。當然，工黨官僚和生意人簽訂合同是秘密進行的，真象暴露只是偶然的事情。1948年末成為特別法庭審訊對象的悉德尼·斯坦里舞弊案是最可恥的一樁。許多最顯要的工黨官僚通過這一位斯坦里得到賄賂替資本家和資本家集團的營業進行安排。接受賄賂來進行各種有利的勾當，和各個公司談判到這些公司去擔任職務問題，大小宴會，駭人聽聞的貪污行為以及上層工黨官員的腐化——這就是特別委任調查這件丑事的法庭成立後暴露出來的東西，儘管總檢察長蕭克羅斯竭力掩蓋和了結這一案件。

達爾頓曾通過斯坦里的交涉想獲得百貨公司經理的職務，年薪10,000鎊。一個大公司曾向吉布遜提出請求允許發行股票。列寧曾經指出，收買官吏並為他們由為國家機關服務轉而為私人公司服務做好準備，這是壟斷資本時代通常的現象。事實正是這樣。大家知道蕭克羅斯由於害怕繼續揭穿這些事情，草草了結了這一丑史。但是，就是這些公開出來的東西已經使我們能看出工黨上層分子腐化、收買以及和壟斷組織勾結的驚人的圖畫了。

還有另一種方法來保證工黨上層分子完成英國統治階級的意志。英國大臣在辭職以後，終生都得到很高的薪俸。在這種制度下，維護資產階級國家是工黨大臣們感到物質興趣的事情，因為資產階級國家保證他們的富翁的地位。

個人通過國家機關和壟斷組織勾結，不單是通過中央國家機關，而且是通過地方自治來實現的。成百成千工黨分子——工會官僚也包括在內——參加了各個城市的自治機關，這些機關是和資本家們的壟斷組織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系的，特別是和各種建築業、修理業、市政公用設備方面聯系着的。和住宅建築、

学校、水渠、道路方面的联系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各个自治城市所進行的建筑，甚至在工党政府时代也是通过和建筑業壟断組織訂立包工合同的。为了要獲得玻璃、磚以及其它建築材料的有利的价格，即昂貴的价格，为了要獲得有利的包工合同，各个建筑業的壟断組織利用一切手段來收買。

正是由於採取这种收買、行賄的方法，特別在建筑業和建築材料採購中，資本家獲得了大量利潤。例如，根据“工人日报”引証的材料，各个買賣建筑木材的股份公司、各个油漆企業等等都取得了特別高的紅利^①。

工党在变成英帝國主义的第二大党之后，仍然是資產階級在工人階級中的最重要的社会支柱，它服从壟断組織的支配。許多工会官僚進入國家机关，和各个壟断組織一鼻孔出气，順从地完成他們的要求，通过自己一定的環節直接轉变到統治階級的队伍当中，和他們打成一片。出現了兩重过程。一方面各个壟断家族的成員進入工党，佔据許多重要职位並保證該党对壟断組織的忠誠。另一方面，党的上層分子自己通过國家机关和壟断組織联系起來。

这种情况也通过授予工党首領貴族头衔的形式表現出來。

上述的工党政府成員及其領導人物48个人中有四分之一是勳爵。此外，有一非內閣閣員工党分子也是勳爵。勳爵的头衔也授予职工大会总委員會委員、礦工联合会主席劳瑟和总委員會总書記狄金。許多工党分子——上議院議員——是資本家。世襲貴族和上議院終身任职並不領正規薪金，但这至少是工党上層分子用來和英國統治階級联合的有效的手段。勳爵的头衔不單滿足工党首領們的虛榮心，头衔本身是交易所的珍品，英國大

① 參看1950年5月29日“工人日报”。

資本家出高价收買。勛爵头衔保証在私人公司內，在股份公司的董事會里，在和貴族的名字有密切联系的保險公司內得到肥缺。难怪到处吹嘘自己是“民主主义者”的右翼工党分子現在關於廢除委任的、世襲的上議院——英國金融寡头的支柱問題連听也不想听了。1918年工党綱領中關於廢除上議院的条文在后來的綱領中一律取消了。1952年秋在工党的代表會議上許多地方組織的代表提出把廢除上議院的口号加到工党的新选举綱領当中，右翼上層分子坚决反对这一“駭人听闻”的要求，尽管这一普通的建議的提議既沒有要求取消貴族的头衔，也沒有提議取消和这些头衔有关的特权。

最后，工党的國有化——建立一些和私人壟斷組織並列、並为私人壟斷組織服务的國家壟斷組織成为工会官僚進一步服从壟斷組織上層分子的手段。早在战争时期，职工大会总委员会就通过了一項決議，凡是成为國家職員的工会官僚都要被解除工会职务。这样作是为了不“束縛工会官僚的手脚”，使他們有可能順暢地佔据國家机关中的肥缺。

根据工党制定的法令，國有工業的中央管理局成員有工会官僚一、二人參加煤炭、鐵路等等的区管理局。

1949年6月2日党代表會議上，有几个代表說管理局的人員——前工会官僚——是企業家，說他們是新的資本家。这不是偶然的。

因此，國有企業管理局也和國家机关一样是工联官僚和壟斷組織联系以及为壟斷組織效劳的补充手段。

* * *

总之，工党上層分子和工会官僚在一起保証造成了这样的情况：成百万工人加入了工党，但並不是積極參加这个党的活动。同时这个代表工会官僚和小資產階級联盟的上層分子和英

國統治階級密切聯系着。

列寧關於工黨寫道：“當然，工黨成員大部分是工人。但是，是否是真正的工人政黨，這不僅取決於它是否由工人組成的，而且取決於誰領導它以及它的行動和它的政策的內容是怎樣的。只是後者才確定在我們面前的是不是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政黨。從這一唯一正確的观点看來，工黨是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政黨，因為它儘管是由工人組成的，但領導它的是反動分子，——是完完全全按照資產階級精神進行活動的最壞的反動分子……。”^①

從上面這段話我們看到，工黨沒有允許通過工會集體參加工黨的工人真正參加黨的生活，至於以個人黨員為基礎的工黨地方組織的基本黨員羣眾，政治上消極情緒的原因是和使工會基本會員羣眾政治消極的原因不同的。這是由於地方組織首先是議會和各個地方市政府進行競選運動的工具。工黨的僱傭官僚首先是選舉工作人員，選這些人的標準就是看他們保證競選運動的才能怎樣。工黨地方組織的黨員基本羣眾和黨的聯系表現在工作人員每三個月到黨員家里收黨費。地方組織本身的事務都是由一小撮積極分子和黨的官僚來決定的。工黨議會黨團和工黨執行委員會之間的關係更加使地方組織只能執行選舉機器的職能。

在工黨里面起主要作用的是代表黨行動並不受執行委員會領導的議會黨團。議會黨團的領袖同時就是黨的領袖。而工黨代表會議每年選出來的工黨執委會的主席是個擺設。議會黨團的重大作用以及工黨代表會議在極大的程度上有名無實的性質着重表現在1952年秋工黨代表會議上所發生的事件中。參加工黨

① “列寧全集”俄文版第31卷第232—233頁。

領導30年的首領之一摩里遜在執委會選舉時落選了。這件事實際上表現了各個地方組織的黨員對於右翼工黨領導的思想和政策的辯護人在政治上的不信任。這種政治上的失敗並沒有阻止摩里遜在代表會議上發言，他發言的意思是：“你們不選我進執委會，但是我是工黨議會黨團的副主席，憑這個資格，我仍舊和從前一樣是黨的副領袖。”因此，代表會議上明顯表現出的對摩里遜在政治上的不信任，並沒有能改變任何東西。摩里遜照舊是工黨的事實上的領導者。摩里遜這件事鮮明地說明了右翼工黨上層分子利用來領導黨並決定黨的政策的方法。

作為議會選舉機器的工黨的作用以及議會黨團首領在黨內的作用，是和工會上層分子與黨的右翼領導之間的关系完全適應的。吸收廣大工人羣眾到黨里面來，但是使這些羣眾沒有影響這個黨的政策的可能性，這個黨的領導的右傾（這種領導是建立在工會官僚和這個黨的資產階級領導人物結成聯盟的基礎上的）——這種不民主的結構使工黨成為保持英國資產階級統治的最強的武器。上述特點使工黨成為整個英國資產階級政治上層建築當中一個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

第 二 章

从費边机会主义到“民主社会主义”

一 費边主义——工党思想的基礎

在現代情況下，为要使羣众服从資產階級，單靠一些組織上的槓桿——右翼工党分子和工会、合作社、集体會員的上層分子的联系，已經不够了。为了能够实现資產階級在工人階級中的社会支柱——英國壟斷資本的第二政党的职能，工党上層分子一貫採取最巧妙圓滑的手段來籠絡羣众。

如果說，在資本主义总危机到來以前，工党議員和工会官僚們沒有感到有制定綱領的必要，那么，現在情况却根本改变了。

列寧不止一次地指出过“英國式的愚蠢的对理論的鄙視”。列寧在 1913 年寫道：英國人以自己的“实际主义”和不爱好一般原則而自豪；这是同样的行会思想在工人运动中的表現。

工党从它一產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結束，一直是扮演着自由党的議會附屬品的角色，同时它沒有任何制定好了的綱領基礎。不但如此，而且联合会性質的建党原則还容許在这个党内進行最廣泛的“交換意見”，容許有“批評自由”。“批評自由”乃是捍衛对資產階級最有利的極端机会主义的观点的自由。

工党分子的“討厭理論”，事实上意味着他們完全服从佔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思想体系。1905 年斯大林在“略論党内意見分歧”一書中，談到这种指望資產階級思想体系自發地影响工人階級的企圖時說道

“在我們这个时代只能存在着兩種思想体系：資產階級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它們之間的區別，也在於前者（即資產階級思想体系）較后者要老得多，傳播的範圍要廣得多，在生活中扎下的根要深得多，無論在自己人中間或外人中間，到处都可以碰到資產階級的觀點，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則剛剛開始走了几步，剛剛給自己开辟道路。不用說，如果就思想的傳播來講，那末資產階級的思想体系即工联主义的意識，比剛剛走了几步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傳播起來要容易得多，對於自發工人运动的影响也要廣泛得多。这一点之所以正确，尤其是因为自發运动——沒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本來‘就有受資產階級思想体系支配的傾向’。而受資產階級思想体系支配就是排斥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因為這兩種思想体系是互相否定的。”^① 斯大林着重指出了在資本主义条件下資產階級思想体系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傳播起來要容易得多。接着指出說：同时，資產階級的思想家照自己的办法裝扮成社会主义者，他們总是竭力想使工人階級受資產階級思想体系的支配。

工党之沒有任何綱領和一定的原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前，曾是使英國廣大無產階級羣众受資產階級思想体系支配的一种方法。但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結束的时候，階級斗争的尖銳化已表明：工党沒有自己的綱領已經不再是使羣众受資產階級思想体系支配的一种方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工人运动的汹涌澎湃，第一次世界大战結束时英國工人階級反对資產階級的斗争，特別是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証明英國工人階級已轉向社会主义。1918年，通过了第一个（工党建立18年以后）綱領。这个綱領宣称社会主义是工党的目的。按照

^① 見“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86頁，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工党的右翼首領——韓德遜、麥克唐納、湯姆斯等人的打算，这个綱領是要使羣众在新的歷史环境中脫离革命斗争。

資本主义的总危机愈是加深，工人階級的攻击愈是有力，工党的首領也就愈加需要用某些“原則”來籠絡羣众，用这些原則來掩飾他們的为資本謀利益的活动，为他們的反共斗争、反对英國工人階級的民主进步趋势的斗争作辯护。可見，与歷屆議會競选运动同时制定的許多綱領（1927—1928年的綱領，1934年的綱領，1945年的綱領）的使命，是用改良主义的胡說迷惑工人。

从1924年起，右翼工党分子出版了許多誣蔑馬克思主义的小冊子。在麥克唐納第二屆政府可恥的破產（1931年）之后，工党思想家就抱定目的想从“哲学的”、“經濟的”、“政治的”观点來“論証”工党上層分子所鼓吹的掛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國家壟斷資本主义。

这种貧乏而庸俗的著作还有另外一个任务——使統治階級相信：工党上層分子根本不承認無產階級的任何階級斗争，工党上層分子將採用最坚决的措施來保护資本主义。在这种緊張的階級斗争的歷史条件下，工党首領不得不制定自己的思想体系。

* * *

費边主义是工党主义的思想出發点，正象自由主义的工人政策和作为自由党的簡單附屬品是它的政治出發点一样。

費边社於1884年在倫敦創立，是資產階級“社会主义者”的集团，这个集团公然反对馬克思主义，極端害怕無產階級的革命斗争，否認階級斗争。恩格斯在1892年这样描寫費边派說：“这是一帮各色各样的資產階級‘社会主义者’，从利慾薰心的鑽营之徒直到善感的社会主义者和慈善家，他們只因为懾於工人

統治的威脅而聯合起來，並且為了預防這種危險，保證把領導權掌握在自己手里，掌握在‘有教養的人’手里，決心什麼都干。”^①

這個“高傲的資產者”集團（正如恩格斯所稱呼的），最害怕工人階級的獨立，最害怕工人階級為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而進行的鬥爭。因此，他們對馬克思主義懷有不共戴天的仇恨。恩格斯寫道：“由於階級鬥爭，他們狂熱地仇視馬克思和我們大家。”^②

與一切其他資產階級的思想家一樣，費邊派也制定了自己的“理論”，其目的首先是為了反對馬克思主義。費邊派的主要思想跟一切改良主義者一樣，是資本主義長入社會主義。在他們看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並沒有什麼原則上的區別。正像斯大林所指出的，在機會主義者看來，“……社會主義制度並不是什麼新東西，其實它和現存的資本主義制度也沒有區別，……把社會主義容納到現存制度中去是很容易的，每一個工會，甚至每一個消費合作社零售處或生產合作社，都已經是‘社會主義的一部分’了。他們就想用這種補綴舊衣的荒唐辦法來給受苦受難的人類縫制新衣！”^③

為了論證自己的資本主義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為了跟馬克思主義作鬥爭，費邊派發明了“市政社會主義理論”，按照這個理論，主要的“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應當是擴大市政府對自來水、電車、城市供電等等的所有權。這樣，社會主義就會逐漸地，“一點一滴地”，並且是通過地方自治的選民投票實行起來。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29卷第114—115頁。

② 同上，第185頁。

③ “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14—15頁，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列寧說費邊派的“市政社会主义”是市政資本主义。費邊派的宣傳的含義，在於使無產階級的注意力從階級鬥爭的根本問題上轉移到城市經濟的細小的個別問題上去。

列寧寫道：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把市政社会主义奉為特殊的“學派”，因為他們幻想社會和平，幻想階級調和，力圖把公眾的注意力從整個經濟制度和國家制度的根本問題上轉移到地方自治的細小問題上去。

事實上，“市政社会主义”也好，“一点一滴地輸入社会主义”的許多其他方案也好，都是費邊派為了反對馬克思主义，反對馬克思主义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而發明出來的。

1919年，在“費邊社会主义概論”新版序言中（這書於1889年初版，被一切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奉為聖經），費邊社的創始人悉德尼·韋伯承認：費邊社社員最關心的事，莫過於制定一種新的思想來反對馬克思主义。韋伯寫道：當費邊社成員“遇到”應當“運用消費的觀點”和建立“消費者協會”的思想時，他們就會懂得：這將是對“市政社会主义”的“重要補充”，其目的在於反對馬克思主义。費邊主义的另一創始人，曾任25年費邊社總書記的皮茲，在他的“費邊社歷史”中承認，費邊社的主要目的在於消滅馬克思主义在英國的影響。

恩格斯說費邊派是一伙野心家，他們有充分的判斷力，懂得社會革命必不可免。

費邊“社会主义”鼓吹“市政社会主义”，鼓吹用課稅辦法來平衡收入。同時，這些受“基督教道德”薰染的費邊派，還抱定目的要說服百萬富翁懂得實現社会主义的必要性……。費边主义創造人之一蕭伯納——偉大的戲劇家，他在晚年，在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後，曾在抨擊一伙惡毒的費邊工黨誹謗家時歌頌

和保护过苏联，甚至他也在二十世紀初寫成了一本“百万富翁社会主义”的專題小冊子，在这本小冊子里，他天真地劝告富人对待工人不要做惡人，不要做不公正的人，而要做“費边社会主义”的信徒。但是，虽然蕭伯納的观点可以說是一个誤入歧途的正直人的观点，但对其他費边派說來，則是資產階級辯护人用伪善的宣傳把劳动者束縛在資本主义剝削鏈条上的有意企圖。

費边派關於百万富翁“苦於”自己的財富的空談，按費边派的打算，是要誘使工人放棄同資本的斗争。这是一种極端虛偽的表现，而这种虛偽是費边派的一般特征，更是今日工党分子的一个極其重要的特征。难怪这位蕭伯納（尽管他是費边社創始人之一）后來曾公正地把費边派叫做“極端的庸人”。

費边派寫了很多这样的書，說他們努力以社会主义來“感化”統治階級，劝告統治階級要做“善人”，不要做“惡人”。

在“以社会主义感化”英國資本家和地主的借口下，按照工党的原則参加了工党的費边社，暫時退出了工党（1902年）。

費边派絕不是痴愚的人，尽管他們力求說服資本家成为社会主义者。費边派也不是歐文式的烏托邦主义者，尽管他們在自己的著作中对歐文大加讚揚。这是一伙以社会主义为招牌，自覺的保护資本主义的人。費边派的繼承者工党头子登台执政后，把为了拯救資本主义而鼓吹“民主社会主义”的职能和压迫各殖民地人民与工人階級的职能巧妙的結合了起來。实际上，費边社退出“劳工代表委员会”，表明了它力求使資本家懂得必須利用他們的各种方便工具。用社会主义“感化”統治階級的宣傳，在費边派看來，实际上是要使工人相信資本家是慈善而“有益”的，因此反对資本家，進行階級斗争，都是不應該的。

尽管費边社退出了工党的隊伍，但是費边主义对工党的腐蝕性的影响决沒有因此而中止。已經徹头徹尾滲透了費边机会

主义的“独立工党”加入了工党以后，用费边主义的实践和思想侵蝕工党。“独立工党”的首領麥克唐納是当时（从1906年起）工党的总書記，他是費边分子。麥克唐納所謂的“建設性的社会主义”，他的關於“社会中的思想同化”，实际上是使工人階級在思想上受資產階級支配的宣傳，關於資本主义“一点一滴地”長入社会主义、“資本主义时代不易觉察地滑入社会主义时代”的宣傳，都是資產階級費边思想的老調重彈。

由此可見，即使費边社暫時退出工党以后，費边主义实际上仍然是工党上層分子的思想体系。

列寧寫道：“費边社”是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工人政策的最完全的表现。

費边派的完全的机会主义的最重要的基本目的，就是要在階級斗争尖銳化的新的情况下，在工人开始离开純粹工联主义思想的新的情况下，把工人箝制在資產階級的影响之下。列寧在提到恩格斯对費边“社会主义”的态度时，用下面的話給予費边主义以鮮明的評价。列寧寫道，恩格斯“……鄙視这伙資產階級騙子手悉德尼·韋伯先生之流，因为他們想腐化工人，想在反革命意义上影响工人。”^①

現在，我們在这里順便地指出，其他各國的改良主义者也利用費边主义的思想使工人受資產階級的腐蝕，在反革命意义上影响工人。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他否認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原則上是对立的，否認階級斗争和無產階級專政，这一切都是以費边主义为依据的，正如以德國改良主义、拉薩尔主义的思想为依据一样。大家知道，多年來披着馬克思主义者外衣的伯恩施坦，在英國居住期間，同費边派常常見面，並對他們表示同

① “列寧全集”俄文版第21卷第234頁。

情。恩格斯在 1892 年 8 月 20 日致倍倍爾的信中說，伯恩施坦“傾向於”費邊派，對費邊派作出了“過高的估計”。

費邊主義從它產生時起就是一種與馬克思主義公開敵對的思潮。修正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伯恩施坦正是從英國費邊派那里繼承了許多“論據”來反對馬克思主義。列寧寫道：“……伯恩施坦在英國‘費邊派’那里‘养成了’他那種機會主義……”^①

費邊主義是十八和十九世紀資產階級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的各種觀點的混合物。在社會學方面，費邊派鼓吹反動的資產階級實證論者孔德和斯賓塞的觀點。費邊派的經濟觀點乃是各式各樣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從庸俗經濟學家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到阿弗里德·馬歇爾和數學家哲奉斯的“理論”的混合物。費邊派鼓吹在強制保持工業利潤的條件下，把地租和利息收為國有。他們否認資本主義剝削的存在，瘋狂地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

不言而喻，費邊主義經歷了一定的發展過程以後，日益明顯地暴露了自己的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本質。

早在二十世紀初，費邊派就直接地、公開地保護英帝國主義。在英國一布爾戰爭時期，費邊派首領公然袒護英帝國主義反對弱小布爾民族的戰爭，袒護這個激起世界各國勞動者公憤的戰爭。

對英帝國主義的這種辯護（列寧稱之為“費邊帝國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得到了繼續和發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機會主義變成了“費邊帝國主義”。列寧指出：“費邊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是一個東西：口頭上的社會主義實

^① “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第 186 頁。蘇聯外國書籍出版局 1950 年版。

际上的帝國主义，由机会主义变成帝國主义。

那些在1915年参加政府並大力帮助“本國”帝國主义進行掠夺战争的工党首領，在1914—1918年曾扮演了“費边帝國主义者”的角色。“費边帝國主义”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成为工党右翼上層分子的思想体系。

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給予了英國無產階級以强烈的革命化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工党上層分子为了保持他們在羣众中的影响，於是决定制定一个工党从前沒有的綱領。1918年的綱領，是由費边社的創始人之一韋伯草拟的，其中充滿了反动的費边精神。在这个綱領当中唱的还是階級合作，資本主义長入社会主义的老調子；充滿了費边派对革命的恐懼，主張用課稅办法來“平衡收入”。的确，从1918年的綱領中，我們已經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为了適應資產階級向工党提出的任务，費边主义思想有了進一步發展。在这里所不同的是工党已从自由党的附屬品变成了英國資產階級的大党。工人階級的革命化及其向社会主义的轉变，要求工党除了許下各种实行改良的諾言以外，还要更善於随机应变，善於耍弄各种蠱惑人心的花言巧語和社会主义的詞句。可見，工党这个綱領中貫串着的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成了后來工党一切綱領的榜样。

同时，工党取自由党而代之，成为帝國主义第二大党的远景引起工党首領加緊制定其思想体系的某些方面，以便使統治階級相信工党分子是“值得器重的”，相信他們不僅在战争时期，不僅在联合組閣时，而且在和平时期，也能够“独立地”建立一个为英國資本所需要的政府。

早在1918年以及后來的1928和1934年的綱領中，已經提出了以“社会主义”为招牌而目的是要拯救和巩固英國資本主义的措施。

1918年的綱領以告資產階級的宣言開始（引証日本反动分子大日伯爵的話當作權威的意見），該宣言中談到了“文明的死亡”的危險性，把革命地推翻資本主義、無產階級專政說成是“文明的死亡”。這一點表明了工黨對英國無產階級走上消滅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的恐懼心理。

為了拯救資本主義“文明”，1918年的綱領首先提出了所謂“社會重建”的任務——通過“擴大生產”來實現從戰爭過渡到和平的措施。主張對工業實行“民主監督”之類的國家資本主義措施的綱領，在保存資本主義的條件下，必然只會加強資本主義的統治。但是，這種綱領卻被標榜成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手段。1918年的綱領充滿了聳惑人心的社會主義詞句和諾言：答應工人實行某些工業部門的國有化，提高生活水平，保證“充分就業”和用課稅的辦法平衡收入（這一點被吹噓成為“國民財政領域中的革命”）以及其他等等。同時它又向資產階級擔保說：所有這些措施無論如何也不是“階級的”措施，而是為了“民族”的利益，也就是說，事實上是挽救和加強資產階級的統治的。

工黨在大選前制定的並成為競選綱領的那個綱領的特点是：工黨在成立政府時想要實現的行政措施有了詳細規定，而基本原則立場則是極端模糊的。這種綱領結構的目的不是要消滅而是要鞏固資產階級制度的政黨。

毫無疑問，費邊派一直是影響着工黨的政策。費邊社的成員參加了麥克唐納的兩屆內閣，他們從來都是工黨的議會代表。參加到費邊社的還有工黨分子的首領[⊖]。

⊖ 加入費邊社的現今的工黨首領有：艾德禮、摩里遜、摩根、菲利浦斯等人。奇怪的是：費邊社的成員從來都是為數不多的，1952年總共也只有3,800余人。費邊社的成員只是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的使命是為工黨提出和探討思想體系的問題。

1952年，工党政府倒台后，右翼工党分子需要重新論証自己拥护保守党人並为美國億万富翁服务的政策，於是費边社便重新登上了舞台。正是在这一次，費边社成員扮演了供給工党以最反动的思想的販运者的角色。工党主义的許多思想家，像斯特拉徹、希利、克羅斯曼、克羅斯蘭德之流，曾經出版了一本“新費边主义概論”的彙編^①。他們在彙編中千方百計地替工党右翼領袖为本國的和大洋彼岸的壟斷資本家服务作辯護。

可見，費边社一向是以資產階級“社会主义”反动思想（工党上層分子已滲透了这种思想）的販运者身份，而与工党形影不離的。但是，如果把八十至九十年代的費边社創始人和現今右翼工党分子等同起來，那就錯了。旧費边主义是壟斷前的資本主义到帝國主义过渡时期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思想体系。在政治上，旧費边主义乃是成分極其复雜——从利慾薰心的鑽营之徒到資產階級慈善家——的集團。他們之中有些人，如蕭伯納，是正直的，确实是迷失了路途的人。

作为費边主义進一步發展的工党思想，是在另一个时代——兩個体系互相斗争的时代，社会主义力量大大增長和世界資本主义瓦解的时代形成的。与費边主义比起來，工党主义吸取了不少新的反动的理論。

* * *

第一次世界大战結束以后，工党把1918年的費边綱領当作自己的正式綱領，实际上已經成为一个資產階級的政党，虽然它

1952年費边社的報告（《Fabian Society 69—th Annual Report》，July 1951—June 1952）說：工党代表和思想家楊·米卡尔多、克羅斯曼、蓋茲克尔、克羅斯蘭德、修斯、約翰·派克、迈克·容格、克里契·瓊斯等人，是費边社執行委員會委員。

① 參看《New Fabian Essays》，Edited by R.H.S. Crossman, L. 1952.

有無產階級成分。工黨領導竭力強調自己的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

工黨分子公開反對馬克思主義（這始終是工黨領導的特點）絲毫沒有緩和下來，儘管有個別工黨分子，像柯爾之流，為了迷惑羣眾在三十年代曾企圖把馬克思說成是……工黨主義者。工黨分子從費邊派那里繼承下來的這種公開的反馬克思主義，使他們不同於那些在一定時期以前還用馬克思主義的幌子掩飾自己的大陸上的機會主義者。

在主要的西歐大陸國家里，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響下，社會主義政黨是十九世紀下半葉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而產生的。後來，在這些政黨中，機會主義逐漸地佔了上風，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時，這些政黨便公開地背叛了馬克思主義，背叛了無產階級，站到進行帝國主義戰爭的“本國”資產階級方面去了。

只有列寧領導下的布爾什維克黨，才自始至終地忠實於革命無產階級的事業，忠實於馬克思主義。

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公開地把機會主義的和改良主義的社會民主黨拋到資產階級陣營中去了。各國社會民主黨幫助各國帝國主義者驅使工人為了“本國”資產階級的利益去打仗。列寧在1915年寫道：德國社會民主黨和費邊派在戰爭中的行為是一樣的。列寧從這一點做出結論說：“……事實上，現代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領導者，包括考茨基在內，是和恩格斯早就說過的費邊派完全一樣的資產階級代理人。費邊派不承認馬克思主義也好，考茨基之流‘承認’馬克思主義也好，在事情的實質上，在實際政策上……都根本沒有絲毫改變。”^①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意味着馬克思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

^① “列寧全集”俄文版第21卷第234頁。

徹底划清界限。隨着無產階級專政在俄國的勝利，正像斯大林在1927年所說的：“社會民主黨再也不能拿馬克思主義旗幟來炫耀，再也不能向無產階級專政思想獻媚，不然就會給資本主義造成相當的危險。社會民主黨既然早已喪失了馬克思主義的精神，結果也就不得不離開馬克思主義的旗幟，而公然不諱地反對馬克思主義的產兒，反對十月革命，反對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了……”

社會民主黨和馬克思主義之間已經橫着一道鴻溝。從此以後，列寧主義，共產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唯一的代表和堡壘了。”^①

各國社會民主黨在離開馬克思主義的旗幟，明目張膽起來反對馬克思主義的產兒——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後，為了籠絡工人，它們裝成爲“馬克思主義的”政黨。它們用一套馬克思主義的術語來裝飾自己的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倫納分子、鮑威爾分子、考茨基分子和希法亭分子就是這樣做的）。它們之所以能夠比較容易地做到這一點，是因為，正像列寧指出的，任何資產階級理論都是可以用馬克思主義的術語來表達的。

工黨的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工黨上層分子始終認爲：甚至利用馬克思主義的語言，用馬克思主義的術語也是不體面的事情。

列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寫道：在“獨立工黨”的隊伍中，馬克思主義在原則上是受排斥的，因此，馬克思主義的語言也是根本不利用的。

工黨首領的反馬克思主義是從費邊派和“獨立工黨”那里繼

①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11頁，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承來的；“獨立工黨”，正像前面所指出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是工黨的組織上和政治上的領導者。工黨從來都不在形式上或口頭上承認馬克思主義。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在第二國際代表會議上曾經發生過令人可笑的事件：德國社會民主黨人“責難”工黨分子反對馬克思主義，“責難”他們否認階級鬥爭。德國社會民主黨之所以這樣做，決不是因為它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德國改良主義者害怕工黨分子的公開反馬克思主義，會給他們籠絡工人的勾當帶來困難。

現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右翼社會黨人公開背棄了馬克思主義。這種直接的公開的背棄馬克思主義的行為，是在西德舒馬赫、法國勃魯姆、意大利薩拉蓋特和奧地利波拉克這些人宣佈之下進行的。這種背棄馬克思主義的行為还是在1950年6月舉行的“社會黨國際會議委員會”^①代表會議上摩根·菲利浦斯以右翼社會民主黨的名義宣佈的。可是工黨總書記摩根·菲利浦斯當作工黨的特點來聲明的東西，就是工黨一貫公開反對馬克思主義，宣揚反動的資產階級理論，始終是工黨的上層領導者的“信念的象徵”。

摩根·菲利浦斯現在吹噓的工黨領導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性質，貫串在工黨的全部歷史中。

二 工黨——右翼社會黨人的領導黨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直到法西斯獨裁在德國取得勝利為止，和戰前一樣，德奧兩國的社会民主黨是各國社会民主黨

① “社會黨國際會議委員會”，即所謂法蘭克福“國際”成立以前的右翼社會黨人的國際組織。

的首腦。德奧兩國的社会民主党的首領——那些希法亭分子、倫納分子、考茨基分子等等——在背叛馬克思主义的精神、离开馬克思主义的旗帜之后，便瘋狂地反对馬克思主义，反对苏联。

第一次世界大战結束以后，德奧兩國的社会民主党提出了一套目的在於替資本主义辯护，挽救資本主义的重要的“理論”。

随着法西斯独裁在德國的勝利，第二國際各國社会民主党中的領導角色暂时轉由法國社会党來扮演。法國社会党的首領勃魯姆和戴阿加緊物色“治愈”和挽救資本主义的藥方。

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以后，各國右翼社会党中的領導角色轉由英國工党來扮演了。

这种情况是由許多原因决定的。与欧洲大多数其他資本主义國家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不同，英國工党由於依靠工会官僚，和党的机关得以在羣众中保持自己的影响。工党黨員的人数超过加入法蘭克福“國際”的一切其他右翼社会党黨員的总数。同时，工党政府的存在也起了頗为重要的作用，因为工党政府巧妙地實現了英國壟断組織的政策，在工人羣众面前把这一政策冒充为“社会主义的”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以后，英國工党首領在西欧社会党人中間起領導作用，还由於英國是欧洲最强大的資本主义國家，尽管英國的陣地削弱了，但是英帝國主义畢竟还拥有—一个幅員廣大的殖民帝國。

工党上層分子的这种領導作用，向來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現出來的。英國工党分子乃是1946年为了联合欧洲右翼社会党人而建立“社会党國際會議委員會”的發起人。“社会党國際會議委員會”的辦事处設在倫敦，它的实际領導者是英國工党总書記摩根·菲利浦斯，第二領導人也是右翼工党分子希利。

英國工黨對西歐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右翼社會黨人的領導作用，決沒有消除各國右翼社會黨人之間的矛盾。在歷次“社會黨國際會議委員會”會議以及後來在1951年夏天舉行的右翼社會黨人法蘭克福“國際”成立大會會議上，在歷次“國際”執行委員會會議以及在米蘭（1952年10月）舉行的“國際”執行委員會例會上，各國右翼社會黨人之間經常爭吵不休。^①這種經常的爭吵和勾心斗角，表明了英美帝國主義之間以及歐洲各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在各種不同問題上的矛盾。比方說，英法右翼社會黨人在“舒曼計劃”的問題上發生了意見分歧。法國右翼社會黨人完全擁護在美國實際領導下制定“歐洲煤鋼聯營”的“計劃”，而工黨分子在哥本哈根舉行的“社會黨國際會議委員會”的代表會議上，是反對英國參加這一壟斷組織的。不過，工黨分子卻完全擁護建立西歐冶金工業超卡特勒的思想。

例如，與“歐洲委員會”、與建立“聯合歐洲”有關的問題，曾引起了歷次“社會黨國際會議委員會”代表會議上的尖銳鬥爭。在這些問題上的勾心斗角，直接地反映着美英之間的矛盾^②。

1951年7月初成立的右翼社會黨人“國際”關於“民主社會主義原則”這一思想基礎的宣言，採用了工黨關於在私有制基礎上實行“平衡收入”、“混合經濟”、“民主計劃化”是社會主義的基本內容的原則。

在法蘭克福“國際”中，扮演領導角色的仍然是工黨分子。摩根·菲利浦斯被選為“國際”委員會的主席，德國右翼社會民主黨人奧倫豪爾和法國人居伊·摩勒被選為“國際”委員會的副主席。奧地利人布薩塔爾被選為總書記。布薩塔爾僅僅是在奧地利出生的，他已加入英國籍，成為工黨分子。

① 詳見本書第7章。

三 “民主社会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以后，右翼社会党人称自己的思想体系为“民主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这个用語，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我們就可以在各國改良主义者——艾德礼（英國）、王德威尔得（比利时）、希法亭（德國）——那里看到。但是，它只是在战后才成为一切右翼社会党人的思想招牌。

換上这塊招牌並不是偶然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以后苏联的实力和威信大大增長的情况下，在帝國主义的統治在中欧和东南欧及亞洲許多國家破產的情况下，在各資本主义國家的共產党的威信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右翼社会党人便需要找尋新的形式以便把羣众箝制在自己的影响之下。改良主义的“資本主义和平長入社会主义”的陈腔濫調，並沒有產生应有的效果。此外这时右翼社会党人需要的是新的蠱惑人心和籠絡羣众的手段，來掩飾他們为壟断資本服务的活动。因此，各國改良主义者需要新的招牌和新的“理論”。

* * *

成为“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礎、決定右翼工党分子的哲学观点、政治观点和其他观点的主要的和極重要的东西就是对工人階級的勝利的恐懼。由於在苏联顯示了和實現了無產階級專政和社会主义勝利，所以，这些右翼社会党人首先就把全部仇恨对准社会主义國家——苏联。右翼社会党人的思想体系，是作为反苏联的、反共產主义的思想体系而發展和形成起來的。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在苏联几个五年計劃進程中，社会主义國家对各資本主义國家工人階級的覺悟的强有力的影响，就已經顯示出來了。苏联几个五年計劃的偉大成就、剝削階

級的消滅、社会主义社会的建成以及苏联新宪法的通过，使英國工人階級以及歐洲其他國家的工人階級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印象。这个印象，在资本主义國家的貧困和失業，德國、意大利及其他资本主义國家法西斯統治下的血腥鎮壓和殘暴恐怖，鮮明对照之下，顯得更加强烈了。

但是，工党思想家关心的不是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而是反对苏联、反对進步力量的斗争。正像工党首領一再声明过的，法西斯鎮壓革命無產階級、鎮壓共產党的經驗，特別地吸引了他們。貝文在他1942年出版的“行將到來的任务”一書中承認，德國法西斯主义的經驗，使他發生“極大的兴趣”。吉伊在他的“保衛社会主义”一書中說，法西斯德國在“調節”經濟、准备战争方面的經驗，大大地影响了工党領導。不是反对法西斯主义，而是反对共產主义、反对苏联对工人階級的強烈影响，这就是工党上層分子所关心的事情。二十、三十年代的工党主义思想，是在反对共產主义、反对苏联——馬克思列寧主义理論的体现者的瘋狂的、造謠中傷的和惡毒的斗争中發展起來的。

工党主义思想家之一柯尔的如下的自白，是值得引証的。他在1937年寫道：“關於共產主义危險的思想，牢牢地抓住了工党分子，以至於和共產主义者作殘酷斗争的願望，對他們說來，是压倒一切的。他們的行动似乎是同意戈培尔、希特勒以及其他那些想要号召一切民族对共產主义俄國举行一次总的十字軍討伐的納粹主义狂热者。事实上，对共產主义的恐懼在腐蝕着他們的頭腦。”[⊖]

右翼工党分子的首領不止一次地承認，“民主社会主义”的

⊖ G. D. H. Cole, The People's Front, L. 1937, p. 39. (着重点是我加的——德伏尔金)

整个思想是反对共產主义的。

但是，在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存在及其在逐步向共產主义过渡的条件下，随着各人民民主國家不断獲得巨大的成就，右翼社会党人不再用人們已經听膩了的反苏的胡說八道來籠絡羣众了。右翼社会党人不單是再三重复着改良主义關於階級調和，關於“資本主义長入社会主义”等等的陈腔濫調而已。他們还極力开導劳动者說，社会主义已經在各資本主义國家里實現了，因此，願意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人們，似乎不需要消滅資本政权，不需要走苏联人民和各人民民主國家的道路了。从前，“資本主义長入社会主义”被宣佈为改良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現在，它却被恬不知恥地說成是已經實現的了。

英國被說成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典范。工党政府的稅收政策，它的資本主义國有化的措施以及國家对壟断組織的加緊資助，被說成是这种似乎是在美國資本主义和苏維埃共產主义之間的特殊“社会主义”的標誌。

例如，在1950年工党綱領“工党与新社会”中，談到英國資本主义时，已經用过去式了。同时，这批善於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能手，把資本家粉飾成为“民主社会主义英國”的“必要的”和“有益的”成員。

为了反对馬克思列寧主义，右翼工党分子利用了資產階級的陈旧的武器——宗教。工党分子把宗教看成是救命符。被工党上層分子奉为圭臬的是艾德禮在1945年举行的职工大会上的声明：能够“拯救世界”的途徑只有一条——这就是“一切人都是兄弟的基督教原則”。工党分子的首領所指的“世界”，是資產階級的世界。艾德禮所宣揚的“博爱”，是剝削者和被剝削者、富人和窮人、殖民地人民和帝國主义者老爺們之間的“博爱”。打着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旗帜奉送給工人們的这种“博爱”，是迎合

英國壟斷組織的老板的胃口的。艾德禮、克利浦斯、菲利浦斯這些人把宗教說成是工黨主義的來源，正如費邊主義是工黨主義的來源一樣；他們把宗教看做是和工人羣眾中的革命思想進行鬥爭的手段。

工黨分子不僅進行宗教宣傳，而且還同教會相勾結，教會在英國是使羣眾服從於資本統治的強有力的工具。費邊派早就在教會人士中間尋求過並且得到了大力的支持。工黨和工會的首領認為上教堂是他們的義務，這是為了維護教會在羣眾中的威信。許多工黨首領——艾德禮、克利浦斯等人——本身就是宗教的宣揚者。

宗教的神秘主義，特別突出地描繪出工黨主義是一種不擇手段欺騙和愚弄羣眾以使資本主義免遭滅亡的思想。

為了反對馬克思主義，右翼工黨分子求助於一種最反動的資產階級哲學——主觀唯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相反，工黨主義的思想家，無論是達爾頓、克羅斯曼和艾德禮，都在人們的心理狀態、主觀體驗和本能當中去尋找對各種社會現象的解釋。例如，艾德禮宣稱：戰爭的原因是恐懼和“安全的願望”。工黨報刊遵循着艾德禮的指示，把帝國主義者所實行的軍備競賽政策說成是對共產主義的恐懼，是對資本主義世界“安全保障”的願望，從而來為這種政策作辯護，這並不是偶然的。

“對共產主義的恐懼”，實際上是一切和平與進步力量的恐懼和仇恨的表現。主觀唯心主義的胡言亂語的目的，在於為殖民者反對各被壓迫民族的民族解放運動和準備第三次世界大戰作辯護。

工黨的哲學家和經濟學家企圖反對馬克思主義，否認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把資產階級個體的心理狀態和主觀體驗說成是社會發展的基礎。

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很久以前就徹底地批判了否認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是客觀的、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觀點。斯大林曾經寫道：“馬克思主義把科學規律——無論指自然科學規律或政治經濟學規律都是一樣——了解為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過程的反映。人們能發現這些規律，認識它們，研究它們，在自己的行動中估計到它們，利用它們來為社會謀福利，但是人們不能改變或廢除這些規律，尤其不能制定或創造新的科學規律。”^①

馬克思主義對自然界與社會的規律的客觀性質的分析，徹底地打擊了其他一切關於社會發展規律的性質的理論，其中包括工黨主義的、主觀主義的和唯意志論的理論。工黨主義的思想家用人們的體驗和心理狀態來“解釋”社會關係的企圖，實際上表明了資產者力圖逃避那導致資產階級制度滅亡的無可改變的社會發展進程。

借口反對“世界觀的僵化”，在法蘭克福“國際”成立大會的宣言中，各國右翼社會黨的哲學家所宣揚的任何神秘主義的、僧侶主義的和主觀唯心主義的“體系”，都被說成是與“民主社會主義”一致的“體系”。右翼工黨首領和思想家想依靠神秘主義、僧侶主義、主觀“熱情”哲學來解救他們擺脫不可變更的社會發展規律，這一情況証明了由資本主義總危機所決定的整個工黨思想體系的破產和瓦解。

* * *

右翼工黨分子的思想體系的出發點，是否認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利益的對立，宣揚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階級合作。從成為工黨首領的“靈感”的源泉的費邊派和麥克唐納到達爾頓、艾

① 斯大林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2頁。

德禮和摩里遜為止，工黨的著作貫串着一個目的——熄滅階級鬥爭，使工人和資本家協調。為此，他們證明說，資本家和工人之間並沒有什麼十分顯著的界限。而階級鬥爭本身是該詛咒的。事實上，否認階級鬥爭，都是右翼社會黨人站在資本家方面參加階級鬥爭來反對工人階級的一種形式。宣揚階級和平的目的，在於使工人階級解除武裝，加強資產階級的陣地。列寧曾經指出：否認階級鬥爭是政治上最惡劣的偽善。

宣揚階級和平的目的，是要向工人證明工黨分子關於通過與資本家妥協的辦法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關於從資本主義社會緩慢地“滑到”社會主義的空談是正確的。

在國內宣傳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利益通過“全民族利益”的形式而達到一致，宣傳放棄和資本的階級鬥爭——這就是幾十年來工黨主義所進行的破壞和瓦解英國工人羣眾的宣傳的基礎和實質。

工黨思想家固執地堅持說：革命行動和英國工人階級的“民族性格”是格格不入的，英國工人階級反對推翻資本政權，擁護“資本主義長入社會主義”。

近來右翼工黨首領們玩弄“革命”詞句，這證明連他們自己也不相信英國工人的“和平性格”。1945年大選以後，工黨首領通過拉斯基的嘴說道：工黨政府願意“完成和平革命”。克利浦斯、摩里遜、威廉斯等人在1948年說道：工黨黨員已經用工黨政府存在的事實本身“完成了社會革命”。

這在1950年的工黨綱領中，被稱為“英國和平革命”，或者——像摩里遜、艾德禮、摩根·菲利浦斯所說的——“一致贊同的”革命，即得到資本家贊成的革命。這種任何人都察覺不到的令人奇怪的革命（正像“人民報”所寫的“不顯露的社會革命”），乃是對人民的欺騙。社會主義革命——推翻資本政權，

剝奪地主和資本家，確立工人階級的政權——是在資本家和地主瘋狂反抗的條件下、在革命政權堅決鎮壓這種反抗的條件下實現的。而工黨政府則是取得資本家的允許上台執政的。在工黨統治的六年內，對資本家秋毫無犯。不僅如此，而且“工人”政府的全部活動都是對壟斷組織有利的。關於工黨革命的捏造只有一個含義：欺騙人民。

然而，高談“革命”這一事實本身就是有象徵性的。事實證明：右翼工黨分子為了保持自己在羣眾中的影響，竟不惜採用虛偽和捏造的手段。那些只要一想到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就心驚膽戰的資本主義辯護人，竟喊叫什麼他們之所以完成了“和平革命”，正是因為真正社會主義革命的思想在英國勞動羣眾中成熟了。關於工黨分子似乎已實現了“和平革命”的空談之所以需要，是為了誘使羣眾放棄用真正的革命手段來消滅資本政權和建立社會主義。

現在，工黨首領已經不能只用宣傳“階級調和”和“資本主義逐漸長入社會主義”的辦法來為自己的政策作辯護了。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使得那些宣揚“漸進論”、資本家和工人的“基督教博愛”，責備共產黨人缺乏“實踐精神”、“服從抽象理論”的工黨分子站不住腳了。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各人民民主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都用事實證明了推翻資本政權是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唯一的道路。

工黨首領面對着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以及蘇聯變成社會主義和民主陣營的中心的實事，在宣傳階級調和和“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時，已不能僅僅以自己的“經驗”、“憎惡理論”和以自己的“實踐精神”為借口了。

這就是為什麼工黨分子以“民主社會主義”做為招牌，利用各種各樣的新“理論”和新口號，力求——據工黨官方消息——

“喚醒那个如此長期地以悲觀失望为滋 养 的羣众的潛在的理想主义。”①

被右翼工党分子以及其他各國的右翼社会 党人称为“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並且在籠絡羣众中起着重要作用的那个混合物的一个組成部分，就是宣傳“純粹的民主”、“保衛自由”和“人权”。

工党分子吉伊（艾德礼把他的論調說成是对“民主社会主义”观点的确切的闡明）对右翼工党分子認为自己有責任保衛的这种“自由”，做了如下的描述。吉伊宣称，自由首先就是工人为自己选择將为之工作的企業主的自由。

吉伊寫道：“另一方面，这是經濟自由，就是買或賣的自由，雇人或解雇的自由，生產或不生產的自由。”②

可見，右翼工党分子所說的“自由”，对資本家說來是剝削工人的自由，而对工人說來是为自己选择剝削者的自由。

大家知道，僱傭工人被迫把自己的劳动力出賣給同意僱用他們的任何一个資本家。虛構的自由，对工人說來，实际上就是受資本家階級的奴役，在这种情况下，臨在奴隸头上的已不是監工的鞭子，而是一旦拒絕受資本主义剝削时的餓死的威脅。

列寧曾經着重指出过資產階級民主的局限性。列寧寫道：“資產階級的民主制較之中世紀制度虽有偉大的歷史進步作用，但它始終是——而且在資本主义之下不能不是——狹窄的，殘缺的，虛偽的，假仁假义的民主，對於富者为天堂，對於貧人和被剝削者为陷穽为騙局。”③

① “Labour Press Service”，III，1948年P-6.

② Douglas Jay, The Socialist Case, L. 1947, p. 273.

③ “列寧文选”兩卷集，第2卷第438頁，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英國工人在英國資產階級社會的條件下，通過與資本進行的幾十年尖銳的階級鬥爭，爭得了若干自由。英國工人重視他們在同資本進行鬥爭中所爭得的組織工會和合作社的權利，並保護着這些權利。

工人享有組織工會和合作社的權利，是英國無產階級的巨大成就。馬克思主義者從來都強調工人階級必須盡量地利用自己在艱巨的鬥爭中所爭得的建立組織的權利，以便進一步爭取社會主義民主。

右翼工黨分子實際上踐踏並取消了英國工人階級在資本主義制度範圍內的頑強階級鬥爭中爭得的資產階級民主自由。在這裡，工黨分子只不過是追隨着本國的資產階級以及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總危機時代的其他各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斯大林在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中說道：“從前，資產階級高唱自由主義，維護資產階級民主的自由，從而在人民中間為自己樹立了聲望。現在，連自由主義的影子也沒有了。所謂‘個人自由’已經不再存在了，——現在，僅僅那些擁有資本的人們才被承認有個人權利，而其他的一切公民則被當作只適於供剝削的人料。人們平等和民族平等的原則被踐踏了；這種原則已代之以從事剝削的少數人享有充分權利而公民中被剝削的大多數人則毫無權利的原則。資產階級民主的自由這面旗幟已經被拋棄了。”^①

右翼工黨分子不去真正的維護勞動者爭得的民主權利以免受資本家的侵犯，反而保護資本家反對勞動者的特權。

右翼工黨分子把美利堅合眾國說成是“自由”的榜樣和象

① 斯大林：“在蘇聯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第6頁，人民出版社版。

征，說它应当成为一切國家的理想。保守党——工党的“民主”越是模倣大洋彼岸的样子來压迫人民，这种对“美國民主”的恭維吹捧就越是不可遏止了。“美國的民主”事实上是对人民羣众的恐怖手段和暴力。反对工人階級的經濟組織和罢工的殘暴法令，对共產党实行越來越兇暴的恐怖手段，对和平战士和進步組織的迫害——这就是“美國的民主”。对黑人的恐怖手段，对印第安人的慘酷的屠殺，鄙視侨民——意大利人、波蘭人、中國人、捷克人、犹太人及其他歐、亞洲出身的人为第二等人——这只不过是“美國的民主”的一个方面罢了。

右翼工党分子把美國的制度說成是“榜样”，並且热衷地力求在英國模倣和採用这种制度。仿照美國的榜样，艾德礼在1948年3月宣佈把共產党人从國家机关中排挤出去。仿照美國的榜样，工党前內政大臣卡特尔·艾得庇护法西斯示威遊行，禁止工人的五一節羣众大会和遊行。仿照美國的榜样，摩根·菲利浦斯和摩里遜迫害共產党人，並要求把共產党人驅逐出工会，而狄金主張禁止共產党的活动。工党首領用警察陷害的方法对付和平拥护者，破坏在設菲尔德举行第二屆世界保衛和平大会。工党政府禁止罢工，动用軍隊來鎮压罢工。

由此可見，關於虛構的民主主义的空談，只是为了掩盖实际上採取的消滅最起碼的資產階級民主自由，並用恐怖手段來反对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共產党的手段的。

工党政府的倒台，1951年秋季大选后保守党的上台执政，向全世界暴露了工党的“社会主义”的真面目。

工党的思想家們——摩里遜、达尔頓、拉斯基——不止一次的宣称：工党無論如何也不应当走得“这么遙远”，以致竟会走上根据社会主义原則來真正改造社会的道路。正像威廉斯和柯尔所自認的一样，工党首領不願意而且也害怕实现当保守党大选

獲勝后不得不取消的那種改造。

右翼工黨分子宣稱他們和一切右翼社會黨人都是“自由（即資本主義的——德伏爾金註）世界”的保衛者和代表。右翼社會黨人曾在1951年7月右翼社會黨“國際”成立大會上的“民主社會主義”“原則”的宣言中，以及在摩根、菲利浦斯在這次大會上報告中宣佈過他們是“自由世界”的保衛者。工黨主義的其他首領也經常散佈這種說法。“自由世界”指的是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自由世界”是跟和平民主陣營這個彷彿是“不自由”世界對立的。右翼工黨分子和其他右翼社會黨人關於與“東方”對立的“西方”的空談，乃是对“自由世界”的這種辯護的補充。而關於“自由世界”的空談以及“西方”和“東方”的理論，都是從帝國主義思想家的武庫里借取來的。

格·馬·馬林科夫在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揭露了這種“自由世界的理論”。格·馬·馬林科夫說道：“美國統治者宣稱，他們所嚮往的似乎是建立‘自由國家集團’之類的理想。他們再三發表聲明說，美國、英國、法國、土耳其和希臘代表這個‘自由國家集團’，而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則彷彿是‘不自由的’國家。在我們看來，美國、英國、法國、土耳其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確有‘自由’，但這不是人民的自由，而是剝削和掠奪人民的自由。至於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在這裡確實沒有這種‘自由’，因為在這些國家中，剝削和掠奪勞動人民的自由早就被消滅了。”[⊖]

右翼社會黨人把建立所謂“歐洲防務集團”的條約方案和大西洋公約，宣佈為“自由國家聯合”的實現。可見，右翼社會黨人

⊖ 格·馬·馬林科夫“在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第18頁，人民出版社版。

用來為美帝國主義及其僕從國的極端侵略性的行為作辯護的那些理由，是和美國帝國主義者的理由一模一樣的。右翼工黨分子所宣揚的思想，如同其他各國的右翼社會黨人一樣，是從美帝國主義的思想武庫里借來的，這個思想武庫經常散佈所謂“美國生活方式”、“西方文明”比“東方”優越的捏造。

右翼社會黨的“自由世界”和“兩種文明”的理論的目的，在於把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和整個和平民主陣營的道路跟西方各國的虛構的“特殊道路”和“特殊命運”對立起來。

這種理論的用意，在於把歐洲資本主義從死亡中拯救出來。這種理論的任務，是要為資本主義國家在保護那彷彿受到共產主義威脅的“西方文化和道德體系”的借口下聯合起來反對和平民主陣營做辯護。工黨和社會民主黨的“自由世界”的理論，是思想上的遮羞布，是為帝國主義鎮壓各殖民地人民的解放鬥爭做辯護的。

“自由世界”和“兩種文明”的理論，用假社會主義的口號來掩蓋另一次世界戰爭的準備。右翼工黨分子和其他右翼社會民主黨人標榜“自由世界”以及和“東方文明”對立的“西方文明”的口號，是為了維護資本主義奴隸制度、殖民剝削和資產階級的野蠻行為，反對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所體現的進步和民主的光明世界。

工黨思想家在這裡成了壟斷資本為取得最大限度利潤而鬥爭的工具。對“西方文明”和“自由世界”的吹噓，在目前情況下就是公開為那些妄圖統治世界的新的野心家作辯護。美國壟斷組織的報刊也在宣揚同樣的論調，這並不是偶然的，所不同的只在於：在華爾街的報刊上“自由世界”和“西方文明”被說成是資本的“自由經營”和“自由倡議”的世界。在右翼工黨分子那裡，這同一個“自由世界”和“西方文明”則被說成是“民主社會

主义”的堡壘。

現代帝國主義者所謂的“自由世界”和“西方文明”就是對千
百萬婦女和兒童的殘酷屠殺，是麥克羅尼蘇斯的死亡營，是對
希臘政治犯的橫暴鎮壓，是對佛朗哥西班牙和土耳其人民的恐
怖鎮壓，是英帝國主義者反對馬來亞人民的戰爭。美國是“自
由世界”的代表者的首腦。正是在現在，即在資本主義走向滅亡
的時代，“自由的”西方的“文明的”帝國主義者，不論在西方還是
東方都暴露了他們的剝削者的本質。資產階級到處在扶植一切
落后的、腐朽的、反動的東西。

無產階級乃是每一個西方國家的一切先進的東西的真正代
表者。無產階級乃是每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的進步和文化的
代表者。列寧於1913年在他的論文“落后的歐洲與先進的亞
洲”中寫道：“在‘先進的’歐洲，只有無產階級才是先進的階級。
而尚存的資產階級則甘願去干一切野蠻、殘忍和罪惡的勾當，
以求保持垂死的資本主義奴隸制度。”[⊙]

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第二個階段的特点，不僅在於各殖民地
人民的解放鬥爭具有巨大的規模，而且還在於歐洲各人民民主
國家（根據“兩種文明”的理論看來，這些國家是屬於“西方”
的）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獲得了極其偉大的成就。“自由世界”和
“兩種文明”的理論的任務，是要模糊和掩蓋事件的真實含義
——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陣營與帝國主義反動陣營的鬥爭，使
羣眾認識不清。

右翼工黨分子用“東西方兩種文化與道德體系”的神秘的
“衝突”來代替真正的歷史的衝突——兩個陣營的鬥爭。

恰恰是在西歐各個國家（工黨思想家認為這些國家由於特

⊙ “列寧文選”兩卷集第1卷第819頁，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殊的“西方的”傳統，保險不會受共產主義的影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領導着各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切進步力量的共產黨的影響大大地擴大了。

關於“西方文化與道德體系”的一切神秘的胡說，在階級鬥爭的嚴酷現實面前都煙消雲散了。正因為如此，工黨思想家威廉斯在他的“三重號召”一書中不得不承認，在歐洲各國，只有在英國，右翼社會黨暫時還保持着對羣眾的影響。也難怪柯爾在工黨的雜誌“新政治家與民族”週刊（1948年1月17日）中承認“共產主義的普遍性和民主社會主義的局限性”。柯爾承認說，“共產主義的普遍性”在於：共產主義思想不論在西方或東方，在“落后的”或“先進的”國家的羣眾當中，都得到了廣泛的響應和支持。這無意中就是承認“民主社會主義”乃是反對人民利益的思想，而共產主義則是各國工人階級和勞動者的真正利益的表現。這也就是承認“民主社會主義”的任務是要把西歐各國從不可避免的崩潰中拯救出來，它是為殖民剝削作辯護的思想，因此，也就沒有可能在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里得到傳播。“民主社會主義”的保護者期待侵略性的大西洋聯盟和美國的統治把“民主社會主義”從不可避免的滅亡中拯救出來。在開始干涉朝鮮以後，右翼工黨分子宣稱，拯救“自由世界”以及“民主社會主義”的主要手段，乃是經濟的軍事化。正像摩根、菲利浦斯於1951年7月初在法蘭克福“國際”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所說的一樣，“軍事化可以幫助社會主義發展”。“民主社會主義”就是這樣徹底地暴露了它之所以宣傳“保護自由世界”和“西方文化和道德體系”原來是在思想上為帝國主義侵略作辯護。

* * *

和其他各國的右翼社會民主黨人一樣，英國右翼工黨分子從來都把資產階級國家說成是公平地解決階級與階級之間的爭

端的“仲裁者”。他們把國家描寫成站在政治和階級之上的中央机关。对資產階級國家作这样的評价，在右翼工党分子看来，会証实他們關於“資本主义能够長入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宣傳，同时，在羣众面前好作为資本的工具的國家的作用辯护。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以后，右翼工党分子宣称，現在，國家正像艾德礼所說的一样，已成为这样一种“指導的和組織的力量”，为了它並且圍繞着它正在進行着斗争。

國家乃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剝削者的國家的使命是要为少数剝削者的利益而箝制多数被剝削者。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國家不能不是資產階級專政。英國工人階級根据自己的日常經驗是深信馬克思主义这个原理的真实性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以后階級斗争極端尖銳化的条件下，國家从来也沒有这样徹底地变成了壟斷組織的工具，为壟斷組織所利用。右翼工党分子以英國資產階級第二政党的身份組織政府，利用國家机器來巩固資本主义，瓦解和鎮压無產階級，提高壟斷組織的利潤。这就是为什么吹嘘“國家的新作用”成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最时髦的字眼”的緣故。資產階級國家被說成是“保證福利的國家”和“为社会服务的國家”（拉斯基、摩里遜）这种“理論”已經从工党分子那里散佈到西歐其他各國的右翼社会党人那里去了。

國家資助破產的資本家的制度，提高壟斷組織的利潤，加重捐稅，被說成是“关心福利”和“为社会服务”。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后資本主义总危机加深的条件下，資產階級利用英國右翼工党分子不僅为了欺騙羣众，而且也是为了要他們以执政党的身份鎮压和掠夺人民。由此，通常就產生这样一种理論，只要工党分子得到資產階級的同意並且通过議會投票組成政府，那么，國家就足以成为社会主义的國家了。这种理論最便於掩盖

作为执政党的右翼工党分子为了使資產階級國家進一步服从於金融寡头而捏造的一切。

工党主义關於國家应当帮助資本家“提高產品產量”的原理，是为不擇手段加緊剝削劳动者作辯护的。这一原理也为英國右翼工党分子和其他各國的右翼社会党分子在扼殺工人同資本的斗争和支持資本向無產階級進攻方面的活动作辯护。

工党關於“國家的新作用”的宣傳，事实上是用來掩盖使國家机器更進一步服从於金融寡头的意志和利益的措施的。

右翼工党分子居然使國家軍費开支把急遽增加了的軍事化和軍备競賽說成是“福利國家”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利益而進行的活动，顯然，这样做，無論英國或美國的壟斷資本家都是完全同意的。

在工党政府倒台和保守党人於1951年10月上台执政以后，工党思想家提出一項任务：即使不是工党政府当政，而是保守党政府当政时也要使羣众搞不清資產階級國家的真正作用。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在上面已經提到过的右翼工党思想家的集子“新費边主义概論”里說，“國家已經不是資產階級的执行委员会了”。这样一來，資產階級國家的字样在工党分子的書刊里就根本看不到了。为保守党分子的一切反动措施作辯护的，正像“福利國家”的“理論”为右翼工党分子的一切反动措施作辯护一样。既然國家已經不再是資產階級的國家了，就应当贊同这个國家的措施——这个結論既完全符合壟斷組織的利益，又完全符合於为壟斷組織的利益服务的职工大会总委员会和右翼工党領導的实践。

四 右翼工党分子的經濟观点

工党思想家为了籠絡英國工人階級，力圖对政治經濟学的

各个問題做出“自己的”回答。

但是，工党經濟学家的經濟“理論”，乃是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学家的理論的簡單重复。

到工党分子的經濟观点中去尋找某种統一性和連貫性，是徒勞無益的。这是如此地明顯，以致於工党作家全圖顛倒黑白，把缺乏連貫性和邏輯性說成是工党的重要的“优越性”（威廉斯、容格）。最粗笨的折衷主义被說成是工党主义的“方法”。拉斯基甚至想把这个“方法”叫做多元主义的方法。但是，就連这个名称也是从某个通常的資產階級哲学流派那里剽窃來的。

工党的思想家曾經声明說，拥护某一种經濟理論，乃是工党黨員的一項經常的任务。这就是說，工党思想家可以完全自由地宣揚任何一种反动的資產階級經濟理論。工党思想家所禁止的也只能是一种經濟理論——馬克思列寧主义理論。

工党思想家对無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学進行污蔑和造謠；为了反对無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学，他們向來都是从資產階級經濟学家那里蒐集“論据”的。

工党思想家为了欺騙羣众而重新复活了早就被人們遺忘了的被馬克思粉碎了的庸俗經濟学家。

比方說，柯尔和拉斯基在他們所寫的反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学的小冊子里，熱衷地蒐集了早已被駁倒了的資產階級經濟学家的論据來反对馬克思的价值理論、反对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論，一句話，反对馬克思列寧主义的政治經濟学的一切原理。

老实說，工党分子从每一个十九世紀的庸俗經濟学家那里（从資產階級生產方式的永恒性和和諧性的宣揚者塞尼奥尔、凱里等人开始）都在某种程度上剽窃了他們的經濟观点。达尔頓和拉斯基仿倣旧費边派，把資本主义最典型的辯护人之一、資本与劳动的利益的共同性的宣揚者宾塔姆說成是工党主义的

先驅者。吉伊宣稱資產階級社會學家斯賓塞和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約翰·穆勒為工黨主義之父。吉伊、柯爾和拉斯基重復着英國壟斷組織的辯護人阿·馬歇爾及其追隨者庇高的理論。最後，一切工黨的經濟學家、政論家、和政治家都吹捧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的反動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凱恩斯。

同時，右翼工黨分子常常避而不談誰是他們所宣揚的理論的真正的創立者，他們把檔案庫里落滿了灰塵的理論說成是自己“獨創的”經濟著述。各式各樣資產階級流派的一切無稽之談都被工黨分子用來論證自己的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

無論右翼工黨分子怎樣散佈他們的虛構的社會主義，只要一考察他們的經濟“理論”，他們的資產階級本性就特別明顯的暴露出來了。這些理論的目的（儘管它是關於社會主義的某些論調掩蓋着的），是要為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作辯護，是要使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永遠存在下去。

工黨上層分子一方面讓他們的思想家任意抄襲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最具有辯護性質的觀點並把它說成是最新的創作，同時把為資本作辯護的邊際效用論變成了自己的信仰的象徵。

哲奉斯和曼格爾這些主觀學派的宣揚者，他們由於畏懼資本主義社會的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而把消費者的心理體驗當作“研究”的對象竟被工黨“經濟學”推崇為不可推翻的權威。

在1950年6月哥本哈根右翼社會黨代表會議上關於工黨思想問題的專題演說中，摩根·菲利浦斯把邊際效用論說成是工黨的正統的理論，這是因為工黨企圖在邊際效用論當中尋找與馬克思主義價值論針鋒相對的東西。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資本家階級是靠工人的無償勞動為生的。用剝削工人的方法所攫取來的剩餘價值由資本家的各個集團進行分配。資本家力圖把工人所獲得的工資，成為勞

动力价值的轉化形态的工資，保持在不足糊口的水平上。工人的貧困化和資本家的財富的增長——这是資本主义生產的規律。

这一切对右翼工党理論家說來都是毫不相干的。他們把事情說成这样，似乎資本家所得的就是他們在实际上“以自己的劳动創造出來”的东西。工党經濟学家所宣揚的正是这种粗暴的为資本作辯护的理論。

比方說，按照吉伊的說法，利潤乃是企業主領導企業所得的工資加上冒險獎金。原來資本家並不是剝削者，而是劳动者——这是資產階級經濟学家为了迎合資產階級的需要而老早捏造出來的謊話。

不但如此，吉伊还宣称，“社会”支付給大企業主的報酬比他們所“創造”的东西要少得多。

吉伊替工業資本家直接辯护是和替貨幣資本家的辯护相結合的。吉伊把利息說成是“必要的服務費”，是取得貨幣以便“經營企業”，是对貨幣資本家“預期”的報酬。吉伊把利潤和利息說成是像工人的工資一样的費用。

这样一來，利潤和利息就被列为生產費用，資本家本身被当作生產工作者，而对工人的剝削也就消失了。总之“服務的理論”、“冒險獎金”，把利息說成是“預期的報酬”，即那些馬克思徹底批判的十九世紀前半叶庸俗政治經濟学的基本方針，被工党分子从多年的塵土堆里拿出來奉为自己的信仰的象征。巴师夏、薩伊、塞尼尔是现代右翼工党分子的老师。

右翼工党分子为了掩盖資本主义的真正的矛盾，給資本主义加上了一些虛構的矛盾，把这些矛盾列入心理学的範圍之內。比方說，右翼工党分子追隨費边派，把消費者和生產者之間的矛盾說成是資本主义的主要的“罪惡”。

按照艾德禮的說法，“生產者”（即資本家）所關心的是使商品缺乏，商品价格高昂。因此，“生產者”力求縮減生產。

与此同时，“消費者”關心的是使商品更多，物价降低。“根据社会主义的原則”改造社会的任务，按照艾德禮的說法在於：要使擴大生產的願望（“消費者的心理”）变成資本家的指導原則。資本主义的一切罪惡在於：过去的政府是遵循限制生產的原則的，危机就是从这里產生的。为要保證生產的不断的和順利的擴大、消除資本主义的一切疾病和不幸，只要以实行“富足政策”的工党政府來代替实行“貧乏政策”的保守党政府，並說服資本家相信“富足心理”比“貧乏心理”的优越性就够了。

艾德禮於1945年5月13日在伯明翰工党区委員會的例会上發表演說時宣稱，工党黨員的經濟观点已經被銀行家、工業家和英國一切其他政党的活动家所接受了。艾德禮斷言，既然摒棄“貧乏心理”和“限制的實踐”的工党“理論”已为資產階級集团所接受，因此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障碍已經消除了。在工党执行委員會1947年7月召开工党代表會議時出版的小冊子“工党黨員是擴大生產的拥护者”里，談到了这一点。最近几年來，摩里遜、克里浦斯和貝文也不止一次的根据这种精神發表演說。

这种理論就是这样的。其任务在於證明，在資本家本身不受絲毫損失的条件下，通过改变政府的政策和从“限制的實踐”过渡到“擴大生產的實踐”的办法，可以輕而易舉地“过渡到民主社会主义”。

由此可見，按照艾德禮的說法，似乎資本家所做的事情僅僅是用縮減生產的办法來增加利潤。但事实上資本家乃是用擴大生產，加强对工人的剝削的办法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的。經濟危机恰恰是在擴大了的工業受到銷售市場的限制的情況下發

生的。在經濟危机时期，資本主义所造成的一切災难——羣众的貧困、失業等等特別加深了，發生了商品生產过剩的現象，商店和倉庫堆不下过剩的商品。在資本主义制度下人民的貧困和災难並不是“心理現象”造成的，而是資本家对工人的剝削造成的。而事情的實質是不会由於壟断組織有时为了保持最大限度的利潤限制生產而發生变化的。無論資本家擴大生產或者壟断資本家縮減生產，他們决不是为了“共同的利益”，而是为了追求利潤。不論資本家擴大生產或者壟断資本家縮減生產，其結果都是使資本家的財富增加和羣众的貧困增長。

關於工党思想家說服“善良的”資本家（而这样的資本家，工党思想家肯定說，是佔大多数的）。放棄罪惡的意圖而走上“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的空談，乃是旧費边派關於能够用社会主义的思想“感化”資產階級的謬論的繼續。在这里，艾德禮、摩里遜与旧費边派之間的区别，在於費边派希望資本家变成社会主义者，而艾德禮和摩里遜則向世界宣告說，他們已經用社会主义的思想“感化了”資本家了，他們已經使資本家变成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了，因此誰要是反对資本家誰就是反对社会主义。摩里遜在1947年工党代表會議上所作的声明的含义也正是这样的，他断定說，資本家正像英國居民的一切其他集团一样，“已經接受了作为社会的法律基礎的社会平等和經濟民主的思想”。

在工資問題上，工党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拥护者站在从英國反动經濟学家阿·馬歇爾那里剝窃來的边际生產率論的立場上。边际生產率論的實質在於它虛偽地断定說，工資是由在最惡劣的条件下的劳动生產率水平（边际劳动力的劳动生產率）决定的。这种反动理論主張在就業的工人人数增長的条件下必須降低工資，这一理論的使命是給資本对工人階級的進攻找根据。

从前在工党的綱領当中，曾經根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加入工党的資產階級經濟学家霍柏森的原理規定了提高工資的条文，这个时代已經过去了。霍柏森把經濟危机說成是羣众的消費不足，認為通过提高工資的办法能够在資本主义社会范圍內消除危机。顯然，这是改良主义的空想。但是，關於在工党分子执政的条件下提高工資的建議，是工党上層分子手中用來籠絡工人，把工人束縛在自己的影响之下的工具。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工党的綱領当中，關於提高工資的条文已經根本看不到了。工党政府在物价上漲的条件下实行尽力抑制工資提高的政策，其結果是实际工資的降低。

現在，吉伊代表着右翼工党分子的立場，从“边际生產率論”出發，“在理論上”論証提高工資是絕對不能容許的。他宣称，“社会的正义”要求“保持費用和利潤之間的关系不受侵犯”。譯成普通話，就是資本家的利潤無論如何不应当受到侵犯。

从“边际生產率論”得出沒有剝削的結論，这对資本家是非常有利的。右翼工党分子証明，既然沒有剝削，那么提高工人的劳动强度（即工党分子所說的生產率）就是为了工人本身的利益。在战后的歷年的职工大会代表大会和工党年会上，工党的大臣和工会官僚在“民主社会主义”和“边际生產率論”的掩盖下，加緊論証說：需要更多地更緊張地工作。他們号召工人承受牺牲似乎是为了社会主义，其实是为了壟断資本家。

为了提高資本家的利潤而要求工人承受牺牲的另一根据，是那种認為提高劳动生產率似乎就是同时提高了工人的实际工資和資本家的利潤的理論。这种依据为資本作辯护的“边际生產率論”的“理論”，追随着十九世紀中叶的庸俗經濟学家凱里和薩伊，宣揚劳动和資本的利益的和諧。右翼工党分子之所以利用这种公开为資本作辯护的和諧理論，还为了說服工人不要与

資本進行斗爭，把為資本家的過度勞動說成是為工人自己的勞動。這種叛賣的“理論”對工人掩蓋工人和資本家的利益的對立，掩蓋工資變動和利潤變動成反比的事實。加強勞動強度是對資本有利的，並且只是意味着對工人剝削的加強。那種認為生產率（勞動強度）的增長既是工人的幸福也是資本家的幸福的虛偽理論，乃是工會首領和工黨首領的一切言論的基礎，是他們借以要求工人停止罷工，和資本家合作，“為共同利益而協同活動”的基礎。總委員會和工黨領導用來替工資問題的政策作辯護的正是這個理論，這在保守黨政府執政以後也是如此。所謂工人和資本家在提高勞動生產率（強度）方面利益一致的理論的使命，是要為工黨首領在企業中建立工人和資本家的“協商委員會”、禁止罷工等等作辯護。

這種理論符合資本家的利益，它是和工人的利益敵對的。

工黨首領宣揚工人和資本家在提高勞動生產率方面有共同的利益，從而公開叛賣了工人階級。

否認資本對勞動的剝削這一點，最明顯地表明了工黨在經濟問題方面的著作的反動性。工黨分子克羅斯曼宣稱，西歐的資產階級已經消失了，如果說剝削工人的情形還存在的話，那麼，這已經不是常規而是例外。摩里遜於1948年秋天在帝國會議上竟宣稱，似乎在整個英帝國剝削已經不存在了。於是，資本主義就被宣布消失了，而剝削就被宣佈為不存在的了。不錯，在這個問題上有人（像艾德禮）承認過，剝削在以前，即在十九世紀也許是有過的。但是在二十世紀剝削或者是消失了，或者似乎是正在開始消失。

剝削，按照工黨著作的說法，恰恰是在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代替了舊的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的時候開始消失的。可見，這是对壟斷資本的最露骨的辯護[⊖]。

我們再找不到比這種把資本主義說成是社會主義，把資本家說成是工人，把利潤說成是工資的形式，說剝削已經消失了更荒謬的言論了。

這一思想體系，和工黨綱領的諾言一樣，只使工人更加老老實實地為資本家效勞。前面我們提到的威廉斯在“三重號召”一書中已經承認了這一點。威廉斯指出，英國的“民主社會主義”的思想體系和政策“沒有給工人提供出他們所期望的東西”。“民主社會主義”掩蓋着剝削的加重、勞動強度的加強、工資的降低、壟斷組織對工人階級的進攻等等事實。

工會官僚過去是在上屆工黨政府代表參與之下，而現在是在保守黨人參與之下，“代表工人”實行的和資本家“協商”的制度，是叛賣工人利益的一種形式。所有這些“委員會”和“協商委員會”，在“民主社會主義”的旗幟下，使工人服從資本家，幫助壟斷資本家提高勞動生產率，加強剝削，破壞罷工。工會官僚借助於工黨政府全權代表的“媒介作用”而取得的和資本家的默契，被稱為“工業民主”和“經濟民主”，其使命是要盡力保護僱傭奴隸制度、提高壟斷組織的利潤。但是，這和老早以前的跟企業主叛賣性的和瓦解戰鬥工人的隊伍毫無區別。區別只在於：這些為壟斷組織利益的勾結，是工黨政府在“民主社會主義”的掩蓋下進行的。

事變的進程越來越暴露出，工黨的“民主社會主義”正是資本主義。正像吉伊所聲明的，“民主社會主義”稍為不同於私人企業經營，企業主們應該為這一點而“歡呼”。

-
- ⊖ 有趣的是：吉伊認為貨幣資本家和工業資本家一樣，也是生產的必要的和永恆的條件。宣揚蠱惑人心的“食利者消亡”論的反動經濟學家凱恩斯，看起來似乎比“民主社會主義者”吉伊更加“激進”。

右翼工党分子着重指出，他們所虛構的“社会主义”意味着資本家的存在和繁荣。正像摩里遜在波尔尼姆工党年会上的演說中所声明的，“越接近社会主义，我們就越需要……私人企業經營”。这种为拯救英國資本主义而發明的“分期社会主义”就是如此。

右翼工党分子还吹嘘美國的資本主义制度。工党首領們接二連三地發出了所謂美國也……在向“民主社会主义”發展的声明。

1949年1月，杜魯門給國會的咨文中曾經声明道：美國政府为了与行將到來的經濟危机進行斗争將走上資助私人資本家投資的道路，当时英國工党的报刊和西欧其他資本主义國家右翼社会党的报刊都欣喜若狂。“每日先驅报”声明：美國已經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了。

在工党的官方出版物[⊙]里，有專門一節是証明美國已經不是大資本的國家的，在美國，“民主”一天天地完善起來。在这一工党講演者手冊中宣称，除了工党的英國和斯堪的那維亞以外，美利堅合众國現在是“最進步的國家”，“馬歇爾計劃”和杜魯門綱領關於向欧洲各國的殖民地輸出資本的第四点計劃“乃是國際主义基礎上的社会主义”。

要为那些力圖夺取世界霸权的美國億万富翁更好地効劳确实是困难的。在这里，工党主义所扮演的真正角色，是在思想上掩盖美國壟断組織的政策，这一点不亞於它掩盖英國壟断組織的政策。

这就是把壟断資本家說成是社会主义者，把帝國主义的發展階段說成是社会主义，並且用“共同利益”为任何一种鎮压劳

⊙ «Facts and Figures for Socialists» L. 1951, p. 386—387.

動者的形式作辯護的“民主社會主義”的真面目。這就暴露了工黨主義是為了欺騙人民而創立的帝國主義思想體系的一種形式。

英國共產黨的綱領“英國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對工黨的“民主社會主義”作了如下的說明：

“他們的所謂‘民主社會主義’是一個烟幕，在這個烟幕遮掩之下，他們替資本主義利潤和剝削制度辯護，保衛資本家和壟斷資本家的地位，力圖支撐崩潰的資本主義社會結構——這個結構是少數人佔有財富，多數人忍受貧困和低落的生活水平，以及經常發作的經濟蕭條和戰爭的危險。”

1952年10月保守黨政府組成後，右翼工黨思想家力圖“證明”即使在公開的資本主義反動勢力的政黨（保守黨）統治的條件下，在英國資本主義也是不存在的。目前，右翼工黨思想家所進行的一切宣傳和“理論研究”都是按照這個方向進行的。工黨主義的思想家克羅斯曼、克羅斯蘭德、希利、斯特拉徹等人在“新費邊主義概論”中宣稱，英國“已經不是資產階級的國家了”。但是，由於很難找到會相信保守黨政府“實現社會主義”的傻瓜，於是工黨思想家宣佈了“新思想”的必要性。主觀唯心主義詭計的全部武庫都被利用起來。很快，各式各樣新的“社會主義定義”發明出來了，這些定義都歸結為一點：改變社會經濟條件已經不是社會主義的目的。社會經濟改變的任何要求，甚至是改良主義的要求都被說成是馬克思主義，並遭到詛咒。

現在右翼工黨思想家聲明，应当在“感覺”、“倫理學體系”、個人的自我修養方面去尋找社會主義。克羅斯曼宣佈社會主義就是“道德的進步”，而且根據這一點把工人反對資本家的一切要求都看成是“不道德的”要求。克羅斯蘭德則聲明說：“社會主義的目的”在於在工人中根絕“階級感情”，要以建立工人與資本

家的“利益一致和地位平等的感情”來代替階級感情。“社会主义联盟”中的倫理学社会主义者宣佈人的“道德上的完善”是社会主义的目的，他們所宣揚的實質上也是同样的論調。

这种論調所追隨的目的是不难識破的。这种“社会心理学的”方法是要使被剝削者养成对剝削者俯首听命的心理。为了安慰要求社会主义和忍飢挨餓的工人及被剝削者，向他們建議……進行“个人的修养”，培养和他們的最兇惡的敌人——壟断資本家的利益“一致感”。

在右翼工党分子的最新的宣教当中，“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最明顯的暴露了自己的真实目的——为壟断組織的利益欺騙工人。

第三章

工党的國有化的實質和結局

工党政府在1945年大选以后实行了一系列的措施，这些措施的真实内容和目的在於巩固英帝國主义的陣地，保証英帝國主义取得最大的利潤。

英國右翼工党分子在掌握政权以后实行的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某些工業部門的資本主义的國有化。他們巧妙地利用了博得工人羣众欢迎的國有化口号，以此來籠絡工人並裝作好像是实现工人的要求的样子。

工党政府關於改变某些工業部門（工党政府把这些部門吹嘘为“社会主义的”部門）为資本主义國家所有制的措施，被右翼工党分子千方百計地用來控制劳动人民，緩和劳动人民的不滿情緒。

右翼工党分子大吹大擂地把改变一些企業为資本主义國家所有制宣傳为“实现社会主义”，决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苏联的偉大的經濟成就对英國工人階級發生了巨大的影响，苏联的这些成就乃是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勝利以后在國內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和实现社会主义國有化的結果。

工党的國有化乃是近几十年來在許多資產階級國家中实行的資本主义國有化的变种。这些措施是某些壟断資本集团的利益，或者全体壟断資本家的利益所要求的。現代資本主义基本經濟規律的作用，即对最大限度利潤的要求成为这些措施的基

礎。

資本主義國有化和社会主義國有化在其實質和實現的形式与方法上都是直接對立的。揭露与分析資本主義國有化的工党變種的真正本性，需要对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社会主义國有化及其与資本主義國有化的對立的原理加以說明。

一 社会主义國有化和資本主義國有化

我們首先來研究一下由於消滅資本政權而產生的社会主义國有化的實質和特点表現在哪里。

工人階級只有在消滅資產階級政權和建立工人階級專政以後才能夠實現社会主义國有化。無產階級依据生產关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客觀經濟規律，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把工業、運輸業、銀行等等實行了國有化。資本主義生產关系很久以前就与發展了的生產力發生了沖突，私人資本主義的所有制形式成了生產發展的最大障礙。無產階級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實行了國有化，把生產資料變成了公有制，在已經實行國有化的企業當中消滅了資本主義剝削，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經濟形式。由於工業、運輸業、交通工具等等變成了全民的財產，生產的社会性質和社会生產的產品的私人佔有之間的矛盾被消滅了，生產关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得到了廣闊的場所。

可見，為了要消滅資本主義的基礎，並用社会主义的基礎來代替它，必須實現工人階級政權所實行的生產資料社会主义國有化。社会主义國有化意味着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与資本主義剝削以及建立全民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社会主义國有化意味着把工業、運輸業、交通工具、銀行等等轉到人民手里，以摧毀資產階級經濟障地，消滅資本對工人的剝削，消滅資本主義利潤的體系。社会主义國有化意味着用革命手段把資本主義私有制改造

成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創造必要的条件。

由於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勝利的結果，苏維埃政权在人类歷史上第一个實現了社会主义國有化。工人階級在共產党的領導下取得了政权，剝奪了資產階級和地主。共產党博得了世界革命工人运动的“突击隊”的榮譽称号。各人民民主國家的兄弟党遵循着苏联共產党的榜样和苏联人民的全世界歷史經驗，實現了社会主义國有化。

列寧在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不久在實踐上提出了關於社会主义國有化及其意义的問題。

1917年在布尔什維克党四月代表會議上，根据列寧的提議通过了銀行和辛迪加國有化的要求。列寧在其1917年10月6—8日（19—21日），即大約在十月武裝起义三个星期以前所寫的“論修改党綱”一書中曾經寫道：“各國由於战争和破坏不得不从壟断資本主义走向國家壟断資本主义。客觀情况就是如此。但是，在革命形势下，在革命的时期，國家壟断資本主义会直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在革命形势下不走向社会主义，决不能前進。战争与革命所造成的客觀情况就是如此。我們的四月代表會議考慮到这种情况，提出了‘苏維埃共和國’的口号（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形式）和銀行与辛迪加國有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措施）。”^①

由此可見，列寧十分清楚和确切地表述了我們党的綱領關於社会主义國有化問題的實質。列寧首先提出了政权問題。在國家壟断資本主义的条件下，只有採取推翻資本政权的方針，运动才能向前發展。

列寧把研究國有化跟实行國有化的政权的階級本性密切地

① “列寧全集”俄文版第26卷第143頁。

联系起來。列寧曾經指出过：在俄國處於革命的条件下，只有採取建立工農蘇維埃政權和實行作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基本措施之一國有化的方針，運動才能進一步向前發展。列寧寫道：“我們在進行戰鬥，就是說我們在為我們的黨奪取政權而鬥爭。這個政權將是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的專政。掌握了這個政權，我們不僅不害怕越出資產階級制度的範圍，恰恰相反，我們明明白白地、直接了當地、確切地、大聲地說，我們一定越出這個範圍，我們勇往直前地向社會主義邁進，並說這就是我們的道路：通過蘇維埃共和國、通過銀行與辛迪加國有化、工人監督、全國義務勞動制、土地國有化、沒收地主的財產等等。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提出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措施的綱領。”^①

共產黨取得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是因為它具有明確的社會主義國有化的綱領。隨着蘇維埃政權的勝利，土地、工業、銀行、運輸業、交通工具等等實行了國有化。1917年12月14日（27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了銀行國有化法令。1917年12月和1918年，根據人民委員會的法令，工業部門先後轉為人民的財產。

實現國有化是為了破壞資產階級的經濟力量 and 組織新的蘇維埃的國民經濟，首先是為了組織新的蘇維埃工業。銀行、鐵路、對外貿易、商船和全部大工業——煤礦工業、冶金業、石油工業、化學工業、機器製造業、紡織工業、制糖工業等等實行了國有化。這是對資產階級的一種剝奪，把生產資料轉歸為工人國家所有。

國有化的方式及其次序本身是由消滅資產階級的經濟權力、實現向社會主義建設過渡的措施以及對反革命作鬥爭的必

① “列寧全集”俄文版第26卷第143頁。

要性所决定的。这就是全部大工业的国有化，这是由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的要求所决定的，它足以反对资本的利益为目的的。苏联社会主义国有化乃是旨在消灭资本家和地主的统治，保证建成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国有化的榜样和典范；这一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是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不断地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的办法，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东南欧和中欧各人民民主国家所实现的工业和银行的国有化，是通过剥夺大资本家和最大资本家的办法消灭财政资本政权的社会主义国有化的形式，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和条件。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国有化的特点在于在第一个阶段把过去属于希特勒分子、附敌分子、卖国贼以及与德国法西斯侵略分子同谋者的一切企业无偿收为国家所有。与此同时，那些超越了法律所规定的一定范围的企业也实行了国有化。

苏联军队把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从法西斯占领下解放出来以及政权交归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的手里，是这些国家实现国有化的条件。在每个人民民主国家里，实现国有化的时间、规模和条件是取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反对反动阶级及其政党的斗争的进程的。苏联国家和军队的实力防止并确保了各人民民主国家免遭那些为外国帝国主义者所支持的反动阴谋与叛乱的干涉和危险。

在捷克斯洛伐克，根据“矿井和某些工业企业国有化”法令，从1945年10月25日起，有一些企业实行了国有化，在这些企业中工作的占全体工人（斯洛伐克不包括在内）62%。按照每个部门来说，国有化部门中的工人在以下各部门工人人数当中所占的百分比是探矿业——100%，电力、煤气和供水生产——82%，黑色冶金工业和机器制造业——75%，化学工业——74%，玻璃

工業——68%，皮革工業——60%，建築材料和陶器工業——59%，紡織和縫紉工業——46%，食品工業——39%，造紙和印刷工業——28%，木材工業——23%，建築工業——10%。

在外國帝國主義者支持下所組織的捷克斯洛伐克反動派的陰謀的粉碎，給工業國有化的新階段創造了條件。

1948年3月，工人在50名以上的企業實行了國有化。1948年，對外貿易實行了國有化。1950年，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工業和對外貿易中，資本主義企業已經不存在了。

在波蘭，根據1946年1月3日頒佈的法律，銀行、保險公司、通訊與運輸企業、重工業和對外貿易實行了國有化。每班50名工人以上的企業實行了國有化。根據貝魯特在關於波蘭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中所引証的材料來看，社會主義部門的產品的比重占百分之86.3%。可見，由於國有化，波蘭的絕大多數工業產品在1946年已經由社會主義部門進行生產了。

社會主義部門的比重在1947年佔89.5%，1952年，佔99.6%。實際上，資本主義成份已經從波蘭的工業當中被消除了。

在匈牙利，關於國有化的基本措施要比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實行得遲些。這取決於粉碎國內反動勢力的鬥爭的特點。在1946年1月，煤礦實行了國有化，發電量在20,000瓩以上的發電站，國有化實行得稍遲一些。

在1947年11月，由於匈牙利反動派的失敗和被粉碎的結果，五個匈牙利銀行及其控制下的264個工商業企業以及金融機構實行了國有化。

1948年3月25日，國民議會決定100名和100名以上工人的企業實行國有化，對外貿易實行國有化。1949年12月27日，10名和10名以上工人的一切工業、運輸業和採礦業的企業歸國家所有。到1949年12月，全部製造業、採礦業和冶金業歸國家所

有。

在羅馬尼亞，在消滅君主制和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國以後，基本工業部門實行了國有化。在1948年，工業、運輸業、銀行和保險公司實行了國有化。

在1952年，社會主義成份在羅馬尼亞全部工業產品中佔96.5%。

在保加利亞，在1947年年底已經廣泛地實行了工業、運輸業和信貸的國有化，保證了公有化成分在這些國民經濟領域中，按照季米特洛夫的說法，“幾乎完全佔據壟斷地位”。在1948年年底，全部工業的93%掌握在國家手里，在1951年初，全部工業的99%掌握在國家手里。

在阿爾巴尼亞，具有全國意義的工業已經實行了國有化，銀行和交通工具已經實行了國有化。後來，全部工業實行了國有化。只有那些不採用僱傭勞動力的手工業作坊還掌握在私人手里。

大工業和銀行的國有化摧毀了這些國家中的壟斷資本的障地。這些國家的人民已經解脫了外國帝國主義者的奴役。由於國有化的結果，奠定了國家的全民所有制的基礎，建立了新型的國家。在政權屬於人民的人民民主國家里，大工業、運輸業和銀行是屬於國家的。結果這些國家的人民解脫了帝國主義的壓迫，勝利地沿着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前進。

各人民民主國家中的社會主義國有化，是社會主義在蘇聯取得勝利的情況下，在蘇聯的經驗的基礎上，在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協助與援助下實現的。

政權的性質決定着各人民民主國家的國有化的本質。中歐和東南歐各個國家執行着無產階級專政的職能。工業、銀行和運輸業的國有化，乃是各人民民主國家在殘酷的階級鬥爭的情況

下所實現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礎。

中國的人民政权按其性質來說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它是中國向社会主义發展的過渡的政权。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那些過去屬於賣國賊、附敵分子、與日寇同謀者、買辦資產階級的工業已經實行了國有化。國有化的企業已經歸全民所有。這些國有化的企業是中國向社会主义發展的過渡條件下的人民政权的經濟基礎。

社会主义國有化按其階級性質、實質和形式來說是與資本主义國有化對立的。

在資本主义總危機時期，即當壟斷組織控制國家的時候，在各資本主义國家里常常出現企業的公開國家化的情形。在各個帝國主义國家里，個別的企業，而在特殊的情況下甚至整個工業部門可以被資本主义國家收歸國家所有，實行國有化。

在馬克思列寧主义經典作家的著作里，對於這種國家化的本質正像對資本主义條件下的國家所有制的實質一樣，作了全面的分析。企業、鐵路等等歸資本主义國家所有，並不意味着剝削制度的消滅。恰恰相反，國家化本身成為壟斷資本對工人階級和一切勞動者加緊剝削的工具。

自然，資本主义國家為了挽救資本主义或加強壟斷組織的障地，不得不求救於國家化的手段。這一事實證明：生產關係和生產力性質之間的衝突已經達到了極端尖銳的程度。資本主义國有化本身，是落后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性質之間的衝突的表現，它不僅不能導致這一衝突的消除，而且只能使這一衝突更加尖銳化。這種國家化只能導致階級矛盾的尖銳化。

在資本主义總危機的條件下，實行財產國有化時，國家要補償國有化企業舊業主全部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的價值。此外，

國家還向企業主以債券利息的形式支付股息；這種債券是國家為了代替股票而發給企業主的。由此可見，舊業主對工人的剝削照舊保存下來了。

在這種情況下，國家是作為資本家取得利潤的保證人出現的。國家一方面對舊業主支付一定的債券利息，一方面保證他們取得不以行情波動為轉移的收入。

資本主義企業歸國家所有還直接為了資本家的免遭破產。國家化的這一原因是十分常見的原因。這個原因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帝國主義階段來到以前就發生過。例如，恩格斯在1880年所寫的“俾斯麥先生的社會主義”一文中，當分析德國鐵路國有化的原因時，指的恰恰就是這個原因。1869年到1873年，大部分德國鐵路股票被匯兌銀行和勃萊赫雷德這兩個銀行所收買。在1873年，當經濟危機到來時候，這兩個銀行面臨着破產的危險，並且極力想把自己的股票銷售給國家。恩格斯對這件事情寫道：“帝國政府把全部鐵路集中在自己手裡的計劃的出發點並不是國家的社會繁榮，而是破產銀行的個人繁榮。”^①

國家按照人為地大大抬高的市價收買了鐵路股票，於是那些甘心大虧其本而賣出股票的鐵路股票持有者取得了巨額的利潤。俾斯麥實現了鐵路國有化，同時使大資本家免遭破產，而且獲得了在戰爭時期更加方便地管理鐵路的可能。

列寧在他的著作里不止一次地指出過：在帝國主義時代，國家的壟斷乃是個別資本家和資本家集團增加收入和免遭破產的手段。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底最高階段”一書中指出：國家的儲金社和郵政機關開始與銀行競爭。列寧曾經指出：德國的商會常常要求禁止儲金社和郵政機關從事銀行業務，他

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15卷，第489—490頁。

指出：“銀行大王好像是畏懼國家的壟斷將從意料不到的方面來侵襲他們。但這種畏懼當然不過是好像一個事務室內兩個管事相互競爭而已。原來儲金社中數十萬萬的資本，實際上終究還是由那些銀行資本巨頭們支配，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國家的壟斷不過是一種替某某工業中將近破產的巨萬富翁提高並担保其收入的手段罷了。”^①

在列寧的這些原理當中，極其深刻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企業國有化的原因。那些財運亨通的資本家，銀行大王或工業大王是不願把自己的財產變成國家的財產，儘管國家對個別企業的所有制和壟斷組織的統治是很和睦共處的。

但是那些將近破產的資本家們看到國家化能夠挽救自己的資本和利潤，因而喜歡採取這種增加自己收入的手段。

在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條件下，個別企業甚至工業部門的國有化是由於以下的原因發生的：在許多情況下，國家所有乃是壟斷資本家加緊剝削羣眾和增加利潤的最有利和最方便的手段。

列寧曾經寫道：“帝國主義戰爭非常加速並加劇了壟斷資本主義變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過程。國家與擁有莫大勢力的資本家組合日益密切地溶合起來，它所加在勞動羣眾身上的駭人聽聞的壓迫，也就愈益駭人聽聞了。”^②

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基本內容，恰恰是國家為了保證資本家壟斷組合取得最大限度利潤而服從於它們。

國家機器乃是加緊剝削和增加利潤的最有效的工具，在階級鬥爭急劇尖銳化的條件下用其他手段是達不到這一目的的。

① “列寧文選”兩卷集第1卷第948頁，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② 同上第2卷第162頁，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國家給予工業家和銀行家的補助金、貸款等等，是靠課稅進行的。這是直接從工人階級的工資和其他勞動者階層的收入中扣除的錢。

在帝國主義條件下，企業國有化只不過是壟斷組織為了加緊剝削羣眾而利用國家的一種形式罷了。

恩格斯關於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國家化曾經寫道：“不管現代國家具有怎樣的形態，它仍然是純粹資本主義的機構，是資本家的國家，是理想中的總合資本家。國家愈是把生產力佔為己有，它就愈將完全地變成綜合的資本家，因而愈將有更多的公民受它剝削，工人會成為僱傭工人、無產者。資本主義的關係不會消除，而是更加尖銳化。”^①

這種國有化對於整個資本家階級，首先是對壟斷資本有利的。最常見的是，那些生產的產品包含有其他部門的生產費用的企業實行國有化。國家以加強剝削工人和用國庫的錢在技術上重新裝備國有化企業的办法保證降低這些企業的生產費用，從而為其他部門的壟斷資本家服務。這樣一來，整個壟斷資本的利潤就增加了。由此可見，現代資本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也是關於資本主義企業和整個部門歸國家所有的措施的基礎。現代資本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必須取得最大限度的利潤——使我們能夠了解和解釋在資本主義總危機條件下資產階級國家中所實現的國有化的措施。

在現代的條件下，即在工業、運輸業、交通工具和土地國有化在蘇聯作出了輝煌的成績——這些成績表現在生產力和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的突飛猛進的發展上——的條件下，右翼社會黨人和其他資產階級政黨特別喜歡把任何收歸國家所有的作法說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14卷第282頁。

成是“社会主义的”措施，为此，資產階級國家冒充超階級的机关，它似乎是代表人民和整个社会的利益的。於是資本主义國家所有制就冒充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

恩格斯老早就給当时假社会主义者把个别資產階級政府所实行的國有化措施冒充社会主义的措施的企圖以致命的批判。他寫到：“……最近，自从俾斯麥着手國有化以來，出現了特种的假社会主义，它以一種志願的奴才相时而在那里出現，时而在这里出現；它直截了当地把任何國有化，甚至俾斯麥的國有化都宣佈为社会主义……比利时政府最一般的政治与財政的考慮，自己來修筑主要鐵路，俾斯麥只是为了在战争时期便於管理和利用，为了从鐵路官吏中結成俯首貼耳投票拥护政府的一羣而主要是为了給自己創造新的、不受議會干涉的收入來源，毫無經濟必要把最主要的普魯士鐵路綫变为國有，所有这一些做法無論怎样說都不是社会主义，既不是直接的或間接的社会主义，也不是有意識的或無意識的社会主义。否則，普魯士國家銀行，帝國瓷器手工工場，甚至軍隊中的連隊縫紉部，而且連弗里德利赫·威廉三世在三十年代有一位聰明人所主張的……妓館國有化也当真被認為社会主义机关了！”^①

同时，恩格斯还指出：資產階級首先希望把郵政局、電報局、鐵路收归國家所有。

工党首領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曾經論証过个别工業部門資本主义國有化的必要性，把郵政局說成是資產階級國家已經長入社会主义的最鮮明的標誌。他們需要这样做是为了欺騙那些为了實現社会主义，要求真正的國有化的工人羣众。右翼工党分子把他們的为資本利益服务而規定的变煤礦工業、鐵路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15卷第539—540頁註解。

和英國銀行為國家所有的辦法說成是“社會主義”。右翼社會黨分子把國家資本主義壟斷說成是社會化，是為了向羣眾掩蓋和粉飾這樣的事實：資本主義國有化按其目的是與為了社會主義而實現的國有化相對立的。列寧曾經寫道：“最普遍的一種錯誤，就是根據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觀點來斷言，似乎壟斷資本主義或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已經不是資本主義，已經可以稱為‘國家社會主義’以及諸如此類等等。”^①

列寧主義教導說，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乃是社會主義的最充分的物質準備。

在沒有消滅資產階級的統治以前國家壟斷組織是不會為全體人民服務的。列寧曾經指出過，在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是沒有任何中間階段的，他同時還指出，為了要實現向社會主義過渡，必須用革命方法推翻由於實現國家壟斷的措施而得到利益的階級的統治。不採取革命的手段來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國家壟斷的措施是不會關心人民的利益的。

實現國有化的那個政權的階級本質乃是決定國有化性質的基本的、根本的和主要的東西。因為，這裡談的是生產資料歸國家所有，因此，國有化的性質本身及其形式（組織形式和政治形式），賠償、歸國家所有的企業的領導的性質問題的解決，都是由國家政權的階級本質所決定的，由實現國有化的具體歷史的、階級的和政治的環境所決定的。國有化企業本身成為管理國家政權的階級的手中的武器。

正因為企業或工業部門掌握在資產階級國家手里，所以壟斷資本的執政黨或它們的右翼社會黨奴僕永遠利用國有化來反對工人。

^① “列寧文選”兩卷集第2卷第219頁，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壟斷資本的政黨或它們的右翼社會黨幫兇所實行的資本主義國有化，都是為了鞏固資產階級政權，鞏固資產階級剝削的基礎，保證壟斷資本取得最大利潤。必須指出，除此以外，資本主義國有化始終只是部分的國有化，只是在個別企業或個別工業部門中實行國有化，對應該實行國有化的這些或那些企業的選擇，始終是由壟斷資本的利益來決定的[⊖]。

各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國家所有制，在不同的國家里可能在不同情況影響下實行的。也有這樣的情況：國有化的企業反過來又變成壟斷資本家的私人財產。

在這種情況下，壟斷資本家發了兩份財：靠國有化發了一份財，靠國家所有變成私人所有又發了一份財。比方說，美國有許多工廠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靠國家費用建成的，當時壟斷組織在這些企業的建筑以及出租方面，獲得了巨額的收入。壟斷組織利用了這些企業的固定資本，靠國家的供給獲得了巨額利潤。戰後，這些工廠的很大部分被國家廉價“賣”給了壟斷資本家。

二 工黨國有化的真實內容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前，工黨在1918年通過的第一個綱領中，提出了英國某些工業部門實行國有化的口號。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費邊派曾經提出過某些工業部門的國有化，他們把它宣傳成“社會主義化”。這是一種欺騙，它使工黨的資

⊖ 現代右翼社會黨分子（工黨分子吉伊之流）宣稱，在全部大工業歸國家所有和整個資本家階級變成獲得賠償並且靠國有化企業的收入而生活的食利者的情況下，才能實行國有化。事實上，這是像考茨基基派的超帝國主義論和希法亭的“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論與關於“有計劃的資本主義”的可能性的奇談怪論一樣，是反動的空想。

產階級改良主義上層分子能够影响工人羣众，冒充自己是工人階級利益的代表。

1918年的綱領宣佈要实行鐵路、礦井和電力生產國有化。此外，这个綱領主張將英格蘭銀行和保險团体实行國有化，而且还宣布工党要实行土地國有化。

毫無疑問，这个綱領是工党的首領們在英國工人运动日益高漲的压力下通过的。它之所以被工党的首領們通过，是由於他們害怕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英國的工人运动。同时，綱領中規定的國有化的办法的使命，乃是巩固英國的資本主义。这表現在要求完全“公平合理的”对各个企業主实行賠償上，同样也表現在对國有化的对象的仔細選擇上，被提出來作为國有化的对象的正是那些工業部門，它們的落后会引起其他工業部門的生產成本提高和利潤下降。

工党關於“立即國有化”的綱領的第一章是和整个綱領一样，处处关心的是提出不致触动英國資本主义的利益的措施。这个綱領正是这样判定出來的：用它的彷彿是“社会主义”的性質來欺騙工人，同时又說服資產階級为了巩固資本主义，必須作某些改良。

工党的首領們在提出某些工業部門國有化口号时，極其巧妙地估計到工人羣众的情緒。右翼領導者用一切手段力圖說服工人，他們应許了的國有化一旦实现就意味着过渡到社会主义。

当然，工党的首領們很明白，在工人的心情与工党上層分子提出的口号之間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鴻溝。南威尔斯的許多工人，根据自己的經驗以及在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确信必須消滅資本主义，必須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因此他們提出了实行礦井和鐵路等等國有化的要求。工党的上層分子也假裝作渴望社会主义的样子。事实上他們把國有化办法看作是巩固資

本主义的手段。

工人羣众得到的东西和工党在其綱領要求中所拥护的东西之間的根本差別，極明顯地表現在1920年3月召开的各工業部門和各左翼社会主义团体的代表大会上，南威尔斯的一位礦工代表的講演中說道：“如果官方的首領們說的礦井國有化是建立在一切階級的利益上的措施，那末南威尔斯的礦工們要求的却是……消滅剝削劳动的各种形式。”^①工党首領們同意礦井國有化的要求，因為他們在这里找到了挽救和巩固資本主义的手段；而南威尔斯的工人要求实行國有化是要消滅資本的权力，要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

英國工人的真实的階級本能和建立了苏維埃政权的俄國無產階級的范例，啓示英國的礦工把要求煤炭工業國有化当作反对資本权力的措施。

只有以列寧主义原則为指南的新型的政党，才能領導这个斗争，才能說服礦工不能局限於一兩個部門实行國有化（这是与資本主义相容的），才能說服他們只有在消滅資本权力的基础上和消滅資本权力以后实行整个工業國有化才是解决問題的唯一正确的方法。

但是，当1920年英國革命高漲和革命危机的时期，大家知道，能把礦工的这种本能的意圖变成自覺的意圖的共产党，还剛剛成立。

在以后的年代里，右翼工党的首領們就利用國有化的口号作为影响羣众的工具。在1922年和1923年的大选运动中，工党提出了某些生產部門、运输業和英格蘭銀行实行國有化的口

^① 全俄职工会总会机关报“國際工人运动”第1—2期第26頁（1920年5月）。

号。可是，第一个工党政府在1924年执政时，並沒有尽絲毫力量去實現某些部門國有化的諾言。

1926年6月8日，在梯弗里斯，斯大林在他的报告中揭示了英國煤炭工業的危机、礦井國有化的口号和政权問題的关系。他指出，英國煤炭工業的危机和它有关的总罢工充分提出了關於在确立工人監督之下煤炭工業社会主义化的問題。

同时，决不能認為國有化的口号和爭取社会主义的問題是不相关联的。斯大林說过：“英國工人階級不能不親身体驗到，在走向目的地的道路上主要的障碍是資本家的政权，在目前就是保守党及其政府。既然工会总委员会像怕瘟疫一样地怕承認經濟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不可分的联系，英國工人現在就不能不了解，在他們和有組織的資本進行艰苦的斗争中，政权問題就是現在的基本問題，不解决政权問題就不能克服煤炭工業的危机，也不能克服英國整个工業的危机。”^①

煤炭工業國有化問題也和整个工業國有化問題一样，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为了劳动者的利益，只有通过消滅英國資本权力，才能够得到解决。但工党上層分子想的不是消滅資本权力，而僅僅是为了通过把礦井轉变为資本主义國家所有，減輕英國資本家的困难情况。

工党在1928年通过題为“工党党员与民族”的綱領，重复了1918年綱領中所包含的要求。

1929年第二个工党政府执政时期，旧的歷史重演了。第二个工党政府还是不考慮實現工党的綱領要求。

1929年至1931年間，工党政府的破產和麥克唐納、斯諾登和其他工党首領公开投向保守党，促使工党的思想家又制定新

①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47頁，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的國有化計劃。

从那些繼麥克唐納之后掌握工党領導权的新集团，即現在还繼續領導着这个党的集团（艾德禮、摩里遜、达尔頓等）观点看來制定充分保證壟斷資本利益的國有化办法，这是由許多原因决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更明顯地暴露出英國喪失了以前的世界地位，英國資本主义更加腐朽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市場相对的穩定、各殖民地本國的輕工業的增長、美國資本的進攻、德國帝國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敗以后的復活——这一切使英國的經濟情况剧烈惡化。英國的工業處於停滯和衰退的狀態中。1929年至1933年的世界經濟危机使英國帝國主义的情况愈益惡化了。

英國工業的机器已經陈旧了。英國資本主义为了巩固自己对外貿易的地位，需要重新裝備工業。

根据工党的計劃，重新裝備工業应当由國家出錢來实现，也就是由納稅出錢來实现。工党認為，某些部門的國有化是实现重新裝備最適當的方法。根据他們的計劃，实行國有化的应当是那些最虧本的、裝備陈旧的、生產成本很高的、它們的產品在其他工業部門的生產成本中起着重要作用的那些部門。那些部門就是煤炭工業、運輸業、電力生產、煤气工業。根据工党的方案，國家壟斷的办法应当成为能解决英國資本主义長期的危机和保證英國壟斷組織最大利潤的手段之一。

大家知道，工党的國有化办法本身，与英國資產階級的“正統的”政党，即保守党和自由党的政治實踐相比，在原則上沒有任何新的东西。某些國有化的办法（例如，1938年國家贖買煤礦礦藏）是这些政党远在工党实行國有化以前实行过或者提出过的。在工党这里，新的东西是为了壟斷資本的利益而实行的整个國有化办法的規模以及在羣众面前把这个綱領吹噓成社会

主义的綱領。当时，把計劃中的資本主义吹嘘成“社会主义的”國有化，对右翼工党來說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苏联五年計劃的成就，苏联沒有失業和危机，对遭受極嚴重的經濟危机的（1929年至1933年和1937年至1938年）資本主义世界是一个鮮明的对照。社会主义建設的成就，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勝利，对英國工人階級的影响日益增長。在这种情况下，費边派關於“資本主义長入社会主义”的旧烹調術，加上工党的資產階級國有化計劃的調料，就变成欺騙羣众的重要手段，变成阻止羣众走上反对資本主义、为社会主义進行階級斗争的廣闊道路的重要手段。

代表着英國工業家联盟的利益和地位的工党首領們，想要一箭双鵰：既要为英國資本主义制定國家壟断的辦法的綱領，同时又要在工人階級面前冒充这些辦法是社会主义的辦法。英國資本主义的情况愈困难，失業愈增加，工人階級狀況愈惡化，右翼工党分子愈要進行愚惑宣傳，愈要高談社会主义。他們竭力要羣众相信，工党將來执政时实现國有化，这將意味着英國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列寧寫道：“資產階級正需要这样的一部分工人階級能信任的僕从，这种僕从則用改良主义道路可以走得通的空話去裝飾和頌揚資產階級，用这种空話去迷惑人民的眼睛，用拙劣地描画改良主义道路底美妙和可能的办法，使人民离开革命。”^①

这种拙劣地描画改良主义道路和資產階級國有化的美妙和可能，在1934年公佈的，工党的題为“民族与和平”的綱領中表現出來了。在1934年的綱領中，資本主义國有化的总的要求並沒有絲毫改变。

^① “列寧文集”第6册第219頁，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工党的上層分子和保守党黨員一起組成联合政府，对自己提出的關於对某些部門实行國有化的綱領性的办法極力保持沉默。尤其是摩里遜在1944年紐約出版的“前途与政策”一書中，只順便談到關於“自然的壟断組織”國有化的必要性，他所指的是煤炭工業、运输業和电力生產。

实际上，工党执行委員會在1944年12月代表會議以前的立場就是这样的。这次代表會議的任务是为1945年大选拟定行动綱領。

但是，如果說工党的首領們在羣众面前極力辯护在第一个和第二个工党政府执政时放棄实现某些部門國有化的工党的綱領是因为工党在議會中不佔絕大多數，解決問題是依賴自由黨員的投票，那末，現在，战争快結束的时候，情形已經变了，工党有一切可能在議會中獲得絕大多數了。在这种情况下面前，工党的領袖們又尽可能地長期拖延將铁路、煤气工業、电气工業、英格蘭銀行实行國有化办法付之实现。

在1944年工党的年会上，执行委員會在报告中只提議將煤炭工業國有化。在其他方面，工党的首領却只主張对工業保持战时的監督。

工党分子提議用國家补助金、貸款、和“鼓励”壟断資本家的其他形式去提高英國工業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能力。因此工党执行委員會在年会上提出的決議歸結为要“对英格蘭銀行实行監督，对股份銀行發給貸款，並且要建立全國投資管理局”。这是拋棄实行國有化的國家壟断办法的綱領。正如英國資產階級的報紙所指出的，这个綱領實質上和保守党的綱領沒有什麼區別。

但是，1944年的工党年会以多數票通过了決議，在決議中指出了重工業和銀行实行國有化的必要性。這一決議在實質上

意味着工党执行委员会的失败。

工党的执行委员会在代表会议上的失败，反映了战争结束时英国工人群众在苏联人民战胜法西斯德国的全世界历史性胜利的影响下产生的左倾情绪。英国的劳动群众渴望社会主义、和平、和苏联的友好。代表会议的决议要求领导上提出重工业和银行实行国有化的纲领，表现了群众拥护社会主义的愿望。

但是，加入工党的工人群众，却被英国在工党领导下能够通过逐渐由“资本主义长入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幻想所蒙蔽了。这种幻想是右翼工党的首脑们有意意识地散佈和大力培植的。

工党执行委员会在年会上，在失败的事实面前耍了手腕。它制定了1945年颁布的题为“面向将来”的竞选纲领，在纲领中关于只是对英国资产阶级有直接利害关系的那些工业部门国有化的工党的纲领要求和执行委员会最初的提议结合起来了。执行委员会的最初的草案和执行委员会通过的补充建议，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互相补充的，其目的都是为了巩固垄断资本的地位。

当然，这时工党的领导不随机应变是不行了。在1944年年会的决议中指出了重工业和银行实行国有化有原则上的必要性。而在1945年最后被工党执行委员会通过和代表会议批准的纲领中，这一原则性方针却被某些工业部门和英格兰银行应当实行国有化所代替了。

1945年5月在布拉克浦召开的工党年会通过的“面向将来”的竞选纲领指出，英格兰银行应当成为公有财产，“其他银行的活动应当和工业的需要一致”。关于“其他银行的活动和工业利益一致”这一点，丝毫没有改变英国金融寡头的支柱——五大家垄断银行的活动。

1945年工党年会批准的资本主义國有化的綱領，把工業分成三类。第一类是那些“不可收拾”的工業部門。它們是“已經成熟或早就成熟到为了國家利益轉归公共財產和管理”的部門了。除了旧綱領中列舉的那些部門加上煉鋼工業，都是屬於这些部門的。第二类是維持原狀的中小企業。第三类是对实行國有化“尙未成熟”的工業部門。

在土地國有化方面，工党的競选綱領和从前的綱領相比，甚至后退了一步。1945年的綱領宣佈，工党分子是“相信土地國有化”的。但是，綱領並沒有提出關於土地國有化的任何办法。只是答应“为社会的目的”購買某些土地。

國有化的綱領以及1945年圍繞这一綱領討論时展开的斗争就是如此。工党的首領們認為1945年某些部門國有化的綱領的通过乃是工党向“实现社会主义”的过渡。

事实上，工党首領們提出的某些部門國有化的綱領重复了工党的旧綱領，他們关心的只是巩固英國的资本主义。

* * *

由此可見，工党的某些部門國有化的綱領要求的歷史以及1944年工党年会上圍繞國有化問題的斗争証明：工党上層分子从旧費边派那里承受了某些部門國有化的要求，把它当作自己的冒充为社会主义者的手段。同时工党的領導者尽量拖延实现自己的綱領要求，当事变的進程逼使他們去做的时候，他們打算只用对資本家有利的形式去实现他們的綱領要求。

通过工会集体加入工党的工人羣众渴望社会主义。工党的羣众看到在苏联的条件下國有化了的工業一日千里地向前迈进，他們把國有化看成是达到社会主义的手段，天真地相信工党首領們在大选中獲得多数以后会实现社会主义國有化。当1944年和1945年在工党的兩次年会上，在渴望社会主义的羣众

和右翼的首領們發生沖突的時候，工黨執行委員會單純地把旧的綱領要求搬進工黨的新的（1945年）競選綱領“面向將來”當中。工黨上層分子在社會主義的旗幟掩蓋下只是為了鞏固英國資本主義的地位，把某些工業部門轉歸國家所有。英國資產階級的領袖們就是這樣對英國工人佈置了騙局。

1949年頒佈的兩個文件：一個是工黨分子的競選綱領“工黨黨員相信英國”，另一個是保守黨黨員的競選綱領“英國的正確道路”，都特別明顯地向英國普通工人揭穿了工黨國有化的實質。

在這兩個文件中值得注意的事實是：右翼工黨分子在1949年“工黨黨員相信英國”的綱領中拒絕了國有化的進一步的措施。同時保守黨黨員認為必須聲明，他們贊成工黨所實行的英格蘭銀行、煤炭工業、運輸業、電力站的國有化。保守黨的綱領宣稱，一旦保守黨掌握政權，他們不廢除工黨的這些辦法。

如果說1945年大選時保守黨黨員為了競選猛烈反對工黨的國有化辦法，說這些辦法是“社會主義的”，那麼，1949年保守黨的綱領則認為工黨所實行的國有化辦法與資產階級的利益沒有矛盾，相反地，它是完全符合他們的利益的。

這只不過是証實，工黨實行國有化政策是為了以保守黨黨員為其主要的政治代表的資本家階級的利益的。

1950年8月工黨頒佈了題名“工黨與新社會”的新綱領。綱領的目的：一方面要進一步恐嚇和欺騙工黨黨員；另一方面，這個文件的任務——根據英國共產黨理論刊物“共產黨評論”公正的論斷——是要“向美英帝國主義者表示，工黨堅決支持帝國主義的利益”[⊖]。在1950年6月工黨的首領們在道爾金特別秘密

⊖ “Communist Review”, Oct. 1950.

會議上擬定的這新的正式文件中，值得注意的事實是：在這一綱領當中完全看不到進一步國有化的要求了。曾經在1949年的“工黨黨員相信英國”的綱領中應許的關於水泥工業、制糖工業、保險事業的國有化現在再不提了，只是提到供應水的國有化。

1950年10月初摩里遜在馬爾加特召開的工黨年會上斷言，工黨撤消本來就殘缺不全的國有化提案，是暫時的。這些話絲毫無濟於事，這該是正像摩里遜所說的，如果工黨能在眾議院得到比1950年2月23日大選所獲得“更優異的對比力量”，工黨就恢復這些要求。顯然，摩里遜的聲明，只是為了籠絡羣眾講的照例的聳人聽聞的諾言。同時他的聲明總掩飾和証實右翼工黨分子在對內外政策問題上和保守黨黨員結成統一戰綫的事實。

三 工黨的國有化的目的

工黨政府對英格蘭銀行、煤炭工業、電力站、煤氣工業、國內運輸業和一部分鍊鋼廠實行了國有化。這些企業是工業的不大的部分。在這些企業中擁有的工人還不到全部工業工人的20%。

對資本主義國家來說，稀奇的不是國有化的事實本身，而是國有化的規模，工黨的首領們利用這種情況欺騙勞動者，使他們認不清工黨實行國有化的真正目的。實際上，選擇國有化的對象既是由被國有化的企業主切身要求和利益來決定的，也是由整個英國壟斷資本的利益來決定的。

工黨政府實行國有化的那些部門所起的作用是對其餘工業供應燃料和動力，或供應運輸工具。由此可見，從一切其他工業的利益的觀點看來，它們是起着輔助作用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英國資本主義拚命要在世界市場上爭奪自己的地位。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首先與美國相比，裝

备的陈旧、生产成本的高昂使英國資本家在世界市場的競爭中處於極其不利的情況中。

工黨首領們首先擔心的是怎樣能把英國資本主義從窘境中拯救出來，保證它獲得最大的利潤，提高英國工業的競爭能力。換句話說，工黨的國有化乃是為巩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總危機時期中徹底動搖的英國資本主義的地位的措施的總和。

燃料、電力、運輸在資本主義工業一切部門的生產成本中佔着重要的位置，但是正是這些英國工業部門處在極其衰敗的狀況中。這些部門的高昂的生產成本和困難的處境提高了其他工業部門的生產成本，並且使英國工業在世界市場上的地位惡化。

在實行國有化的部門中間，煤炭工業站在最前列。在十九世紀時，它是英國經濟實力的基礎之一。煤的輸出對英國的對外貿易有着巨大的意義。煤炭工業是英國商船隊在世界市場上佔優勢的基礎，也是海軍艦隊在世界上佔優勢的基礎。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英國煤炭工業進入了極其衰退的時期。

煤的開采和輸出[⊖]（單位：100萬噸）

年代	1900	1913	1924	1929	1938
開采	229	292	272	262	231
輸出	41	96	81	78	47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煤的開采比1913年減少五分之一以上，停留在1900年的水平上。1938年煤的輸出比1913年減少二分之一以上，勉強超過1900年的水平。

在減少採煤的同時，煤炭工業的工人人數也減少了。1913

⊖ “The Colliery Yearbook and Coal Trade Directory”, L. 1951. p. 631.

年礦工人數為 1,107,000 人,至 1938 年減少到 782,000 人了。

採煤方法落后,裝备陈旧,礦井主不願把投資重新裝各礦井——这一切決定煤炭工業勞動生產率極端緩慢的發展。1938 年每個工人的勞動生產率比 1913 年增長的情況如下:

	英國	波蘭	上西里西亞	魯爾
1913年	100	100	100	100
1938年	113	159	162	164

在蘇聯,僅僅在兩個五年計劃內(自 1929 年至 1938 年),煤炭工業每個工人的勞動生產率增長到 110.8%,而 1938 年和 1913 年相比則是 244%。由此可見,在這一時期蘇聯煤炭工業的勞動生產率的增長超過了魯爾、上西里西亞和波蘭的煤炭工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 2.25—2.5 倍。英國礦井的勞動生產率的增長是微不足道的。英國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等於蘇聯的十一分之一。同時英國勞動生產率首先是依靠提高勞動強度來進行的。

英國礦井主不採用技術革新的任何措施。幾十年以前建立起來的礦井(有些礦井將近 100 年),從吊車到掌子面的距離很長。有這樣的礦井,工人為了要到掌子面來回一次,就需要化兩小時到兩小時半的時間。在這種情況下,缺少運煤機械化使煤炭工業中輔助工人的比重大大增加了。

在幾十年期間,英國礦井主使礦井貧瘠,不肯作巨額投資。基本資金沒有擴大,裝备陈旧。20 年內(自 1893 年至 1913 年)利潤和採礦權的費用是 33,200 萬英鎊,而那時煤炭工業的投資總額共計是 13,000 萬英鎊。可見,20 年內利潤總額超過全部投資的兩倍半。[⊖]

⊖ 參看 Brady: Crisis in Britain, L. 1950. p 113.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煤炭工業部門的情況更加惡化了。

工人人數少於1893年的水平。1945年每個工人的開採量是216噸，比1873至1882年每個工人的開採量286噸的水平降低了。

礦井是走着下坡路的。戰時，煤的輸出幾乎停止了。儘管這樣，但由於戰時採煤量下降，國內仍感到煤的異常缺乏。正如一位工黨代表在眾議院討論煤炭工業國有化時說道，“在最近21年內，煤炭工業已瀕於殞死狀態。”

英國壟斷資本的利益要求大量投資來對礦井進行改組和進行重新裝備。

礦井主決不願意進行這種重新裝備。英國工業家聯合會要求國家出錢重新裝備。

工黨的煤炭工業國有化就是這種要求的實現。正如1945年工黨的競選綱領“面向將來”中所說的，“在25年的過程中，生產英國最貴重的原料的煤炭工業，處在混亂掙扎的狀態中，因為它是幾百個獨立公司的財產。這些公司合併歸國家所有，便成為巨大的經濟，提供生產方法現代化的可能性”。

因此，工黨國有化就是在許多個別公司的位置上建立起統一的國家資本主義的壟斷制，就是為了一切資本家和煤的消費者的利益依靠國家出錢重新裝備礦井的綱領。

國有化也是為了礦井主的切身利益的，因為他們擺脫了虧本的礦井，得到了極優厚的補償。

因此，資產階級、尤其是礦業家聯合會歡迎煤炭工業實行國有化，後者樂於協助礦井國有化。

工黨政府為了要擺脫“工業崩潰”的威脅，實行了礦井國有化，當時運輸燃料與動力大臣辛威爾認為，在這種威脅面前由於煤炭工業的麻痺病症愈益加強，英國資本主義已停滯不前了。

英國資本家迫切憂慮的不僅是降低煤的生產成本，而且是恢復煤的輸出。工黨政府指望通過國有化達到擴大採煤量和降低煤的生產成本。這將會保證恢復和擴大煤的輸出並把廉價煤供給英國的資本主義工業。

工業的生產成本的另一重要要素是電力。擴大電力生產和按低稅率供給電力一定會幫助英國大資本家降低電力費用。

1937年這一年在英國每人用電是224瓦，而在美國是398瓦。

英國許多電力站因輸送電力的稅率過大過高，嚴重地妨礙了英國資本主義的壟斷組織。

1935年英國有635個電力站。在將要實行國有化時，電力站的數目因集中而減少到600個。倫敦一個區內1935年有82個獨立的電力站。1947年即實行國有化以前，它們的數量有些縮減，然而仍然有75個各自獨立的電力站。

1935年在麥克豪汶主持下的下議院常會指出：數目眾多的電力站的存在，按不同的稅率送電，電壓不同，在不同條件下使用器材和電纜，這嚴重地危害了以廉價的電力供應各個企業的事業。燃料與動力大臣辛威爾在下議院當討論電力站國有化條例草案時說道：“如果代表們看一看倫敦區電力站的分佈圖，就會看見它像個燈謎。一些電力站伸入到其他電力站的區域，供應區不符合技術的要求；私營公司和地方經營的企業絞成一團了。”^①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電力生產減縮了。英國壟斷資本家希望統一的國家資本主義的壟斷組織代替其他許多企業，它能夠為他們的利益服務，服從他們的要求，依靠國家出錢重新裝備電

① Brady, Crisis in Britain, L. 1950, p. 137.

力站，並且同樣由國家出錢建立新的電力站。

在煤氣工業中，也存在着類似的情況。600家以上的私營和市營企業的存在，高稅率的煤氣，低下的技術水平——這一切阻礙降低生產成本。工黨分子將煤氣工業實行國有化，只是符合英國巨大資本的利益。

第二次世界大戰將告結束時，鐵路運輸業（正和一切國內運輸業一樣）所處的情況不比煤炭工業好。

鐵路公司不願意在鐵路上作巨額投資。工黨的運輸大臣伯恩斯在議會討論關於鐵路國有化的問題時指出，國內運輸業的情況是悲慘的。

鐵路本身和鐵路車輛都極端陳舊了。1948年，有8,000台以上的機車（佔機車總數40%以上）超過了規定期限來使用。車廂的情況也不妙。車廂數量一年年減少了。僅1947年內，車廂減少了54,000輛，兩年內（1946—1947年）減少了80,000輛。由於車廂破爛不堪，幾千輛車廂經常不斷修理，從而減少運轉車廂數量。

鐵路股份公司（這些公司很多）不關心採用新技術。這表現在缺乏標準化，表現在機車類型很多。1948年當運輸委員會接管鐵路的時候，機車類型達400種以上。這造成了並正在造成燃料消耗過度。當時，裝有自動掛鈎的車廂幾乎沒有。

這種極端腐敗的情況也發生在國內航運當中。英國國內水路運輸業的基本系統乃是十八世紀末工業革命時代已經存在的運河網。這個運河網在英國經濟史上曾經起過很大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英國國內航運貨運量每年達4,000萬噸，1938年則只有1,300萬噸，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更少了。

屬於許多私營公司的水路運輸業處在極端衰落狀態。一篇專門性的文章這樣描述英國國內水路運輸業的情況：“水閘、涵

洞和橋樑的深度、寬度、一般條件或尺寸都不相同……。為一種類型的船隻建立起來的運河，通常是不適宜於其他類型的船隻通行，因此，只有最小的駁船才能任意航行。在大陸內……普通的駁船 600 噸，而在英國，最大的駁船往往是不到 100 噸的，也有低到 40 噸的。”^①

港口和船塢的情況也好不了多少。裝貨、卸貨的倉庫和裝備不能發揮效用。碼頭不能停泊較大的船隻，如此等等。

和英國資本主義工業的利益相矛盾的是過高的稅率。根據科林·克拉克的統計，1935 年英國貨物運輸的平均價值比美國高四倍，比法國幾乎高一倍。這上面，加上了不同的路綫貨物運輸的許多各種各樣的稅率。根據運輸部的統計，1947 年有 4,000 萬至 5,000 萬種^②不同的稅率。

工黨的打算，是鐵路和水路的重新裝備應當由國家出錢，也就是依靠勞動者的納稅來進行。國內運輸業的國有化可以保證降低貨物運輸的稅率和提高一切工業部門的利潤。

國有化也拯救了鐵道大王的破產。據“論壇”雙周刊（1949 年 12 月 2 日）報導，大戰前鐵路的股票迅速跌價，鐵路公司很少支付股息。當下議院討論運輸業國有化法案草案時（1946 年 12 月），克利浦斯說，鐵路公司“面臨着徹底的破產”^③。

於是，右翼工黨分子像對待礦井主和電力站業主一樣，來挽救鐵路大王的破產。對鐵道和水路的業主來說，工黨的國有化是真正的恩施。它可以使他們的鐵路和運河擺脫衰落狀態，並

① Fenelon, *Transport Coordination*, L. 1929, 引文是根據 Brady "Crisis in Britain", p. 262-263.

② 原文如此，疑有誤。——譯者

③ "Railway Gazette", 3. I. 1947.

且保證他們得到極有利的賠償費。

鋼的價格對英國一切資本主義工業有巨大的意義。鋼是一種半成品，它要在冶金工業、機器製造業、造船業和其他部門內加工。正如1948年11月15日供應大臣斯特勞斯在議會中說的，資本家想要“按低價格得到他們所需要的鋼”。鋼對英國的輸出有相當重要的意義。英國工業家聯合會認為降低鋼的生產成本是提高英國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能力和提高英國壟斷組織的利潤的重要條件。

然而，英國鍊鋼和鍊鐵工業的特點是技術和組織很落后。還在1930年，森基公爵委員會就做出結論說，“金屬熔煉和煤炭煉焦工業十分落后了，它們已不符合當前的要求”。

亨利·歐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寫的小冊子中對鍊鋼工業指出道，鋼的生產是“不符合最起碼的技術要求的。在送料、摻焦、烘礦和焙礦、選礦、利用廢氣加熱送風入爐等方面，英國完全是落后了……，在裝爐機械化和取消手工勞動方面的情況也是這樣的”^①。

1938年英國高爐的平均熔鐵量是68,000噸，而1937年比利時是81,600噸，盧森堡是90,300噸，德國是127,700噸，美國是254,000噸。英國高爐的技術水平是歐洲最落后的；高爐的生產率几乎是低到只等於美國的四分之一。

用英國冶金工廠做例子就特別明顯地可以看出，技術的陈旧和落后的重担是怎样束縛了資本主義的工業。英國的冶金工廠建立起來已經有一百多年了，但在這些工廠中，守舊的生產方法現在還是占優勢的。

現代的技術要使高爐的過程、鍊鋼和軋鋼的過程在一個企

① Henry Owen, *Steel—the Facts*, L. 1946.

業內進行。英國極大部分的工厂却沒有高爐和煉焦爐，於是它們必須製造煤氣來熔鐵。在鍊鋼企業中沒有高爐和煉焦設備，軋鋼是在單獨的工厂里進行的；生鐵、熟鐵和原鋼不得不運往全國各地。為不同業主所有的工厂的生產率和該區內供給它們的各企業生產率是不相適應的。大部分冶金企業的裝備陳舊。根據羅斯塔斯的材料，在英國鍊鐵和鍊鋼工業中，一工時的產量大約只等於美國的五分之一。

為了英國壟斷組織保證最大利潤的利益，需要根本重新裝備鍊鋼工業和使它現代化。鍊鋼工業和鍊鐵工業的技術是這樣落后，工厂是這樣分散，要大量投資才能對它們從根本上進行重新裝備。

工黨對某些冶金工厂實行國有化的目的，是依靠勞動者的納稅和依靠對該部門工人加緊剝削來保證降低鋼鐵的生產成本，這種鋼鐵是保證屬於其他工業部門的資本家的企業所需要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促使工黨對一部分鍊鋼工厂實行國有化的另一個原因，是在世界市場上由於即將成立“歐洲煤鐵聯營”（參加者有西德、法國、意大利、比利時、荷蘭、盧森堡的鋼鐵工業和煤炭工業），英國的鋼鐵面臨着殊死的競爭。‘舒曼計劃’的實現首先一定會使西德的鋼的生產增長，英國的壟斷資本家和他們在工黨黨內的代理人都懂得，新的超卡特勒會徹底地把英國的鋼從歐洲市場上排擠掉。還在1951年和1952年，“舒曼計劃”實現的前景和魯爾鍊鋼的擴大引起從西德運往英國的金屬原材大大減少，引起英國煉鋼工業的情況更進一步的惡化。

英國工業巨頭為了能夠在這種不利的情况下維持世界市場的競爭，願意將生產鋼鐵的半成品的企業轉歸國家所有。國有

化得以各种方法利用國家資金來重新裝備煉鋼工業和加強英國的鋼在世界資本主義市場上的地位。

因此，工黨上層分子提出煉鋼工業國有化的要求，和煤炭工業及鐵路國有化的要求一樣，是從英國壟斷資本的利益出發的。

現在，我們就來看看一部分煉鋼工廠國有化所採取的形式，同時看看在這些工廠中進行國有化的情況。

1918年11月，工黨政府把一部分冶金工業實行國有化的草案提交到下議院進行討論。

右翼工黨分子在提出煉鋼工業國有化草案時，利用它來展開照例的宣傳運動。他們證明，這彷彿意味着“向英國資本主義的堡壘進攻”，“向利潤原則的進攻”。工黨的報紙寫道，工黨政府對一部分煉鋼工業實行國有化，不僅是反對“沒有良心的資本家”的戰士，而且是為保衛“民族和民主社會主義利益”的戰士。

當議會討論煉鋼工業國有化法案草案時，工黨和保守黨之間發生了內部的爭吵。保守黨反對實行國有化，並且說，如果他們執政，煉鋼企業就歸還舊業主。

這種爭吵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呢？

原因在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煉鋼工業由於很多的軍事訂貨和輸出部門的需求的增加，並不缺乏訂貨。鋼鐵巨頭的利潤不斷增長。煉鋼壟斷組織的老板看到前面轉變到軍事經濟的遠景，預料會有更高的利潤。在這種情況下，他們認為不把自己的企業轉歸國家所有對自己會更有利，於是反對實行國有化。英國壟斷資本家的“經濟學家週刊”就是這樣解釋鋼鐵巨頭反對國有化的原因的。

煉鋼工業壟斷資本家為了獲得最大利潤，提議主要依靠國家出錢來重建自己的陳旧的企業。為此，制定了16,800萬英鎊

的重建的計劃，以便達到由國家來補助重建所需要的大部分資本的目的。

戰後的頭幾年中化費在重建一部分煉鋼工廠的12,000萬英鎊中的大部分是由國庫撥給的，而煉鋼壟斷資本家想長遠得到國家的補助費，同時得到軍事訂貨的高額利潤。這就是他們為什麼反對國有化的原因。

由此可見，保守黨反對一部分煉鋼工廠實行國有化是反映鋼鐵壟斷組織的利益的。這在不小的程度上還由於保守黨認為一部分煉鋼工業國有化法案草案是工黨的競選手段，這並不是沒有根據的，工黨把煉鋼企業國有化說成是實現自己的競選諾言。

工黨政府為了滿足煉鋼和煉鐵工廠主的胃口盡到了一切努力。實行國有化的只是一部分企業。最現代化的企業——聯合工廠並沒有實行國有化，它同樣制成品，鐵和鋼是半製品。只有那些生產鋼鐵鑄件的企業國有化了，這些鑄件在尚未國有化的企業中去進行最後加工。因此“英國鋼業公司”國有化了，而它的“子”公司即生產武器的巨大壟斷組織“維克斯”和“列特化學”公司則沒有實行國有化。同樣，“托馬斯·費爾斯”公司國有化了，而它的“母”公司“約翰·勃朗有限公司”等則沒有國有化。例如，對消費“英國鋼業公司”總產量中30萬噸鋼的“維克斯”康采恩，極有利地靠國家費用按低價得到鋼。除了巨大的賠償費以外，“國有化”形式本身對鋼鐵大王是極其有利的。

那些轉歸國家所有的企業並沒進行絲毫改組。從前的經理管理着自己的企業的原班人員。舊的公司名稱甚至還保留下來。

不僅如此，已被國有化的企業的領導機關——“英國鋼業公司”根據國有化法案只能進行“總的計劃”，而無權干預已經國有

化了的公司的事务。由此可见，壟断資本家仍然是他們企業的主人。

1949年議會通过了一部分煉鋼企業國有化的法案。但是工党政府拖延实行这个法案。1950年9月工党政府宣称从1951年1月起法案生效，並批准了領導已經國有化了的煉鋼企業的“英國鋼鐵联合会”的管理機構。1951年2月开始把企業移交給联合会管理。

一部分煉鋼企業國有化就是这样實現的，事实上國有化把从前的主人留下照旧管理自己的企業。

一部分煉鋼工業实行資本主义國有化的真正意义和内容就是如此，而右翼工党分子却大言不慚地把这种國有化宣佈为“对利潤原則的打击”，在这問題上展开的斗争的真正意义和内容就是如此。这是用“社会主义”欺騙羣众和有利於壟断資本的实际措施結合起來的慣用把戲。

必須指出，英國國有化的办法是和美國壟断資本家的利益相矛盾的。第一，美國壟断組織反对英國工業在世界市場上提高競爭能力，因为这会加强英國出口業者和美國出口業者对比的地位。美國壟断組織关心的不是加强英國工業，而是進一步削弱英國工業，阻碍英國工業技術的重新裝备方面的措施。第二，美國壟断組織力圖廢价收購英國國內的企業。某种工業部門轉归國家所有乃是外國資本深入这些部門的巨大障碍。这就是为什么哈里曼和霍夫曼要反对英國煉鋼工業國有化草案。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國壟断組織主張完全停止進一步在英國國有化的“实验”。可見，工党首領們甚至拒絕了工党所理解的國有化的進一步的要求。

工党上層分子得到起决定性作用的英國壟断資本集团的同意，在动搖之后竟对許多工業部門实行了國有化的办法，这是因

为已经造成的环境威胁了英国资本主义本身的生存。

但是工党政府实行工党的国有化办法的原因不仅限于这一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结束时，英国资产阶级面临着国内极尖锐的阶级斗争。

虽然有禁止罢工的战时法律，但是在战争过程中，罢工的次数和损失劳动日的数量不断增加。1940年罢工的次数是922次，1943年增加到1,785次，1945年则增加到2,293次。1940年损失劳动日的数量是94万个劳动日，1943年增加到185万个劳动日，1945年增加到284万个劳动日。

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英国无产阶级的前进部队经常拥有200万矿工和铁路工人的队伍。

按照工党的计划，煤炭工业和铁路运输业的国有化将最近十年中在英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战斗中起领导作用的工人——矿工和铁路工人——跟落后的工人群众隔离开来。尽管矿工和铁路工人的领袖背叛和出卖了矿工和铁路工人，但是正是这些工人对资本进行了最积极的斗争。

让我们把1919年9月27日至10月6日100万铁路工人总罢工的事件提一下。其次，再把1921年4月至6月长达九个星期的矿工罢工的事件提一下。铁路工人和运输工人联盟本应该用团结一致的罢工支持他们。他们的形式上的领袖——汤姆斯、威廉斯和霍支逊——破坏了矿工团结一致的罢工，“黑色星期五”那天（1921年4月15日）出卖了矿工工人，而同时也出卖了本联盟中的成员。

1926年5月3—12日，由于矿井业主坚决拒绝工人提高工资的要求，工人掀起了总罢工。总罢工被工会的领袖们出卖和破坏后，一部分矿工继续进行罢工。英国资本家公开地反对矿工

不僅因為煤炭工業在技術方面裝備很壞並需要重新裝備，而且首先因為礦工從來都是英國無產階級的先進部隊。控制這個先進部隊，降低工資，以便在制服這個基本隊伍之後來約束工人階級的其他隊伍，這就是英國資本的戰略。從這裡產生了英國礦工舉行罷工的英勇精神，從這裡產生了英國工人通過總罷工支持礦工的無比堅強的決心。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英國資產階級面臨的形勢是很危險的。因此工黨的首領們的戰略是要在英國工人階級的先進部隊——礦工和鐵路工人的手上和腿上加上鐐鐐，同時欺騙他們。對煤炭工業和隨着對國內運輸業實行資產階級的國有化是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煤炭工業和國內運輸業的國有化意味着英國工人階級的兩支最先進的部隊為自己的要求不是和個別資本家面對面進行鬥爭，而是和整個資產階級國家進行鬥爭。當階級鬥爭尖銳的情況下，資產階級的國家機關在為了“社會的利益”的幌子下迫害礦工和鐵路工人。工黨政府採取特別殘酷的办法反對已國有化了的部門的罷工工人，那並不是偶然的。當煤氣工業工人罷工時，根據十九世紀後半葉的法律，8位罷工的領導者被逮捕了並被送交法院。

工黨的國有化使得對已經國有化了的部門的勞動者的剝削加緊了。如果工黨不欺騙羣眾，英國資產階級想加強剝削工人就必然會引起英國無產階級的激烈的階級鬥爭。

正因為如此，所以在1948年12月工黨政府提交給議會的所謂“四年計劃”的備忘錄中指出，工業衝突的次數比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時期減少，是工黨分子對資產階級最重要的功績。備忘錄裏面這樣寫：“在工業方面保持和平——這是一個卓越的貢獻……如果我們拿1914—1918年相應的戰後時期的經驗來作

比較，那么在这艰苦的改造时期，这比我們所預期的还要大得多呢。”

工人的生活水平日益降低。軍备競賽和國家經濟的軍國主義化——这一切引起英國階級斗争的極端尖銳化。在这情况下，礦工和鐵路工人和以前一样是工人階級的先進的部隊。

“曼徹斯特衛報”直率地承認，國有化瓦解工人階級和削弱工人階級的打算遭到了破產，它寫道：“在已經國有化的工業部門中，劳动关系的問題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有重大的意义；但是沒有迹象証明，用目前國有化的方法可以解决劳动关系問題。”[⊖]

这个承認很重要。它証明資本主义國有化与工党的算盤相違背，並沒有解除英國無產階級的武裝，也不能使無產階級失掉給資本的進攻以回击的战斗精神和决心。

工党政府为了保护壟断組織的利益，把某些工業部門实行資本主义國有化看成英國資本家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跟工人階級進行斗争的工具。在軍备競争的情况下，英帝国主义特別重視煤炭工業、电力站的生產、煤气工業不間歇生產。为全國經濟供給燃料和动力的这些部門的罢工，能够給准备战争和軍备競賽的計劃一个沉重的打击。資產階級極端害怕战时在这些部門中進行罢工。

英國統治階級懂得，战争，特別是反对社会主义和民主陣营國家的侵略战争，一定会引起國內階級斗争更加尖銳化、强有力的革命的高漲。当1918—1920年英國進行反苏武裝干涉的时候，在英國，工人階級为了和平，能够動員一切力量，使帝国主义反动派的軍事力量陷於癱瘓。上述部門的罢工斗争使一切工業

⊖ “Manchester Guardian”, 26. V. 1949.

有陷於癱瘓的危險，因此在戰時帝國主義國家採用一切暴力手段瓦解和禁止這些部門的罷工。

右翼工黨分子大吹大擂地把電力站和煤氣工廠國有化說成“電氣和煤氣的社會主義”，他們用“社會主義”字眼作掩護，其目的在於給帝國主義國家戴上“人民利益”的假面具，這樣就可以根據私有者的法律，用軍事力量鎮壓企業中的工人的舉動。在這裡，資本主義國有化已成為反動派反對工人羣眾，特別在戰時反對工人羣眾的發動的武器了。對於鐵路運輸業也是一樣。當下議院討論國內運輸業國有化法案草案的時候，克利浦斯和摩里遜特別用軍事的原因來為這種措施作辯護。

即使在這一方面，工黨政府也沒有想出新的東西來。資產階級國家為了進行戰爭常常要採取國有化，特別是鐵路方面的國有化。正因為如此，在大多數資產階級國家中鐵路都轉歸國家所有了。資產階級國家利用國有化是為了立即對鐵路工人施行軍事苦役刑罰的制度，因為鐵路上的罷工能斷絕軍事運輸。正因為這些理由，當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英國鐵路上確立了國家的“監督”。

英國資產階級打算利用已經實行國有化的工業部門作為戰時反對工人階級鬥爭的支柱。

工黨根據所有制國有化的辦法，像當時法西斯德國希特勒和英國保守黨所實行的類似的辦法一樣，並沒有改變英國經濟的資本主義的性質。

保守黨的代表在辯論煤炭工業國有化時宣稱，在“支付優厚的賠償費”的條件下他們將接受國有化的原則。所謂“優厚的賠償費”就是給舊業主最優厚的賠償，用辛威爾的話來說，這是“會使舊業主歡天喜地的”。保守黨代表的發言又一次得到表明：右翼工黨分子和保守黨黨員之間的爭吵（保守黨人和工黨分子不

同，他們宣佈自己是“自由企業經營”的保護者）是連一枚破銅板都不值的。這兩種人除了保護壟斷資本的利益以外，沒有任何其他的“原則”。這兩種人主張竭力利用國庫和國家政權用任何形式——國有化的辦法或任何別的辦法——使壟斷組織發財致富，只要它能有效地掠奪人民。

關於資本主義國有化的辦法，英國保守黨和自由黨的政府遠在工黨政府以前就實行過了。

當議會辯論煤炭工業國有化的時候，保守黨黨員艾登說道，“在過去，保守黨黨員把已經在我國實行的國有化的辦法的責任承擔在自己的身上。”他引証1927年保守黨政府把英國廣播公司轉歸國家所有作為國有化措施。1938年保守黨實行的煤礦國有化也應該看成是國有化的措施。

必須指出，事實上工黨分子實行的一切國有化的辦法，在他們以前已經被保守黨和自由黨以某種形式規定出來了。

例如，1919年森基自由黨委員會推薦煤炭工業國有化作為鞏固英國資本主義的手段。沙繆埃籌備委員會提議鐵路運輸業實行國有化。

事實確實證明，右翼工黨分子的國有化辦法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保守黨黨員的類似的辦法是沒有原則性的區別的。區別只在於這些辦法的規模和他們實行時的階級的和政治的形勢不同。這兩種人所追求的目的都是依靠壟斷組織加緊利用國家機關和加緊剝削工人階級以減輕英國資本主義危機。

區別只在於：保守黨黨員為了百萬富翁的利益而公開行動，而右翼工黨分子則是為了“社會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用極靈巧地迷惑羣眾的方法來實行這些辦法。

四 在賠償費的幌子下对英国人民進行掠夺

根据工党分子为壟断組織的利益对某些工業部門实行國有化的路綫，对被國有化的企業主作“公平合理的”賠償在他們的办法中佔中心地位。为此，國家把实行國有化的企業的股票收買過來，換成公債券發給旧業主，公債券价值总額大大超过了那些企業的实际价值。我們看到的是資產階級在过去很多次採用的最通常的作法，就是为了战争的目的、为了准备战争、为了挽救少数資本家的破產將某些企業贖買過來或收归公有。这种方法由來已久，这是由於把資本家的“財產收归國有”的这一資產階級的性質所决定的，它对資產階級社会的所有制关系沒有絲毫改变。

國有化的資產階級性質以及在英國实现这一措施的政党的資產階級性質，决定了这种“賠償費”的性質和規模。

为人民利益而实行的真正國有化，意味着必須剝夺剝削者的財產，剝夺剝削者。無產階級摧毁資本的政权把生產資料國有化对以前的所有者無論是不給任何形式的賠償費或者是採取部分賠償的形式都不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的和根本的問題，而是由不同的情况所决定的次要的和派生的問題。列寧在“論糧食稅”一書中引証了馬克思關於在某種条件下对無產階級來說最適當的是“对这一匪幫实行贖買”(即对資本家)的指示以后，寫道：“……請思考思考馬克思這話的意思吧。

“他所指的是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英國，是壟断前期資本主义的頂点时期，是当时軍閥制度和官僚制度最少的國家，是当时就工人‘贖買’資產階級而言，社会主义底‘和平’勝利最有可能的國家。所以馬克思說：在某種条件下，工人並不拒絕向資產階級進行贖買。至於对变革的形式、方法和手段，馬克思既沒有東

縛自己，也沒有束縛社会主义革命將來的活動家，他極卓越地了解到將來會有大批新的問題發生，在變革進程中整個環境會怎樣發生變化，這種環境在變革進程中會如何頻繁而急劇地變動着。”^①

對工人階級來說，對被實行國有化的財產付款給資本家的問題，首先是推翻資本權力和確立勞動者的政權的結果。只有推翻了金融寡頭的權力以後，只有確立了工人階級的國家以後，工人階級才能着手實行國有化，才能着手剝奪剝奪者。

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結果是在蘇聯不給企業主資本家以任何“賠償費”實行了工業、運輸業、交通、銀行和土地的國有化。

在歐洲人民民主國家中，自從蘇聯紅軍把它們從法西斯佔領中解放出來以後，工人階級實行了國有化，剝奪了資產階級，並且賠償費（在那些國家中允許有賠償費）只付給少數人，因為只有個別資本家不支持德國法西斯佔領者。

賠償費的問題乃是从政權問題產生的實際問題。工人階級也只能這樣提出問題。

在英國共產黨的綱領“英國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中規定，在英國社会主义國有化的實現只能部分地賠償那些對人民政權抱忠誠態度的人。“一切大規模的工業和運輸業、銀行、壟斷資本家的批發和零售商業組織以及大地產，將為人民政權收歸社會所有。

國債和作為對以前國有化的工業賠償的債券，將一律作廢；對於不反抗人民政府政策的當事人，將予以部分的賠償，但反抗人民政府的，則不予賠償。”^②

^① “列寧文選”兩卷集第2卷第853頁，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② “英國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第22頁，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对艾德礼來說，支付賠償費是最重要的基本的“原則”，它必須对資本家的財產作全部的“賠償”。在一定的条件下，某些企業（或甚至某些部門）轉归資產階級國家手里，對於壟斷組織是完全可以接受和有利的。艾德礼在实行这种办法时，首先关心的是賠償費，即关心不要从壟斷資本家的荷包中拿走一英鎊。他在“工党的前途”一本小冊子中証明，必須对被國有化的企業的所有主实行全部賠償，理由是：第一，得罪他們是不好的（“不公平的”），第二，他說，“引起不必要的对抗是愚蠢的”。

由此可見，工党的首領們首先关心的是資本家的利益。工党分子由於害怕关心本階級利益的資產階級，取消了沒收的要求。

工党思想家达尔頓在“英國实用社会主义”一本小冊子中論証了賠償的必要性——而且是全部賠償——因为第一，不能得罪所有主；第二，他恫嚇說，沒收会引起“怠工”和生產中的嚴重的破坏。

在工党關於國有化問題的一切著作中重复着拒絕賠償会“破坏生產”的陰沉的調調。

工党分子恩斯特·戴維斯論証了工党代表會議關於必須对各企業主实行“公平合理賠償”的決議，理由是在國有化中最要緊的是不要嚇倒資本家，因为國有化的目的是“實現國家資本主義的办法”[⊖]。

这位壟斷組織的辯護人威脅說，如果拒絕賠償，“生產的推動力將會遭到破坏”。他寫道：“你一旦動搖了使潛在的利潤資本化的信心，資本主義就會崩潰，生產就會停頓。”

這些話講得够清楚的了。这位壟斷組織的辯護人除了看見

⊖ E. Davies, How Much Compensation? 7.1947. p. 5.

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的推動力以外，沒有看見其他的推動力。在他看來，社會主義不外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國有化不外是國家更進一步服從壟斷組織的手段。資本主義是生產的永恆的形式。不消說工黨的一切上層分子的立場。工黨實行國有化的條件完全是從關心拯救資本主義生產和加緊剝削出發的。當然獲得利潤是生產的唯一推動力的說法，顯然是騙人的鬼話，我們知道，蘇聯社會主義社會制度對生產發展造成了那種強有力的推動力，它遠遠超過資本主義的推動力，資本主義是不能和它比較的。

極端腐敗和衰落的英國資本主義也和美國資本主義一樣，有力地證明：正因為資產階級關係的保存，引起生產中極大的破壞，引起生產力的破壞。正是現在，在資本主義總危機和兩個體系進行鬥爭的時期，資本主義現實的千千萬萬個事實證明了資本主義的推動力使生產力腐朽和停滯，使生產力處於苟延殘喘的情況。

蘇聯社會主義社會的實踐無可辯駁地證明，正是社會主義創立了資本主義所未曾有過的對勞動的新的推動力。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結合、在社會生產發展中的個人的興趣、社會主義競賽和斯達哈諾夫運動為社會生產的增長創造真正無窮的潛力。拿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任何一年中的生產總結跟蘇聯以及人民民主國家在任何一年中的經濟總結作比較，都證明了這一點。但是這對右翼工黨分子有什麼相干呢？

工黨政府實行國有化的辦法是從英格蘭銀行開始的。1945年底，國有化的法案被通過，1946年3月實行。法案的實質只能歸結為：其活動在幾百年來早已和國庫發生聯系的銀行（從十六世紀起銀行就已存在），成為國家的銀行了。

發行紙幣的中央銀行轉歸國家所有的事實本身並沒有什麼

新奇。大多數國家發行紙幣的中央銀行都是國家的。例如在沙皇俄國，銀行就是這樣的。國有化絲毫沒有觸動壟斷資本家的大銀行的活動，而且受到金融寡頭的極大的歡迎。

英格蘭銀行的國有化和工黨政府的國有化的一切其他辦法一樣，是這樣實現的：國家保證舊業主除了財產收歸公有而得到極高的賠償費以外，還有固定的收入。英格蘭銀行的股票也和那些已經被國有化的企業一樣，換成了公債券，根據債券每年支付固定的利息。

英格蘭銀行的原始資本是1,450萬英鎊。在最近20年內，股東的平均股息是12%。由於股息高，票面100英鎊的股票在交易所的牌價高到357.5英鎊（1945年8月1日）。工黨政府為100英鎊的債券就要支付給債券持有者400英鎊。這樣，銀行原來的股東得到的貨幣就大大超過股票交易所的股票價格。於是，國庫就發行了比股票額超過5,800萬英鎊的債券來調換股票，以便保證給債券持有者3%的收入。這樣，除了保證支付超過銀行資本總額四倍的貨幣額以外，每年還要保證從前的12%的利息。銀行的全部利潤依舊落到銀行的以前的佔有者的荷包里去了。國家保證股東們按照空前高的牌價得到以前的收入。

已實行國有化的部門的財政狀況的年終總結報告提供了豐富的實際材料，根據這些材料可以判斷工黨的國有化加在英國人民身上的重擔的規模。

在煤炭工業實行國有化時，賠償礦井主的貨幣總額規定為16,466萬英鎊。後來煤炭工業管理局宣佈連同各種附加的賠償費計算在內，賠償費總額增加到35,330萬英鎊。1947年管理局宣佈，賠償費總額達到4億英鎊了。這樣，賠償費總額的增長就像是從山上滾下來的雪球了。這是沒有什麼奇怪的，因為原來

的礦井主被委派為煤炭工業的領導者，賠償費的多少由他們自己決定。同時國家還要為完全陳旧的、極端破爛的、很早已經折旧的裝備付給礦井主一筆巨大的款額。

債券是按賠償費總額發行的，它应当在50年內償清。

此外，礦井主憑債券每年得到利息，在1947年內政府規定為2.5%的利息，到了1948年又被提高到3%，1950年被提高到3.5%。工黨政府通過利率的提高來保證以前的礦井主得到日益增長的收入。

在股東還沒有分配到全部應得的各種賠償費的借口下，一部分收入作為利息付給他們，一部分收入則作為“臨時收入”付給他們。

礦井主得到的收入總額如下（單位：千英鎊）：

	1947年	1948年	1949年
總收入	15,060	15,636	13,200
其中包括：			
利息	2,660	3,136	2,950 (暫定)
臨時收入	12,400	12,500	10,250

此外，在三年內還付給原來的礦井主200萬英鎊作為失去職業（J）的賠償費。

礦井主憑債券每年得到的收入總額並不少於1934—1938年內每年得到的收入總額。並且，礦井主用各種鬼把戲每年得到的利息要比他們應該得到的要多200—300萬英鎊。

工黨對礦井實行國有化就是對勞動者進行無恥的掠奪。

在電力工業中，賠償費是按股票交易所的牌價付給的，此外還清償了那個部門的資本家在實行國有化以前欠下的債務（總數達17,650萬英鎊）。到1949年9月為止，債券一共發行了

34,400 万英鎊，年利 3%。於是，一年的利息總額達到大約 1,300 万英鎊。電力站的股東們用利息和股息所得到的 1938—1939 年年度的收入總額是 1,120 万英鎊，即比 1949 年還稍稍多了一點。而且在已經被國有化的電力工業中收入是有保證的，不受市場情況漲落影響的。

在煤氣工業中發行了 17,400 万英鎊的債券調換股票，利息 3%。根據初步的統計，原來股東的收入幾乎和以前的收入相等。

現在來研究一下運輸業的賠償的情況。支付給鐵路、運河、城市的旅客運輸業的所有者的賠償費是按照股票交易所的行市計算的。

至 1949 年末，一共發行了 115,900 万英鎊的債券去換回舊業主的股票（其中 92,730 万英鎊是給鐵道大王的）。

1948 年鐵路舊業主憑債券總共得到 3,300 万英鎊，1949 年得到 3,450 万英鎊，1950 年得到 3,590 万英鎊。三年內按債券利息共付給原來的佔有主 10,300 万英鎊以上。三年內鐵路赤字是 3,900 万英鎊。這就是說，這三年當中，補償費幾乎大於鐵路虧損的三倍。如果沒有這筆補償費，鐵路不是就會得到相當大的一筆利潤嗎？

但是事情不僅如此。除了支付利息以外，舊業主還用各種借口獲得了各種額外收入。例如，1949 年除債券利息以外，舊業主以各種借口（按照資本的贖回支付利息，按照車廂補償費支付利息等等）多得到 650 万英鎊。

三年內各種額外收入是 2,700 万英鎊。

此外，汽車運輸業和水路運輸業（港口、碼頭等等）的舊業主得到了一大筆錢。

盤踞在運輸業委員會和鐵路、水路及汽車運輸業的執行委

員會中的舊業主及其代理人極力尋找額外掠奪的方法。

在很多情況下，憑債券得到的利息要比運輸公司得到的利潤要高得多。

鐵路、汽車及其他公司的股東如果不是國有化，得到的股息就會比現在憑債券得到的利息要少得多，或者就會根本得不到股息，像 1947 年運輸業公司的情况一樣，虧空了 6,000 萬英鎊。

下述事實使我們認識到由於工黨實行國有化，舊業主掠奪工人和全體人民的某些情况。

“蘇格蘭摩托牽引”公路公司的業主在國有化以前擁有 100 萬英鎊的優待股票和 100 萬英鎊的普通股票。換成債券後股東得到了 840 萬英鎊債券，也就是一英鎊股票換成了四個多英鎊。

“湯姆斯·蒂林”公司的股東擁有 412 萬英鎊的普通股票和 30 萬英鎊的優待股票。而補償費却是 2,480 萬英鎊，或者說幾乎六英鎊換股票一英鎊。

這些材料揭穿了右翼二黨分子在工人中間散佈的所謂舊業主憑債券得到的利息似乎比他們從前得到的股息少得多的說法。對已經被國有化的財產的掠奪在大規模地進行着。

給鐵道大王的補償費要在 90 年內付清。在這期間，他們得到的收入將比鐵路國有化時運輸委員會發行的補償債券的總數多三倍，比 1938 年鐵路股票交易所的價格多五倍。

這種合法的盜竊行為和掠奪行為之所以能夠進行，是因為舊業主把國有化單純看成是掩蓋他們照舊支配企業的幌子，他們對國家的財產並不像對自己的財產那樣愛惜。工黨政府所實行的就是這種政策。

按照交易所價格支付給鋼鐵巨頭的補償費是 24,300 萬英

鎊，這是當他們預見到要實行國有化的時候，故意在交易所抬高了市價。

正像 1947 年 10 月底，當克利浦斯在下議院討論國有化法案時發言當中講到的，當時的鋼鐵公司股票行市（以 1938 年為 100）是 142.6，其他股票的行市則是 149.8，也就是說，鋼鐵公司股票的行市是比其他股票的行市低的。

由於企業主們都知道即將頒佈鋼鐵工廠國有化的法案，鋼鐵公司的股票行市迅速上漲，1948 年 5 月底鋼鐵公司股票的行市超過其他股票的行市（鋼鐵股票行市是 166.9，其他一切工業股票是 161.7）。1948 年 10 月底鋼鐵公司股票的行市是 173，其他股票的行市是 161.7。因為國有化的鋼鐵企業的股票是按照交易所行市贖買的，因此，故意抬高股票行市就意味着把幾千萬英鎊以上的補償給所有主。

克利浦斯認為，在討論關於鋼鐵工業國有化的法案時，鋼鐵工業股票的行市“是最近十年來達到最高的平均行市”。克利浦斯說道：“股東做了一批非常有利的買賣。”

但是，這還不算。實行國有化的公司的股東在把自己的股票折換成債券時，又得到的總數大大超過了股票交易所的行市。根據債券得到 3.5% 的年息。

被國有化的企業的業主在把股票折換成債券時，共得債券總額約 25 億英鎊。這一筆大數目，比 1947 年國民收入總額 902,700 萬英鎊[⊖] 的四分之一還要多些，舊業主過了一個時期，就有權利把這筆債券在交易所里兌現。

債券保證他們每年收入總額達 810 萬英鎊，不受經濟市場情況波動的影響。

⊖ 由於在他的文章中採用英國資產階級的統計學重復計算的結果，國民收入的這個官方的總數是大大增加了。

由此可見，對已經國有化了的企業的業主來說，這是極有利的買賣，國有化以後，在資本家的手里仍舊掙取同樣的資本，只是他們用以得到收入的有價證券的形式變了。他們得到的不是私人股份公司的股票，而是由國家來保證股票收入的，相應的國有化部門的管理機關的股票。

現在，只要保護舊業主利益的國家不垮台，舊業主就不會受到破產的威脅。他們個人不必擔心日益強烈和頻繁地在摧毀着資本主義經濟的經濟危機的後果，因為資產階級國家擔負起了這種打擊。在這些企業中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通過支付債券利息、並通過給國有化企業的管理人員和代表們支付的高額薪水，仍舊落到了舊業主的手里。資產階級國家用一切權勢和力量來保證舊業主對工人的剝削。

舊業主除了得到每年有保證的收入以外，還得到贈送的巨大的款額，這筆錢是用來補償他們的破爛不堪的和早已折舊了的設備的價值的。

在國有化部門的工人身上加上一副重擔，結果必然加強對他們的剝削。工黨的國有化帶給礦井、鐵路和運河的舊業主的不是他們過去常常遭受到的虧本，而是使僵死的資本產生效用，並且帶來有保證的收入。

補償費的多少是由管理局確定的，而管理局里盡是國有化企業的原業主。這就是債券利息增加的原因，這就是為大資本家——舊業主常常規定按照行市買股票，甚至按超過股票交易所行市買股票的原因。通過對仲裁法庭使用壓力，也是達到提高補償費的手段之一。舊業主的代表和其他部門的壟斷資本家以及政府官員控制着仲裁法庭。資產階級的報刊充滿了這類送給煉鋼廠、鐵路、電力站等等的舊業主的補充禮物的消息。英國共產黨的綱領“英國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指出：“資本主義國有化

並未改變對工人的剝削，因為付給舊業主的賠償向他們保證了可以從工人身上繼續取得他們不勞而獲的收入，而且還加上國家權力的保護來擔保付款。資本家之擁有資本，還是一樣，只是股票的方式變了。”^①

工黨實行的賠償就是這樣的，它對於資本家是功德無量的賠償，對於勞動者是極不公平的、掠奪性的賠償。

國有化部門的資本家所得到補償費乃是一種財政手續，這是從勞氏到約翰·皮爾朋特·摩爾根的財政詭計的“天才們”羨慕不已的手段。

五 同業聯合公司——壟斷資本家在 國有化部門當中的管理形式

如果說賠償和這種賠償的形式保證了舊業主對國有化部門的工人保持剝削和加強剝削，那末，管理形式則保證他們和其他壟斷組織照舊保持對各企業的领导。

他們保持了“傳統的”國有化企業的管理形式。他們簡單地從英國壟斷資本的老經驗中把這種管理形式搬過來。這是他們露骨地維護老早確立的剝削制度的很好的證明，工黨的首領們誇口說這是“對英國傳統的忠忱”。

工黨分子按照“同業聯合公司”的類型即按二十世紀初出現在英國的壟斷組織的類型組織國有化企業的管理和领导。

同業聯合公司是壟斷組織的形式，是在國家政權的協助下資本集中的結果。

當帝國主義時代初期，同業聯合公司是壟斷組織為自己發財致富利用國家政權的最初的形式之一。在“社會福利”的掩飾

^① “英國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第29頁，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下，为了增加利潤，同業联合公司有时成为壟断組織手中利用市政府的工具。

第一个同業联合公司是由1902年議会的特种法令創立起來的。根据这个法令建立了倫敦供应水的統一的壟断組織。新的統一的壟断組織——“同業联合公司”或“首都自來水管理局”——通过贖買这些公司的股票的办法吸收了倫敦的各自來水公司。而且，贖買是在極端有利於股東的情況下進行的。合并到一个壟断組織的所有股份公司的票面資本本來只有2,290万英鎊，当这些公司的股票調換成管理局的債券以后，總額却达到46,939,000英鎊，即超过一倍。結果是業主們每年的收入增加了一倍，而且他們可以在任何时候把自己的債券在交易所按加倍的价格出賣。为了支付債券的高利息，自來水价格提高了。同时参加同業联合公司管理局的都是那些原來自來水公司的大資本家。

可見，这种同業联合公司是壟断組織的形式，它是極端有利於参加壟断組織的企業主的。

也是按照同業联合公司的原則，根据1908年的議會法令建立了倫敦港自治局，旧業主和資本家——發貨人和收貨人被提出作为倫敦港自治局的領導。倫敦旅客運輸管理局也是同業联合公司的例子，它是1932年吸收公共汽車公司、地下鐵道公司、電車公司、輪船公司等92个不同的企業建立起來的壟断組織。

旅客運輸联合公司事实上是不受倫敦市自治局領導。联合公司管理局自己制定運費表和工資，不需要誰批准就建設新路綫和取消旧路綫。联合公司管理局由六个資本家——債券持有者——和一个工会官僚組成的。

因此，这些壟断組織是被加入壟断組織的各企業的業主所控制的，他們除了得到很高的工資以外，依旧得到甚至更多的股

息。

值得注意的是倫敦運輸業同業聯合公司的草案是在1931年由工黨政府的運輸大臣摩里遜制定的。他宣佈，那時聯合公司是“實現社會主義”的形式。1932年保守黨政府實行了這個草案，這就證明了這種“社會主義榜樣”和壟斷資本家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1926年保守黨政府按照同業聯合公司的類型建立了英國廣播公司。

在30年中工黨的首領們把同業聯合公司的壟斷組織說成是“社會主義”。他們是壟斷組織的保衛者，他們把壟斷組織的一定的形式的建立——在私人壟斷資本家的管理下的國家資本主義——冒充是“社會主義”。

工黨的國有化的實現正是採用同業聯合公司——國家資本主義的壟斷組織的形式的，它由私人壟斷資本家來實行管理，保證他們有經常的和穩定的收入，很少受國家政權管轄。按照我們熟悉的吉伊的說法，同業聯合公司是一種“在營業的基礎上組織起來的壟斷組織，通常歸國家所有，由生意人擔任行政領導。”

工黨分子誇口說根據同業聯合公司的原則建立國有化部門的組織有種種好處，甚至有這樣的理由：不應當因取消舊企業對其原來的企業的管理而得罪他們。

工黨的經濟學家楊格宣稱，國有化工業的新的管理局脫離國家機關而獨立是必要的，因為各企業的舊業主應當在管理局中得到很高的工薪。楊格寫道：“使少數工業家成為國家機關人員，他們的工資比現在最高的工資高到一倍或兩倍，這就不能不引起原有的國家工作人員的憤怒情緒。”^①

^① M. Joung, Labour's Plan for Plenty, L. 1947. p. 77. (着重點是我加的——德伏爾金)

總之，楊格闡明，我們總是要把高額的工資付給壟斷資本家的。但是必須由獨立的不屬於國家機關的資本家組成管理局，以便不會引起國家工作人員的憤恨。

在工黨的代表會議上，摩里遜、克利浦斯和其他工黨的首領三番五次對不允許工人管理國有化企業作辯護，他們的理由是：工人“沒有成長到”能夠管理的程度。資產階級對工人的這種誹謗老早就被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駁倒了。在社會主義和民主陣營的國家里，工人是企業和整個工業的經理和領導人員的基本幹部，在全体工人羣眾的積極參加下，與企業的工程技術人員親密團結，出色地擔任了領導工作，而且保證了資本主義所從未有過的生產發展的速度。

工人彷彿“沒有成長到”能夠管理的程度的理由是一個老早被提出的理由，剝削者為了挽救自己的特權和自己的統治，在革命以前的俄國和中歐以及東南歐的許多國家中曾經廣泛宣傳過這一套。工黨的首領們宣稱工人不可能也沒有能力管理企業，是企圖為他們的讓壟斷資本家保持對國有化企業的领导的政策作辯護。

右翼工黨分子大力鼓吹的“議會的監督”對壟斷資本家好像是危險的，因為它可能從議會的講台上洩漏盤踞在同業聯合公司中的壟斷資本家的秘密。對壟斷資本家來說，這種監督甚至可以說是“侮辱性的”。

1950年4月初，下議院進行了關於國有化了企業的工作的質問。在代表們的發言中指出，政府的政策剝奪了議會議員要求從部長那里听取具有社會意義的情況報導的權利和可能性。

作為下議院首領的摩里遜拒絕了這樣的質問。他說，准許這種問題是和聯合公司的原則相矛盾的，根據這個原則“公司的管理委員會有權不把關於自己的商業上的業務的情報提供給議

會的議員和部長”[⊖]。

当实行工党的國有化的資產階級國家完成了把企業變成自己的財產的堂皇的行動和授權給原來那些壟斷資本家管理聯合公司以後，就放棄干涉它現在作為形式上的所有主的企業和工業部門的事務了。

右翼工黨分子是多麼熱心地保護壟斷資本家的“榮譽”和“地位”、他們的利潤、他們對國有化企業的領導呵！

國有化煤炭工業的管理機構是怎樣的呢？根據國有化法案，煤炭工業管理局（Coal Board）和八個區管理局被確定為煤炭工業的領導。自治管理局與國家的關係上是“自治的”，它認為應該怎樣做就怎樣做。國家的領導只限於任命中央管理局的人員和作關於指導它們的活動的“一般的指示”。煤炭工業管理局的主席是海德利勳爵，它原來是英國最大的煤炭托拉斯“鮑威爾·達夫林”的總經理和礦井主協會的主席。他是英格蘭銀行管理局的成員，和鋼鐵壟斷組織有密切聯繫。他的代理人是保守黨官僚亞瑟·斯特里特，曾被壟斷資本提拔為國防大臣助理。管理局的其他七人當中，有兩個人曾經是礦井主（楊格和巴勞茲），一人是大金融公司的經理，一人是大金融資本家，同時也是參謀總部的科學顧問，兩人是和壟斷資本家有密切聯繫的工會官僚，一人曾經是外交部的官員。

由此可見，在管理局的機構中佔統治地位的是壟斷資本家和他們的代表，包括參謀總部的直接全權代表。

根據1949年初波立特同志在英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引用的材料，在12個國有化企業的管理局（煤炭工業管理局，運輸業委員會，四個運輸業執行委員會——鐵路運輸業管理

⊖ “Financial Times”, 6. IV. 1950.

局、國內水路管理局、公路管理局、公共汽車交通管理局，電力站管理局，煤氣工業理事會，三個航空公司）是由 87 個成員組成的。其中 43 人是大家資本家，9 人是政府官吏，4 人是軍官，14 人是工資很高的專家和行政人員，17 人曾經是工會官僚和合作社工作人員。

艾德禮承認，1950 年國有化企業的中央管理局的領導中有 131 人是做生意的。其中有 63 人同時是大壟斷公司和其他部門的經理。其餘 68 人當中，23 人是貴族，9 人是勳爵，3 人是上校和上校以上的官銜的軍官。

由此可見，同業聯合公司的管理局是由壟斷資本家及其僕從組成的。

但這並不是事情的全部。為了監督那些和國有化部門的產品有關的其他工業部門的壟斷資本家，成立了和管理局平行的專門機關。例如，除了領導國內運輸業的運輸業管理委員會及其各區的組織以外，還成立了以中央協商委員會為首的運輸業協商委員會。這些協商委員會是由作為關心降低運費的“消費者”的那些工業和航業各部門的資本家組成的。它們的目的是保證大資本對國有化了的運輸業的領導和監督。按照工黨規定的章程，自然也要指派國家官吏和一兩個工會官僚到這些協商委員會里面擔任職務。

這樣的機構在其他國有化部門中也同樣建立起來了。例如，在煉鋼工業中成立了以鋼為原料的其他工業部門的壟斷資本家組成的“消費者協會”。它們監督國有化鋼鐵企業，為了整個資本主義工業的利益，自然首先是依靠剝削工人，保證降低鋼的價格和生產成本。

這些“消費者協會”是壟斷組織領導國有化企業的形式之一。

資本主義國有化大大增加了壟斷資本家對國家機關的影響，增強了他們的實力、他們所擁有的掠奪人民的經濟槓桿和政治槓桿。

工黨的首領們宣稱，他們用同業聯合公司、“消費者協會”、協商委員會實現了“工業的民主”。實際上在國有化企業中，舊業主及其走卒無人監督地支配着企業。

的確如此，從前，當企業歸私人所有時，壟斷資本家一定要顧慮到他們對工人的壓迫、剝削的提高立刻會遇到工人的反應，可能引起罷工、工會的干涉等等。現在，壟斷資本家在國家的權威的掩護下，並擁有對企業無人監督的管理的權力，他們在國有化企業中毫無顧慮。他們在高談“社會利益”的掩飾下有充分的可能性更加加強在企業中的地位，並且無人監督地支配它們。

這就是為什麼，——正如許多事實證明這一點——在國有化企業中對待工人極端蠻橫無理的原因。1949年在布拉克浦的工黨年會上，許多代表對國有化企業中的制度和對它們管理的性質表示憤怒。鐵路員工代表說，在工人中間產生“失望的情緒”，這是和實行工黨的國有化分不開的。他說，舊業主管理的結果是鐵路的狀況比以前更壞了，對工人的剝削比以前更重了。電力工業的工人代表說，實行國有化以後，“舊業主和領取養老金的工會首領掌握了電力工業部門的領導”。

1950年，在馬爾加特的工黨年會上，京斯敦的代表哈里及其他代表表示憤恨，因為國有化企業中的領導者得到極高的工資，而在這些企業中的工人羣眾則得到極低的工資，並且工人無法對付管理局當中那伙萬能的生意人。

正如化學工人工会主席在布萊敦代表大會上所說的，舊業主——現在的企業的領導者“現在在企業中所擁有的權力比

从前希特勒幻想过的还要大。他們拥有驚人的經濟权力，他們想利用这种权力來徹底奴役我們”^①。

在1950年上半年所舉行的一些工会代表會議上都發出了这样的控訴。

工党的首領們以同業联合公司、“消費者协会”、协商會議的形式，用“社会主义”的漂亮辞句來掩盖國有化企業管理局的真正性質。英國共產党的綱領“英國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指出：“資本主义國有化的管理是官僚主义的；國有化工業的管理委员会是由旧業主或其親信控制着的。因此改变只是形式上的改变；工人們仍然受着資本家老板的統治。”^②

在实行工党的國有化即实行資本主义國有化变种当中，國有化企業的管理局的性質就是如此。

英國共產党在自己的綱領中指出，社会主义國有化的結果在原則上是企業管理的另一种形态和性質：“社会主义國有化則完全排除資本家及其代表。管理委员会完全由工人和技術人員組成。一切建議、計劃和工作目标都由各个工業以及工厂的工人們討論並共同决定。这样，工人和他們的工会参加民主管理，完全得到了保證。”^③

由此可見，國有化企業管理局的性質是由哪一个階級实行國有化、为誰的利益实行國有化來决定的。在國有化企業中旧業主及其走卒的統治，是和資本家的政权的保存密切联系着的。

六 工党实行國有化的結果

工党的國有化給資本家——已經轉归國家所有的企業的旧

① TUC, Brighton Congress Report, 1950, p. 513.

②、③ “英國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第24頁，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業主——保證了巨大的利益。工黨的國有化使資本家得以避免破產並保證增加資本家的利潤。工黨實行國有化的結果，使其他沒有實行國有化的工業部門的資本家也得到了不少好處，好處是國有化部門向一切資本主義工業供給的商品是最低廉的，它們的服務是最便宜的。

例如，1951年初貨物運費比戰前增加了80%，但運輸業委員會從資本家那里購買的商品的價值却增長了一倍至一倍半。煤的價格和戰前時期相比是大大低於原料和工業品的價格。1951年7月煤的批發價和1947年相比增長了28%，而总的原料和工業品的批發價則增長了67%[⊖]。1952年批發價格的一般指數和煤的價格之間的差額是很大的。

在煤炭工業實行國有化的基礎上，出口業壟斷組織特別賺錢。為了他們的利益，煤炭貿易沒有實行國有化，它依舊掌握在壟斷資本家的手中。英國的煤的出口價格比在國內市場上的煤的價格高一英鎊，儘管根據“金融時報”的材料，1950年4月英國的煤在瑞士的市場上每噸按54法郎出售，而德國的煤要貴得多，每噸按79法郎出售。

英國的鋼——在不小的程度上由於英國的煤的價格低廉（煤在鋼的生產成本中佔重要地位）和由於運費低廉——1951年在國外市場出售同樣比其他國家鋼的價格便宜。

由於煤炭工業、國內運輸業、電力站、煤氣工業實行國有化而降低了一切工業部門的生產成本，只能意味着一件事情：資產階級國家為挽救這些部門（國有化部門）使它們免於破產，把技術裝備費用的重擔，靠加重勞動人民的賦稅而承擔在自己身上。同時，在其他一切工業部門中，資本家由於煤、電力、煤氣價格的

⊖ “Monthly Bulletin of Statistics”, IX, 1951, p. 177, 185.

降低和鐵路運費減少而增加的利潤，首先也只能是靠加重國有化部門的工人的剝削而達到的。

其他部門的資本家也从電力價格的相對的低廉得到了利益。

從鐵路運費、煤、電力方面來降低生產成本，增加了其他部門的資本家的利潤。資本家對工黨的國有化非常滿意。

這裡有一個問題——國有化部門的資本家靠誰得到這樣有利的和慷慨的補償呢？而其他部門的資本家又是靠誰得到較低的運費、廉價的煤和電力呢？

上面已經指出，為了保證支付給國有化企業舊業主豐厚的補償費，對英國勞動者進行了何等巨大規模的掠奪。但是，在礦井、鐵路、運河等等設備極端破舊的條件下，高昂的補償費還意味着另一件事：國有化部門的工人和納稅者出了雙倍的錢，花費在這種設備上面。

事實上，資本家按完全新的價值得到礦井、鐵路等等的極端破舊（60—80%）的裝備的補償費。他們將在幾十年期間靠國有化部門的工人得到這個價值（每年的利息除外）。

但是此外，這些部門的管理局還得拿出資金來更新裝備以及維持生產。在等待國有化時期里資本家就從收入項內扣除折舊費，干脆把它們放進荷包了。結果是國有化部門竟必須支付雙倍的費用。關於這個問題，“勞工研究”雜誌這樣寫道：“運輸業和電氣業國有化的法案規定，管理局一定要以適當的方式保證折舊和贖買資本的資金。因為人們都這樣解釋：管理局一定要保證全部折舊和全部贖買，這些應完全由管理局負擔。通常，私人公司有很大部分資本是不必撥還的，只要（用來擴大生產的新資本除外）保證折舊費就是了……很顯然，任何一個正規的企業，都不會同時又是財產折舊又是贖買資本的。”^①

“劳工研究”雜誌在分析國內運輸業時做出結論：在兩重負擔下的運輸業委員會，“第一，完全不保證自己的財產折舊，第二，這是在移交的時候部分的財產狀況很壞；第三，結果委員會很快地耗盡了自己的資本”。

鐵路運輸業管理局由於給業主巨大的補償費，不僅必須為擴大固定資本而投入資金，而且也化費巨大的款額來加緊補償損耗了的固定資本，因為舊業主從折舊費中盜竊了大量資金。這就急需支付巨款來維持鐵路和使用中的鐵路車輛。

這就是說，重擔落在運輸業工人的肩上。但是其他國有化部門也是這樣的。工黨的國有化的費用由英國的整個工人階級擔負，特別是由國有化部門的工人擔負。

對國有化部門的工人的巨大的壓迫就是從這裡產生的。

工黨政府的資本主義國有化幫助英國資本家靠加強對工人的剝削來擺脫困難。

他們希望這樣的國有化能夠促使國有化部門的工人為了所謂“社會利益”而加強勞動強度。

現在來談談事實。

摩里遜為工黨官方文集所寫的“經濟的社會化”一文中說，煤炭工業在國有化以前“沒有工業和平”^①。按照摩里遜的說法，國有化應當保證“工業和平”，創造有利於提高勞動強度的“新的社會精神”。

在同一文集中另一篇文章的著者柯爾宣稱，國有化的意義就是“工人應當關心他工作的那個部門的勞動生產率的狀況，並

① “Labour Research”, II, 1951, p. 28—29.

② “The British Labour Party. Its History, Growth, policy and Leaders”, vol. II, L. 1948, p. 20. (着重點是我加的——德伏爾金)

且应当为他本身的利益和同志們的利益尽力完成一切，以便提高生產和降低成本。”

由此可見，右翼工党分子力圖利用國有化增加劳动强度，加緊对工人的剝削，降低生產成本，从而巩固英國工業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能力。

工党首領要求工人牺牲的無数言論和在“社会利益”的掩飾下向工資進攻的一切政策都証實了工党分子的打算正是这样的。資本主义國有化的目的是保証英國壟斷資本用牺牲工人階級的利益的办法來擺脫困难，要在壟斷資本面前解除工人階級的武裝。

工党的經濟学家吉伊公开寫道，國有化企業应当成为向工資和工人階級的劳动条件進攻的支柱。

吉伊寫道，在國有化部門中“自由競爭应当是決定薪金和工資的原則”，也就是說，用不着工会的干涉。吉伊宣稱，在國有化部門中增加工資是不允許的，因为它“会破坏各种費用的比例”，也就是說，它会引起企業主的收入的減少。他反对在國有化部門中增加工資的根据是：这一定会引起掌握在私营部門中增加工資的要求。

另一位工党的思想家威廉斯在他所著的“三重号召”中公开地寫道：“由於英國面臨的問題極端嚴重……对工人階級說來，國有化决不是工人階級所期待的比較輕鬆愉快的日子，它意味着号召工人沒有任何补偿地緊張地工作。”[⊖]

总之，工党的國有化揭穿了它是壟斷組織反对工人階級的工具。

英國資本主义國有化的結果是加緊对國有化部門的工人的

⊖ Francis Williams, *The Triple Challenge*, L. 1948, p. 120.

实际工資的進攻。’例如，虽然物价經常上漲，但从國有化的时候起至1950年礦工工資仍然是沒有改变的。煤炭工業管理局依据國家的凍結工資的政策拒絕接受工資率的些微提高，理由是，它是关心降低生產費用的，也就是說，实际上它是关心提高買進煤的那些資本家的利潤的。

1950年底和1951年初煤炭工業管理局在礦工罷工的威脅面前接受了增加工資的要求。但是，当达成協議时，工資的提高远远落在物价上漲的后面，在达成協議以后物价的上漲把增加額化为烏有了。

但是，伴随着即使是貨幣工資的微小的增加而到來的，通常是工会官僚的嚴重的背叛行为。礦工工会的首領承担起帮助行政机关的义务，以加班和星期日的一部分時間進行工作來延長工作日。礦工工会的領導承担起大力反对非正式的罷工和竭力帮助劳动緊張化的义务。

这种協議只是造成劳动强度的加强，造成为降低生產成本而对礦工加强剝削，因而造成其他部門的資本家的利潤的增加。英國的進步雜誌“世界新聞評論”（1952年第18期）寫道，1952年1月在煤炭工業中的工資的增加比起物价的相应的上漲來是微不足道的，几千礦工得到的工資，以1947年的物价計算，等於4英鎊3先令。这大大低於其他工業部門的最低工資。

正如這一雜誌所指出的，現在全体礦工得到的工資根据他們的实际水准比最低工資低10%。1952年物价的上漲很快地吞沒了1952年初得到的微小的增加，礦工所要求而沒有得到的每星期的增加額——1.5英鎊，只不过是抵銷了物价上漲。

運輸業中的情况也是这样的。

在工党的小冊子“英國工会运动問題”中貝·英格林承認，在國有化部門中凍結工資的措施实行得比私人工業中嚴格得

多。

國有化以後，在1949年和1950年期間，在鐵路部門中工資的變化很小。1950年底，全國鐵路工人聯合會要求工資提高要與物價的上漲相適應。當提高工資的要求被拒絕的時候，運輸業工人的總罷工成熟了。在這威脅面前，鐵路運輸業管理局同意從1951年1月1日起提高工資7.5%，可是，即使是根據政府的明明是虛報不實的材料來看，自從實行凍結工資的政策以後，物價上漲了14%。事實上，只是在1950年，和1949年相比，生活費用就上升了17%。但是連這一工資的微末的提高也很快地被物價的進一步的上漲化為烏有了。而且連這種虛假的“讓步”也是以一系列的增加勞動強度和裁減幾千工人的措施為條件的。

可見，煤炭工業管理局和鐵路運輸業管理局是既熱心地保衛舊業主的利益，又熱心保衛其他工業部門的資本家的利益的。

資本家從工黨的國有化所得到的利益，是靠着進攻國有化部門的工人的生活水準，他們的日益貧困化和靠着大大增加礦工和運輸工人的勞動強度而取得的。對於國有化的其他部門（電力站和煤氣業）的工人也是一樣的。

現在，保守黨政府變本加厲地向國有化部門的工人的生活水準進攻。

1950年10月在馬爾加特召開的工黨年會上代表們指出，在國有化部門中工人的勞動強度劇烈增加，工人精疲力竭。例如，從運輸業國有化開始實行後四年半時間內，鐵路人員縮減了11%。在技術上沒有任何重大的變化的條件下，這意味着它是靠急劇加強留下來的工人的工作速度，靠急劇提高勞動強度達到的。工人反抗這種榨取血汗的制度。為了打擊工人的抵抗，監工人員大大增加了。

工党的國有化的結果是急剧加强了國有化部門的工人的剝削，是加强了工人的劳动强度，是向工人的工資的進攻。

國有化部門的工人不單單替旧業主作工，支付补偿費；他們还要清还和支付企業被盜窃貪污掉的固定資本；他們遭受加緊的剝削來保證低廉的運費和煤、電力以及煤气的低廉的价格。可見，这些部門的工人遭受的是双重的剝削。

加緊对工人的剝削引起在國有化部門中的罢工斗争的增加。正因如此，在已經國有化的部門中常常發生多次罢工和工人参加罢工的人数的增加。

1950年在1,339次罢工当中絕大多数的罢工是在煤炭工業（863次罢工）、运输業、煤气業、電力站中爆發的。在302,000罢工工人当中，有19万工人（又是大多数）是在國有化部門中作工的。1951年和1952年的罢工运动的情况就是这样的。現在國有化部門的工人更加積極地起來为反对壟断資本家和为壟断資本家服务的國家的联合力量对他們的加緊剝削而斗争。

正如英國共產党的綱領“英國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中所指出的，“資本主义國有化的目的不僅是要对旧業主繼續偿付賠款，而且要使其他部分的工業業主也因供給他們廉价的商品和福利而得到好处。正是为了这許多原因，所以这类國有化了的工業一方面提高了工人的劳动强度，同时又压低了他們的工資。資本主义國有化是牺牲國有化工業中的工人來替整个資本主义牟利的。”^①

工党的國有化的結果还在於，國有化部門的局部重新裝備的重担落到國家預算上。当煤炭工業國有化时預定撥款15,000万英鎊作設備現代化之用。

^① “英國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第23頁，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为了擴大电力站，电力管理局得到了新資本 25,000 万法郎，比其他一切部門得到的多。煤气协会得到 4,000 万法郎。煉鋼工業也同样每年得到几千万法郎。

为了大資本家的利益，擴大國有化部門的裝備的費用，絕大部分由國家預算來負擔，事实上就是由勞動者納稅人來負擔。

工党的首領們宣佈作为“民主社会主义”的主要工具的國有化的結果就是如此。

同时必須指出，工党的國有化並沒有解决使英國資本主义擺脫已經拖延了几十年的危机的狀況。事实上，它也沒有能力解决。

國有化工業从前沒能够而且現在也沒能够轉到新的技術基礎。补偿費的沉重重担，由於國有化以前旧業主盜窃貪污，而必須为恢复現有的裝備撥出巨款，因而破坏了普遍的重新裝備的可能性。

撥給煤炭工業管理局的資金即使充分得到利用也远远不足以真正改造英國資本主义这种已經衰敗的和腐朽的工業部門。

这就是为什么礦井的机械化和煤的开採增加不大的原因。煤的开採落后於1937年的水平，而且比1913年的水平落后得更多（1952年为 22,500 万噸，而 1937 年为 24,400 万噸，1913年为 29,200 万噸）。

運輸業的技術改造沒有起色。1951年鐵路部門有五千多台機車老早就应当拿去熔化了。

煤炭工業和運輸業沒有大量重新裝備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巨大的款額用於賠償旧業主，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

國有化部門沒有根本改造的原因之一是在整个机器製造業

的產品增長得不大的情況下，機器和工業裝備輸出的比重過高。有40%以上的機器製造業的產品被輸出國外（其中包括礦井和鐵路的裝備）。

1935年出產的717台機車中，輸出137台（或17%），國內留下了580台。1952年出產了719台新機車，其中377台即一半出口了，在國內留下238台，這少於1935年國內機車數量。1950年和1951年出產的柴油機車和電動機車並不能使鐵路的狀況改觀。客車車廂和貨物車廂的狀況稍好一些。

戰後時期英國鐵路運輸業的重新裝備大概是按1935年的規模進行的，當時新投入鐵路的固定資本是不多的。

對國有化部門也和其他工業部門一樣，機器和裝備的輸入比起大量輸出來是微乎其微的。

國有化工業不能實行技術根本改造的另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1950—1952年的特別大規模的軍備競賽。部分工業轉到軍需生產，更加忽視了機器製造業對國有化部門供應裝備。

在不生產直接軍事物資的部門中，機器的供應減少了。例如，鐵路運輸業管理局的主席宣稱，由於擴軍備戰，鐵路的現代化拖延了。

英國資本主義的矛盾、給國有化企業的業主巨大的賠償費、對輸出的最大限度的增長的極大興趣以及特別重要的是軍備競賽，使工黨政府關於國有化工業部門轉到新的技術水平的吹噓宣傳和綱領喪失了作用並變成了一紙空文。

工黨的國有化的結果就是這樣的。因為它的實行了大資本家和正要破產的某些部門的壟斷資本家的利益，因此它並沒有使這些部門擺脫技術的落后和極端腐朽的狀況。這種國有化只對資本家有利和引起加緊對國有化部門工人的剝削以及對英國人民的新的掠奪。

英國共產黨的綱領“英國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無比鮮明地表明了为人民謀福利的社会主义的國有化和为資本家利益的工党的國有化的对立。

英國共產黨的綱領首先把國有化和实行國有化的这个政权的階級性联系起來。为了实行不是工党的資本主义的國有化而是为人民实行社会主义的國有化，必須消滅壟斷資本家的政权。

工党的國有化是壟斷組織利用國家來加緊剝削、增加利潤的形式之一。社会主义國有化是人民政府經濟政策的基石。綱領指出：“不但必須一勞永逸地打垮壟斷資本家們的一切权力，而且必須把工業掌握在人民的手里。要終止資本家的牟利和对工人的剝削，保證我國的經濟生活能由自己控制並使經濟計劃變成事实，同时为人民的生活情况的重大改進奠定基礎，社会主义國有化是必需的。这是把資本主义私有制轉变为社会主义人民所有制的途徑。”^①

綱領向工人闡明，工党分子的國有化的办法是把某些部門轉变为資本家階級的集体所有，而不是人民所有。

工党实行的國有化絲毫也沒有改变資本主义的規律，也不能消除英國資本主义的腐朽和衰落。只有徹底消滅資本家及其走卒。只有把企業轉归人民所有，才能为生產力的巨大的和迅速的發展、为工人階級和全体勞動者的生活水准不断提高保證一切条件。

社会主义國有化使一向被用來增加資本家的利潤的大量財富归社会利用。社会主义國有化使人民政府有可能保證生產的不断高漲，重新裝备和根本地改造工業，在全國性計劃的基礎上

① “英國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第22頁，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改善和經常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增加工資，降低物價，永遠消除經濟危機和失業的可能性。

工黨的首領們放棄了以前他們宣佈的土地國有化的口號。他們公開這樣論證，他們不想把他們和佔有土地的大地主“關係搞壞”。工黨的領導也像關心大資本家的利益那樣熱心地關心英國地主的利益。共產黨要求立即將土地國有化，事實上在英國沒有小土地所有主階級的情況下，在人民民主的制度下，將會保證農業的改組，大大提高農業生產水平。

共產黨在自己的綱領中闡明，作為人民政府的經濟政策的基礎的社會主義國有化有利於中間階層——小商人和小企業主，因為國有化把他們從壟斷組織壓迫和壟斷組織的監督下解放出來。由於共產黨的工作和自己的經驗，普通工人更加深信，只有在消滅壟斷組織的權力、击潰保守黨黨員和右翼工黨分子以及確立目的在於實現社會主義的工人階級的真正的政權的基礎上，真正的人民的國有化才能實現。

集體加入工黨的工人們將以痛苦的經驗証實工黨的國有化的性質，並且為實行新的、按其階級本性來說是另外一種國有化而鬥爭。

七 關於工黨的“混合經濟論”

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右翼工黨分子就堅持“混合經濟”的主張。現在，當工黨政府對某些工業部門實行資本主義國有化的時候，右翼工黨分子特別不厭其煩地宣傳這種主張。

“私人經濟和國家經濟的聯合”被說成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民主社會主義”的最重要的標誌。通過蔡林格（德國右翼社會黨人）、威廉斯和吉伊這些人的筆桿，硬說社會主義不用採取國家企業和私人企業聯合的形式是不可思議的。根據這種論

据，一般說來，經濟的“純粹的”形式是沒有的而且也不可能有的。事實上，把“混合經濟”說成是社会主义，就表明右翼社会党人不要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者。

真正“純粹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从來沒有的。资本主义保留着旧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式的殘余，改造它們，使它們服从自己。比方說，在所有资本主义國家里，都保存着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殘余。在殖民地國家內，帝国主义为了保持和巩固自己的統治，保存着封建关系和奴隸占有制关系的殘余。美國资本主义依靠着对千百万黑人的奴隸劳动的剝削增長和積累了大量財富。在最“先進的”资本主义國家內，旧的封建貴族——大土地占有者階級——和金融寡头結合在一起了。他們共同剝削貧農、中農、僱農，並且採用半封建的地租形式。連資本家自己也常常購買了土地，並剝削農村的劳动者。普魯士的地主貴族——和金融寡头結合在一起，並在资本主义的基礎上改造过的旧的半封建貴族——之被消滅只是由於苏联战胜德帝国主义、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內消滅壟斷組織的权力和沒收地主的土地的結果。在羅馬尼亞、波蘭、匈牙利、阿尔巴尼亞以及其他人民民主國家內，只有在推翻金融寡头的同时，才徹底地消滅了半封建的关系在鄉村中的殘余。这种例子是不勝枚举的。

一切問題在於：资本主义是一种剝削形式代替旧的封建剝削。因此它容易和过去的經濟的剝削形式的殘余（農奴制的形式和奴隸占有制的形式）和睦相处，使它們適合於自己的需要。

但是，如果不消滅剝削的一切形式，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建成。如果說社会主义革命是順便消滅封建剝削的殘余，那末資產階級的消滅、资本主义剝削的消滅和社会主义生產关系的勝利，則是在相当長的时期內，在工人階級專政的条件下实现

的。

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到根据集体的、社会主义的原则对乡村进行改造以前还保留着的旧的、个体的、小私有的农民，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是不存在的。

且看1936年苏联的基本生产基金是怎样分配的。

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国家的所有制和合作社集体农庄的所有制一起——占整个生产基金的98.7%。

国家的（全民的）所有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整个生产基金的90%，在工业中占97.35%，在农业中占76%。

合作社集体农庄所有制在1936年是苏联国民经济的整个生产基金的8.7%。在农业的固定资产中，社会主义的合作社—集体农庄所有制是20.3%，个体农民的部分共为0.6%，因为绝大多数的个体农民到那时已经加入了集体农庄。以剥削别人的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完全消失了。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社会乃是摆脱了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社会，是消灭了这些社会形式的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人剥削人的现象。它的经济基础是公共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它有两种形式：国家所有制和合作社—集体农庄所有制。在苏联现存的阶级是完全新的阶级。这就是工人阶级，它不受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全体人民共同掌握国家的生产资料 and 一切财富。这是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庄的农民，他们把自己的福利建立在共同劳动和集体农庄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上面。集体农庄的成员利用先进技术共同进行工作。他们的福利和文化不断地增长；社会主义农业的生产力迅速增加。这是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和全体人民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是从人民中来的。苏维埃社会不同于任何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是：

在社会中没有对抗的階級，剝削階級消滅了，組成蘇維埃社会的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在友好合作的基礎上生活和工作。

苏联歷史發展的進程表明，社会主义意味着一切資本主义关系、一切剝削的消滅。城市和鄉村是建立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即國家的和合作社—集体農庄所有制的基礎上的。工党的思想家所謂社会主义只有和資本主义混合才能存在的論調已經被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歷史發展的進程駁倒了。

工党分子的这种“混合經濟”究竟是什么呢？这不是別的，而是國家壟斷資本主义。在这里，國家服从壟斷組織。壟斷資本家既作为私有主、又利用國家即壟斷組織的工具，对劳动羣众進行殘酷的剝削。國家壟斷資本主义为了欺騙羣众而冒充“社会主义”，徒劳無益地企圖消滅在苏联建成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对英國和其他資本主义國家的劳动者所產生的不可磨滅的印象。

“混合經濟”的理論本身不是新的，也不是右翼工党分子最先發明的。法西斯經濟学家桑巴特宣傳过“混合經濟”理論。反动的美國經濟学家蔡茲、哈里斯、漢遜之流保衛这种理論。霍伯森和比利时社会民主党人戴曼宣傳过这种理論，西欧的現代的凱恩斯主义者正在宣傳这种理論。他們为了資本主义的利益，把國家在补助金、稅收等方面的措施說成是和私人資本主义企業並存的特种經濟形式。右翼工党分子也同样宣傳这些。

右翼工党分子和其他右翼社会党人跟壟斷組織的公开的思想家的唯一的“区别”在於：右翼社会党人用“混合經濟”來冒充“社会主义”。

工党的思想家休·达尔頓在他“英國的实用的社会主义”一書中，把國家的一切活动，不管是行政的、財政的或其他的活动，都說成是“社会主义”。根据这一点，达尔頓把警察、監獄、法院、学校和教会列入“社会主义的”組織。他居然把公开对劳动羣众

施用暴力的資產階級國家的活動也說成“社會主義”。

達爾頓和摩根·菲利浦斯說道，“資本主義長入社會主義”的過程在英國已經進行了幾百年，從建立了國家的郵政和中央集權的資產階級國家的其他機關時起就開始了。這些假社會主義者把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說成“兩種成分的”（國家的和私人的）經濟。而且把“國家的成分”說成是“社會化了的成分”。

資產階級關於在資本主義國家條件下的兩種成分的理論是從這樣的無稽之談出發的：把“國家的成分”當作“社會主義的”或“人民的”成分而與私人的成分（意思就是沒加入組合的壟斷組織和企業）相對立。從這種理論得出結論，“社會主義已經長入資本主義”並代表國家跟其他一切經濟即私人經濟相對立。事實上，為資本主義國家所有的企業不僅具有和壟斷資本家的私人企業一樣的社会性質，而且是公開和直接地或間接和隱蔽地服從於私人企業的。英國的國有化部門的管理的性質和形式乃是這一事實的鮮明的例證。資產階級國家按它的階級本質來說，是壟斷資本家的集體組織，它是榨取剩餘價值的工具，是準備和進行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工具。

工黨的思想家們加緊宣傳“混合經濟”體系和資本主義是不同的東西。工黨的首領們宣稱，這是“介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東西”。

所有這些摩里遜派、威廉斯派都一致擁護“英國社會主義的特殊形式的個人主動精神和國家所有制的結合”。

工黨的首領企圖這樣說服工人：英國存在着特殊的經濟形式——不是資本主義的而是“已經社會主義的”或“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西歐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中右翼社會黨人都廣泛地採用這種迷惑工人的論調。

由於國有化的結果，20%的英國工業成為國家所有。但是

國家本身就是壟斷組織的機關，是為它們服務的。單從這一點來看，就根本談不上還有什麼和私人壟斷組織在本質上不同的、具有特殊的社会性質的、特殊的國家“成分”。最近幾年內工黨的首領們對於“個人的專業心”的辯護和提倡更加囂張了。他們都讚揚和吹噓“私人的主動精神”，在它前面卑躬屈節，說它能夠拯救英國。對資本主義的辯護恐怕不會再比頌揚“混合經濟的個人專業心”更偽善的了。

1949年的競選綱領“工黨相信英國”直接提出國家的企業應當為壟斷組織服務的問題。在綱領中我們讀到，“國家的企業”應當“切實地和私人商店競爭”。這句話應當理解為壟斷組織的利益並且僅僅是為它們的利益“忠誠的”服務。綱領的著者宣稱：“政府應當準備購買那些業主打算出賣的適合於開工的企業”。這就是說，如果破產威脅着企業或它已經破產了，資產階級國家應當按高價購買破產者的企業來挽救破產者。自從在英國開始為了壟斷資本家的利益以資本主義國有化的形式實行掠奪以後，壟斷組織報刊自然要歡迎而且正是歡迎這種做法的，這是完全適合壟斷組織利益的做法。

1949年5月右翼社會黨代表會議也提出了同樣的“要求”。

1949年的競選綱領中有這樣一條，這一條意味着國家的企業轉回到壟斷組織手中的可能性。

在這綱領中我們讀到：“不應當任意地或沒有足夠根據地支持和私人企業競爭的國家的企業……如果企業辜負了希望，就不應當依靠納稅者人為地支持它們”。1949年秋，布利德林頓的職工大會代表大會總委員會的總結報告中也有同樣的條文。

這一條的意思是明明白白的：大資本家的利益，而且只有大資本的利益高於一切。從綱領的其他各條可以看出，壟斷資本家應當得到巨大的補助金。至於說到成為國家所有的企業，如果

从壟斷組織利益看來有必要的話，工党政府会停止“支持”它們。这不是別的，而是要为它們回到私人的手中辯护，如果資本的利益要求这样的話。

結局就是这样的。工党的首領們实行了某些部門的國有化，因为这是对資產階級有利的，而且是为籠絡工人所需要的。壟斷組織的利益会提出归还的要求。右翼工党分子是决心这样做的。在國家企業沒有競爭能力的借口下，他們准备用最賤的价錢在適當的时候把國有化企業归还給壟斷資本家。

現在保守党政府正打算在鋼鐵工業中实行1949年的綱領制定的东西。可見，煉鋼廠的業主是兩面賺錢：國有化賺一筆，廢除國有化又賺一筆。

圈子轉完了。“混合經濟”的思想体系（它被說成是“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理論”的最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不是別的，而是保护壟斷組織利益的擋箭牌和形式。國家資本主義的企業暴露了它們所固有的本性。它們是私人壟斷組織的簡單的附屬物。

这就是工党的“混合經濟”和工党的國有化的實質。

第四章

所謂“監督”、“充分就業”和“計劃化”

一 右翼工黨分子是怎樣“批評”壟斷組織的

無論在工黨的綱領性的文件和工黨首領的言論中，还是在工黨政府的實際活動中，都表現出工黨上層分子是為壟斷組織服務的。

右翼工黨分子一面為壟斷組織辯護，一面也“批評”一下它們的“不好的地方”。大家知道，儘管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誠心誠意為壟斷組織服務，但他們並不拒絕“批評”壟斷組織，他們提出各種不同的“改良”壟斷組織的建議。

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對壟斷組織的這種“批評”不是偶然的。

資本主義發展的帝國主義階段的特点是壟斷組織的壓迫越來越成為不堪忍受的了。在帝國主義條件下，物價上漲，卡特爾和托辣斯占統治地位，壟斷組織依靠加強對工人階級的剝削，使國內大多數人民破產，掠奪落後民族，奪取最大限度的利潤。最後，壟斷資本家把戰爭看作是榨取最高利潤的最好“生意經”。由此產生了廣大人民羣眾對壟斷組織的日益增長的憎恨。

因此，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不得不通過對壟斷組織的“缺點”提出“批評”，提議保存壟斷組織的“好的方面”消除它的壞的方面，來掩飾他們對壟斷組織的庇護。列寧曾經指出過，作為帝國主義的保護者的資產階級學者和政論家，通常都是採取多少隱蔽的形式而出現的，他們掩飾壟斷組織的統治及其矛盾。他們

力圖把局部的和次要的問題提高到第一位，力圖用完全不重要的“改良”方案例如派警察監督托辣斯等來轉移人民的注意力，使他們不去注意重大問題。

摩里遜在他的1943年出版的一本小冊子“向前看”中，費惑人心地列舉了壟斷組織的一些“缺點”。摩里遜抱怨說，壟斷組織限制生產並保持高昂的壟斷價格，這就取消了資本家的“事業心”，發明思想硬化了，“冒險精神”弛了。摩里遜對“改進”壟斷組織活動的建議是怎樣的呢？他宣稱必須採取“合法措施”來“鼓舞”壟斷組織的“事業心”。在摩里遜看來，“鼓舞事業心”應當通過降低壟斷組織的利潤稅率來實現。這樣一來，對壟斷組織的假批評變成了為壟斷組織尋找保證它們取得最高利潤的手段了。

右翼工黨首領在自己的綱領性的文件和言論中並不拒絕“批評”壟斷資本家，並且責備他們，說他們限制生產，阻礙工業的重新裝備和採用新技術。但是在他們的經濟“研究”中，他們則直接為壟斷組織作辯護。比如，吉伊在自己的一本小冊子“論社會主義的主張”（The Socialist Case）中宣稱，貿易自由和企業自由的“同義語”乃是社會主義。他把社會主義看作是私人壟斷組織和國家壟斷組織的結合。

但是，這不是有意識的欺騙又是什麼呢？工黨首領把壟斷資本主義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說成是社會主義（或者，拿他們的術語來說，是“民主社會主義”），以便為加強壟斷組織的權力和掠奪人民方面的一切措施作辯護。最近幾年里，艾德禮、摩里遜和菲利浦斯也不止一次地宣稱，由於工黨政府的“極有成效的”活動，在改造“壞的”和“惡劣的”壟斷資本家成為“好的”和“善良的”壟斷資本家方面，已經取得了輝煌的成就。那些“惡劣的”壟斷資本家差不多已經沒有了：壟斷資本家都成了“社會主

义者”了。在工党主义的思想武库里，这种对壟断組織的頌揚是特別丑惡的。

吉伊之流的工党經濟学家，重复着反动的資產階級思想，並且宣稱“絕對壟断組織”的“主要害處”彷彿是它排除競爭。在他們看來，要由壟断組織之間的競爭來消除絕對壟断組織的缺點，競爭能提高壟断資本家的“事業心”。工党主义的思想家用這種關於存在着某種“絕對壟断組織”的臆造，來為壟断組織作辯解，並掩飾那些為提高壟断資本家一貫追逐利潤而採取的暴力鬥爭方法。事實上，排除競爭的壟断組織，在世界上是不存在的。在帝國主義時代，競爭不是消滅了，而是變得特別尖銳和深刻了。帝國主義創造了競爭的新形式，它使資本主義矛盾趨向尖銳化。而且，為了消滅競爭者，壟断組織除了採取經濟手段，還經常運用政治手段，甚至犯刑事罪的手段。壟断資本家絞殺那些不服從壟断組織，不服從它的壓迫和專橫統治的人們。

列寧曾經指出過，考茨基對帝國主義所作的理論批評，“迴避和掩飾了帝國主義最深刻的根本矛盾：壟断組織和與之並存的自由競爭之間的矛盾，財政資本的巨大‘業務’（以及巨量利益）與自由市場上‘誠實無欺的’貿易之間的矛盾，卡特尔和托辣斯（一方面）與沒有加入卡特尔的那些企業（另一方面）之間的矛盾等等”^①。列寧的論述，徹底揭穿了現代資本主義辯護者的捏造，他們打着壟断競爭和他們所捏造的“絕對壟断組織”之間的对立的旗幟來保護壟断組織，這是用反动的空想來欺騙羣眾，好像保存和“改進”壟断組織，能夠消除資本主義發展中帝國主義階段所固有的壟断組織對技術進步的人為障礙及其對勞動者的掠奪似的。

① “列寧文選”兩卷集第1卷第1022頁，人民出版社版。

工党的一个经济学家米卡尔多写道：工党政府除了采取措施实现英国的个别经济部门的国有化以外，还应当实行“便利於成立新的壟断組織”的政策，这些新的壟断組織应当和旧的壟断組織展开競爭。在一本附有摩根·菲利浦斯寫的序言的闡述煉鋼工業国有化問題的工党小冊子中，提出了一个保护壟断組織的“理由”：建立現代化企業需要“很多錢”。“当企業达到这样龐大地步时，許多公司在工業中是沒有地盤的”[⊙]。自此得出結論，競爭是不需要的，也是不可能的。現代資本主义的熱衷的保护者宣稱壟断組織是必然和不可避免的，十分“徹底地”帮助了壟断組織去戕害所有那些妨碍壟断組織的独占統治和取得最大限度利潤的人們。

在資產階級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当中有一种流行的“理論”，就是把工人階級的工会組織叫做阻碍“經濟力量的自由競爭”，阻碍資本家和工人的“平权”关系的“壟断組織”。資產階級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打着“平权”和“自由”的旗帜出來反对工人階級的工会組織的存在。这个被当作壟断組織向坚持階級斗争立場的工会進攻的烟幕的反动理論，在工党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中間也得到了廣泛的傳播。他們把工会“壟断組織”說成是“有害的組織”，而且它几乎成了資本主义一切禍害和不幸的根源。

工党分子柯尔在他的一本小冊子“充分就業的手段”中責备工人說，为提高工資進行斗争的工人好像“企圖使自己成为特种商品——劳动力的私人壟断資本家。”柯尔把要求提高工資的工人叫做“社会的剝削者”，而把团结工人的战斗的工会組織叫做

⊙ W. Fienburgh and R. Evely, *Steel is Power. The Case of Nationalisation*, with a forward by Morgan Phillipps, Secretary to the Labour Party, L. 1948, p. 99—100.

“劳动壟断組織”、“最危險的”壟断組織形式。工党的經濟学家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資本主义國家中是一小撮壟断資本家像吸血鬼一样吸吮着全社会的膏脂。

關於“劳动壟断組織”的捏造，是为了把提高工資說成是生產过剩危机和失業增長……的原因。另一个工党的經濟学家吉伊也在進行类似的宣傳，反对工会为提高工人工資而斗争。

在这些右翼工党的經濟学家的著作中，把和資本主义作斗争的工人說成是“壟断資本家”。但是他們顯然一点也不反对在决心实行一切妥协和背叛會員的右翼首領領導下的那些工会。

保衛資本主义壟断組織直到公开頌揚壟断組織，攻击虛構的“壟断組織”即工会，迫害和資本主义作斗争的工人——这就是工党主义思想家的經濟觀的實質。

工党經濟学家的这些反对工人的言論，反映出資產階級害怕工人階級的統一，懼怕工会真正成为和資本主义作斗争而不是服从資本主义的工人的战斗組織。關於“工人暴政”的叫喊，關於好像被工会的“專制”破坏了的“劳动自由”的必要性的叫喊，从壟断組織的刊物上搬到了工党分子那里。这表明了一个事实：工人的战斗的工会組織成了壟断資本家貪得無厭的道路上的障碍。壟断資本家希望工人是單独的、沒有組織的，並且沒有能力在任何程度上去制止現代強大的資本家壟断联盟的進攻。

工党的經濟学家，还逐字逐句地重复着反动的美國报刊用来証实美國通过的反对工人的塔夫脫—哈特萊法案的那些根据，塔夫脫—哈特萊法案的實質是直接利用國家暴力來制止工人反对資本家的罢工斗争。

顯然，工党經濟学家反对“工会壟断組織”的这些言論絕不会妨碍工党上層分子和职工大会总委員會首領完滿地达成协

議。工党經濟學家的這些敵視工人階級的言論是重彈保守黨人的老調，並且證明工党和工會的首領服從資本主義壟斷組織達到了何等程度。

工党上層分子轉到公開為壟斷資本服務的立場，在工党的競選綱領中表現得極其明顯。1918、1928、1934和1945年的綱領里有一些故意含混不清的反对“利潤原則”的東西。這只不過是籠絡羣眾的手腕。這些綱領中把啓發資本家自動放棄“利潤原則”當作反对“利潤原則”的主要斗争手段之一，從這一點就可以清楚看到了。這是重彈費邊社關於“普遍同意（其中包括資本家）建立社會主義”的老調。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矛盾進一步發展的條件下，領導英國政府達六年的工党上層分子，不得不考慮怎樣從思想上為自己的保存和鞏固壟斷組織的政策辯護。正因為這樣，在戰後的年代里，工党分子才以公開的對“利潤原則”的卑躬屈膝和鼓吹壟斷資本家掠奪人民的“權利的不可侵犯性”，代替了工党分子對“利潤原則”的怯懦的進攻。比如，摩里遜在1946年就曾經宣稱過，“沒有必要取消利潤的動機”，這種動機本身是“正確的和正義的”，這些言論不止一次地被摩里遜及其他工党主義思想家重復過。

當然，壟斷資本家非常歡迎的是，比方說是1949年工党綱領中的這類條文：“應當按照勞績來估價每一個壟斷組織”，“企圖消滅進行合理生產的壟斷組織那是最不合理的事情”。當然，“按照勞績來估價壟斷組織”的號召及保存“合理生產”的壟斷組織的要求和進行反对壟斷資本家的斗争是毫無共同之點的。這是只有金融寡頭的政黨才使用的語言。很難再找到一個像“工党黨員相信英國”這一綱領那樣公開保護資本主義壟斷組織利益的文件了。

这个綱領宣佈，“經理人員和私人企業主，是對國家負責的企業監護人。就這個意義上說，任何企業都是民族的。”執政黨右翼工黨分子把壟斷資本家稱做“民族代表”竭力使工人屈服於財政大王的專橫壓迫。

因此，工黨政府採取了盡量加強壟斷組織的力量的措施，這是毫不足怪的。比方說，1948年通過了國家津貼紡織工業的法令。法令決定給予津貼的只是擁有至少三個有5,000萬甚至5,000萬以上紗錠的紡紗廠的卡特爾。國家奉送給加入卡特爾的資本家的禮物是：25%的修理費和新設備價值。

結果，在1950年，紡織廠生產量50%以上加入了某一個卡特爾。

如果說在其他部門沒有實行這種法令，那麼，這只是因為沒有必要，因為壟斷組織在其他部門里的獨佔統治早已確立了。

工黨首領早就提出過監督壟斷組織的轟動人心的口號。例如，在1928年和1934年的工黨綱領中提出了通過“確立對壟斷組織和聯盟的嚴格監督”保護消費者不受過分高價的損失。1945年工黨分子的競選綱領要求確立“對壟斷組織和卡特爾的公開監督”。在這個綱領中，工黨分子提到了“壟斷組織的反社會的有限的行為”，並且花言巧語地要求禁止這種行為。

那麼，工黨政府在執行自己的諾言方面採取了哪些具體措施呢？

在控制價格、出售原料、批准對外貿易方面，工黨政府採取的措施只是軍事管制的殘余，其目的在於通過最有效方式，保證把戰爭後果和經濟危機轉嫁給工人階級。列寧指出，反動官僚的控制乃是把戰爭的重担轉嫁給勞動羣眾的手段。

工黨首領本人不止一次地承認過，“控制價格”的真正任務

乃是保證“生產者”即大資本家的利益。工黨領袖執政后，在自己的公開的文件里預先表明了，這種控制將公馬上被取消，如果資本家願意這樣的話。1946年秋，艾德禮在伯明翰工業家大會上做過這種保證。在“工黨黨員相信英國”這個綱領里也包含了同樣的保證。事實上，從1949年年中起，由於日益迫近的生產過剩危機，取消了許多種商品的配給制。美國對朝鮮的干涉開始以後，按照華盛頓的要求，開始了瘋狂的軍備競爭，許多種原料感到缺乏，這時，工黨政府又加強了“調整”。

工黨政府在加緊輸出和限制輸入方面的措施，像一付重擔一樣，壓在英國勞動者的肩上，這些措施和壟斷組織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像現在保守黨政府做的一樣，工黨政府里的大壟斷組織代理人完全控制了原料輸入許可証。冶金、化學、機器製造、電工和其他托辣斯對於核發原材料輸入許可証的各部，有着巨大的影響。

正像工黨分子、議員斯密斯在1948年蘭開夏和捷夏的工會理事會聯盟代表會議上所說的那樣，“幾乎全部工業原料都被操縱價格的工業家聯盟控制着。結果，每一種原料，在它被投入工業以前，已經被榨取了大量的超額利潤”。許可証和“監督”是壟斷組織手中一個用來瓦解非卡特勒化工業中的中小企業主的有力武器。為此，工黨政府採取了一個“優先權”的原則，偽善地把它吹噓成“社會主義”原則。這個原則的實質在於，首先許可壟斷組織輸入那些稀缺原料或在國內購買這些原料。結果，非壟斷化的中小企業由於原料不足而不得不縮減生產或者完全停止生產。

對壟斷組織的“控制”無非是壟斷組織用來取得最大利潤和消滅競爭者的武器。

從美國開始干涉朝鮮以後，由於軍備競賽的急劇加強，美

帝國主義購買大批軍事戰略原料。早在1950年下半年，由於瘋狂的軍備競賽，英國的原料和金屬就已經非常缺乏了。從美國輸入的原料（棉花、硫磺等）減少了，鎊也極端缺乏。工黨政府對原料“控制”的加強表現在，稀缺原料的許可證優先簽發給軍需工業中的壟斷組織方面。結果，羊毛工業、紡織工業、木器工業和其它工業部門的許多依靠國內市場的中小企業倒閉了。工黨對原料的控制，由於軍備競賽而進一步加強了壟斷組織的實力，增加了壟斷組織的利潤，並且加速了卡特爾化的過程。保守黨政府不是在較小的程度上，而是在更大的程度上執行着“優先權”的原則，財政大臣巴特勒宣布了1952年的輸入要縮減到六億英鎊。原料輸入大量縮減使非壟斷化的企業簽發許可證受到更大的限制。因此，在保守黨政府執政時，非壟斷化企業的破產和倒閉更多起來了。保守黨政府和工黨政府的差別僅僅在於，工黨分子在“民主社會主義”的掩蓋下採取了有利於壟斷組織的“優先權”的原則，而保守黨人則去掉了這塊遮羞布。

工黨政府所實現的對價格的控制採取這樣一種形式，它提高了商業壟斷組織的利潤，減少了小商人的收入。批發壟斷組織佔有絕大部分的商業利潤，留給另售商的利潤簡直小得可憐，這部分利潤通常不超過工人的工資。在工黨控制下的小商人和小企業主的情況之所以惡化，還由於他們是和國內市場有聯系的，他們的產品銷售依賴於廣大居民羣眾的購買力，而由於軍備競賽和物價上漲、勞動羣眾購買力的降低以及壟斷組織進攻工人羣眾的整個政策而造成的國內市場的萎縮，減少了小商人和小企業主的利潤。

右翼工黨分子實行過的和目前保守黨人正在實行的“調整”價格的政策，乃是壟斷組織進攻工人階級以及小企業主和小商

人的工具。

依賴於銷售壟斷組織以及由於勞動居民購買力降低而倒閉的小企業主的情況就是這樣的。

英國共產黨綱領“英國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中談到，在消滅了壟斷組織的政權和確立了人民民主制度以後，小所有者將要得到的好處是：“小店主和小商人，以及鄉間的小土地所有者和農民，將從壟斷資本家所加在他們身上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並將由新情況所產生的週轉率的日漸增長得到好處”。

工黨首領使人們相信，好像所謂“工作組”（Working Parties）實現了“對壟斷組織的監督”。在英國19個工業部門里已經建立了由壟斷組織的代表和國家官吏組成的這種工作組。工黨分子吸收工會官僚參加並宣布“工作組”是和壟斷組織作鬥爭的工具，是“向社會主義邁進的一步”。

實際上，“工作組”的全部活動在於向政府獻策：怎樣最有效地使大資本家得到更多的利潤，依靠國庫重新裝備他們的企業，加強工人的勞動強度等。這種集團的成立完全體現了資本家的利益，並為工黨政府的政策——給大資本家以補助金和投資款項的政策——奠定了基礎。“工人集團”的活動鮮明地證明了，無論在工黨分子還是在保守黨人執政的條件下，國家機關是怎樣打着維護“公共利益”的旗幟而為壟斷組織服務並服從壟斷組織的。採取“工人監督”形式而進行的資本家和工黨的工會官僚之間的“協商”，實際上是一條通道，沿着這條通道，壟斷資本家利用國家機關為自己謀利益。

那些大壟斷集團認為沒有充分壟斷化的工業部門，如家具業、紡織業和首飾業中，都已經成立了“發展委員會”，它也是由資本家、工會官僚和“獨立人物”，即其他部門的壟斷資本家代表或政府官吏組成的。比方說，紡織業中的“發展委員會”的

成員是4个資本家、3个工会官僚和3个“独立人物”。委员会的主席是大資本家萊蒙·斯特里特。

根据1947年議会的特殊法令，“發展委员会”的任务是“提高工業的效率和生產率”——实际上就是加緊剝削工人，提高工人的劳动强度，——以及促進相应的工業部門中的資本家壟斷聯盟的成長。

1948年4月根据議会的特殊法令建立了“壟斷問題委员会”。工党領袖把这个委员会吹噓成“对壟斷組織的最大打击”，“对壟斷組織的進攻”。“工党黨員相信英國”这一綱領吹噓說：“过去，壟斷組織在关闭着的大門之外努力進行了工作，但是現在，当政府建立了关于壟斷組織問題的委员会以后，它們的反社会措施將会被揭穿，它將迫使威脅社会的壟斷組織改組，要它們符合社会利益。”这种断言純粹是吹牛誇大。正如从工党政府的宣言中所看到的一样，委员会的責任只是通过“有限的調查”來“研究”壟斷組織的活动，这种委员会並不对任何人担負任何义务。

壟斷組織通过派遣自己的代表加入“壟斷問題委员会”來監督壟斷組織本身。其次，这个委员会，即使它願意，如果沒有得到特殊允許，也不能对貿易大臣的決定進行調查，而且即使偶尔得到允許，它也沒有权利公布調查的結果。委员会所採取的措施必須得到下議院的批准，大家知道，盤踞在下議院里的也是壟斷資本的代理人。比如，英國百万富翁的雜誌“經濟學家”，非常滿意地表示說，这个委员会“具有不肯定和不明确的职能”。事实上，“壟斷問題委员会”所進行的斗争完全不是为了“制止”壟斷組織，而是为了使有代表加入这一委员会的势力雄厚的壟斷集团吞併那些沒有壟斷化的企業，为了滿足与势力不大的公司作斗争的大壟斷强盜的利益。

为了欺騙人民，工党領袖有这样一种論調，好像“壟断問題委員會”公开了壟断組織所保守的商業秘密。正象列寧所指出的那样，在資本主义社会里，保守商業秘密的法律，不是为生產或交換的需要服务，而是为投机和暴利、直接的欺詐服务，直接欺詐在有限公司里特別流行，財政报告和資產負債表巧妙地掩盖着欺詐手段，为了欺騙人民，他們把財政报告和資產負債表編造得天衣無縫。

实际上監督壟断組織的法律是以工党許多首領所拥护的理論为根据的，按照这一理論，为反对資本而進行斗争的工会被看成是“劳动的壟断”。法律草案的專門条文廢除了1906年劳动爭議法第四款，这一款禁止企業主对組織罢工的工会提出訴訟。法律把宣佈罢工的工人当作壟断者，这一点是完全符合資本家的利益的。这样，关于監督壟断組織的法律，就成了壟断組織用来和工人階級作斗争的武器了。工党貿易大臣威尔遜在下議院討論法律草案时宣称，应当制定补充法律来反对和企業主作斗争的工会。因为，在威尔遜看来，和資本作斗争意味着“限制工会的競爭”。

因此，英國最大的化学壟断組織“帝國化学工業公司”，在它致貿易大臣的报告書里，对关于壟断組織的法律表示欢迎是一点也不足怪的。报告里談到这一法律应当保衛壟断組織“不受不正确的責难或惡意批評”。这种說法再确切不过地表述了法律的真正含义。“壟断問題委員會”的使命是把羣众对壟断組織的憤慨掩盖起来。因此，壟断資本家很欢迎这个委員會。

右翼工党分子假說，这一法律的目的是反对商業秘密，实际上，它所追求的目的則是保持和維護商業秘密。它的目的不是制止壟断組織的“有限制的活动”，而是相反，保护壟断組織不致引起人民的公憤。

工党政府在准备制定“壟断問題委員會”的法律草案时，派了一个專門团体到華盛頓去停留了好几个星期，在那里研究了美國对壟断組織的監督“政策”，这件事情是耐人尋味的。大家知道，在美國，从舍尔曼法律开始，对壟断組織的監督一直是建立和發展世界上最横行霸道和实力最雄厚的托辣斯的掩飾。把美國看成是在立法方面和壟断組織“作斗争”的榜样，这最清楚地揭穿了工党“壟断問題委員會”的真实含义。实际上，工党政府是前門拒虎，后門引狼。惡果很快就表明了。最近几年，在“壟断問題委員會”的“有效活动”的掩飾下，英國壟断組織的利潤大大地增加了。

1951年10月25日的競选綱領中，工党首領为了“加强对壟断組織的進攻”，答应通过議會执行“擴大壟断問題委員會的职权和編制”的法律。毫無疑問，如果在大选以后工党政府繼續执政的話，擴大“壟断問題委員會”的职权和編制的做法早变成再一次欺騙劳动者的司空見慣的手腕了。

这几年來工党政府和資產階級的报刊拚命掩盖一个事实：英國財政資本的代表实际上对工党政府的活动進行着不折不扣的監督。但是，紙里包不住火，許多事实是大家都知道的。

事实表明，工党政府最重要的決議，是执行國內壟断資本家主要联合会——英國工業家联合会的指示。1944年貝弗里治的报告發表后，在英國工業家联合会备忘录里宣佈了“調整投資”和“充分就業”的政策。实际上，工党政府是把此項备忘录当作指令，当作自己活动的法典的。当这个联合会的代表根据联合会的決議在有关的政府委員會里提出了“方案”以后，工党政府就通过了“冻结”工資的決議。1947年，英國政府關於減少修建住宅和社会需要的撥款政策的決議是根据英國工業家联合会的备忘录通过的。

作为冶金工业大王的联合会的英国钢铁联合会的历史，是垄断组织怎样实现对工党政府的监督的另一例证。尽管在1951年初，拥有一半钢铁工人的企业实行国有化，但联合会的活动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国有化企业的原主仍然继续领导联合会，并使工党政府服从自己的意志。“在英国钢铁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的33个委员中，有30个委员是国有化公司的代表。联合会的技术人员（1,000人）同时在联合会和英国钢铁公司里服务。”^①

可见，继英国工业家联合会之后的最大的垄断资本家（实质上起了冶金卡特尔的作用）机构和由于国有化而重新建立的国家炼钢垄断组织结成一伙了。

从下面的事实中，可以看出工党领袖通过国家机关和英国钢铁联合会伙通一气的程度。1951年2月，斯特劳斯（当时的工党供应大臣）以个人和英国钢铁公司的名义声明：由于从西德进口废铁减少而面临着生产缩减的危险。

斯特劳斯在另一发言中说，英国钢铁联合会曾经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和英国钢铁公司协商，应当采取什么政策来领导国有化的炼钢工业企业。不仅如此，在联合会和公司共同召开的代表会议上还成立了一个“协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给公司提供“建议”——实际上是规定要国有化公司必须执行的指示。

斯特劳斯接着说，领导国有化炼钢企业的英国钢铁公司的任务是“和私人公司的领导人协商”。不仅如此，根据他的说法来看，公司强调自己愿意特别注意工业中的私人经济成分。工党大臣宣称，钢铁“生产者”即私人资本家的利益应当“特别加以保护”^②。

^① “Labour Research”, III. 1952, p. 55.

^② “Labour Research”, IV. 1951, p. 55.

工党領導不再羞羞答答了。它向全世界暴露了自己“对壟斷組織監督”的真实內容，这种監督实际上是壟斷組織对工党政府的監督。

二 工党主义和凱恩斯主义

在三十年代后半期以前，工党分子的“思想統治者”是資產階級改良主义者霍柏森，他主張平衡收入並实行局部的資產階級國有化來改良資本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加入工党的霍柏森的資產階級改良主义，完全符合工党及其資產階級思想体系的實質。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右翼工党分子的真正偶像是反动資產階級經濟学家凱恩斯。他的著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受到了工党上層分子的交口称讚。

这种对凱恩斯的崇拜不是偶然的。凱恩斯在世的时候（死於1946年），就被認為是帝國主义資產階級最反动的思想家。現在，所有的資產階級和右翼社会党的經濟学著作都在鼓吹、傳播、闡述、重彈凱恩斯的老調。

上面已經指出，工党思想家做效着自己的費边派先驅者的榜样，热衷地重彈和傳播了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資產階級經濟学家的庸俗理論。把凱恩斯主义几乎当作了工党的正式理論，这並不意味着放棄宣傳老牌的資產階級理論。

凱恩斯本人是折衷主义者。他批判了以前的資產階級經濟学家的某些“教条”，同时又完全从边际效用理論出發，以阿·馬歇爾为依据，在某些方面沒有迴避霍柏森，極力吹噓西里維奧·蓋捷耳和道格拉斯少校之流沒有誰知道的資產階級的庸人，把他們的言論当作經濟科学界的最新成就。

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曾經說过，凱

恩斯是个“……人所共知的資產者，是布尔什維主义的兇惡敵人，他把自己描繪成一個丑惡、兇狠、殘暴的英國市儈的模樣。”^① 对馬克思主义深惡痛絕的凱恩斯制定了作为拯救腐朽資本主义的手段“理論”。

凱恩斯完全懂得，在苏联和資本主义同时存在的条件下，当着苏联日益顯示出自己的正在成長的經濟和政治威力及其对資本主义的优越性时，不欺騙羣众，不瓦解工人階級，就不可能巩固已經动摇的資產階級制度。於是用来医治資本主义痼疾的騙人單方和关于壟断組織掠夺工人階級的方式的“切实”建議，即通过國家採取旨在欺騙工人階級的非根本建議伙成一团了。

工党上層分子之所以如此兴高采烈地欢迎凱恩斯的“理論”，是因为看到凱恩斯的理論在煽动及欺騙羣众方面和他們自己制定的巩固資本主义的措施是一致的。凱恩斯把自己的理論叫做“溫和的保守理論”。但是，难道右翼工党分子，特別是在最近几年里，沒有暴露出自己是千方百計地力圖拯救資本主义的保守党的穩健的羽翼嗎？

可以列举出工党“权威人士”發表的許多把凱恩斯捧到天上去的言論。吉伊曾寫过：“我們大多数人都深深感激凱恩斯勛爵。”工党經濟学家麥休在闡明工党“經濟計劃”的小冊子里，提到了“凱恩斯的出色的分析”。工党經濟学家对凱恩斯的这种評價是不勝枚舉的。甚至沒有这些熱衷的讚揚，只要把右翼工党分子的著作和凱恩斯的著作，把凱恩斯的著作和工党的政策比較一下，就足以肯定它們之間真正的“精神默契”了。

如果把各色各样的蠱惑性的外壳和玩弄詞藻丟开不談，作

① “列寧全集”俄文版第31卷第105頁。

为壟断資本重要集团的思想体系的凱恩斯主义的真正內容可以归結为：利用國家政权來保証壟断組織取得最大限度的利潤並加强它們对工人階級和一切劳动者的剝削。國家壟断資本主义是拯救資本主义的最后手段——这是僵死的庸俗政治經濟学的最后掙扎。

在壟断資本主义条件下，壟断組織和資產階級國家日益接近。这种接近的經濟意义在於國家机关服从壟断組織。

國家机关服从壟断組織表明了國家壟断資本主义的实質，这是由現代資本主义基本經濟規律作用决定的。壟断組織通过國家机关加强对工人的剝削，制定旨在粉碎工人对資本的進攻所進行的反抗的立法，通过稅收和提高物价來掠夺工人和全体人民，通过种种極其不同的形式把巨額利潤裝進自己的腰包。

正是由於控制和利用國家机关，才使壟断組織有極大的可能性來加强对工人的剝削並保証最大限度的利潤，而这种可能性是採取其它方式或手段所不可能实现的。

世界分裂成为兩大体系，社会主义經濟体系的壯大和巩固，資本主义世界內部矛盾的尖銳化，劳动后备軍变为失業常备軍，經常失業的增長，生產部門的經常开工不足，經濟危机的極端深刻化和經常化，資本主义國家經濟發展速度的急剧下降——所有这些都証明資本主义陷入了不可克服的矛盾並面臨着整个資本主义体系的最后崩潰。統治階級對於資本主义矛盾尖銳化和以無產階級为首的被压迫者和被剝削者的革命的恐懼日益加深。資產階級本身丧失了对資本主义內部力量作用的信心。在爭取保証最高利潤、加强剝削劳动者和拯救資本主义免遭毀滅的斗争中，越來越廣泛地利用超經濟手段來实现寡头專政。

凱恩斯給金融寡头利用國家政权來加紧剝削羣众和取得最

大限度的利潤的這種實踐提供了“理論”基礎。德、意法西斯主義利用國家政權，通過恐怖鎮壓和準備新戰爭的方法來掠奪羣眾，在美國為了從經濟危機中找出路而實現了的使國家政權進一步服從壟斷組織的措施，法西斯煽動和工黨所提出的用欺騙羣眾的“社會主義”口號來拯救資本主義的單方——凱恩斯把這些都“概括”起來了。因此，法西斯德國軍事經濟方面的主要全權代表沙赫特，美國的壟斷資本家（許多所謂凱恩斯學派的經濟學家）和打着“民主社會主義”旗幟出現的工黨上層分子，都普遍頌揚凱恩斯，是並不奇怪的。凱恩斯用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術語，加上漂亮詞句和抽象論斷的點綴，來闡述壟斷組織利用國家機關達到自己目的的實踐，以及帝國主義政黨（從右翼工黨分子到法西斯分子）所採取的各種欺騙和迷惑人的方式。比方說，凱恩斯為保證“充分就業”而“調節”投資的思想是從1918年的工黨綱領中借用來的。這個綱領指出，“我們知道，現在如果政府願意，就可以這樣來分配社會工作以及國家管理機關和地方自治機關所做的工作（包括私營企業主的工作），以便使對勞動的一般需求在整個王國里大致保持在一個水平上。”[⊖]

由此可見，凱恩斯的最重要的原則之一——通過“調節”投資維持就業水平的原則，乃是他從工黨分子那里原封不動剽竊過來的，而工黨分子則是從那些提出方案把國家和社會組織當作和經濟危機作鬥爭的手段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和政治家那里剽竊來的。關於利用戰爭準備和戰爭本身作為和經濟危機作鬥爭的手段的命題，是凱恩斯從德國法西斯主義的實踐活動中搬用過來的。在1929—1933年的經濟危機時期，在許多不同的國

⊖ Labour and the New Social Order. The Programme of the Labour Party on Reconstruction. p. 10.

家里，特別是在美國，廣泛推行了給与私人資本以國家補助金（私人資本建議把它当作和危机作斗争的手段）來拯救壟斷組織使它不致破產的措施。善於把各种不同的資產階級學派的原理集中在自己的“理論”中並把它叫做“最新的科學成就”——這是英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慣技。在把邊際效用的主觀理論和生產成本論折衷地結合起來的阿弗里德·馬歇爾之後，凱恩斯毫不知恥地剽竊了各式各样的資產階級理論，開出了他自己的拯救資本主義的單方。

這就是為什麼凱恩斯“理論”是五花八門“博征旁引”的“理論”的原因。右翼工黨分子、最無原則的折衷主義者把這一點看成是突出的優點。凱恩斯、英國銀行的經理、金融寡頭的親信在自己的著作里體現出了英國資產階級的全部奸詐、狡猾和巧妙技倆，英國的資產階級是一個有着數百年壓迫和剝削羣眾的經驗的階級，這種經驗又是和非常豐富的欺騙羣眾的經驗結合在一起的。

如果把凱恩斯在自己的著作中大量運用的漂亮詞句和無稽之談丟開不談，那麼凱恩斯的七拼八湊的觀點的實質就是這樣的：

舊學派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斷言在各資本主義國家里存在着的僅僅是工人在資本家向他們提出的條件下拒絕接受工作的“自願失業”，凱恩斯和這些經濟學家不同，承認還存在着不以工人意志為轉移的非自願失業。而且，凱恩斯還着重指出，現代大規模的失業威脅着資產階級社會的存在。在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經濟危機的空前尖銳化和深刻化，數百萬經常失業大軍的形成，資產階級對既沒有危機又沒有失業的蘇聯的恐懼（它對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有不可消除的影響）——這就是凱恩斯理論的基礎。

凱恩斯的全部經濟學說的中心就是尋找實現“充分就業”的手段。凱恩斯及其信徒認為：“充分就業”並不是消滅失業，而是把失業減少到不威脅資本主義的程度，並且照舊是對就業工人工資施加壓力的手段。

在凱恩斯看來，危機和失業的原因在於資本家利潤的減少，由於居民的支出好像少於他們的收入。正象我們所看見的那樣，凱恩斯分子首先關心的正是資本家的利潤。為了增加對商品的需求，從而保證提高利潤，凱恩斯主張大大擴大資產階級的消費，所以他擁護最不合理的奢侈，資產階級的最荒謬絕倫的揮霍——一直到建設奢華的陵墓等。

可見，凱恩斯是金融寡頭的寄生性的保護人。凱恩斯証實資本家的奢侈和揮霍是延緩危機的手段，他是壟斷組織的保護人。

但是，正象大家知道的那樣，資本家的最不合理的奢侈並沒有拯救資本主義擺脫危機。於是凱恩斯找到了另一個單方，這就是用增加投資來抵償消費者需求的不足。他宣稱，投資的增加將會增加就業人數並提高資本家的利潤。但是因為在經濟危機時期，資產階級由於利潤的急劇下降和商品銷售的縮減而不能增加投資，因此，國家應該給以幫助。國家應當通過補助金、組織社會工作和其他措施來鼓勵投資。這將會為達到“充分就業”和消滅危機提供可能性。

在凱恩斯看來，當資本家還有取得高額利潤的美好遠景時，危機是會不到來的。國家應通過“調節”投資來保證資本家有可能取得不斷增長的利潤，使他們擺脫遭受毀滅的不幸前途。

這就是凱恩斯主義的真正內容。經濟危機意味著最大限度的利潤的急遽下降；為了維持高額利潤，凱恩斯主張在最廣大的

規模上通過國家補助資本家並從而造成人為的需求的辦法進行合法的、有“理論”根據的盜竊國庫的行為。

但是，增加投資意味着產品的增加和由於需求不足而引起的生產過剩的加劇。因此，凱恩斯的調節投資和達到“充分就業”的單方的實際內容看來就是擴充軍備，而擴充軍備的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戰爭。戰爭可以消滅數百萬的“剩餘”勞動力和大量財富，可是，戰爭依靠掠奪國庫和使工人服苦役產生出空前未有的巨額利潤。可見，凱恩斯提出的“調節”經濟的措施反映着把戰爭當作保證最大限度的利潤和千方百計加緊剝削勞動者的帝國主義者的意圖。

凱恩斯只是在一兩個地方提到戰爭是拯救資本主義的手段，這是因為他是極力為“明達事理”的人寫作的。凱恩斯完全懂得，公開宣傳屠殺人類來拯救資本主義，可能激起人民的憤怒。但是凱恩斯的反動理論的實質並不因此而改變。

為帝國主義戰爭作辯護——這是凱恩斯“理論”的另一特徵，因此凱恩斯的現代追隨者正在公開談論凱恩斯自己偷偷摸摸地談論過的東西。凱恩斯的信徒貝佛里治就承認了這一點，他說，達到“充分就業”的唯一實在的辦法是……“全面戰爭”。凱恩斯的信徒只不過是把帝國主義者對戰爭的渴望譯成了庸俗政治經濟學的語言而已。

國家究竟依靠什麼來“調節”投資和提高利潤呢？凱恩斯指出了兩種辦法——稅收和通貨膨脹。但是應當依靠哪些階級來增加稅收呢？壟斷組織的思想家凱恩斯說：依靠勞動者。而且他還強調指出，徵稅對金融寡頭是有好處的，——可以假借“社會正義”和“平衡收入”的名義實行徵稅。凱恩斯斷言在“現代條件下，財富的增長不僅不象通常所認為的那樣，依賴富有者的節制，而且這種節制會大大阻礙財富的增長”，他接着補充說：這

些情况以及通过税收把國民資金轉入壟斷資本家腰包中去的情况“正在取消一个使我們認為必須小心翼翼地行动最重要的根据。”[⊖]

这样，國家就可以在更大的範圍里並且用不着过分小心地（和壟斷資本家本人的做法比較起來）掠奪劳动者为壟斷組織謀利益了。

凱恩斯提出的另一种方法是通貨膨脹。在凱恩斯看來，为了使通貨膨脹不致損害資本主义，必須加以“調節”。“合理範圍”內的通貨膨脹提供了降低实际工資的可能性。

在凱恩斯看來，和实行降低实际工資同时实行征稅，把它作为補助資本家的資金來源，这是实现“充分就業”的条件。

凱恩斯从欺騙人的观点出發，把利潤和利息之間的相互关系提到首要地位，但这只不过是伪装。凱恩斯認為殘酷地進攻工人階級和非無產階級劳动羣众，乃是实现“充分就業”的主要源泉和刺激力。

減少失業人数和“增加就業”可以依靠降低实际工資而达到的断言，是以过时的庸俗的工資基金論为依据的，按照这一理論，全國範圍內的工資總額不变，就業工人人数的增加会引起每个工人的貨幣工資的相应減少。

凱恩斯和以前的資產階級經濟学家在工資問題上的差別僅僅是这样：当时，馬歇爾、皮谷和其他資產階級經濟学家主張減低貨幣工資並讓資本家本人來实现降低工資，凱恩斯則認為，通过直接公开地進攻貨幣工資的办法來減低貨幣工資是危險的，因为，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可能引起革命的爆發。可是通过通貨

⊖ 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第360頁，1949年苏联外國書籍出版局、俄文版。（重點是我加的——德伏尔金）

膨脹和提高物價而實現的實際工資而降低，則是另外一回事。為了不致引起工人階級的憤怒，這種降低可以逐步進行。按照凱恩斯的想法，由於國家的通貨膨脹政策而實現的實際工資的降低，還有另外一種優越性，這就是可以把這種降低冒充為替人民謀福利的措施。

但是問題不僅僅在這裡。凱恩斯之所以把降低實際工資說成是減少失業和達到“充分就業”的條件，是因為他力圖達到另外一個目的——唆使失業工人去反對就業工人，把工人反抗資本對他們工資的進攻的鬥爭，說成是失業的原因。相反地，凱恩斯提醒就業工人說，工人工資降低的原因不是資本的進攻，而是失業工人……。

但是，凱恩斯的野心還不止此。他妄想證明，只有在達到“充分就業”即消滅“非自願失業”的情況下，實際工資才會不再減少。而且，凱恩斯，繼他之後是貝佛里治都強調說，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只有戰爭才能達到充分就業。凱恩斯分子提出讓工人階級自己去選擇：或者是工資降低和失業大軍的擴大，或者是戰爭。這樣，凱恩斯給壟斷資本提供了用來進攻工人階級和非無產階級勞動羣眾以及發動帝國主義戰爭的武器。

凱恩斯的理論明顯地表明了依靠加緊剝削勞動者和經濟軍事化來保證壟斷資本取得最大利潤的要求。

自然，凱恩斯的這些單方都不能消除經濟危機，因為經濟危機的基礎和根源在於資本主義生產的性質本身。“危機的根源在於生產的社會性和生產成果的資本主義占有形式之間的矛盾。資本主義的這個基本矛盾的表現，是資本主義生產能力的巨大增長和千百万勞動羣眾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縮小之間的矛盾，因為資本主義生產能力的增長是為了取得最大限度的

資本主義利潤，而勞動羣眾的生活水平却总是被資本家竭力保持在最低限度範圍內。”^①

凱恩斯的單方，意味着羣眾購買力的進一步降低，以及由於勞動者貧困的加深而引起的國內市場的必然的縮小。

資產階級國家的政策在於，依靠稅收和不斷降低實際工資，通過“和緩的”通貨膨脹使大量的附加剩餘價值轉移到壟斷組織的支配之下，以便增加投資，這種政策使日益增長的生產能力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不可避免的相對縮小之間的矛盾達到極其尖銳的程度。

可見，實現凱恩斯的辦法，必然不是消滅危機，而是促使矛盾尖銳化，引起危機，引起更深刻、更尖銳的危機。凱恩斯以及那些大肆吹噓自己是使資本主義擺脫經濟危機的拯救者的凱恩斯信徒們，都向戰爭求救並把戰爭看作最後手段是毫不奇怪的。甚至連他們的增加投資的綱領本身，也意味着為了戰爭目的而擴大軍事機關。這就是凱恩斯主義、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壟斷資產階級的重要集團的經濟理論的真正含義。通過增加稅收和通貨膨脹，物價上漲，通過給資本家以巨額補助金，為了壟斷組織的利益而“調節”投資，通過目的在於保證最大限度的利潤的經濟軍事化和瘋狂的軍備競賽來掠奪勞動者——這就是凱恩斯派的“理論”和實踐。

壟斷資本家興高采烈地接受了如此適合他們口胃的理論是很自然的。右翼工黨分子把凱恩斯的綱領當作自己的綱領，這一點鮮明地表明了右翼工黨分子是維護壟斷資本利益的人。

不用說，工黨上層分子接受凱恩斯主義作為自己的信念象徵，並且照他們一貫的做法在凱恩斯的綱領上貼上了“社會主

①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14頁，1955年人民出版社版。

义”的籤条。通过“調節”投資达到“充分就業”和平衡收入一併被宣布为工党“社会主义”的第二項基本要点。

顯然，右翼工党分子在执政以前，不可能在自己的綱領式的宣言中公开地、直接地闡述降低工資和提高資本家利潤的凱恩斯理論。甚至凱恩斯本人也是用“消滅食利者”的高調來模糊这些要求的。

工党首領在其綱領式的宣言中宣称，彷彿“調節”投資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在提高羣众的生活水平的情况下，“充分就業”將會得到保証。

1945年工党綱領的基本要点是，通过國家对投資的“調節”达到“充分就業”。在这个綱領里，用霍柏森理論的精神解釋經濟危机的原因。霍柏森認為，消費不足是經濟危机的原因。为了欺騙工人並使他們看不清凱恩斯理論的實質以及根据这一理論進行的進攻無產階級生活水平的實踐的真正意义，工党思想家宣称，凱恩斯的危机論不是排除而是补充霍柏森的消費不足論。

其次，綱領中宣称，“通过規定高額工資、社会保險、征稅，可以保証高度和經常的購買力。”

这样，为了掩盖實現工党—凱恩斯的“充分就業”綱領的真正實質，許下了提高工資、進行改良的諾言。

1947年6月出版的工党的官方小冊子“工党黨員是擴大生產的拥护者”中宣称，工党黨員在执行“充分就業”政策时的基本目的，已經不是提高購買力，而是为了“擴大生產”而“最大限度地提高生產率”。号召工人為資本家的利益而加强劳动强度。在“面向將來”的綱領公布了兩年以后，提高生活水平和提高高工資的諾言只剩下回憶了。

同时，工党的“調節投資”和“充分就業”的全部綱領，在工

竟“社会主义”的幌子下，和凱恩斯的理論完全一致地發展起來了。在有步驟地提高價格的情況下，實現“凍結”工資。在“民主社会主义”的口號下，通過“和緩的”通貨膨脹，實現了壟斷組織向工人階級的進攻。在充分就業的“社会主义”的欺騙宣傳的遮蓋下，壟斷組織竭力利用國家機關來滿足自己的要求和慾望。

但在開始執行“凍結”工資政策的前後，右翼工黨分子在自己的正式發言和為工黨領導所同意的小冊子里，向世界宣布了他們是怎樣了解“與危機作鬥爭”和“充分就業”的政策。

繼凱恩斯之後，威廉斯也在自己的“三重號召”一書中宣稱，“充分就業”絕不是消滅失業。和貝佛里治一樣，無論是他還是工黨經濟學家巴爾納，都認為3%的失業是實現“充分就業”的必要條件。

在蓋茲克爾的一篇文章（載1948年工黨正式刊印的三卷集第一卷）中宣稱，“有利於工業”即壟斷組織的失業人數，應當不少於全部就業者的4%。在這本論文集出版時，正式公布的就業人數約為2,300萬人。因此，蓋茲克爾所要求的失業人數幾乎達到100萬人。這種使失業看來不至於“太少”並從而不會減輕失業者對就業工人工資的壓力的關懷，徹頭徹尾地表明了這個工黨首領的立場。在1949年的工黨綱領中，也着重指出了“局部”失業的必要性。

繼凱恩斯之後，右翼工黨分子把保證資本家的快樂心情，保證資本家有一切條件去“樂觀地估計”將來的利潤，宣布為最重要的任務。吉伊正是這樣說過：“只有高額利潤才能維持穩定的就業。”

國家竭力協助壟斷組織提高利潤，這就是所謂“充分就業”政策的基本內容。

過去，作為執政黨的右翼工黨分子的政策就是這樣的。現

在，在野时期的工党的政策，也是这样的。军备竞赛愈是向前发展，工会和工党的右翼首领就愈加吹嘘和讚揚作为达到“充分就業”的手段的軍事化和战争。比方說，上面談到过的“新費边主义概論”曾經公开宣称，重新武裝和“全面战争”是减少失業的手段。在1952年5月总委员会的宣言中直接提出“战争就是工作”。

这种公开为战争辯护，把战争看作是实现“充分就業”的手段，就是公开为壟断資本服务。

事实上，军备竞赛和战争既不能消滅危机，也不能消滅失業。1952年英國的失業者增加了一倍，工業生產开始普遍減縮，許多輕工業部門的生產急剧下降，都是鮮明的例証。事实証明，右翼工党分子和工会首领关心的不是消滅失業而是壟断組織的最大限度的利潤。

現在，我們來考察一下被称为工党政府政策的基石之一的“調節”投資問題。在工党政府执政时期，“調節”投資是通过被工党分子叫做“調節行情”的主要工具的銀行系統來实现的。國有化了的英國銀行通过各項業務，增加了私营商業銀行的現金，保證了資本家得到比以前多得多的貸款。接着，1946年成立了全國投資委员会。財政大臣是委员会的主席，英國銀行的董事長、倫敦交易所的所長和其他人物是委员会的委員。根据政府“白皮書”的声明，委员会的任务是“刺激投資以實現充分就業”。

1946年通过的公債法，使國庫有权保證私人企業得到大量貸款。

对資本家的“財政援助”通过兩個公司來進行，这两个公司是由許多有政府参加的銀行和保險团体組成的。它們都是邱吉尔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建立起來的。这两个公司之

——“工業金融公司”只支付給“威爾斯鋼鐵公司”3,500萬英鎊。其它貸款首先支付給軍事工業的壟斷組織。

後來，還成立了“工商業金融公司”，它的官方宣佈的目的是“保證給小借貸者以貸款”。成立這個公司是為了給小企業主造成一種印象，好像國家是關心他們的。事實上這個公司把大筆貸款貸給了軍事壟斷組織的輔助企業。小業主們被欺騙了。

但是這一切都只是一些表面現象，它後面隱藏着的，是在“充分就業”和“調節投資”的掩蓋下對全國實行掠奪。實際上工黨政府把國庫變成了壟斷組織的真正救濟所，並且用各種不真實的數字和關於“共同幸福”的幻象來掩蓋這個事實。

正象“經濟學家”雜誌（1950年4月29日）所承認的那樣，工黨政府處心積慮地掩蓋着補助壟斷組織的真實款額。

這是因為：工黨政府不願意把壟斷組織掠奪納稅者的真實數字宣揚出去。政府所公布的那些數字，顯然是大大縮小了的。

這就是1948年10月下議院的議會國庫秘書公布的關於政府給予私人工業資本家的補助金數字的材料：⊖

私人工業所得補助金總數（以1,000英鎊為單位）

1946—47年	31,829.2
1947—48年	34,606.0
1948—49年	37,307.6

這個補助金的數字顯然是大大縮小了的。比方說，大家知道，在1946—49年間，煉鋼工業的投資約有12,000萬英鎊[⊖]。而且，一半以上是國家的投資。這個數字，比議會的國庫秘書正式公布的給予鋼鐵大王的補助金總數多了兩倍半。

⊖ “Manchester Guardian”, 3. XI. 1948.

⊖ “Statist”, 25 II. 1950.

上面引用的数字，尽管是顯然縮小了的，但仍然表明了給予私人工業的補助金的不断增長。拿1948—49年來和1946—47年比較，補助金總額几乎增加了一倍。得到補助金額特別多的是具有軍事意義的部門。僅僅煉鋼工業和民用航空業就得到了全部補助金的三分之一以上。

另外還有許多領取補助金的道路，特別是对重工業中的私人壟斷組織。比方說，根据“經濟學家”雜誌的材料，1950年底斯河流域企業中的投資几乎达到一億英鎊，其中絕大部分投入了重工業[⊖]。而且，絕大部分投資是由國家投入的。投入煉鋼工業的2,400万英鎊中，大部分被投入了萊根倍的大煉鋼壟斷組織“道尔曼·朗”的工厂。工党政府慷慨地補助了这个工厂，从而实际上增加了工厂主在煉鋼工業國有化时得到的补偿費。

根据“工業分佈”的特殊法令（1945年），大量資金流入到所謂“發達地区”的私人壟斷資本家的腰包。補助“發達地区”壟斷組織的形式之一是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成立的所謂“西方八大公司”。工党政府大大擴大了它們的活動。它們依靠國庫建設了並正在建設着新的企業，而且給予康采恩以現成的厂房和裝備，或全部为康采恩所有或由康采恩出少量租金。为此，壟斷組織只要說自己願意就可以开办新企業。

通过“西方八大公司”把100个國家軍事工厂，其中包括大战时期建成的大砲制造厂，極廉價地租給了私人資本家。

例如；工党政府通过“西方八大公司”保證了一个私人壟斷組織建設价值100万英鎊的鐘表工厂，而且，獎給公司的60万英鎊也包括在这100万里面了。

⊖ 此材料摘自“*The Economist*”，正是这份雜誌把底斯河流域叫做“重工業的天堂”。

“西方八大公司”在供应康采恩以装备、厂房、资本方面的“效劳”是这样地適合壟斷資本家的胃口，以致工党政府宣布了在國內其他地区也建立同样組織的意圖。数億英鎊通过其他办法，也流入了私人壟斷組織的腰包。这一点，只要回想一下政府投入住宅建設的数億英鎊，通过包工合同完全被私人建筑業壟斷組織所攫取的事实，就足够了解了。

壟斷資本家的机关报“經濟学家”表述了（並完全同意）右翼工党分子实现“充分就業”和“調節投資”政策的实質。“如果社会使政府有权支出一部分收入，如果社会要增加自己的基本設備，社会就应当節制一部分消費开支，以供政府作政府开支及实现投資計劃之用。”[⊖]

如果用普通話說明这一切，那就是这样的：工党政府按照凱恩斯理論办事，縮減了劳动者的消費。它通过补助金把工党政府撥出的投資資金交給了私人資本家。直接軍事撥款不計算在內，投資首先是用到备战的上面了。法國財政部的統計和經濟研究所的雜誌引用的材料，也証实了这一点，根据这个材料看来，英國政府在1946—1949年間的投資总額是139,300万英鎊（这里不包括地方自治机关的投資），其中投入民用工業的是58,600万英鎊，投入軍事工業的是80,700万英鎊[⊗]。由此可見，工党政府用於軍事目的方面的投資，在四年期間比用在國民需要方面的投資几乎多了二分之一。

“經濟学家”雜誌承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英國經濟，始終在很大的程度上具有軍事性質。上面引証过的材料完全証实了这一点。工党的新的軍备綱領，意味着补助金和定貨更加大量

⊖ “The Economist”, 29. IV. 1950, p. 954.

⊗ “Notes et Etudes Documentaires”, 24. II. 1950, p. 11.

地流向軍事壟斷組織，並提高它們的利潤。前任工黨財政大臣賈茲克爾在1951年2月15日宣布，在三年（1951—1954年）內，70%的軍事開支將用於軍事生產，其中17億英鎊將用於機器製造業、航空工業、汽車工業和造船工業的軍事定貨^①。1951—1954年的軍事開支總額規定為47億英鎊。這就是說，這個龐大數目中的70%將落入軍事工廠主的腰包——用來製造飛機、坦克、武器、軍艦和其他屠殺工具。

這就是工黨的“調節投資”和“充分就業”政策的真正含義。這是經濟軍事化、幫助壟斷組織加緊剝削工人階級的政策。

軍事工業中的大量定貨，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歷年來的“充分就業”政策的組成部分。目前，這種軍事定貨的規模更加擴大了。

大力加緊輸出，是戰後時期達到“充分就業”的另一種手段。英國壟斷組織力圖利用由於德、日輸出國的失敗而在世界市場上暫時呈現的有利局勢。這便使得出口壟斷組織得到了巨額利潤，同時並使出口貿易的出口部門和壟斷組織得到了優厚的補助金。

海外貿易管理機關直屬的貸款部門，早在工黨政府上台的最初幾年里，就給予了出口壟斷組織以六億英鎊範圍內的各種“幫助”、“援助”和“保證”。1949年10月，貸款處宣稱，這是不夠的，必須“幫助工業賺更多的美元”。貸款部的責任是，在兩三年里“補償”出口和工業壟斷組織由於找尋新市場而遭受的“損失”，只要壟斷組織作簡單的聲明，說新地區有“銷售可能”就給予補助。不僅這樣，還保證給予把商品輸到美元地區的壟斷資本家以特別優厚的出口獎金。此外，為了“幫助”壟斷組織加緊

^① ‘Labour Research’, III. 1951.

把商品輸到美元地区而成立了專門的出口管理机关，当然，这標誌着給这些壟断組織以更优厚的补助金和賞賜。

清还英鎊國債也成了出口壟断組織發財致富的手段。輸出还債的產价值由國庫如数付給工業企業和出口公司，这些工業企業和出口公司又用这笔款子“賺得”大量利潤。

这就是凱恩斯和貝佛里治所說的“調節”投資。这是壟断組織的天堂，它們除了得到巨額利潤以外，还獲得了在官方材料中既不被算作利潤，也不被算作利息的，象湧泉一样源源不絕地流入了壟断資本家的保險箱和錢櫃的数以億万計的英鎊。

“調節”投資以保證“充分就業”的全部機構，只不过是通過國家机关把英國資本主义歷史上空前的巨額資金轉归壟断組織。通過國家机关而流入壟断組織腰包的資金總額，只有一个國家比英國多，那就是美國。在美國，这种过程是通过另外一些办法進行的。美國沒有資本主义的國有化，使数十億美元流入壟断組織腰包的活動，不是在“調節投資”的幌子下，而是在“自由競爭”的幌子下進行的。壟断組織通過“馬歇爾計劃”規定的补助金，通過軍事定貨、高价等等，從國家那里取得大量資金。

英帝國主义正在步着美帝國主义的后塵。在英國，这个过程暫時是在工党“社会主义”的旗帜下進行的；后来，保守党政府执政，去掉了这个烟幕。但这一过程的内容是一样的——壟断組織通過國家掠夺人民，而國家則始終如一地服从这些壟断組織。

事实上，在英帝國主义以前的無論那一个政党执政时，壟断組織的势力都沒有达到过像工党执政时期这样大的范围。在以前無論那一个政党执政时，壟断組織的力量及其占有剩餘价值的范围從來沒有达到过像在这种“强大的社会主义政府”执政下

这样大的程度。只有在1951年10月大选后上台的保守党政府才超过了工党分子。

三 工党“计划”后面掩盖着什么？

右翼工党分子一直在大喊大叫好象他们已经实行了“计划”，这种关于“计划”的空谈，在工党的笼络群众的政策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工党分子为了“证明”他们实现的“计划”，提出了一大堆各个方面的数字，他们把这一大堆数字冒充为“年度计划”，甚至把它冒充为“四年计划”（1948年12月公布）。

可是，当时“主要的计划拟定者”克利浦斯在议会中回答直接提出的有关1950—51年的预算问题的讲话中，却不得不这样认为，“民主计划”究竟是什么，这是“极难肯定的”。在“实现”计划以后的好几年里，计划的主要发起人承认，工党的“计划”实际上只是一句空话。

* * *

工党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关于工党政府实现了年度“计划”甚至“四年计划”的全部议论，完全是胡说八道。

单凭执政的工党政府或任何其它资产阶级政府的臆测或愿望，计划经济是不可能出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私有制、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社会产品的私人占有，这些是和计划经济不相容的。正象在资本主义剥削条件下不可能存在社会主义生产一样，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也绝不可能出现计划经济。“有计划的资本主义”、“民主计划”理论的基础是资产阶级有可能任意废除一些经济规律并代之以另一些经济规律的冒险的主观主义的想象。在资本统治的条件下，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计划经济只有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统

治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計劃經濟本身是随着新的社会主义基礎的开始發展而產生的。

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是在生產資料公有的基礎上產生的。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之所以發生作用，是因为只有在这一經濟規律的基礎上，社会主义經濟才能進行。資本主义所固有的競爭和生產無政府狀態的規律，随着資本主义生產关系的消滅而失去效力。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的規律是作为已經失去效力的競爭和生產無政府狀態的規律的对立物而出現的。只有在國民經濟以社会主义基本經濟規律为依据的情况下，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的規律才能得到發揮作用的廣闊場所，社会主义基本經濟規律的重要特征是以在高度技術基礎上使社会主义生產不斷增長和完善的办法，來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整个社会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

國民經濟計劃、苏联國民經濟發展的年度計劃和五年計劃、苏維埃國家的整个經濟政策，都是以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的要求为依据的。苏联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和年度計劃是这一規律的相对地真实的反映。

建立在社会主义基本經濟規律、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的要求的基礎上的計劃，包括國民經濟、技術和文化的一切領域。

斯大林指出：“我們的計劃不是臆測的計劃，不是想當然的計劃，而是指令性的計劃，这种計劃各領導机关必須執行，这种計劃能決定我國經濟在全國範圍內將來發展的方向。”^①

反映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規律和社会主义基本經濟規律要求的五年計劃和年度計劃，保證國民經濟一切部門的發展速度，

①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80頁。

这种速度是资本主义國家根本达不到的。

千百万工人羣众和全体劳动者的实践活动、毅力、主动精神，保証着计划的完成。工人和農民在生产过程中的觉悟程度决定着计划的命运。

党和國家提出的任务，从一个五年计划到另一个五年计划是不断变化着的。比方說，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任务是：恢复遭受战争破坏的地区，恢复战前的工业、运输業和農業的水平，然后大大超过这一水平。这些任务都順利地实现了。五年计划提前完成了。1950年的工业，超过了1940年工业水平的73%，超过原定计划48%。1952年和1940年相比，工业生产增加了1.3倍，日用消費品的生产增加了60%，農產品，特别是原料和畜产品的生产，超过了战前水平並且逐年不断增加。苏联劳动者的物質福利大大提高了。在1940—1951年間，苏联的國民收入增加了83%。

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关于1951—1955年苏联發展的第五个五年计划的指示規定，在生产資料生产每年平均增長13%，消費資料生产每年平均增長11%的情况下，在五年內提高工业生产水平約70%。指示規定提高谷物总產量40—50%，其中小麥提高55—65%，皮棉提高55—65%，亞麻纖維提高40—50%，糖蘿蔔提高約65—70%；等等。

在不断提高社会主义生产和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苏联的國民收入在五年之內將提高60%以上。工人和職員的实际工資，連同降低另售价格計算在內，將提高35%以上，集体農庄庄員的貨幣和实物收入（以貨幣計算）將增加40%以上。

苏联人民正在为完成和超額完成新的五年计划而順利地劳动着。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國民經濟和文化的發展正是按照这个

方向前進並獲得結果，計劃之所以規定並保證了這種結果，是因為黨和政府在自己的政策中從認識了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客觀經濟規律出發，利用這些規律為全體人民謀福利。

人民民主國家計劃經濟的特點是和蘇聯有計劃的社會主義經濟的密切聯繫、利用蘇聯計劃的經驗和這個勝利了的社會主義國家對已經走上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國家的兄弟般的援助、計劃的調協。作為國民經濟的經濟命脈的社會主義經濟成分是人民民主國家計劃的經濟基礎。

高度的發展速度、在消滅戰爭後果和工業化中的巨大成就，是人民民主國家國民經濟固有的特點。1952年，人民民主國家的工業生產遠遠超過了戰前水平，波蘭超過了2.5倍，捷克斯洛伐克超過了1倍，匈牙利幾乎超過了2倍，羅馬尼亞超過了1.3倍，保加利亞（地方工業不計算在內）超過了3.3倍，阿爾巴尼亞超過了6.5倍。在這些國家里已經消滅了失業和危機的可能性，各族人民的物質和文化水平正在有步驟地提高。在這些國家的農業中正在進行着和富農的尖銳鬥爭，儘管農業已經擺脫了地主的束縛，但小農經濟仍占居優勢地位，國家正在採取有計劃的調整措施。

可見，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的計劃經濟完全地並充分地証實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理：計劃經濟只有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存在。

在資本主義社會里，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剝削僱傭勞動，競爭和生產無政府狀態的規律，排斥了計劃經濟的可能性。計劃經濟和現代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作用是不相容的。資本主義生產不能不產生危機和生產發展中的週期性的間斷，不能不破壞生產力，不能不引起羣眾的貧困化和失業。

因此，使資本主義經濟計劃化的企圖是註定要失敗的。

競爭、生產無政府狀態、危機、失業是資本主義的必然伴侶，它們只有隨着資本主義本身的消失才會消失。

斯大林深刻地分析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可能有計劃的問題。他在和英國作家威爾斯的談話中說道：“什麼是計劃經濟呢，它有一些什麼特征呢？計劃經濟是力求消滅失業現象。我們且假定：在保存資本主義制度方面可以做到把失業現象減少到某種最低限度。但是不論哪一個資本家從來不會而且無論如何也不會同意完全消滅失業現象，消滅失業後備軍，因為失業後備軍的使命就是壓制勞動市場，保證工資低廉的勞動人手。您看，這已經是資產階級社會‘計劃經濟’中的一個破綻。其次，計劃經濟是以加強其生產品為人民羣眾所特別需要的工業部門的生產為前提的。可是您知道，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的擴大是依據完全不同的動機來進行的，哪一個經濟部門的利潤率最大，資本就奔向哪一個經濟部門。您決不能迫使資本家讓自己遭受損失，同意較低的利潤率，以便滿足人民的需要。如果不從資本家下面解放出來，如果不廢除生產資料私有制原則，那末您就不能建立計劃經濟。”^①

正是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的有計劃的社會主義經濟的巨大成就說明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和右翼社會黨人發明的各種不同的關於“有計劃的資本主義”的可能性的假“理論”以及制定各色各樣好像可以為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實現這種計劃經濟提供可能性的方案的目的，是為了欺騙羣眾。

* * *

在三十年代初期世界經濟危機嚴重的时候，工黨首領出來為“計劃”作辯護了。十分明顯，這是企圖拿某種東西和蘇聯的

① “斯大林與英國作家威爾斯的談話”第3頁，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

有計劃的社会主义經濟的巨大成就对立起來。

第一个五年計劃的年代，是有計劃的社会主义經濟顯示出自己的巨大优越性的年代。苏联人民以最大的热情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建設了数百个拥有最先進的技術裝備的新企業。在第一个五年計劃的進程里建立了許多新的工業部門——拖拉机工業部門、重機器制造工業部門、人造橡膠工業部門、汽車工業部門等等。由於社会主义工業化的方法，由於計劃經濟，我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極其迅速地從落后的農業國變成了擁有新的技術生產的先進的工業國。

在嚴重的世界經濟危机以及隨之而來的失業的迅速增長和羣眾貧困化的情況下，苏联工業的這種提高鮮明地表明了社会主义對資本主义的优越性。

五年計劃的成就，對資本主义國家中勞動人民的思想發生了深刻的影響。關於五年計劃的問題，在資本主义國家最不同的階層里，特別是在這些國家的工人階級中引起了強烈的反應。

工黨思想家拉斯基、艾德禮、達爾頓及其他等人，正是在三十年代里動員了自己的一切力量來證明不可證明的東西——在資本主义條件下計劃的可能性。他們利用了苏联社会主义計劃的成就來散布關於計劃在資本主义英國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流言。“組織起來的資本主义”的社會民主理論在世界經濟危机面前的破產，並沒有使他們感到絲毫不安。當1929—1933年的毀滅性的世界經濟危机來臨的時候，社會民主黨“理論家”關於資本主义經濟已經成了有組織的經濟的斷言，像一陣烟霧似地被吹散了，工黨首領連忙宣布，通過資產階級國家的各項措施可以消除資本主义固有的無組織性和無政府狀態。艾德禮證明，不改變所有制的關係，即在私有制統治下，“計劃”是可能的和必要的。在艾德禮看來，一切問題都在於……英國銀行的國有化。

臆造的“計劃”的一切措施都歸結為滿足壟斷組織的利益，保證放貸款給它們，使它們能夠利用國庫和英國銀行來領取補助金。

首先提到的是1934年工黨綱領中計劃的必要性。其中規定：“計劃經濟的實質”是……國家控制投資，為此就建議“成立全國投資管理機關”，並通過英國銀行國有化的辦法確立對銀行的監督。

通過流通和貸款來調節資本主義這個已經不止一次表明（早在蒲魯東時代）是破產了的和毫無根據的資產階級方案，在工黨的綱領中又重新復活了。這些方案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條件下，不過是加強關於提高壟斷組織的收入和壟斷組織利用國家機關的國家壟斷措施，不可能是別的東西。

右翼工黨分子執政以後，他們關於“計劃”的煽動達到了從來沒有過的程度。工黨政治家的意圖是，在資本主義總危機尖銳化的新條件下使羣眾相信，好像他們真正在實現“有利於社會主義的計劃”。他們企圖通過這種辦法來消除蘇聯有計劃的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對英國工人階級思想所發生的影響。

根據摩里遜在波爾尼姆工黨年會（1946年）上的宣言內容看來，“英國的綱領”首先是要取得資本家的同意。1949年和1950年的工黨綱領着重指出了“英國社會主義”的這一特點。對資本家說來，唯一的刺激就是追逐利潤。1949年工黨綱領的擬定者暴露了自己的真正面目，他們承認在利潤減少的情況下，“說服”資本家擴大生產是不可能的。

由資本家批准，為了資本家的利益並取得他們同意的“計劃”，說明“計劃”的擬定者是在迷惑人，這樣的“計劃”不過是資產階級剝削的掩蓋和辯護。當右翼工黨分子規定“計劃”的定義的時候，他們就被迫暴露出自己的資產階級本質，暴露出他們沒有真正的計劃。

为了說明实际上的工党的“計劃”究竟是什么，我們就來考察一下摩里遜称它为“計劃的机器”的那个工党官僚机关的特点。

1947年，在爱德文·普劳登的領導下，建立了“中央計劃委员会”並且成立了“計劃經濟管理处”。正像工党的正式出版物所表明的那样，“計劃委员会”的任务是：第一，“協調政府各部計劃的積極性”；第二，“保證消費和現存資源之間的正确的相互关系”^①。至於第一个职能，那它实际上应当是最普通的各部之間的調协委员会，从拿破崙到皮特时代的任何資產階級政府都有这些部。“委员会”建立的“消費和資源之間的相互关系”实际上是对任何人都沒有約束力的数字堆砌。

这种如此大肆喧嚷的“計劃”，乃是“計劃委员会”的数字的堆砌，这些数字對於那些拥有整个工業的五分之四的資本家說來都沒有約束力的。这种数字的堆砌，对受資本主义自發势力作用所支配的國家經濟發展的实际过程，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意义。至於由英國工業家联合会的代表們建立的委员会，那末，顯然，盖茲克尔、艾德禮和其他工党部長都是受这些委员会左右的。但是，这和計劃同样是絕對沒有任何关系的。

两个目的在於“实现”“國有化”企業和私人資本家之間的“合作”的“委员会”同样也是和真正的計劃沒有什么关系。这里我們指的是以賈茲克尔为主席的“全國工業生產协商委员会”和以劳工大臣为主席的“全國咨議联合会”。这些联合会也正式包括在政府的“計劃机器”里，它們通过了对資本家不起任何作用的決議。它們的目的是說服資本家通过某項決議或通过沒有实际意义的共同宣言。

① “Labour Party Year-Book”, 1947—1948, p. 206.

这种“机器”就是这样的，事实上它的目的是用“计划”这一字眼来掩盖垄断组织在国家经济中支配一切的统治地位。

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工党政府的“计划”实际上究竟是什么。

第一，每年（1948年，1949年，1950年和1951年）年初公布了官方“白皮书”形式的“经济观察”。其中记载了前一年在财政、对外贸易、投资、价格等方面所发生的事件，同时又提出了对次年行情的猜测。这些办法和猜测无论对谁都不是指示，而是看行情和猜谜：如果不发生任何意外，国家经济生活的各个不同方面大致往那方向发展。正象任何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英国的整个经济生活进程决定于自发的资本主义规律的作用。所谓“调节投资”和“充分就业”的政策仅仅是购买军事定货的措施，是垄断组织通过国家对销售稀缺原料、消费品定额及其它等等的控制。“经济观察”中阐述的这些虚假的、对任何人都没有约束力的计划，没有而且也不可能给仅仅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的国内资本家指出国家经济生活的任何方向。工党的“计划拟定者”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提出这种任务。

让我们来简短地考察一下被工党分子大肆吹嘘成“民主计划的顶点”的1949—1953年的所谓的“四年计划”。

“四年计划”是采取对“马歇尔计划”的备忘录形式（所谓“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来说明的。实质上这是工党政府对美国老板全面让步的报告。“计划”的主要内容是阐述工党政府对经济措施和经济发展的可能趋势的见解。“计划”中阐明了工党政府关于税收政策的见解，宣布了要进一步增加间接税（由人民群众负担的），减少直接税（由有产者交纳的）。宣布了“补助工业”政策是主要任务之一，这就是说，除了补助国有化部门以外，还补助私人资本家。其次，备忘录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历年来的罢工的减少，说成是工党政府最伟大的功绩。备忘录强调指出，工党政

府有意依靠工人階級來保證進一步“提高生產率”，增加壟斷組織從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榨取的利潤。特別着重地指出了加緊輸出的必要性。

對工黨“四年計劃”來說，最主要的是加緊剝削國內工人階級、殖民地人民和备战。根據這一點才規定了：橡膠的收割量從1946年的435,000噸增加到1952—53年的835,000噸，銅的開採量從1947年的145,000噸增加到34萬噸，花生產量從1946年的325,000噸增加到1952—53年的88萬噸。這些數字都被恭恭敬敬地貢獻給由於準備新的世界大戰計劃而需要積累戰略原料儲備的美帝國主義了。英國壟斷資本家從剝削殖民地中得到的利潤大大減少了，這就意味着工黨政府將用盡一切力量來鎮壓殖民地中正在鬥爭的人民，保證財政大王有條件增加利潤和加緊剝削。1950—51年期間，英國各殖民地的錫、銅、橡膠等等的產量確實增加了。但這種增加是原料價格暫時猛烈上漲的結果（特別是在美國開始進攻北朝鮮以後，由於美國積累戰略儲備和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軍事化），它和工黨的“計劃機器”是沒有任何關係的。馬來亞、南羅得西亞、南非聯邦、澳大利亞、緬甸等地的原料壟斷組織進行了擴大原料生產的鬥爭，因為這會使它們得到令人難以置信的大量利潤。同時，工黨政府加倍生產花生的冒險措施遭到了破產。國庫資金中的3,500萬英鎊落入了壟斷資本家（特別是尤尼萊佛托辣斯）的腰包。

現在我們再來考察一下工黨“計劃”在國內生產方面的數字。工黨“計劃擬定者”吹噓說，煤的開採量將從1947年的19,700萬噸增加到1952年的26,000萬噸。可是，從這些空洞的計劃中什麼東西也沒有得到，儘管看來好像國有化的煤炭工業的開採量可能而且應當受到工黨“計劃”的影響。事實上煤的開採量在1951年是22,300萬噸，而在1952年是22,500萬噸，

比1947年僅僅略有提高。紡織工業部門和輕工業中的其它部門，不是象預計的那樣正在增加生產，而是由於國內外市場的縮小和原料不足正在經歷着危機。人造絲每月平均產量，1952年比1951年減少了26%。在同一時期里，棉花的消費減少了32%。在1951年和1952年，針織、靴鞋、家具和其它輕工業部門的生產也減縮了。

在對外貿易方面，工黨的“計劃”規定有步驟地增加輸入額。事實上，在1951年和1952年，輸入額減少了。國內投資不是按照預定計劃在增加，而是從1952年開始減少了。“計劃”規定有步驟地消滅支付逆差，事實上，1951年的支付逆差大大增加了。1952年支付逆差的減少首先是糧食和原料輸入大量縮減的結果。

在工黨的所謂計劃“執行”的三年期間，英國經歷了1949年的尖銳的外匯危機，經歷了1950—51年冬季的燃料危機。國內的失業人數急劇增加了。

由此可見，遭到了失敗的工黨“四年計劃”，乃是工黨“計劃擬定者”虛構的數字的堆砌。

根據共產黨機關報“勞工月刊”的公正評論，四年計劃只不過是工黨政府綱領的說明。至於國有化部門中的投資，那麼，計劃中的數字也是虛構的，因為，國有化部門中各企業的工作，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完全決定於行情，即決定於市場自發勢力的作用。而工黨的年度計劃則是標本式的行情“預測”，這種“預測”是根據行情研究所按照資產階級政府或個別壟斷組織的定貨而制定的一般規格得來的。工黨的“計劃”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什麼真正的計劃，工黨首領關於他們所執行的“社會主義計劃”的一切言論，實際上無非是欺人之談。

摩里遜在波爾尼姆（1946年6月）的工黨年會上承認工黨的“計劃機器”沒有執行而且也不應當執行任何真正的計劃。摩

里遜聲明，當生產在擴大時，工黨的“計劃機器”除了收集統計資料以外沒有什麼事情可做。因為它的任務首先是“預測”危機的來臨。

工黨的經濟天氣預報者利用毫無價值的統計資料要“預測”經濟危機來臨的時刻，他們要干一件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已經毫無效果地干了一百多年的事情。

結果是連工黨分子本人也承認，他們的“計劃”並沒有使資本主義關係發生任何變化。他們甚至連想都沒有這樣想過。

1950年的綱領“工黨和新社會”公開承認，工黨的“計劃”不能消除經濟危機和失業。綱領不得不承認，“面對着一系列的危險”，這些“危險”可能把英國引向危機。綱領中列舉了這些“危險”：（一）在對外貿易方面大難臨頭；（二）物價暴漲；（三）羣眾購買力降低；（四）失業增長。由此得出的結論是，工黨的全部“計劃”是一錢不值的，而通貨膨脹和降低羣眾購買力的政策只能導致危機的矛盾更加尖銳化。

工黨上層分子使人相信，“預測”到危機來臨，然後執行“制止危機的政策”。1949年和1950年的綱領應許採取好像能夠消滅危機的措施。這是一些怎樣的措施呢？第一，為了制止物價的急劇下跌，兩個綱領都提出了繼續加強通貨膨脹的要求。為此，政府應當取消平衡預算，不顧收入而增加支出，用大量增加通貨量來防止物價下跌。

事實上，大家知道，加強通貨膨脹的結果，並不象工黨綱領所應許的那樣提高購買力，而是羣眾貧困的加深和羣眾購買力的降低。

1949年的綱領認為“制止危機計劃”的另一手段是：通過增加給予企業主的國家補助金的辦法來“鼓勵企業主均衡設備定貨”。1950年的綱領宣稱要採取“和危機作鬥爭”的最重要的手

段“使企業主不再不相信有銷售全部產品的可能”。資本家应当“更多地浪費”（這裡，正象在其他一切方面一樣，重復着凱恩斯和貝佛里治的單方）。兩個綱領所提出的最後手段，都是增加“共同投資”。

工黨的“制止危機計劃”的這一“最新”武庫就是這樣的。它原來是一種大家老早就知道的通過通貨膨脹、補助壟斷組織、軍事定貨來“調整”市場景氣的手段。仍然是進攻工人階級、進攻工人階級的实际工資，仍然是補助並贈禮給壟斷資本家，購買他們的軍事定貨，即保證壟斷組織取得最大限度的利潤，只不過是範圍更加擴大了。“制止危機計劃”的工黨綱領是依靠資本對工人階級和勞動者的進攻來擺脫經濟危機的綱領。它既不能消滅危機，也不能制止失業的照例增長。但這是一個為了壟斷組織的利益的现实綱領——它是一支用工黨的新腔唱出的老調子。

工黨雜誌“新政治家與民族”表述了1950年6月3日的“計劃”，當時在英國，生產危機已經成熟，由於朝鮮戰爭和經濟軍事化綱領還沒有發生原料奇缺的現象：“單位定額和汽油配給制被取消了。對鋼鐵分配的控制大大放鬆了；我國和西歐的貿易更加自由了……。目前，計劃受到政府工業部門（具有戰略意義的某些部門除外）的限制。至於占整個生產的四分之三的私人部門，那就只好沮喪地承認，在這些部門里，計劃很快地變成事後的統計了……。真正的計劃因而消失了”。這是很寶貴的承認。它意味着英國從來沒有過而且現在也沒有真正的計劃。工黨雜誌所說的“計劃”只是戰時和戰後的“定量配售”和“配給証”。保守黨人繼續採用了這種“定量配售”和“配給証”，為了提高壟斷組織的利潤，比右翼工黨分子在更大的程度上利用了原料不足和軍備競賽。

第五章

劳动者貧困化的加深以及在工党“平衡收入” 的借口下壟断組織利潤的增長

一 工党政府預算中的直接稅和間接稅

工党首領宣佈說，“收入不平等”是資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缺点”。从他們的声明來看，好像他們的目的是关怀劳动者的幸福和提高劳动者的福利。为了把羣众束縛在自己的影响之下，工党首領們宣称消除这种不平等和“平衡財富和收入”是他們的“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这种絲毫不触犯剝削关系和資本統治而以所謂“平衡收入”的办法來“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張，在工党的思想体系中曾經起过而且現在仍然起着巨大的作用。

艾德礼宣佈說，“財富不平等”是社会繼續有階級区分的“基本因素”。照艾德礼的說法，任务不是在於消滅階級，而是通过資產階級國家來“平衡”階級，由資產階級國家实行有損於資本家和有利於工人的“財富和收入的更公平的分配”。

“平衡財富”这个命題並不是工党独特的發明。这是資產階級經濟学家的通常的命題。

關於減少“財富和收入不平等”的迷惑人心的宣傳，是从十九世紀六十到七十年代英國庸俗經濟学家約翰·斯圖亞特·穆勒那里搬到費边主义小冊子的篇章上來的。現代的財政資本的經濟学家凱恩斯、貝佛里治、庇高之流都主張“平衡收入”。壟断組織的經濟学家都乐於採納这个命題，因为它决不会損害資產

階級社会的基礎。

右翼工党分子也和別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一樣，企圖使羣眾相信貧富是可以“平衡”的，使貧的少貧一些，富的少富一些，以此來保持資本主义社会基礎使其不受觸犯。“平衡財富”这个命題的目的，在於向羣眾掩蓋在資本主义制度下貧富之間、被剝削者和剝削者之間的鴻溝是不可消除的事實。不僅如此，只要資本主义还存在着，那么这条鴻溝也必然会愈來愈深。無產階級絕對貧困化和相對貧困化的加深、資本家階級財富的增加，這是資本主义的規律。資產階級和工党的經濟學家之所以需要“平衡財富和收入”，是為了不讓工人階級得出這一個唯一正確的結論：要消滅羣眾的貧窮和困苦，必須消滅資本政权，建立人民政权，剝奪資本家的生產資料，使其轉歸人民所有。

全部問題在於，右翼工党分子武斷說，要實行一種使富人納稅比窮人納得多的課稅制。實行“公平的”征稅，被說成是消除資本主义所固有的“貧富懸殊”的通用手段。

這種認為“公平的征稅”是實現“社会主义”的手段之宣傳，目的是要向人民掩蓋資產階級國家的作為資本對工人加緊剝削的手段之一的稅收的真正作用。

正像馬克思列寧主义所確鑿證明的，資本主义國家手中的征稅，只不過是加強當權壟斷資產階級的實力和財富，加強工人階級的貧困化的一種手段。

國家所征收的賦稅的實質，取決於這個征稅國家的階級本性，並且是特定的社会制度的生產关系的性質的表現。在資本主义制度下，稅收通過作為資本家階級的執行委員會的國家，歸整個資本家階級支配。

資本家一面納稅，一面千方百計地把納稅轉嫁到勞動者身上。這是通過提高商品價格來實現的。而當着國家向工人征稅

的时候，它又額外夺去了工人工資的一部分。为了金融寡头的利益，兩位一体的資本家和國家通过國家机关攫取了工人的一部分必要劳动。壟断資本一面用征稅的形式攫取了一部分工資，同时又通过資產階級國家把工資降低到只够維持体力的最低限度。資本主义國家通过征稅，加深了工人階級的貧困化，加强了壟断組織对工人階級的掠夺。

在資產階級國家里，征稅作为执政机关的經濟基礎，乃是对工人階級進行額外剝削的手段。資本主义國家是資本剝削無產階級的工具。

在壟断資本主义的条件下，資本家靠國家的幫助加紧剝削劳动者。愈來愈服从於資本家的万能的联盟的國家，对劳动者的压迫变得更加駭人听闻了。

資本主义制度下的國家执行着兩個基本职能——对內的职能和对外的职能。对內的（主要的）职能是箝制被剝削羣众。对外的（非主要的）职能是靠侵犯他國領土來擴充統治階級的領土，或保衛本國的領土免受他國的侵犯。

向劳动者征稅的目的，是有利於实现資產階級國家的這兩個基本职能的。資產階級國家靠征稅來維持警察、監獄、憲兵、軍隊，用他們來鎮壓和強使正是繳納這些賦稅的被压迫階級就范。掠夺性的帝國主义战争是靠征稅進行的，战費——採取貨幣和稅款形式的血汗——都是由劳动者負擔的。

劳动者納稅增加的趋势，是資產階級國家的特征，这是和階級斗争的尖銳化及战争相联系的。

稅收的空前增加是資本主义的帝國主义階段，尤其是資本主义总危机时期的特征。

愈來愈加紧的軍事化、备战和進行規模空前巨大的帝國主义战争——所有这些都形成追加开支，國家用加重对劳动者課

稅的辦法來償付這些開支。

向勞動者徵稅，是保證資本家獲得最大限度利潤的來源之一。其辦法就是從國家預算資金中撥給壟斷組織億萬補助金，並把軍事定貨分配給它們。

金融寡頭把徵稅作為加緊剝削勞動者的工具。這個工具之所以方便，還因為可以把由於徵稅而造成的羣眾生活水平的降低，說成是“對全社會有利的犧牲”。

徵稅並且還是一種使國民收入的重新分配有利於金融資本的最有實力的集團的工具。

國家愈是服從壟斷資本家的萬能的聯盟，國民收入中為了金融寡頭的利益通過徵稅而重新分配的百分比也就愈大。

可見，帝國主義時代資產階級國家的稅收政策，是壟斷組織進行壓迫的表現，是它們要求保證最大限度的利潤，力圖把戰爭和危機的開支轉嫁在人民羣眾身上的表現。

為了大資本家的利益而壓在勞動羣眾頭上的課稅愈是沉重，愈是不能忍受，右翼社會黨人籠絡羣眾的手腕也就愈來愈巧妙。

右翼工黨分子散佈所謂國家是超階級的騙人之談，宣稱賦稅增長本身就是“社會主義的增長”。在這裡是重新耍弄了和工黨國有化同樣的把戲。國家為了壟斷組織的利益而實行的措施，被說成是有利於勞動者的措施。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則完全是另一種情形。社會主義社會的國家預算，無論是它的收入部分或是它的支出部分，和資本主義條件下的預算相比，在本質上是完全不同的。這是由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關係的性質、它的經濟結構和階級結構——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沒有剝削和剝削階級所決定的。

和資產階級國家的預算（在這種預算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居

民的所得稅)相反，蘇聯國家預算收入的絕大部分並不是靠居民納稅，而是靠社會主義經濟的積累。預算收入的基本部分是周轉稅和利潤提成（這是從社會生產的收入中得來的非稅收性質的提成）。

根據蘇聯國家預算，居民稅在1952年是474億盧布，占全部收入的9.3%，居民中發行的國家公債是376億盧布，占全部收入的7.4%。

1952年預算中的周轉稅是2,600億盧布，利潤提成是618億盧布。收入總額是5,088億盧布，周轉稅加上利潤提成占全部收入的63%。從國營或合作社營的企業和組織得到的進款額，占國家預算中全部進款額83.3%。

共產黨和蘇聯政府在制定國家預算時，是從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的要求出發的。預算保證整個國民經濟任務的完成。周轉稅、交付給國家的利潤提成，以及預算的整個收入部分保證社會主義積累的必要規模——建設新的企業、道路、機器拖拉機站等等。通過國家預算，大部分國民收入用於文化、教育、保健、喪失勞動力者補助金和養老金等等需要。國家預算的一部分用作國家的管理費用和國防費用。

預算開支部分的結構表明了預算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

1952年預算的支出總額是5,305億盧布，其中用於國民經濟需要的撥款是1,925億盧布，用於社會文化設施（教育、文化、保健等等）——1,298億盧布，用於國防——1,102億盧布，用於國家管理機關的經費——143億盧布。在1953年預算中，勞動者個人收入中納稅及認購公債的數字占650億盧布，而他們通過預算從國家在教育、保健、補助金等方面的開支中却得到1,920億盧布，即比他們從自己個人收入中交付給預算的錢多1,270億盧布。資金的絕大部分，都用於國民經濟的需要和

滿足人民的社会文化需要。苏联國家預算無論是它的收入部分或是支出部分，都是为了完成擴大社会主义再生產的任务，为了滿足社会主义社会日益增長的需要。

在苏联，新的学校、中等技術学校的数目，学生的人数，俱乐部、療养院的数目都在逐年增加；用於科学、藝術的开支也在逐年增加。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關於第五个五年計劃的指示規定住宅建筑的投資比第四个五年計劃增加一倍，医院的病床数目至少增加 20%，療养院的名額約增加 15%，休养所——30%，幼兒園——40%。城市和鄉村的学校建設比第四个五年計劃約增加 70%，1955 年从大学畢業出來的專家比 1950 年約增加一倍。

同一时期在美國，全部預算的 74% 用作直接的軍事开支，只有 2% 用於教育和保健事業，而軍事撥款总額在近几年來却大有增加。在执行和平政策的苏联，軍事开支的比重一年一年地不断降低。例如，1940 年武裝力量的軍費开支占全部預算的 32.6%，而 1952 年則是 23.6%，1953 年的預算中只占全部开支的 20.8%。这一个簡單的对照解剖了兩種預算的實質：美國軍备競賽的預算的目的，在於保證壟斷組織獲得最大限度的利潤，而苏联發展國民經濟、提高文化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預算的目的，在於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需要。

在實現从資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各人民民主國家里，國家政权所採取的稅收制度和分配預算資金的办法，都是为了保證通过削弱資本主义成分而使社会主义成分得以增長。

在各人民民主國家里，預算的开支部分的結構是为了保證國民經濟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擴大再生產，幫助劳动農民轉上社会主义經濟的軌道，保證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物質和文化水平，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資產階級國家的賦稅、整個財政政策都是代表該社會的統治階級的利益的。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稅收政策的目的（不管目前是什麼樣的資產階級政黨在實現統治階級的意志），是要保證壟斷資本的最高利潤。國家預算，無論是它的收入部分或是開支部分，是達到這個目的的最重要的槓桿之一。工黨首領硬說，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改變稅收的性質是“建立社會主義”的主要工具。在“平衡收入”這種宣傳中，也和“平衡階級”的宣傳一樣，右翼工黨分子以及所有右翼社會黨人關於流通先於生產、國家的超階級性的臆造，通過國家財政政策最露骨地表現出來了。

在保持資本統治的條件下，宣傳“平衡收入”，宣傳把國民收入作有利於人民的重新分配，乃是工黨主義思想家幾十年以來籠絡羣眾的主要工具。

還在工黨的第一個綱領中（1918年），就已宣佈中心任務是要做到“尽可能最平等的分配”。有趣的是：與此同時產生了一種論調，說徵稅比發行公債好，說不容許“稅收妨礙生產和商業”，因為這對工業家和商人是不利的，以及諸如此類等等。

這樣，1918年工黨綱領（工黨後來的綱領也是一樣）的財政部分，不但具有籠絡工人的目的，並且還力求說服資本家相信這種要求的好處，相信這是為了資本家的利益的。

在1928年的綱領中宣稱必須“使稅收適應支付能力”。綱領要求“按照能夠保證維持和改善工業裝備的方式來組織稅收”。這樣，在“平衡收入”這個論調的掩蓋下，提出了保證給資本家納稅優惠權的主張。

1945年的競選綱領宣佈了如下的願望：“凡是盡力促進本國財富增長的人，得以增加其公平的份額”。為了達到“高度的和經常的購買力”，綱領要求實行社會保險和“減少收入低微者

的納稅額”。

这个“达到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方案就是这样的。工党首領所解釋的只是工党綱領中說过的东西。艾德礼宣称，必須用課稅的方式“贖取财富不平等的罪过”。

可見，全部問題在於“不平等的罪过”。資本主义本身並不坏，只需要在某种程度上“改善”資本主义，通过課稅（和“社会服务”）稍为平衡一下各个階級的收入就行了。这种掩盖資本主义制度下貧富懸殊的宣傳，使工人服从資本的意志的宣傳，是工党思想家的特点。

列寧在他寫於1920年的“政論家的筆記”一文中，批評了奧地利机会主义者奧托·鮑威尔的小冊子“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並且談到鮑威尔主張用課稅的办法消滅資本主义的思想。鮑威尔建議沒收資本家收入的“九分之四”。列寧談到鮑威尔的这个方案时，指出它是对資產階級有利的。資產階級之所以欢迎这种提議，是因为它便於欺騙工人，引誘他們脫离反对資本家的革命斗争。列寧的这一个评价完完全全適用於工党主張用課稅的办法消滅資本主义的方案。

在保存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条件下，任何稅收制度都不可能消滅資本政权，都不可能触犯資產階級的財富和資產階級的剝削制度。所以不可能，正是因为当权的資產階級不容許这样做。而且，蒙資本家允准而当权的政党也不会採取嚴重地触犯資本家階級的利益的措施。这是工党政府的經驗所确鑿地証明了的。

現在我們來考察一下工党首領的稅收政策。还在他們战前的綱領中，提到稅收形式的問題时，顯得極為小心謹慎，看起來会使人奇怪，因为工党首領一向是爱好在一切細節上來考究自己的提議和要求的。顯然，綱領的作者在这个問題上是打算“不

束縛住”未來的工黨政府的“手脚”的。

右翼工黨分子在掌握了政權之後所採取的稅收形式，不僅不損害資本家的利益，而且為資本家的利益服務，並加強勞動者的貧困化。

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竭力強調指出，在資產階級統治的條件下，稅收的任何形式都不可能觸犯資本主義的基礎。同時他們還指出，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無產階級是願意廢除間接稅的。

馬克思寫道：“……如果需要在兩種稅收制度中間任擇其一的話，那末我們主張完全廢除間接稅，並普遍地用直接稅來代替它。

因為在征收直接稅的條件下，商品比較便宜，而且它對生產沒有影響，可是間接稅却提高商品的价格，因為商人不僅把間接稅額而且還把預付資本的利息和利潤也加在商品的价格上面……”。^①

直接稅的優點還在於，人人都知道他付給國家多少錢。間接稅把全部負擔都加在勞動者階級身上，而且這樣一來，還掩蓋了為了資本的利益國家掠奪人民的程度。

列寧在1913年寫道：“……社會民主黨人^②的要求——完全廢除一切間接稅，並用真實的課稅，而不是用玩弄花招的累進所得稅來代替它——是完全可以實現的。”^③

間接稅是對剝削階級有利的，而且也只是對它們有利的。工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13卷第1節第202頁。

② 那時我們的黨還不叫共產黨。——德伏爾金註

③ “列寧全集”第19卷第173頁。

党政府一方面大力增加劳动者的直接税，另一方面还增加了間接税。

我們來看一看事实。首先从工党政府剛成立的时候談起，尽管那时战争已經結束，但是課税还是一再增加。稅收額从1938年的119,600万英鎊增加到1948—49預算年度的419,000万英鎊，1951—52預算年度的423,600万英鎊[⊖]。可見，在工党政府下，稅收是大大增加了。稅收比战前时期增加了一倍，甚至比战时的最后一年即1945年（那时稅收額特別大）还要多。这就不能不意味着劳动者納稅的躍進式地增加，因而也就意味着劳动者貧困化的加深。

右翼工党分子硬說，这种不断增加的稅收，已由他們作了“公平的”分配，結果竟做到了“平衡收入”，並進入了“社会主义”的王國。

摩里遜甚至大言不慚地宣称，彷彿工党政府已經通过課税从資本家那里取得了可以取得的一切，因此，工人应当做的不是和資本家進行斗争，而是順从地为資本家賣命。

我們來看一看，这种大量增加的賦税究竟实际上是損害了哪一个階級的利益。

首先，說明这一点的是直接税和間接税的对比。

在工党政府成立之后，間接税的絕對数量的增加一直沒有間断，它在稅收总額中的比重也提高了。而預算中的直接税的比重則逐年下降了。

間接税（关税、消費税、印花税）从1944—45年度，即从

⊖ “Records and Statistics”, 21. IV. 1951; “Economist”, 14. IV. 1951. p. 293.

战时最后一年的107,400万英镑，增加到1950—51年度的158,400万英镑，增长了54%，1951—52年度的预算则增加到165,100万英镑。在同一时期内，直接税几乎停留在同样的水平上。

在1944—45年度，直接税[⊖]占税收总额三分之一强，而在工党政府执政时则几乎达到税收总额一半。1950—51预算年度间接税额比1944—45年度增加了三分之一，固定直接税额差不多减少了一亿英镑。仅在1948和1949两年内，间接税就增加了82,900万英镑，即每年每户增加了27英镑。1950—51年度预算中，间接税增加了8,150万英镑，1951—52年度预算中增加了6,100万英镑。实际上1951—52年度间接税增长得还要多——10,400万英镑。

同是在1948和1949两年内，尽管利润在不断提高，利息税和利润税却减少了8,000万英镑。在1950—51年度预算中，所得税又减少了8,200万英镑。

而增加间接税就等於增加对劳动者的征税。

列宁指出，间接税是最不公平的税。间接税是向穷人征税。

工党政府从上台执政时起，就采取了尽力提高间接税即向穷人征税的方针。工党经济学家杨格直截了当地说，间接税比直接税“优越”。杨格同时又直言不讳地宣称，在直接从工资中扣除直接税的情况下，工人清楚地知道，他“所获得的自己的劳动成果愈来愈少了”[⊖]；而间接税使工人不会这样明显地意识到，因为间接税是通过提高价格表现出来的。可见，问题首先在

⊖ 从前后文来看，疑是间接税之误。——译者

⊖ M. Joung, Labour's Plan for Plenty, L. 1947. p. 38. (重点是我加的。——德伏尔金)

於掠奪工人，降低他們的生活水平。

所以，在右翼工黨首領看來，間接稅的不可估量的意義在於，可以利用間接稅更容易地欺騙工人。關於這一點，工黨政府的官方聲明就是證明。例如，在1948年12月工黨政府提交給上議院的一份關於“四年計劃”，同時也是正式論證政府政策的備忘錄里寫道：“間接稅和補助金制度是適合於穩定物價和工資的總政策的”。^①可見，工黨政府是存心用加重間接稅的辦法把賦稅的全部重擔轉嫁在勞動羣眾身上的。所謂間接稅促進物價穩定的說法，是騙人的鬼話。間接稅造成的物價上漲額比稅收總額大，因為資本家在出售商品時，不僅把間接稅總額加在商品價格上，而且還從這筆附加額獲得利潤。在“凍結”工資政策下增加間接稅，意味着——也不能不意味着——對工資的進攻。在間接稅影響下，實際工資不斷下降，並且下降的數目超過了間接稅總額。

在英國，通過間接稅的辦法降低工人階級和全體勞動者的生活水平，達到了嚴重的程度。全部重擔都壓在勞動人民的身上。根據加拉赫同志在“保衛共產主義”^②一書中所列舉的材料，在1948年，每一個有三個孩子的家庭一年就要負擔間接稅130英鎊。有1,700萬人，實際上也就是每一個產業工人，一年的收入少於260—270英鎊。

可見，每一個有三個孩子的家庭，如果有兩個人工作，單是繳納間接稅就得化去四分之一的工資，如果只有一個人工作，則幾乎要化去一半工資。

以下的統計可以使我們了解通過間接稅掠奪工人階級的程度。根據關於“國民收入”^③的“白皮書”的材料，1950年英國工人

① 參看 W. Gallacher, *The Case for Communism*, p. 141, 174.

② “National Income and Expenditure of the United Kingdom 1946 to 1950”. Cmd. 8203. 1951, p. 21, 23.

工資總額在扣除直接稅以後是 409,600 萬英鎊；加在個人消費品上的間接稅是 190,400 萬英鎊。根據哈里·波立特的統計，全部間接稅的 75% 都是工人階級支付的。這就是說，1950 年工人支付了 142,800 萬英鎊的間接稅，約等於全部工資的 35%。但是，除了間接稅以外，工人還支付直接稅。也是根據“白皮書”的材料，1950 年工人支付了 51,500 萬英鎊的直接稅，占未扣除直接稅（461,100 萬英鎊）以前工資總額 11% 左右。但是這還不是全部。實際上，在“白皮書”中，還採用統計學上的種種把戲，把一部分工人列入“薪金收入者”即職員當中去了。

如果把工黨統計學家算做別的行列的這些工人也計算在內的話，那就可以看出，在工黨政府執政時，工人階級的工資差不多一半被資本主義國家通過賦稅的形式掠奪去了。在保守黨政府時也是一樣。

右翼工黨分子曾大吹大擂地嚷叫所謂“向資本進行課稅進攻”，實際上是壟斷組織向工人階級進行課稅進攻。

工黨綱領中答應用增加富人的賦稅和減少對窮人的課稅、降低間接稅和提高直接稅的辦法來“平衡收入”的諾言，被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我們來看看工黨政府在直接稅方面的政策。右翼工黨分子肯定說，正是直接稅才能保證“平衡收入”。所得稅和其他直接稅是保證“公平分配”的槓杆，——這是艾德禮和賈茲克爾的言論的主要含義。由於工黨政府並沒有對以前就施行的稅收方法作任何重大的改變，為了使自己的斷言具有那怕是一絲一毫的說服力，他們便宣稱“平衡收入”在他們上台執政很早以前就開始實行了。例如，上面已提到過的工黨官方的三卷集中斷言說，從 1900 年起，就已“在全體人民中重新分配收入了”。按照作者——工黨高級官吏的斷言，這種“平衡收入”從二十世紀初到

1934年就已实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有所加强，最后在工党政府的税收政策当中臻於完成了。

其他右翼工党分子，如摩里遜和威廉斯之流也重复着这种論調。所謂“平衡收入”开始於1900年的断言，只不过使这种断言的作者自己暴露無遺而已。1900年是帝國主义时代的开始，那时英國工人階級的貧困化和資產階級的發財致富都在急剧加强。这种断言的作者把臆造的“平衡收入”的开始和帝國主义时代的开始联在一起，这足以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他們的面目。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直接稅的特点是納稅的人數大有增加。1938—39年，所得稅的納稅人數為380萬。1944—45預算年度有1,300萬納稅人。1945—46年度，當時工黨政府上台執政，納稅人數目增加到1,350萬人。1950—51年度達到1,500萬人。可見，在工黨政府時，和戰前時期相比，納稅人的數目要比戰前幾乎多三倍。這意味着把全部賦稅都轉嫁到工人身上。

以後幾年工黨分子的政策在於用種種借口將資本家在戰時所繳納的巨額稅款歸還給資本家，更不用說資本家為了逃稅還有幾百條門路可鑽。

資本家對於工黨分子在課稅方面給予他們的優惠是不會嫌不足的。優惠的辦法是從財政上給予各個企業以通融和優惠，以便恢復折舊裝備，並裝置新機器。在工黨政府以前，企業主以豁免納稅的形式得到的實際補助金占新裝備的價值20%。現在這項補助金已增加到新裝備價值的40%。給資本家的優惠一年比一年增加。

從下面的材料可以看出，在工黨政府下，直接稅的主要負擔者並不是資本家，而是勞動者。根據1951—52年度的預算，所得稅額（繳納所得稅的除了資產階級以外，還有大部分勞動居民）占稅收總額40%。

同时，光算资本家所納的稅（附加稅和利潤稅）^① 总共只占稅收總額10%。

工党政府給予資本家的賦稅優惠一年比一年多。例如利潤稅和超額利潤稅从1949—50年度的43,100万英鎊减少到1950—51年度的39,400万英鎊，即减少了3,700万英鎊^②。

工人階級的賦稅却增加得駭人。下列材料証明了这一点。1950—51年度从工資中扣去的所得稅，比1938年多105倍（1938年是200万英鎊，1950—51年度是21,200万英鎊）。工人和職員合起來的所得稅提高了九倍多（1938年是4,500万英鎊，1950—51年度是45,700万英鎊）。而同时資產階級集团的所得稅，在1950—51年度只比1938年提高了不到三倍^③。

在居民中的資產階級集团內部，多半是对中小資產階級的課稅提高了，而对大資產階級和最大資產階級的課稅則提高得很少。

可見，右翼工党分子所採取的稅收方法是为了加重对工人階級的課稅，減輕居民中的資產階級集团的課稅，並給壟斷資本家集团以最大的優惠，最大的通融，使他們担負最少的賦稅。

工党政府政策的目的是，用减少对大資本家的課稅和加重对勞動者的課稅的办法來保證壟斷組織獲得最大限度的利潤。

这样，就必然使工人更加貧困，降低他們的生活水平。

以上引用的材料說明了工党政府的稅收政策是为哪一个階級服务的。工党的“捐稅平等”的論調，乃是为金融寡头的利益作辯護的烟幕。右翼工党分子在自己的稅收政策方面，絲毫也

① 尽管由於軍备競賽利潤增加得很快，可是以前几次預算中的超額利潤稅在1951—52年度的預算中被取消了。

② "World News and Views", 6, V. 1950.

③ "Records and Statistics", 29. IV. 1950, p. 408.

沒有落在英國資產階級“傳統”政党的后面。

在工党“用征稅方法实现社会主义”的綱領中，还有一种稅收——遺產稅占着特別重要的地位。這項稅收的特殊重要性在工党第一个綱領中就已強調指出來了。后来，在工党每一个新綱領中都一再提到遺產稅是“实行社会主义”的極其重要的手段。在1928年的綱領中，曾把“非工資收入”（这指的是遺產所得）和“工資收入”加以区别。后者不僅包括工資，而且还包括工商業資本家的利潤，銀行家的利息，土地所有者的地租。这种把收入分为“非工資收入”和“工資收入”的做法，乃是对資本剝削工人階級的最露骨的辯護。除了用这种手法來为剝削作辯護以外，还把資本家所攫取的剩余价值說成是他們的工資。反动的資產階級經濟学家否認剝削事实本身。所謂資本主义的“主要罪惡”是“繼承收入”的断言，乃是右翼工党分子的一种手法，其目的是在号召人們反对“繼承的非正义性”的掩盖下为剝削工人作辯護。

1928年的綱領宣佈有“必要”对使繼承人能以獲得“非工資收入”的“財富的繼承”和“出生的偶然性”採取“極端措施”，——工党首領裝模作樣为之感到憤慨的正是这一点，其目的是想保护和挽救工業和銀行壟斷資本家。

1934年的綱領和1940年工党波尔尼姆年会宣言都重复了这老一套。所謂通过繼承以“平衡財富”的思想來自費边派，而費边派又是从十九世紀反动資產階級經濟学家那里剝窃來的。

資產階級社会中的繼承权，保証繼承人有权和有可能繼續占有剩余价值。

馬克思寫道：“正如一切民法一样，繼承法並不是原因，而是結果，是从建立在生產資料即土地、原料、机器等等的私有制基礎上的現存的社会經濟組織当中得出來的法律的結論。同样，

繼承奴隸權也不是奴隸制度的原因，相反，奴隸制度才是繼承奴隸的原因。”[⊖]

顯然，任何遺產稅都不可能消除資產階級關係。為了消除資本主義，需要消滅的不是結果，而是原因——資產階級生產關係、資本政權。隨着資產階級統治、資產階級關係的消滅，這些關係的法律表現即資產階級的繼承權也就會一起廢除和消失。工黨首領利用廢除繼承權是消除資本主義的起點的說法，誘使勞動者不去注意造成他們的災難的真正原因。正如馬克思指出的，在保存資本主義條件下廢除繼承權，和在保存現有商品交換制度的條件下廢除買主和賣主協議權一樣，是荒謬的。

在社會主義社會里，繼承權的實質和資本主義社會根本不同。在資產階級社會里，繼承權是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它的前提是把實行資本主義剝削的條件轉讓給另一人所有。在社會主義社會里，正如在蘇聯那樣，已消滅了生產資料和生產工具的私有制，消滅了人剝削人的現象，並消滅了剝削階級，從而也就沒有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的繼承權，因為占有這些東西會造成剝削的可能。

但是，消滅生產資料和生產工具的私有制，並不意味着消滅一般的個人所有權。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家庭用具、個人用品、住宅的個人所有權，集體農民的大小家畜、家禽、園地建築物的個人所有權均受到保護。公民個人所有的東西可以繼承。根據蘇聯憲法，社會主義社會條件下的法律反映和確定公民個人財產的這種繼承權。

社會主義的繼承權是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結果，而不是它的原因，是這種關係的表現，而不是它的來源。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8卷第1節第336頁。

右翼工党分子宣称遺產稅是“建立社会主义”的極重要的途徑，其目的是为了想使資本主义永远存在，並散佈認為不消滅剝削和私有制就能消滅資本主义的幻想。

在帝國主义条件下，特别是在資本主义总危机时期，資產階級經濟学家特別乐意利用遺產稅是“平衡財富”的手段这一論点。凱恩斯宣称过遺產稅是“財產平衡”的工具。

壟斷資本的經濟学家之所以特別乐意採用这种蠱惑人心的調調，正是因为遺產稅是資產階級最慣用的措施。

工党主張通过遺產稅來“平衡財富”的實質，在所謂“达尔頓計劃”中特別明顯地暴露無遺。按照“达尔頓計劃”，为了要把資本主义經濟轉歸國家（資產階級國家）所有，國家应当沒收一部分以“实物”——有价證券、土地、住宅、企業為形式的遺產。

到第二代——繼承人死后——國家沒收財產的75%。如果繼承人用“劳动和儲蓄的方法”，也就是說，用剝削工人和交易以及其他手段積累了新的資本，那么遺產稅就大大降低。不僅如此，國家还应当尽力促使有進取精神的繼承人的“工資”財產和資本不斷增加。

这个“計劃”实际上只意味着使資本主义永远存在。“計劃”竭力鼓勵積累資本。再过1,000年，遺產稅本身也是消除不了資本主义的。

現在我們來看一看官方材料：

遺產稅（以100万英鎊為單位）

1938年.....	78	1948年.....	180
1945年.....	119	1949—50年.....	177
1946年.....	142	1950—51年.....	182
1947年.....	163	1951—52年.....	183

从1938年起，遺產稅增長了一倍多。但是如果估計到同一

时期內物价的上漲，那么可以看出，实际遺產稅額並未增加。遺產稅占直接稅和間接稅總額的比重，比1938年大为降低了。遺產稅在1938年占直接稅和間接稅總額6.6%，在1951—52年度占4.4%。

当克利浦斯在關於1949—50年度預算的演說中，宣佈把以前存在过的三種遺產稅合而為一的時候，情況絲毫沒有改變。遺產稅額及其性質是依然如故。

這就是工黨答應通過遺產稅“建設社會主義”的諾言的真正結果。

工黨分子在繼承問題上的稅收政策特別明顯地表明了，它無非是保護壟斷資本家的收入和發財。

這就是通過賦稅“走向社會主義的總途徑”，它實際上是把納稅的重担轉嫁在英國工人階級的肩上，使它愈來愈貧困。這是對大資本有利的稅收政策。分析一下工黨預算的收入部分，就無可辯駁地證明了這一點。

二 工黨政府預算開支的目的是什麼

考察一下工黨預算的開支部分就能具體說明，在工黨政府下預算資金的重新分配是對哪個階級有利的。

右翼工黨分子無論在消滅以前幾次戰爭的後果方面，無論在準備和進行新戰爭方面，都盡力保證了英國壟斷資本的利益。

右翼工黨分子的這種作用在他們對公債的態度當中特別明顯地表現出來了。

幾百年來積累起來的英國公債，由於兩次世界大戰而達到了天文數字。

工黨經濟學家企圖證明（特別是在達爾頓當財政大臣的時

候)：國家赤字及由此而來的公債的增加，乃是國家的“純利益”。實際上，公債的增加意味着中籤公債券的利息和本金的稅額的相應增加。

關於英國公債和公債利息變動的資料

年代	公債額(以100 萬英鎊為單位)	利息和本金(以100 萬英鎊為單位)
1913.....	656	24.5
1920.....	7829	325.1
1939.....	7247	215.7
1945.....	21473	412.7
1950.....	25922	477.8
1951.....	25860	513.6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英國的公債就增加了11倍以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的公債增加了2倍，而在工黨執政時又增加了40億英鎊。

與此相適應，公債的利息也增加了：在1931—20年期間增加了11倍多，在1939—50年間增加了1.5倍，在工黨執政時增加了10,000萬英鎊以上。公債利息加重了國家預算的負擔，在1951—52年度占全部開支的13.4%，耗費了間接稅總額的三分之一以上。

英國的公債，首先是兩次世界大戰的後果。工黨政府靠徵稅來償付公債，迫使英國勞動者來擔當這兩次戰爭的財政後果。

在這裡重要的是應當指出以下的情況。工黨政府根本不想減輕壓在英國人民頭上的沉重負擔。無論那一屆工黨政府（無論是在1924年，或是在1929—31年，或是在1945—51年）一次都沒敢降低公債利率或延期還本，相反的，為了提高給鐵路大

王的补偿費，工党政府在实行國內运输國有化时，把利率从2.5%提高到3%。

馬克思關於公債制度寫道：“公共信用成了資本的信條。公債成立了，代襲瀆聖罪為不赦罪的，是公債上的背信。”^①

右翼工党分子最害怕对資本主义國家的威信失去信用。對於他們，正如對於整個資本家階級一樣，这种信用乃是同样的信條。

工党首領关心壟断組織收入的增加，並保护食利者寄生階層的收入。右翼工党分子在完全保持巨額公債（它超过英國全年國民收入官方数字一倍半）的时候，不僅遵守英國資產階級關於公債不可侵犯的由來已久的規則。他們还坚持奉行了凱恩斯主張兩次世界大戰的費用应由人民羣众負擔的建議。

工党政府支付了最后一个便士的公債利息，完全保證了公債的行市和自由推銷。

下一个項目——这是用於軍备競賽、鎮压殖民地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費用。这是实现英帝國主义的計劃的費用。

1950—51年度預算中的軍事撥款的数目是78,100万英鎊。1950年8月，工党政府增加軍事撥款一億英鎊。但是，華爾街要求軍备競賽再加一把勁兒。工党政府急忙执行自己的“大伙伴”的这个指示。以后三个預算年度英國國家預算中用於軍事化的撥款起初提高到36億英鎊，后来提高到47億英鎊。在賈茲克尔的預算演說中（1951年4月），規定1951—52年度的軍事撥款为149,000万英鎊。

在英國的預算中，軍备競賽通过大量增加軍事費用的形式反映出來。用於軍备和已經進行的殖民戰爭的費用的比重在

^① 馬克思著“資本論”第953頁，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1950—51年度是19%，在1951—52年度增加到34%。可是，軍事撥款還不限於這一些。有好幾種軍事費用採取了隱蔽的形式——給壟斷組織以各種補助金的形式。

但是，如果只計算官方的軍事費用，加上用於消滅英帝國主義所進行的以前幾次戰爭的後果的費用，再包括公債利息，那末，所有這些費用就有二十多億英鎊之巨，即占1951—52年度預算全部費用的一半（包括“特別開支”在內）。

工黨政府的預算是經濟軍事化和壟斷組織獲得巨額利潤的工具。極大部分預算軍費（無論是以前幾次戰爭的費用和準備新戰爭的費用）向來都是落入了壟斷組織的腰包。大部分公債利息、軍事虧損賠償費、大部分訂購武器和軍需品的軍事預算費以及其他等等，都是壟斷資本家獲得巨額利潤的通路。

此外，工黨政府還擁有非預算基金，根據“經濟學家”雜誌^①承認的，這筆基金到1949年11月為375,300萬英鎊。工黨政府無人監督地擁有這筆巨額基金，並且不公佈任何材料來說明開支這筆資金的目的和開支的數目。由於擁有非預算基金，使工黨政府能夠最廣泛地補助壟斷組織，盡力向人民隱瞞這件事實。

工黨政府的巨額預算（達到國民收入官方數字的43%）的“秘密”在於：右翼工黨分子遵照英國壟斷資本家和華盛頓的要求，實現了英國經濟的軍事化。

艾德禮1950年9月12日在下議院的演說中宣稱，工黨政府堅持把英國轉上軍事經濟軌範的方針。難怪好戰的英帝國主義的最老的政黨——保守黨人——完完全全擁護工黨政府的財政政策。實際上，和保守黨在預算問題上秘密聯合，這還是1950年

^① “Economist”, 17. VI. 1950, p. 1350—1351.

2月23日大選很久以前的事，後來就公開暴露出來了。

這個同盟在保守黨政府組成以後還繼續存在；保守黨政府加緊實行軍備競賽，向勞動者在爭取改善社會地位方面所得到的果實展開進攻。

除了消除以前幾次戰爭的虧損和準備新戰爭的預算項目以外，大資本家通過預算還得到了另一種款項。各種軍事超額利潤都歸還到壟斷資本家的腰包裏了。

根據“白皮書”、“1946—1950年聯合王國的國民收入和開支”的材料，按照預算開支各個項目歸還給資本家的款項參看下表（以100萬英鎊為單位）[⊖]。

	1946年	1947年	1948年	1949年	1950年
軍事損失的補償費……	131	266	161	193	103
軍事超額利潤稅……	167	40	15	14	11
補助金……	347	438	534	486	444
其他補償費……	3	3	8	16	22
總計	648	747	718	709	582

從軍事超額利潤、軍事損失的補助金和補償費預算中歸還給資本家的總額在五年內達340,400萬英鎊之巨，每年平均約68,000萬英鎊。

現在我們把這些款項和由利潤稅及超額利潤稅所得收入的款項比較一下[⊖]。

	1946年	1947年	1948年	1949年	1950年
利潤稅……	35	31	154	257	264
超額利潤稅……	356	255	129	43	13
總計	391	286	283	300	277

⊖ “National Income and Expenditure of the United Kingdom 1946 to 1950”, April 1951, Cmd. 8203, p. 31.

⊖ 同前。

五年內利潤稅和超額利潤稅為 153,700 萬英鎊。可見，五年內從預算中以補償費和補助金形式歸還給資本家的錢，比他們所繳納的利潤稅和超額利潤稅要多一倍以上。

其次，還以預算和非預算的手續每年撥出數億英鎊補助金作為投資額（現在在保守黨政府下也是如此）。這種投資額從來都是直接或間接地為資本家服務的，而決不是為工人階級服務的。這筆數億英鎊的款項中，從來都有一部分用來補助壟斷組織，有一部分用來重新裝備國有化工業部門，以利於提高英國壟斷組織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能力。

英國資產階級戰後政府（最初是工黨政府，現在是保守黨政府）的整個補助和賠償機關，不僅保證資本家收回他們所繳納的那筆稅款，而且還保證他們得到以稅收形式從勞動者那里征收來的巨額補充款項。

其次一項是國家機關的開支。在 1950—51 年度預算中，撥款 5,700 萬英鎊以上作為對勞動者行使暴力的機關（警察、監獄等等）的經費，撥款 8,000 萬英鎊以上作為“對外的和帝國的”開支——外交機關的開支、給非洲的壟斷組織的補助金以及其他等等，即是用於英帝國主義需要的費用。

國家機關經費開支並不是對人民有利，而是對這個機關所為之服務的壟斷資本家有利的。

剩下的就是所謂社會開支了。工黨分子宣稱，這種開支証明了國家已成為“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英國資產階級由於害怕工人階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初幾年實行了某些改良。這些改良在資產階級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鞏固資產階級的障地。

資本統治條件下的改良勢必變為鞏固資產階級統治的工具，變為欺騙勞動者的工具。

不能不承認，右翼工黨分子所實行的這些改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轉移羣眾的憤懣情緒以挽救英國資本主義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毫無疑問，右翼工黨分子早就拒絕進一步貫徹這些改良，到現在為止對羣眾的幻想還有影響。它們是使工黨首領還能對勞動羣眾有影響的重要原因之一。

現在我們來具體地考察一下這些措施。實行過國家社會保險。但是，這種保險是靠工人和職員的特殊的納稅來實行的。1949年，工人繳納的社會保險基金是15,200萬英鎊，職員——5,400萬英鎊，共計是20,600萬英鎊。可是資本家繳納的“基金”只有2,600萬英鎊。按照預算，在同一年內社會保險的撥款是14,100萬英鎊，多子女補助金是5,450萬英鎊。可見，無論是社會保險基金和多子女補助金，都是靠勞動者的上繳基金來支付的。國家靠“被救濟的人”去“行善”——這就是這些改良的真實內容。

在工黨的改良以前，工人的社會保險是根據工會和資本家的協定實行的。通常是由資本家繳納絕大部分保險基金。國家只支付失業補助金。現在，根據新的社會保險法，資本家實際上不繳納社會保險基金了。他們所交納的基金只等於工人和職員所交納的十分之一。工人和職員實際上完全支付了這一項目的開支（資本家所繳納的2,600萬英鎊挪作別的開支了）。工黨的這一改良意味着：資產階級國家打着“社會主義”的虛偽旗幟，把社會保險的重担轉嫁到工人肩上去。這就是使資本家免除開支並靠工人的微薄工資來實行的改良。

其他改良——保健事業國有化、养老金也都是按照同一原則實行的。所有這一切都是由工人自己支付的。右翼工黨分子所實行的“犧牲平等”制度就是這樣的，在這種制度下犧牲的只有工人。

学校和保健事業的撥款，在工党政府下由於擴張軍備而不斷削減，在保守党政府下，削減得愈來愈厉害了。

在职工大会布萊頓代表大会上，許多代表的發言都指出國民教育處於危急狀態。機器製造業工人工会的一个代表在發言中指出，“为了節約”，学校建筑中沒有現代化的廁所，也沒有存衣处。他說道：“如果我們靠犧牲我們的兒女來准备新戰爭的話，這是我們的恥辱。”^①全國礦工联合会的代表斯蒂尔指出，由於教育事業處於苟延殘喘狀態和薪俸低微，致使教師缺乏，教育兒童的人自己並不具备最必需最起碼的教養。学校建筑物已陈旧不堪。学校有人滿之患，班上學生拥挤不堪。在斯蒂尔居住的工人区的学校里，110个兒童在兩間不大的房子里學習。为富家子弟設有專門的特权的学校，劳动人民的子弟的教育条件則坏得駭人听闻。

保健事業的情况也不見得好多少。現在，医院和診療所实行免費治療。可是，医院和醫療站根本不够。几乎沒有新建的医院和醫療站，候診者拥挤得怕人。有一个代表在布萊頓代表大会上談到英國保健事業中一件不可容忍的事实。醫療站的候診者拥挤不堪，而医生又这样少，以至“常常可以看到候診者在冒着雨雪排成很長的隊伍”。

不言而喻，富人享受着經常的醫療幫助，國民保健事業的嚴重狀況一点也沒有使他們感到不安。

由於軍費开支的大量增加，社会开支（学校、保健事業的开支）在預算中的比重，从1950—51年預算年度的34%下降到1951—52年預算年度的29%。

工党政府为了軍备競賽的利益逐漸削減社会开支。而保守

① TUC. Brighton Congress Report, London 1950, p. 500—501.

党政府在右翼工党分子实际支持下更加广泛地展开进攻。1952—53年度工党政府的预算规定削减社会需要的开支（学校、保健事业的开支）8,200万英镑。

工党最后一位教育大臣承认，在保持和1954年教育费用同样水平的情况下，有20—30万儿童将根本没有入学的可能。由于在保守党政府下停止修建新校舍以及教师愈来愈缺乏，失学儿童的人数还在日益增加。更不用说，劳动者的子女在英国学校中所受的教育，只能得到一些最起码的，对资产阶级说来是获得进行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雇佣奴隶所必需的知识。

可见，工党政府在战后及后来和保守党政府所实行的微末的改良，日渐化为乌有了。

右翼工党分子把住宅建筑列入“福利国家”的社会开支之内。

对英国工人阶级说来，住宅情况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严重过。同时，由于在战时住宅被大量炸燬，住宅需要急速增加了。根据“工人日报”所列举的材料，有二百多万个家庭等待着住宅。此外，有一百多万人住在不适宜居住的房屋里。而且，正如“工人日报”所指出的，上面列举的数字是被大大缩小了的数字，因为各地当局在人们登记需要住宅时规定了許多限制。“工人日报”关于伦敦的住宅需要写道：“比如，在斯傑朴尼，在伦敦，居住条件差的人是不予登记的，因为当局懂得，如果把他们也登记在内，那么登记的人就会佔居民90%了”^①。

1945年工党的竞选纲领答应每年建筑40万间住宅（10年内总共建筑400万间住宅）。实际上，政府的住宅建筑计划一年一年在压缩。1950年，总共建筑了192,700间住宅，而在

① “Daily Worker”, 21, 23. I. 1950.

1935—1938年期間，每年平均却建築了 357,900 間住宅，——可見，戰後建築的住宅幾乎只等於戰前的二分之一。同時，居民人數比 1937 年多了 200 萬，而住宅的數量却由於戰時德機的轟炸和損壞而大大減少了。

在職工大會布萊頓代表大會上，許多代表指出了勞動者的住宅狀況是不能容忍的。威斯勒代表說，住宅的需要嚴重到這種程度，“住宅或寓所建成以前人民羣眾早都死去了”。

建築工人聯合會的一個代表宣稱：“在這個國家里工人住宅的標準向來是很低的，而現在有更加惡化的趨勢”。他把建築工人的居住條件比擬為法老[⊖]時代建築金字塔的奴隸們的住宅條件。

但問題還不僅在這裡。問題還在於：當局所實行的住宅建築本身，無論在過去的工黨政府下和現在的保守黨政府下，都是由建築公司承包的。這就是說，住宅建築使壟斷組織發了一筆財，是對它們有好處的。住宅本身並不歸勞動者所有，而是歸資產階級國家或自治局所有；資產階級國家或自治局經營管理這些住宅，以高額房租出租給工人。新建的住宅由於房租太高，對廣大工人羣眾來說是住不起的。

正如 1949 年和 1950 年工黨年會代表們所指出的，房租化去了工人四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以上的工資。戰後的房租在多數情況下都提高了一倍。

因此，工人常常只好（即使是在可以租到房子的時候）住在不適宜於居住的貧民窟里。不管是住宅建築費問題議會委員會，不管是以前成立的建築委員會都找不到空閒時間說明壟斷資本家究竟得到了多少利潤。但是，根據顯然是縮小了的材料，

⊖ 古代埃及國王的稱號。——譯者

建築公司的利潤超过了战前建築業利潤兩倍。

公司在生產建築材料方面的利潤比任何时候都高。隨着建築公司利潤的提高，建築費用也上漲了；這是靠抬高壟斷組織所供給的材料的价格進行的，並且是供給建築材料的壟斷組織和從事建築的壟斷組織獲得極其高額的利潤的結果。

對工人加緊剝削，損害納稅人的利益而使壟斷組織發財——這就是战后年代由於工黨執政而造成的住宅建築中的狀況。

應當指出，在保守黨政府下，住宅建築及勞動者租賃住宅的情況還要壞。

住宅建築開支在完成軍事計劃的建築材料不足的借口下，在繼續削減着。而住宅需要却在不斷增加。

保守黨政府為了房主的利益企圖通過議會貫徹大大提高房租的法案。保守黨政府主張把市政府建築的房子賣給私人。資家建築市政住宅時撈得了巨額利潤。現在，在保守黨政府下，他們通過出租這些房子又獲得了額外大筆利潤。

現在我們來總結一下。如果說，工黨預算的收入部分證明了徵稅的全付重擔都落在勞動者的肩上，那麼，開支部分則證明了這筆億萬資金的重新分配是對壟斷資本家集團有利的。對於預算材料的分析無可辯駁地證明了這一點。

怪不得工黨政府的預算總是博得金融寡頭的贊許的。

壟斷組織的刊物“經濟學家”雜誌關於工黨第一個預算寫道：“這是個恰到好處的清醒的預算，對它的各個基本部分是難於加以批評的。”

“經濟學家”雜誌關於1947—48年度的預算寫道：“達爾頓的第三個預算，不僅是可以採用的，而且是很不錯的……他提出的建議是以健全的財政原則為根據的，因而獲得了一切權威人

士的支持。”“經濟學家”雜誌所說的權威人士，就是倫敦城的老板。對於克里浦斯的預算也作了同樣的吹捧。

1950年克里浦斯辭職引退的時候，資產階級報刊以最冠冕堂皇的詞句讚揚了他在財政大臣任內的“功績”。賈茲克爾當英國財政大臣時制定的1951—52年度預算，博得了資產階級報刊的一致贊許。正如“泰晤士報”所指出的，賈茲克爾發表預算演說後的第二天老倫敦交易所里便呈現出一片昇平景象。1948年2月以後，股票行市達到了頂點。“金融時報”說，交易所“認為預算是非常合理的”，“每日快報”說，“賈茲克爾採用了托里的預算”並相信他會成為“保守黨政府最好的財政大臣”。工黨“平衡收入”和“犧牲平等”的結果就是這樣。

英國共產黨為反對工黨政府的全部稅收政策進行過堅決的鬥爭，現在正在為反對本屆保守黨政府的稅收政策進行鬥爭。它經常不斷地揭露右翼工黨分子的財政政策是為了資本家的利益和反對工人階級的利益的政策。

在“英國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的綱領中，提出了未來的人民政府將在稅收方面和社會設施方面實行的措施。綱領指出，人民政府將取消社會保險基金，這筆基金將完全由人民所有的企業和人民政府來負擔。在社會保險方面，現在的補助金是微乎其微的，將來的補助金將保證領補助金者過着比現在好的生活。綱領規定要實行廣泛的措施來改善勞動者的整個保健制度。

“把現有的衛生事業擴充為一種有效率的和完備的國家醫藥服務部，並逐漸增加醫生和專家，以便給予勞動人民及其家屬，免費而有效的醫療。我們將在每一個地區建立新的醫院和療養院以及衛生站和診療所。”

綱領指出，未來的人民政府將徹底改造現有的基於階級不

平等原則的教育制度。使它成为能保証为兒童發展提供一切条件和机会的唯一完备的制度。住宅問題也將得到根本解决。

綱領指出，“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政府能够做任何其他政府所不能做的事情，解决人民的居住問題。它将立即着手建造足够使用的新房屋，把接收閒空的和半閒空的房屋給劳动人民居住，並清除貧民窟。只要把大地主的土地，对主要的收归國有，建筑企業和建筑材料企業实行監督，只要停止公債利息的支付，那末就有可能以低廉的成本建筑大量房屋，並廉价出租。”

綱領所坚持的各项措施，向劳动者展示了在消滅資本政权和确立人民民主制度的基礎上解决人民保健、社会保險、國民教育、居住条件問題的前景。共產党綱領的条文揭露了工党政府在社会保險、保健、学校和住宅方面靠加重对劳动者征稅所实行的措施的可憐的与局限的性質。

工人階級貧困化的加深，壟斷資本对工人階級的掠夺，在工党政府下（現在在保守党政府下还在加速繼續下去）不僅是通过課稅來進行的。向劳动者的生活水平進攻的另一个办法，就是在“冻结工資”的情况下，不断提高消费品价格。

三 劳动者生活水平的降低，利潤的提高，軍备競賽

在工党执行委员会 1948 年举行年会时發表的小册子“生產——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工党首領宣佈說，工党的基本目的已經达到了。收入的“平衡”竟达到这种程度，以致已不值得再談什么進一步平衡收入的問題了。由此得出一个結論：工人不应当要求提高工資，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了。

在工党首領看來，任务在於擴大生產，在於更緊張地工作。当然是为資本家工作。这不过是“冻结”工資政策的另一种說法

而已，工党政府是取得职工大会总委员会的同意从1948年2月开始执行这种政策的。在物价飛漲的情况下，“冻结”貨幣工資必然会降低工人的实际工資。这是向工人階級生活水平的進攻，同时也就是要提高資本家的利潤。

可見，工党政府採取一切措施促使並保證劳动者生活水平的降低。操縱物价成了資本向工人階級進攻的武器。

工人階級的貧困化，首先表現在整个战后时期以來物价的不断上漲。在保守党政府下的物价上漲，只不过是工党政府时經常的物价上漲的繼續而已。

根据牛津統計学院学报上面縮小了的材料，从1945—46年度到1952年5月，食品价格上涨的情况如下：油类上涨了50%，人造牛油——55%，醃肉——61%，干酪——54%，蛋类——125%，糖——50%，面粉——100%，肉类——83%，鱼类——50%，馬鈴薯——100%，面包——92%[⊖]。

与1947年的水平相比，1952年底食品价格上涨的情况如下：面包上涨了90%，肉类——35%，牛油——125%，乳类——30%，糖——133%。

物价的这种上漲是經常的，並且远远超过工資的提高。根据科学研究委员会關於劳动問題的材料，从1947年到1952年，食品价格上涨了62%。在同一时期，工資只提高了30%。

關於物价上漲和工資变动的一切材料，都証明了工人階級和全体劳动者的絕對貧困化在不断加深。物价上漲是对下級雇員，領撫恤金者特別是失業者的嚴重打击。

絕對貧困化的这个过程表現在保持几种食品——肉类、干

⊖ "Bulletin of the Oxford Univ. Institute of Statistics", VII. 1952, P. 233, 238—239.

酪、人造牛油、油类、餅干等等的配給制中。

而且，正如無數事實所証明的，工人甚至常常連配給証上面規定的那个只够半飽的份額都買不到。

關於各种食品的消費量的材料，証實了劳动者生活水平的急劇降低。國內各种肉类每週平均消費量（概數）从1934—1938年时期的41,000噸，減少到1951年的26,000噸，即減少了27%；醃肉和火腿的消費量从1938年的10,000噸減少到1951年的8,000噸，即減少了20%；肉类——从1938年的10,000噸減少到1951年的6,000噸，即減少了40%；糖——从1938年的40,000噸減少到37,000噸，即降低了10%，以及其他等等。如果估計到这一时期人口增加了200万（20%以上），那么，这些物品按人口計算的消費量就減低得更加嚴重了。在同一时期內，食品馬鈴薯的每周平均消費量从1934—1938年的63,000噸，增加到1951年的103,000噸，即增加了63%[⊖]。这种食品質量惡化的情况也是居民生活水平下降的証明。

關於英國糧食輸入量减少的材料，是保守党政府对劳动者食品進一步惡化的標誌。和1951年相比，1952年食品輸入量大大减少了。这一时期內，干酪輸入量减少了30%，油类——16%，牛肉——16%，肉品罐頭——22%，糖——11%，鮮果和蔬菜——14%。

居民的日用品購買量在不断降低。例如，和1950年相比，靴鞋的出售量減少了30%，衣服——20%，木器和家具——15%。

如果估計到糧食和工業品消費量的减少只是和劳动者有关，而資產者階層的消費量和战前水平相比並未降低，那么可以看出，劳动者的消費量比以上所举的数字降低得还要厉害。

⊖ “Monthly Digest of Statistics”, II. 1952, p. 81—85.

可以毫無疑問地認為，工人的實際工資在工黨政府時比戰前水平平均降低了約20%。現在，在保守黨政府下，工人的實際工資還在繼續下降。

工黨首領關於忍受“犧牲”的號召，代替了以前答應的工黨保證一上台執政就提高工資的諾言。

1950年9月1日，薩利斯拍利勳爵在上議院發言和自己的“尊敬的論敵”工黨勳爵們進行激烈論戰時，無意中說了真話，他宣稱：工黨政府“不得不隱瞞它的政策愈來愈成為對窮人的進攻”。這位可敬的保守黨勳爵承認了這一事實決不是因為他站在窮人方面來反對富人，而是從競選的角度着眼的。當他的政黨上台執政時，這個政權更加殘酷地向窮人進攻。

近幾年來，右翼工黨分子蠱惑人心的舊手法常常和一種新手法相結合，這就是號召人們為了履行大西洋公約，完成對盟友的義務而忍受“犧牲”。工黨首領已經不能隱瞞重整軍備的計劃在現在和將來都要靠犧牲勞動者的利益來實現了。

1951年1月末，艾德禮在下院發表演說時，在保守黨人一致贊同下宣佈說：“應當採取財政措施削減民用消費量……應當降低民用建築費”^①。在官方的“1951年經濟一瞥”和財政大臣賈茲克爾的演說中都作了同樣的聲明。

對工人階級生活水平的進攻，意味着利潤的迅速提高以及在損害工人利益和有利於壟斷資本家的條件下國民收入的重新分配，意味着工人階級絕對貧困化和相對貧困化的加深，工資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的降低。

工人忍受的犧牲愈大，資本家就愈富——這就是資產階級制度的無可改變的規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時期的特點，是

^① “Times”, 30. I. 1951.

壟斷資本家的利潤和股息不斷提高。利潤的提高從來都表明了對英國工人階級剝削的加強。

在1945—46年度內，根據官方材料，地租、利息和利潤的總額在扣除捐稅以後，至少增加了63,000萬英鎊，即超過了戰前最高水平22%。

在1947年一年內，利潤和利息（地租除外）在扣除納稅以後，就比1946年提高了24%，從1945年到1947年，純利潤提高了39%。

這是工黨政府還沒有借口“凍結”工資宣佈降低實際工資時期的材料。即使在工黨首領特別熱心地證明他們彷彿實現了“社會主義”的這兩年內，收入的重新分配也是對資本家有利的。利潤提高得比貨幣工資快，而實際工資卻落後於物價的上漲。

1948年，利潤又迅速提高了。根據“經濟學家”雜誌的材料，2,348個大公司在1948年一年內的利潤提高了29.6%，遠遠超過了物價的上漲。

資本家利潤的提高竟達到了這樣的程度，以致克利浦斯在下議院辯論1949—50年度預算時也聲言：“物價高昂的原因之一，在於最近幾年來利潤竟高得如此駭人聽聞……一年以前我曾請求（資本家——德伏爾金註）降低利潤和物價，遺憾的是很少有人這樣做。”^①對資本家，克利浦斯只提出了一些他們不屑理會的請求。但是對於工人，大家知道，工黨政府則制定了一套反對1920年罷工的特別法令。對資本家是請求，對於工人則是強迫實行“凍結工資”。

克利浦斯對於自己的聲明很快就感到後悔了。資產階級報刊立即申斥了他，使他再也不提什麼“駭人聽聞的高額利潤”了，

^① “Times”, 20. V. 1949.

虽然,大家知道,这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

但是連这种“駭人听闻的高額利潤”,在1949年、1950年和1951年,又被突破了。

1950年,在职工大会布萊頓代表大会以后,名义工資稍有提高。但是根据西尔斯的統計,名义工資的提高比利潤的提高少四分之三。工資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了,而利潤的比重却提高了。1951年,利潤又提高了許多。根据“金融时报”的材料,和1950年相比,1951年3,787个公司的利潤未扣除捐稅增加了30%,扣除捐稅以后增加了26.5%。总的說來,和1950年相比,1951年的利潤提高了25%,超过名义工資提高的一倍半。1952年,壟断組織的利潤还在繼續提高。

以下关于英國最大的壟断組織——化学托辣斯“帝國化学工業公司”的材料,証明了在工党政府执政的最后几年內壟断組織收入的提高和对工人剝削的加强:

	1949年	1950年	1951年
利潤(以百万英鎊为單位).....	17.8	31	40.1
比1949年提高多少(百分比).....	100	160	231
托辣斯企業每一从業工人一年的工資 (以英鎊为單位)	427	450	500
比1949年提高的百分比.....	100	100.5	110.7
托辣斯平均从每一从業工人身上榨取的 利潤(以英鎊为單位).....	173	300	365

可見,在兩年內名义工資提高了10.7%的情况下,利潤总額提高了131%,托辣斯从每个工人身上榨取的利潤提高了110%。

以英國最大的壟断組織(1951年在它的企業里工作的工人和雇員有11万人)为例的这些材料,表明了工党政府执政期間金融寡头的利潤提高得多么迅速,对工人的剝削的加强,

是多么駭人听闻。

在工資相对穩定的情況下（在物價上漲的條件下），利潤的提高意味着在國民收入中利潤所佔的百分比的增加以及工人和雇員的工資所佔的百分比的減少。

甚至連政府關於國民收入的“藍皮書”（它的材料顯然是隱瞞真實情況的），也只好承認國民收入中工人和雇員的收入所佔的百分比在不斷減少。根據這些材料，1951年，工人和雇員在國民收入中所佔的比重61%，資本家和地主所佔的比重（包括國外投資的收入）是39%。

加工業利潤的比重在1949年是33.9%，在1950年是35.7%，在1951年是37.6%。

工人和雇員的工資比重從1949年的66.1%，相應地降低到1950年的64.3%和1951年的62.4%。

實際上利潤的比重還要高得多，因為在工資和薪俸欄里還包括資本家階級的代表者——經理、管理人等等的收入。但即使這些材料也已無可辯駁地証明了國民收入中勞動者份額的不斷降低和資本家份額的增加，即証明了戰后英國工人階級相對貧困化的增長。

工黨“社會主義”政府保證了壟斷組織對英國工人階級剝削的加強。現在的保守黨政府也不遺余力地保證了剝削的加強。由此而來的便是資本家的大發其財，但無論是保守黨人和右翼工黨分子都以英國統治階級特有的偽善手段向羣眾盡力掩蓋這一點。

英國共產黨總書記哈里·波立特在1949年2月向共產黨中央全會所作的報告中，對資本家的奢侈生活作了生動的描寫。波立特說：“有人向我們宣佈說，對富人的限制達到了極點。我們建議隨便是誰試一試找出證明帝國主義資本家、食利者、寄生

虫的生活水平有某种降低的跡象來。这种跡象是沒有的。奢侈品商店的生意非常好，普通人們只能用眼睛望一望玻璃窗，富人們却絡繹不絕地進入商店買東西，奢侈豪華的旅館和飯店擠滿了人”。[⊖]

在1949年工党布拉克浦代表會議上，代表們指出，居民中的有產者階層过着極端奢侈的生活。工党首領保證了壟斷資本家集团的上層分子大發其財。下述材料証實了这一点。1948—49年度，佔1.5%的商業公司和工業公司獲得了全部利潤的57.8%，而1,671,000家公司只獲得了全部利潤的38%。1948—49年度，約有71万家小“商号”每年每家的收入是300英鎊，即相當於一个不太熟練工人的工資；有115万家小公司每年每家的收入在500英鎊以下。可是在1948—49年度有200家公司每家獲得的利潤却有100万英鎊以上。佔11.8%的公司獲得了全部利潤的86%。可見，極少数壟斷企業佔有了大部分利潤，而小業主，小商人和小手工業者等等則處於可憐的景況。工党政府的全部政策促使了壟斷組織的加強，使大部分利潤的重新分配有利於壟斷組織，正如現在保守党政府的政策所做的一樣。

經濟軍事化意味着成千成万的小業主和小商人遭受破產和受壟斷組織的直接剝削。經濟軍事化把他們推入無產階級的隊伍，並使他們和無產階級接近起來。

佔20%弱的成年居民佔有价值160億英鎊的財產，每一業主平均有35,000英鎊。而1600万25歲以上的人的財產却是微不足道的，每人財產价值平均不到100英鎊；佔英國成年居民絕大多數的1,600万人所擁有的財產，等於佔全國成年居民五十分

⊖ Harry Pollitt, *Communism and Labour, A Call for United Action*, London, 1949, p. 17.

之一弱的一小撮富翁的十分之一。

这就是总结工党政府活动的一些事实。工党“社会主义”无非是损害劳动者的利益，把国民收入和国民财富作有利于大资本家的重新分配罢了，工党的“平衡收入”实际上是富人和穷人，一小撮资本家和全体劳动者群众之间裂痕的加深。保守党政府正在尽力促使这一裂痕进一步加深。

* * *

1952年3月议会批准的1952—53年度保守党政府的预算，意味着劳动者赋税的进一步加重，物价上涨和军费开支增加。首先，新预算规定重新提高间接税。和工党最后的预算草案相比，关税和消费税提高了16,400英镑，等于重新提高了日用品价格。同时，直接税也提高了。而且提高税额的全部重担都落在劳动者的肩上，而不是落在富人的肩上。

军事开支重新大大增加是这个预算的特点。“国防”开支为142,600万英镑，即比1951—52年度的实际军事开支多31.5%。但这里还应当加上预算中其他项目里所包括的军事开支：军事工业补助金，建立战略后备的开支，所谓民用国防的开支和“秘密开支”。军事开支预定共为160,800万英镑，占全部开支36%以上。

此外，公债利息从51,500万英镑增加到54,000万英镑。同时，社会需要的开支却削减了。保守党政府要求各地自治局削减教育开支5%。社会保险、养老金等等的开支也减少了。大大削减粮食补助金，是对劳动者的沉重打击。粮食补助金从1951—52年度的41,000万英镑，削减到1952—53年度的25,000万英镑，即减少了16,000英镑。这种情况又加上提高间接税，结果造成了粮食和其他物品的价格的更加急速地上涨，劳动者的生活水平进一步降低。只是由于削减粮食补助金，就使面包价

格提高了22.5%，面粉——33%，肉类——20%，茶叶——15%。

除了实行这些預算措施之外，还把貼現率从2.5%提高到4%。貸款条件更加惡化的結果是，迫使利潤率本來就比壟斷資本家低得多的中小資本家，不向銀行貸款，並縮減或完全停止生產。由於國內市場縮小，供給为民用市場工作的企業的原料日益減少以及由於國外市場的縮小，本來就开始迅速增加的失業人數，这样一來，就更加嚴重了。

工党分子威尔遜在下議院的發言中說：1952—53年度的新預算，“意味着國內全部收入作这样的重新分配，就是要使窮人变得更窮，使富人变得更富。”[⊖] 在这里不妨向威尔遜提醒一下，保守党政府的預算——向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殘酷進攻和進行軍备競賽的預算——只不过是工党政府預算的進一步發展。區別只在於右翼工党分子打着虛偽的“社会主义”旗幟，而保守党人則是社会主义的公开的敌人。無論右翼工党分子和保守党人向來都是为壟斷資本的利益服务的，前者对工人羣众行动得猶豫不决，后者行动得更为兇暴殘忍。高蘭在英國共產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現在保守党人通过削減教育、保健、住宅建筑和糧食補助金的开支，正在擴大工党首領所开始的对劳动者的進攻。”[⊗]

1953—54年度預算的特点，是和平时期軍事开支的重新空前的增加。預算中的軍事开支是163,600万英鎊。加上美國的“軍事援助”共計是177,600万英鎊。在預算費用比1952—53

⊖ Parliamentary Debates (Hansard) House of Commons Official Report, 13. III. 1952, p. 1623.

⊗ “Daily Worker”, 14. IV. 1952.

年度普遍增加 10,800 万英鎊的情況下,民用需要的開支削減了 6,000 万英鎊。1953—54 年度的軍事開支和償付公債利息的開支加在一起佔全部預算開支的 52% 以上。同時,從 1954 年 1 月開始,取消了壟斷組織的超額利潤稅,並削減了富人的其他幾種賦稅。可見,新預算表明了壟斷組織對勞動者的進一步進攻。

正如 1953 年 4 月 14 日“工人日報”所寫的,“這是財政部最近幾年來提出的最可恥的階級的預算”。

英國共產黨動員工人羣眾一致行動,和壟斷組織、保守黨政府的進攻及其預算政策作鬥爭。共產黨同時還揭露了工黨右翼首領在預算問題上的政策。

第六章

工党分子与殖民主义

一 右翼工党分子的殖民主义思想

在殖民地問題上，工党政府也和其他問題上一样热心地为英國金融寡头服务的。工党政府的政策是以挽救大英帝國、殖民地剝削体系本身为目的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英帝國主义在其廣大的殖民帝國中的地位遭到了破坏。在亞洲，英國这个在世界上佔有殖民地最多的國家，竟沒有力量和日本侵略势力抗衡，不能在緬甸、馬來亞保持自己的殖民地。与自己的殖民地暫時隔絕的英國，依賴着美國的工業和糧食的供应。自从苏联軍隊击潰日本帝國主义以后，英帝國主义在自己的殖民地國家中面臨着完全不同的情况。許多亞洲的殖民地在大战时期建立了民族解放的軍隊，它們和日本佔領者進行了奋不顧身的斗争。

当旧的殖民主代替日本侵略者的时候，殖民地和附屬國的人民加紧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被压迫的人民对压迫和扼殺他們的帝國主义的仇恨、擺脫殖民地剝削的决心促使他們的民族解放斗争大大地高漲。

从十八世紀末叶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时起，英國資本主义总是充当人民革命和人民解放运动的劊子手。

現在，人民革命的大劊子手是美帝國主义。英帝國主义充当它的“小伙計”的角色。

1946年—1951年英國資產階級企圖用工黨的首領們的双手去鎮壓反對帝國主義統治的民族解放運動，正像1951年以後他們企圖用保守黨的双手去鎮壓民族解放運動一樣。

右翼工黨分子並沒有忘掉利用英帝國主義通過工黨政府破壞民族解放運動所採用的手段去欺騙羣眾。他們把自己的殖民地政策說成自己政黨的“最偉大的成就”，說成“體現民主社會主義的理想”。

右翼工黨分子特別讚揚自己對待印度、巴基斯坦和緬甸的措施。

帝國主義者已經不能照舊統治殖民地了。事實上殖民制度正在崩潰。英帝國主義的企圖，像法帝國主義和荷蘭帝國主義一樣，遭到殖民地人民日益增長的武裝的反抗。

斯大林在自己的著作“十月革命的國際性質”中寫道：

“無產階級不解放被壓迫民族就不能解放自己。十月革命的特點就是它在蘇聯進行的這種民族殖民地革命不是以各民族仇視和各民族衝突為旗幟，而是以蘇聯各民族工人農民互相信任和親密團結為旗幟，不是為了民族主義，而是為了國際主義。

正因為我國的民族殖民地革命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和在國際主義旗幟下進行的，所以向來被蔑視的民族、被奴役的民族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升到了真正自由和真正平等的民族的地位，並以自己的榜樣來鼓舞全世界一切被壓迫的民族[⊖]。”

蘇聯社會主義社會的建成，加盟共和國和自治共和國的國民經濟和文化的不斷地高漲，從來都是與帝國主義的壓迫、剝削和殖民地的貧困成為鮮明的對照。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關於中央政治工作的總結報告中說道：“我們不需

⊖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06頁，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要在東方各國進行任何專門宣傳，因為我們知道，我們全部國家制度都建立在我國所有各族人民彼此和睦共處和兄弟合作的基礎上。到我國來住過一年半載的每一個中國人，每一個埃及人，每一個印度人，都有可能確信到，我國是唯一的這樣一個國家，它了解被壓迫各族人民底心思，善於調整從前統治民族中的無產者與從前被壓迫民族中的無產者彼此合作的关系。”^①

蘇聯各族人民的經濟和文化的強有力的高漲，對殖民地和附屬國的人民過去和現在都有巨大的影響。社會主義國家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人民的巨大影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過程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強有力地表現出來了。

蘇聯軍隊戰勝德國法西斯主義和日本帝國主義的結果，使亞洲人民從日本佔領下解放出來，同時民族解放鬥爭強力的高漲，使帝國主義在亞洲統治的制度本身的存在受到威脅。

在亞洲的許多國家內，曾經領導人民羣眾反對日本的佔領而鬥爭的共產黨的作用擴大了。自從日本帝國主義的冒險行動遭到破產和從前的法、英、荷蘭壓迫者回到印度支那、馬來亞、緬甸、印度尼西亞以後，這些國家的工人階級領導了反對帝國主義統治的鬥爭。

由於在戰後進一步發展的过程中，中國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取得了勝利，帝國主義者的處境更加困難了。世界上這個人口最多的國家中，人民革命的勝利給殖民統治以新的、按意義來說是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後第二次嚴重的打擊。

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空前有力地燃起了反帝的民族解放戰爭的火焰的時候，當帝國主義統治亞洲的一切基礎開始崩潰的

① 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關於中央政治工作的總結報告”第32—33頁，莫斯科外國書籍出版局1952年版。

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右翼工党分子的目的是要挽救和巩固大英帝國。

从英帝國主义的觀點看来,工党的首領們完全扮演了英帝國主义統治的拯救者的角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第一个和第二个工党政府在印度和在英國殖民統治的其他区域内残酷鎮压民族解放运动是不下於保守党政府的。

英國統治階級根据經驗知道,右翼工党像和麥克唐納政府一样决心保衛帝國主义的利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右翼工党分子和保守党人联合的时候完全証实了这一点。

英國壟斷資本家並沒有因为工党的首領們自称社会主义者和宣佈实行“社会主义的殖民政策”的意圖而感到不安。

工党的領導者始終不渝地保衛和宣傳帝國主义的思想体系。工党的上層分子从来都是完全站在英帝國主义的立場上的。从壟斷資本家的巨大利潤中分到一筆小錢的工人貴族、在兩次世界大战之間充滿了地方党組織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衷心願意保持帝國主义的剝削的。因此他們宣傳維持和加强大英帝國,从工党的1918年的綱領开始,在工党的所有綱領中都宣傳了这一点。对英帝國主义的工党辯护者來說,旧費边派關於这些問題的著作乃是信仰的象征。1907年出版的麥克唐納的小冊子“工人階級和帝國”是工党上層分子的指南。在这本小冊子中麥克唐納說道,帝國的存在和殖民地服从英帝國主义的統治不僅是很自然的,而且也是絕對必要的。他为了用大英帝國的沙文主义的烏烟瘴气麻醉工人,在自己的小冊子中宣佈,英國是而且应当是“不發達的民族的保護人和導師”。“保護权”和“領導不文明的民族”實質上是从虛構的英國人比“有色人种”优越中得出來的。这种理論的帝國主义實質並不因为工党思想家加上一点關於保護人民福利的吹噓而有絲毫的

改变。

右翼工党分子为压迫各民族的制度所作的辩护，在他們的臆造中暴露出來了，他們說，在自然界似乎沒有帝國主义，並且在大英帝國內似乎沒有剝削者。追隨韓德遜和麥克唐納之后的摩里遜、克里契·琼斯、里塔·辛登和其他的工党思想家宣称：一般說來，資本主义的帝國主义乃是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的命运。1949年和1950年的工党的綱領为了試圖欺騙殖民地人民和英國工人，也宣称“老牌帝國主义”已經死亡了。

但是他們是怎樣顛倒黑白的呢？怎样把英國壟斷組織、英國的武裝部隊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帝國主义暴力和統治，英國的影响說成“不存在”的呢？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右翼工党分子採取公开捏造的手段。

例如，里塔·辛登規定了这样的帝國主义的“定义”，从中閹割它的本質。对殖民地人民進行剝削和無情的掠夺、統治殖民地、向落后國輸出资本、壟斷夺取原料來源和銷售市場——所有这些構成殖民地統治的內容和基礎的东西，都被說成和帝國主义沒有絲毫关系的。在这里里塔·辛登的“定义”是典型的，根据这个定义，帝國主义“乃是有强大力量的民族不用協議、而用強力和影响对弱小民族的統治”[⊖]。於是她接着就急忙补充說，因此英帝國主义在很久以前已經不存在了。

这是我們老早都領教过的手段了。資本主义已經按照上帝的意志和右翼工党分子的願望消失了，他們說，代替它的是“民主的社会主义”，即介乎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間的东西。右翼工党分子就是这样把英帝國主义廢除了，他們簡單地說英帝國主义不存在了。英帝國主义对五億以上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人們的統治說成是“共產党人的臆造”。靠殘酷剝削被奴役的人

⊖ Rita Hinden, *Empire and After*, London 1949, p. 9.

民的大英帝國本身，在工黨的綱領中和在工黨首領的著作中說成是“聯合國的縮影”。右翼工黨分子和頭號帝國主義者——保守黨黨員一起並追隨他們之後，把大英帝國說成“各民族的不列顛的合作”，現在的工黨首領艾德禮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就宣稱，在大英帝國，“它的各個組成部分的互助和合作是以各種不同的形式發展着的”。維持和鞏固英國的殖民地的剝削制度說成是工黨的最重要的任務。例如，英國殖民者詭辯說，对被壓迫和被剝削的各族人民的統治和暴行的關係已經消失，而英國殖民者變成了關心“互助和合作”、頌揚宗主國和它的殖民地以及半殖民地國家之間的平等的人們。右翼工黨分子用這種臆造來掩蓋對亞洲、非洲各民族的最粗暴的和最殘酷的壓迫和剝削。工黨政府在執政時期通過發動殖民地戰爭（在馬來亞、緬甸等國）以及對那些奮起反對英國的統治以及英國在亞洲和非洲剝削者的人民羣眾實行鎮壓來維護大英帝國的虛假的“平等”和“民族合作”。

維護英國在殖民地的統治的工黨分子，除了玩弄一些社會主義的詞句以外，和公開宣揚資產階級民主的鬼話的那些帝國主義分子，從來都是沒有絲毫區別的，這種鬼話是掩蓋財政資本時代特有的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小撮人對地球上大多數居民進行殖民地的和財政的奴役的。

工黨思想家對大英帝國用虛假的“民族合作”加以頌揚和保護，他們千方百計地掩蓋帝國主義對殖民地各族人民的奴役。二十世紀的頭幾年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的“費邊派帝國主義”，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發展過程中發展為“工黨的帝國主義”，即發展成為替大英帝國主義統治作辯護的思想，這種辯護是用英帝國主義已經消失和英國奴隸主跟殖民地的奴隸“平等”的騙人詞句掩蓋着的。

工黨的綱領中關於殖民地問題的章節滲透着對維持和加強英帝國主義的關切。在這些章節中，也像工黨關於殖民地問題的一切著作一樣，宣揚“傳播文明的使命”和“英國殖民地的行政機關的成就”，掩蓋殖民地和附屬國人民的利益跟英帝國主義者的利益的矛盾，從而為英帝國主義掠奪和剝削這些人民作辯護。

工黨在這些綱領中答應給各殖民地人民的東西，從1918年的第一個綱領起到1945年的綱領為止，可歸結為這樣一個概念：“在大英帝國內自治”，意思就是說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絕對服從英國壟斷資本家。

工黨首領艾德禮在他的1937年出版和1949年再版的“工黨的前途”一書中說道，大英帝國的大部分國家“還不準備實行自治，英國政府應當是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保護人’”。由此可見，工黨的首領公開保衛英帝國主義者對各殖民地人民進行剝削的權利。

最瘋狂的帝國主義者為了欺騙各殖民地和附屬國的人民，擁護“自治”的口號。帝國主義者和追隨在他們之後的右翼工黨分子，答應各殖民地實行“自治”，目的是為了阻止各殖民地的人民為爭取自己國家的獨立、消滅帝國主義統治而進行的鬥爭。

工黨的思想體系在殖民地問題上從來都是帝國主義的思想體系的一種形式。同時根據不同情況，或者贊揚“英聯邦”，把帝國主義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人民的剝削和奴役說成是不存在的，或者千方百計證明這是“文明”和“各殖民地人民本身”的利益所必需的。剝削階級的鬼話說：分裂為富人和窮人以及富人对窮人的剝削，是為窮人本身的利益所需要的，這種鬼話在工黨的思想家的著作中復活了，並且竭力證明它是適用於殖民地的，把它解釋成這樣：沒有剝削、沒有英國的“保護”和“關照”，各殖民地和附屬國的人民就不能生存，一定會由於“無政府狀態”和“無

組織”而遭滅亡。

这种虛構並不是新的。歐洲各資本主义國家的統治階級为了不讓工人階級夺取政权，总是採用这种虛構。这种虛構很早就被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國家的社会主义建設的實踐、被中國、越南、朝鮮人民政府的活動駁倒了。正是这些國家的人民擺脫帝國主义統治而取得的勝利，將在殖民地和附屬國內結束生產力遭到毫無意义的破坏，避免人們遭到屠殺。正如歷史的經驗証明，消滅外國壟斷資本家的剝削、根除帝國主义的統治为各解放了的國家大大提高生產力开辟了道路。工党關於各殖民地和附屬國的劳动者沒有帝國主义者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的論調，現在已經被擺脫帝國主义統治的各族人民的巨大成就駁倒了。

二 工党政府的殖民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制度的危机的尖銳化，各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空前高漲，迫使英帝國主义者改变策略，以便挽救帝國主义在各殖民地人民打击下遭到破產。正如威廉斯在“三重号召”中承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以后，亞洲形势發展到要“掀起那种憤怒的大風暴，使英联邦破產”。面臨着足以使不列顛殖民統治破產的反对帝國主义压迫的人民解放斗争的浪潮，工党政府採取了各种手腕。这些手腕的内容就是和各殖民地的反动势力、資產階級的反动的上層分子、地主、王公勾結起來，以便挽救英帝國主义統治制度。

在滅亡的威脅面前，英帝國主义借工党的首領們的手改变了自已統治形式，以便保持和掩盖这种統治。

列寧給各國共產党指出必須“……在一切特別落后國度最廣大的劳动羣众中間，不屈不撓地解釋和揭露帝國主义列强所系統地進行的欺騙，因为帝國主义列强托言創立政治上独立的

國家，而創立了在經濟上、財政上和軍事上完全依賴於它們的國家……”^①。

正像我們在上面看到的，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為止，英國在國外的投資大大減少了。工黨政府在各殖民地的首要目的是：幫助加緊資本輸出，促進提高各殖民地公司的利潤和股息，要各殖民地為軍備競賽服務。政府的四年綱領的基本內容正是這樣的，它預定在殖民地獲得更多的原料和提高國外投資的利潤。按照“四年計劃”，規定“前所未有的收入”由1948—49年度3,500萬英鎊達到1952—53年度的26,300萬英鎊。這個綱領就是靠各殖民地人民出錢保證英國壟斷組織得到最大限度的利潤的綱領。

工黨政府用什麼方法實現這些目的呢？

要達到這個目的，第一，實行國家壟斷制度，它的目的是幫助私人壟斷組織提高利潤和增加生產以及獲得原料。

1948年成立了混合的（私人的和國家的）“殖民開發公司”，根據議會法，它得到撥款12,000萬英鎊，而且有权得到貸款11,000萬英鎊。這個公司的任務是建築港口、公路和鐵路，目的是向殖民地壟斷組織保證更有利的條件輸出原料和更好地開拓殖民地。公司組織法規定依靠加強對殖民地人民的抽稅還有額外投資6,800萬英鎊。這都是要在十年內化費的。這個公司的最重要的任務是準備軍事基地。除此之外，成立了“糧食公司”，它的目的是發展各殖民地的原料的生產。這一公司的資本有5,500萬英鎊。

正像國有化企業的同業聯合公司一樣，殖民開發公司和糧食公司都是壟斷資本家直接領導的。例如，領導殖民開發公司

^① 列寧著“論民族殖民地問題”第22頁，1949年解放社版。

的是特烈弗里漢勳公爵，他同時又是最大的烟草托辣斯的和另外十幾個壟斷組織的經理。他是英國金融寡頭的最大的代表之一。這個公司的經理是投資托辣斯的原來的經理休姆以及其他壟斷資本家。

在工黨政府執政時期，國家關心的是加強剝削各殖民地的人民。它直接投資到道路、港口、灌溉工程，目的是保證提高利潤和加強剝削殖民地的居民。

工黨分子的另一種措施是建立所謂銷售管理局(Marketing Boards)，它是由殖民地壟斷組織的官吏和代表組成的。管理局的任務是銷售一定部門的產品。右翼工黨分子，像里塔·辛登一樣，說銷售管理局“結束了殖民地剝削的舊形式”。而事實上，這種官辦的銷售管理局不外是收購和銷售的壟斷組織，它的目的是決定“統一的收購價格”。作為壟斷資本家和英國糧食部的機關的非洲西部可可銷售管理局，就是這種卡特爾的典型例子。糧食部和私人壟斷組織通過銷售管理局按強制的價格向農民收購可可（從殖民地黃金海岸輸出的可可佔全世界可可輸出額50%）和其他商品，這種價格比在其他國家里同一種商品的價格要低得多。

根據“泰晤士報”（1951年3月12日）的材料，銷售管理局在1947—48年度內收購了英屬殖民地黃金海岸全部可可2,000萬英鎊，賣了5,600萬英鎊，它得到的利潤是3,600萬英鎊。1949—50年度內收購可可3,100萬英鎊，賣了6,200萬英鎊，利潤是3,100萬英鎊。正如“泰晤士報”所指出的，1951年預定收購可可4,500萬英鎊，可賣得9,000萬英鎊。

可見，銷售管理局是國家資本主義和私人的壟斷組織，它按極低的價格收購農民——生產者的原料使他們破產，剝削他們。這些壟斷組織既保證私人壟斷組織又保證帝國主義國家

特別高額的利潤。同時國家因掠奪農民所得到的利潤，重新又以建築道路、港口等等形式使私人壟斷組織獲得利益。

工黨政府盡一切力量去提高殖民地壟斷組織的利潤。在工黨統治期間，殖民地壟斷組織的利潤不斷增長。這裡舉幾個例子。1948年12月至1950年6月期間，在南非洲開採金礦和煤礦的卡菲爾集團公司的股息提高了40—60%。1948—49年度，在北羅得西亞開採銅礦的穆富利爾公司得到的股息大大提高了，它比1946—47年度提高了42.5%。

由於美國和英國的經濟的軍國主義化以及加強軍備競賽的結果，英國在各殖民地的各壟斷組織的利潤增長得特別迅速。1950年和1951年初，橡膠價格幾乎增加兩倍，錫和皮毛價格增加一倍多，其他原料的劇烈漲價，使錫、橡膠、石油、皮毛等等殖民壟斷組織的利潤大大增加。由於軍事—通貨膨脹的局面，賺錢最多的正是那些原料的壟斷組織。

尤尼萊佛最大的壟斷組織的利潤從1949年的4,310萬英鎊到1951年增加為6,910萬英鎊，即增加60%。根據“金融時報”（1951年5月8日和18日）的材料，倫敦的亞洲橡膠公司的純利潤從1949年的26萬英鎊到1950年增加為1,239,000英鎊，即幾乎增加四倍。1949年得到股息61,000英鎊，1950年得到269,000英鎊，即增加三倍半以上。

軍備競賽和美國政府收購戰略原料，引起了錫和橡膠價格的迅速上漲以及錫和橡膠壟斷組織的利潤空前增加。根據1951年6月19日“財政金融時報”的材料，馬來亞的154家橡膠公司的利潤一年內比前一年增加兩倍多。

1951年最大的鄧祿普橡膠公司得到利潤1,400萬英鎊，和1949年的利潤630萬英鎊相比增加了122%。

資本1,590萬英鎊的25個開採錫礦的股份公司1950年得

到利潤 840 万英鎊，1951 年得到利潤 1,230 万英鎊，即一年內利潤几乎增長了一半。1950—51 年度这 25 个公司得到的利潤等於投資額 52%，1951—52 年得到利潤等於投資額 80%。但是这些驚人的利潤也比不上这个名單里面的“南馬來亞錫礦開採公司”所得的利潤，这个公司在一年內的利潤增長了一倍多，1952 年得到的利潤几乎等於投資額 300%，或者像“培恩联合公司”一年內的利潤增長兩倍，1951 年得到的利潤等於投資額 260%。上述 25 个公司中有 4 个公司在 1951 年得到 100% 以上的股息，5 个公司得到的股息由 75% 增加到 90%，6 个公司得到的股息由 40% 增加到 65%[⊖]。“泰晤士報”这样描寫馬來亞“橡膠和錫的新聞”，特别是从美國开始干涉朝鮮以后，馬來亞已經成了“迅速發財致富的天堂”。

工党分子的“社会主义的”殖民政策和軍备競賽的結果就是这样的。結果是在加緊剝削殖民地居民和使他們進一步貧困化的条件下獲得驚人的利潤。事实表明，在一切英屬的非洲和亞洲的殖民地國家內，工人的实际工資比本來極端低微的战前水平还要低。

这种日益貧困化的結果就是使印度和其他英屬領地几百万人因飢餓而死亡。英帝國主義者也像其他殖民地國家的帝國主義者一样，力圖利用靠加緊剝削殖民地得到的巨大利潤去补偿經濟的軍國主義化和美國的擴張加在他們身上的重担。

現在我們对前工党殖民大臣克里契·瓊斯在聯合國第一屆大会上的声明作出真实的評價，他說“英國对殖民地的关系單純是为殖民地人民服务”。这是騙人的鬼話，事情再清楚沒有了，正是在 1946 年，工党政府在制定加緊剝削殖民地人民的办法，

⊖ 參閱“Labour Research”雜誌，X，1952，p. 150，

並竭力在以后几年內实行这些办法。

在以后几年中，工党政府在榨取原料和加緊剝削殖民地劳动羣众方面的办法愈多，工党的首領們就愈加虛假地声明英國遭受最嚴重的牺牲。例如，里塔·辛登硬說，为了开发殖民地“从納稅人的口袋得來的一大筆款額”都化費掉了[⊖]。威廉斯吹噓彷彿由英國出錢实行开发殖民地的綱領是“沒有先例”的。1950年的工党綱領也宣称，“英國建立各殖民地的資源和建立各民族的友好合作，目的是要帮助东南亞的各族人民。”从而工党的首領們宣称，似乎不是英國剝削殖民地，几百年來从殖民地榨取脂膏使它奄奄一息，而是恰恰相反，殖民地榨取“窮苦的英國”的脂膏。

但是關於“英國为殖民地服务”也不是新的論調。这只不过是工党重复了帝國主义關於“白种人的負担”的傳統說法而已，說白种人負着“重大的責任”，关心各殖民地人民的“文明”。

右翼工党分子宣称，他們通过英國对自己的殖民地領地的“援助”去关心提高殖民地的生產力。

大吹大擂的“寬宏大量的援助殖民地”的口号，把壟断組織加緊掠奪殖民地和附屬國人民的龐大計劃掩盖起來了。

右翼工党分子把殖民地國家中“發展教育”的办法說成“仁慈的”办法之一。但一旦接触到实际数字，他們就啞口無言，这些数字是少得多么可憐呀！前殖民大臣曾引用帝國內一切國家的大学生在倫敦學習的人数作为工党的“偉大成就”，这就是：五億殖民地人口中有 3,000 大学生，这些人照例都是殖民地的王公、地主和大資產階級的子弟，他們受的教育是卑躬屈節地为英帝國主义服务。前工党政府关心提高殖民地居民的教育水平就

⊖ Rita Hinden, *Empire and After*, London 1949, p. 157.

是这样的。即使在本國有特权地位的大学生，感到自己在倫敦的地位却是黑人在美國的地位，这还用多說嗎？这可以讀讀登載在1950年12月1日的“旁觀者”周刊上一位倫敦的大学生的來信。这位大学生說，他的非洲朋友們害怕走到街上去，那里会遭到意想不到的嘲弄和侮辱。

在各殖民地里的文盲，在黃金海岸佔居民80%，在斯威士蘭佔居民78%，尼亞薩蘭有94%，索馬里蘭有99%。而且在這些國家里，認為既不会唸，又不会寫，只能簽自己的姓名的人就是識字的人。

在英屬殖民地領土內，在非洲拥有3,600万人口的坦噶尼喀，总共有三个中学，而且这些学校都是專为白人开办的，沒有一所高等学校。1949年在北罗得西亞教育一个非洲学生的費用等於教育一个欧洲学生的費用的二十四分之一，在烏干达等於三十分之一，在尼亞薩蘭等於八十分之一。1949年——正是工党对殖民地的慈善事業运动搞得热烈的時候——在坦噶尼喀非洲教师的工資等於欧洲教师的工資的十分之一。在英屬非洲的各殖民地國家里，情况就是这样的。

事实上，工党政府正像它执政前后的保守党政府一样，竭力阻碍各殖民地的本籍居民受到教育，阻碍从他們当中提拔教員和其他熟練職業的人。

医療設施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缺乏医療救助、不衛生的生活条件、居民的極端貧困决定兒童死亡率特別高，决定各种疾病的廣泛傳染。由於这样，英屬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平均寿命是很低的。这样，我們就可以对克里契·瓊斯1950年9月15日在工党的“論壇”双周刊上所做的以下的声明作出恰如其分的評价：“有些殖民地可憐到这种程度，甚至於它們要过長久時間才能得到初等教育或起碼的医療設施，如果一般說來，这总

有一个时候是可能得到的”(重点是我加的——德伏尔金)。右翼工党分子“关怀”各殖民地人民的“繁荣”的真正代价，就是这样的，这种关怀像保守党人的“关怀”一样。

像克里契·瓊斯、格里菲兹之流的工党思想家把印度、巴基斯坦、西印度、非洲等國內的生殖率的增長，說成是提高这些國家的生活水平的主要障碍。正是这些新馬尔薩斯主义的前提，成了工党政府通过殖民地的“開發計劃”特别是“科倫坡計劃”的基礎。

新馬尔薩斯主义很早就成了帝國主义資產階級的最反动集团手中的思想武器，它的目的是証明帝國主义的統治是合理的。現在美國和英國的新馬尔薩斯主义者，頌揚落后國家的瘟疫，公开号召組織流血战争來减少落后國家的人口。由此可見，工党的首領們和帝國主义思想体系的新馬尔薩斯主义的代表是一鼻孔出气的。

右翼工党分子利用新馬尔薩斯主义，正像一切英帝國主义者一样，是为了轉移殖民地和附屬國人民的注意力要他們不去注意災難的真正原因——帝國主义的压迫和剝削。为了这个目的，除了關於人口的增長是殖民地貧困和災難的主要原因的論調以外，还提出了其他的論調。例如，在“工党黨員相信英國”的綱領中宣称，殖民地的貧困“主要是由於气候条件、瘟疫、風災等等因素”。英國壟斷組織的工党代理人，准备把被他們剝削的人民的貧困和可怕的災難隨意加到自然条件和上帝以及魔鬼上面去，只是为了隱藏和掩盖各殖民地人民的苦难的真正原因。他們故意要掩盖这个事实：各殖民地國家中的風災、瘟疫和其他災難正是由帝國主义者在殖民地的整个統治制度、使土地貧瘠的連作制、不允許这些國家工業化和殘酷的剝削產生的。

工党的政策是对殖民地大力吹噓各种“計劃”——十年計

划、六年計劃等等。这些“計劃”沒有絲毫现实意义，它像工党在本國的“計劃”那样，是一堆憑空想出來的数字。这些“計劃”沒有任何根据，数字完全是任意造出來的，为什么造出这些数字而不是别的数字呢？工党的官吏們既沒有做任何解釋，而且也不可能做出什么解釋。制定这些“計劃”乃是对羣众進行霧惑宣傳和欺騙，企圖“証明”工党政府似乎关心各殖民地的福利和它們的經濟水平的提高。

但是工党分子制定的大吹大擂的“殖民開發計劃”，只是停留在1950年制定的“科倫坡計劃”上。为了制定这个計劃，成立了專門的代表會議。这个“計劃”除去揭露了制定者的意圖以外，还揭露他們对待殖民地的真正意圖。

“科倫坡計劃”是为南亞和东南亞的國家制定的，它被說成是“对貧困的進攻”，而最主要的是用來作为和亞洲的進步和民主的力量進行斗争的手段。后面的一句揭露了發起人的真正陰謀——欺騙亞洲人民並把事情說成彷彿英國关心他們的“福利”，因此他們不应当走解放斗争的道路。

“計劃”（包括印度、巴基斯坦、錫蘭、馬來亞和英屬婆罗洲在內）規定，从投資總額186,800万英鎊中，大部分用在農業和建筑战略道路上，僅僅10%用在加工工業和採礦工業上。換句話說，英帝國主義像从前那样地首先关心的是：要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保持現在的落后狀況。至於說到对採礦工業的投資，那末投資的目的是对英國和美國保證增加原料的開採，首先是保證增加战略原料的開採。同时竭力掩盖这种基本事实：这些國家的真正的提高只有实行工業化和建立重工業的途徑才能达到。但是英帝國主義者最害怕正是在这些國家內建立重工業。

其次，六年的“科倫坡計劃”公开承認，並沒有預期这些國家的居民的生活水平有絲毫提高。不僅这样，而且“計劃”的出發

点是到 1957 年由於“人口增長”的結果一定降低生活水平。

右翼工党的首領們又企圖把英帝國主義統治的結果推卸到人口的增長上去。

後來發現，英國在實現“計劃”給殖民地的唯一“援助”，是給 24,600 萬英鎊即英國欠殖民地的負債銷了賬，這筆款項还不到欠“科倫坡計劃”國家債款的一半，英帝國主義把這筆負債變成更加加緊剝削殖民地的工具。當然，這並沒有妨害英國壟斷資本家在六年之內從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利潤和投資的股息一項榨取十億以上的英鎊。

同時“計劃”規定美國可以在這些國家大量投資，從而這也揭穿工黨計劃制定人乃是美國壟斷資本的幫兇。

“科倫坡計劃”乃是殖民地人民的敵人的計劃，乃是帝國主義剝削和奴役的保衛者的計劃。

在那些殖民地裡，在反動分子（可以和他們達成協議的）很軟弱而民族解放運動規模特別大的地方，右翼工黨分子所表現的殘忍性，跟“老牌”帝國主義者的野蠻行為沒有絲毫區別，即使有區別的話，也僅僅是用新的現代的技術屠殺人民。

正是工黨政府發動了反對馬來亞人民的戰爭，馬來亞戰爭是從 1948 年 6 月開始的。保守黨的議員在下議院有充分根據說，保守黨政府在馬來亞只不過是繼續工黨政府發動的戰爭。

通過工黨政府進行活動的英國資產階級，進行反對馬來亞人民的公開的戰爭，這並不是偶然的。首先工黨政府在國內找不到它能依靠的並能通過它進行活動的比較有力量的反動集團。英帝國主義指望迅速制服 600 萬馬來亞人民和在這殖民地裡保持對工人的沒有任何限制的殖民剝削。為了這個目的，團結了 90% 工人的馬來亞工會聯合會被破壞了。聯合會的領袖們遭到了血腥的鎮壓。

工党政府在馬來亞發動和進行战争是为了英國壟斷組織的利益。1947年至1951年馬來亞对英國的支付逆差付出的美元几乎相当於英國的整个对外貿易，甚至有几年超过了英國的整个对外貿易。例如，1947年英國壟斷資本家只是出賣錫和橡膠就有34,600万美元，也就是說較之1947年內英國向美國輸出总数超过16,600万美元。威廉·加拉赫寫道：“英國（工党的）政府在馬來亞進行的战争既不是为了英國人民的利益，也不是为了馬來亞人民的利益。这个战争的進行是为了橡膠園主和錫礦礦主的利潤，为了更好地保證美國得到廉价的橡膠和錫。”^①

在非洲，工党政府採用殘暴的恐怖手段的办法，以便鎮壓人民羣众爭取自己的权利的斗争的任何嘗試。在殖民地黃金海岸，1948年3月英國軍隊向遊行示威的工人開槍射擊，打死14人，負傷140人。在尼日利亞的厄努格，1949年11月工党政府的警察向遊行示威的礦工開槍射擊，打死21人，負傷53人。

1952年保守党政府对怯尼亞解放运动採取鎮壓手段，保守党政府逮捕了和槍殺了這英屬殖民地的數千黑人。为了要跟合法的黑人的組織進行斗争，在现有的限制办法之外补充了对黑人迁移的限制办法。种族的壓迫和殖民鎮壓达到了空前規模。对遊行示威的黑人開槍射擊。

在南非联邦，馬蘭政府实行同样的种族主义恐怖手段的制度，把黑人驅逐到特定住区，並規定了到区域以外去的通行証法（有15种通行証）。工党政府公开保衛馬蘭的种族主义制度。工党政府的代表在聯合國反对討論馬蘭政府对当地居民野蛮鎮壓的政策，他們虛假地借口說，这是南非联邦的“內政”。所有这些对殖民地居民的鎮壓在原則上和工党政府的鎮壓沒有絲毫区

① 加拉赫著“像獅子一样站起來”第235頁，1954年世界知識社版。

別。艾德禮在“每日先驅報”(1952年3月3日)上的証明不是偶然的,他說,保守黨人是繼續工黨政府的殖民政策,並希望它們今后繼續執行這個政策。

1951年夏天在英屬西印度,組織總罷工的糖業種植場的工人和工業工人遭到了血腥的鎮壓。右翼工黨分子不僅原封不動地保留了对殖民地和附屬國人民的剝削,而且還竭力加緊這種剝削。英帝國主義利用工黨政府提供殖民地的原料富源為軍備競賽服務。右翼工黨分子從來都是熱心關懷保證本國壟斷資本家的高額利潤。

為了鞏固英帝國主義在殖民地的統治,工黨的首領們派遣一批工會官僚去“幫助”殖民地的官僚,和以往的虛假的手段一樣說成是對殖民地人民的“關懷”。

工黨政府的殖民政策,正像現在保守黨政府的殖民政策一樣,是為了竭力加緊剝削非洲殖民地。

無論工黨分子和保守黨人都主張必須開發非洲大陸,認為非洲是英國的“第三帝國”[⊖]。

像保守黨人那樣,右翼工黨分子打算把英國殖民實力中心轉移到非洲殖民地去。英帝國主義者打算在這些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跟亞洲人民的民族解放鬥爭比較起來,是相對的薄弱的非洲的殖民地裡得到對亞洲殖民地作戰的砲灰(英國殖民地軍隊中三分之一以上是非洲人)。

工黨政府加緊制定了關於開發非洲殖民地資源的辦法,其目的在於從非洲大陸得到大量原料,因為亞洲人民的民族解放

⊖ 他們把十七至十八世紀英國在美洲的殖民地稱為第一帝國,它在十八世紀末叶北美獨立戰爭以後失掉了;印度被認為是英國的第二帝國,在兩個世紀期間曾經是英國實力的基礎。

运动威脅英帝國主义从“老”殖民地得到原料資源。

這在美國和英國的壟斷資本家的心目中有着特別的意义，他們把非洲看成是軍事战略基地。

这种軍事战略的觀點說明为什么工党政府在大英帝國的非洲殖民地內積極建設道路、橋樑、港口，这决不妨害右翼工党分子把准备战略基地的措施冒充为黄金海岸、坦噶尼喀、尼亞薩蘭和大英帝國在非洲的其他殖民地內“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手段”。当工党政府执政时在非洲殖民地內投資的增長是为了英國壟斷資本的利益，僅僅是为了这种利益。而工党的首領們把这种步驟冒充“社会主义的”步驟的意圖，是他們常常欺騙羣众的慣用的手段。保守党政府也加緊繼續实行这些“社会主义的”办法。

工党政府在近东的政策也是为英帝國主义的利益和准备战略基地服务的。前工党政府外交大臣貝文和摩里遜經常說，近东是大英帝國的支柱。在近东区域內駐紮着四分之一以上的英國武裝部隊。他們在似乎独立的而事实上在經濟上和政治上依賴的國家中，保衛着英國石油壟斷組織的利益和英帝國主义的战略的利益。

当伊朗的議会在强烈的人民运动的压力下通过英伊石油公司國有化的法律的时候，工党政府动用了恐嚇、强大的压力、公开威脅的一切手段，派遣英國軍艦馳入波斯灣。工党政府坚定不移地保衛英伊石油公司的巨大利潤。这个公司的大部分股票是屬於英國政府的，根据“劳工研究”的材料，这个公司的固定資本2,000万英鎊。从1940年至1946年英伊石油公司得到利潤6,780万英鎊，即为固定資本的370%，並付出122%的股息。在三年之內（1948—1950年）英伊石油公司得到利潤24,300万英鎊，即平均每年为固定資本的400%。1950年英伊石油公司的

利潤是11,500萬英鎊，其中只有1,600萬英鎊歸伊朗政府，英國政府以納稅的形式得到了5,000萬以上的英鎊，股息支付了3,300萬英鎊，余款作為準備金。1950年全部利潤幾乎等於固定資本的600%，股息是165%。可見，正是在工黨政府執政時，依靠對伊朗人民難以置信的剝削和他們的貧困，英伊石油公司的利潤和股息達到了難以想像的規模。

右翼工黨分子堅持遵循帝國主義傳統的政策——在反對民族解放運動中依靠近東和中東的地主和買辦分子。特別是許多事實告訴我們，英國的代理人收買了有伊朗的地主，為了英伊石油公司的利益給他們運去武器，反對英伊石油公司國有化。當恐嚇和威脅都不發生作用和英伊石油公司的國有化實現的時候，工黨政府開始卑躬屈節地懇求華盛頓挽救英國在伊朗的石油經營權。美帝國主義給伊朗政府最大的壓力，它的算盤是，討價還價的結果伊朗石油產地的真正主人仍然是美國煤油大王。

當反映埃及人民的意志的華夫脫黨政府，於1951年10月初宣布使埃及陷於半殖民地地位的英埃條約無效的時候，工黨政府宣布自己決心出力挽救英國在埃及的統治。保守黨政府的進行的對埃及人民的不宣而戰的戰爭所造成大規模的暴行，槍殺和平居民，焚燒農村，就是工黨政府的政策在地中海區域的繼續。

華爾街為了軍事冒險把近東和中東各國變成軍事基地的政策，得到了英帝國主義的工黨代理人的充分支持。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英帝國主義對美國的日益增長的依賴性，表現在美國的資本深入到英國殖民地里去。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英帝國主義和美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的尖銳化是在這種環境中產生的：英帝國主義因為無能對付被壓迫人民的民族

解放斗争的强烈高涨，对美国垄断资本家作了一连串的让步。工党政府拥护杜鲁门在1949年给国会的咨文中的“第四点”计划。在这咨文中杜鲁门宣布“鼓励美国在落后国家投资的……新的大胆的计划”。杜鲁门宣称，在这些计划中，“老牌帝国主义”是没有地位的，——这种谬论并不新颖。工党的殖民地问题的纲领很早就宣传这种谬论。事实上这是美帝国主义扩大进攻的纲领，目的是要占领欧洲各国的殖民地领地。按照美国的“第四点”计划，资本输出具有特殊的意义。右翼工党分子接受杜鲁门的“第四点”计划却有这样一个条件：美国扩大对落后国家（其中包括大英帝国的殖民地）的资本输出，同时还应当加强英国资本对这些国家的输出。1950年的工党纲领所宣布的“对落后国家同等帮助的国际计划”是用来为美国扩张计划贴上“民主社会主义”的商标的。他们支持美国扩大扩展计划，同时提议：英国垄断组织同样要用扩大资本输出对落后国家加紧剥削。

右翼工党分子竭力宣称杜鲁门的“第四点”计划证明，资本输出，和英国的资本输出一样，是处于“公共监督之下”的，并追求……落后民族的“福利”的，说这种资本输出不是帝国主义的。我们已经提到过像希利、斯特拉徹等人的“新费边主义概论”的著作，希利、斯特拉徹等人，特别热心地赞扬美国和英国的垄断资本家的资本输出。这些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千方百计地掩盖利用国家从美国输出资本的真正目的：为私人垄断组织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剥削这些国家的廉价劳动力来为美国金融资本谋利，掠夺性地利用不发达国家的原料资源是为了保证美国在世界的经济和军事的统治，这种所谓美国的“技术援助”乃是使落后国家在经济上恶化和使它们服从美国垄断组织的手段。斯特拉徹、希利、摩里遜等人拥护美国的“技术援助”，打算在加紧剥削殖民地的事业上使英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合作。而事实上

这种政策使英帝国主义在英帝國內的地位遭到破坏，使美帝国主义日益加紧佔領英國的殖民地和自治領。

美國壟斷組織在大英帝國的國家內爭奪更多的經濟陣地的斗争，必然引起英美矛盾的極端尖銳化。工党的首領們号召在向落后國家加紧資本輸出的事情上和美國合作，表现出英帝国主义在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强烈高漲和殖民体系实际崩潰的面前感到恐懼，指望美帝国主义帮助英帝国主义維持这个帝國——这个榨取五億人民的膏脂的龐大的軀体。但是这种打算决沒有排除反而造成了英美矛盾的極端尖銳化，这是因为打進了大英帝國的美國，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而且使英國殖民壟斷組織的最大限度的利潤有毀滅之虞。

1952年在莫坎比召开的工党年会上，工党执行委员会公佈了關於殖民政策的特別声明，題名为“走向全世界富裕之路”。工党代表會議通过这一声明的目的是：在帝国主义的殖民制度实际崩潰的条件下制定出挽救英國殖民統治的今后的“方法”。宣言百般描寫落后國家的貧困和飢餓，但它却小心翼翼地避而不談这些國家貧困的真正原因——帝国主义的統治、殖民剝削、帝国主义者对殖民地的掠夺。宣言認為主要的任务是：保証提高殖民地的農業生產、它的生產率、原料生產的擴大。宣言提出的一切办法可归結为：改進选种工作，和虫害作斗争，擴大施肥，發展灌溉等等。这一切再加上当地一部分農業原料的加工，就被叫做“工業化”。从英國以及从美國輸出資本（根据杜魯門“第四点”計劃）被宣佈为發展農業的手段。同时为了挽救殖民剝削，宣言卑躬屈節地向美國呼吁帮助。工党的殖民政策的最新的方案就是这样的。它的目的在於：要用“工業化”这个字眼掩盖在事实上禁止殖民地發展自己的重工業，保証加紧为帝国主义者進一步軍备競賽的利益所急需的原料生產。这样，在殖民地

“跟飢餓和貧困鬥爭”的借口下，在“民主國家”為落后國家的情況“負責”的口號下，右翼工黨分子提出這樣的綱領：加緊剝削殖民地的居民，大量從殖民地榨取農業和原料資源，提高英國和美國資本家的利潤。這個綱領是沒有其他目的的。

讓我們來談一些事實，證明在大英帝國的國家內英國和美國的壟斷組織的尖銳鬥爭。無論工黨怎樣吹噓美國和英國的壟斷組織向大英帝國各國輸出資本有“共同合作”的必要，也不能掩蓋英國和美國的壟斷組織為了資本輸出、為了保證自己得到最大限度的利潤的那種殘酷的和日益加劇的鬥爭。首先我們來談談加拿大。

還在大戰以前，美國在加拿大的投資等於加拿大的全部外國投資的60%，1951年提高到77%。而英國投資部分在1939年為36%，1951年下降到19%。僅在三年之內（1948—1950年）美國壟斷組織在加拿大的投資總數達13億美元，而且投資總數一年年在增加。

美帝國主義總是把加拿大看成自己的實際的領地，並且為了戰爭準備以“防禦北方軍事基地”為借口佔領了這個英國的自治領的許多區域。

美國的資本大大伸入到南非聯邦。例如馬蘭政府於1951年得到美國債款80萬美元，這被認為是以後幾年接踵而來的大量債款的開始。這些債款是在把鈾礦供應美國的條件下得到的。福特、洛克菲勒和摩根所關心的是開發南非聯邦的資源。

許多美國壟斷組織參加了南非開採金礦的100個股份企業和銅礦及鋅礦。美國資本正在伸入澳洲，雖然資本不大，但美國壟斷資本家已經佔領了一個鈾礦產地。工黨政府向美國壟斷資本家提議按“科倫坡計劃”實現7億英鎊的投資，指望着由英國和美國的壟斷組織共同參加來實現“計劃”，提高英國壟

斷組織的利潤。但是，大家知道，1951年2月美國壟斷資本家拒絕在英國的控制下根据“科倫坡計劃”在東南亞進行投資。在長期的斗争和討价还价以后，結果还是英帝國主义做了讓步。1951年7月13日簽訂了英美協定，根据美联社的報導，協定准許英國的海外領土根据杜魯門第四點計劃直接从美國得到援助[⊖]。

这一決定特別明顯地着重指出，美國壟斷資本反对英國，美國企圖在大英帝國內排挤自己的敌手。

爭取獲得最大限度的利潤，成了英帝國主义和美帝國主义競爭的基礎。英帝國主义过去和現在打的算盤是：軍备競賽能够保證英國壟斷組織在帝國的領地內得到最大限度的利潤。但是这种打算是建立在沙灘上的。美國“朋友”决不願意为英國壟斷資本家火中取栗，他的打算是佔領英國的銷售市場、原料產地和增加資本的場所，為了保證獨佔最大限度的利潤。這不僅从在上面說到的加拿大的例子可以看出來。一个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馬來亞。在最近几年中，由於美國收購原料，英國壟斷資本家从这里攫取特別高的利潤。被這些極高的利潤吸引來的美國壟斷組織，大力把馬來亞橡膠種植場和錫礦礦井攫为己有，收入佔英國壟斷組織最高利潤的大部分。另一方面，為了降低英國原料壟斷組織的利潤，他們从1951年年中开始大大縮減收購橡膠和錫礦，就使得這几种原料的价格下降。

美國壟斷資本家加緊伸入英國的殖民地和勢力範圍，加緊剝削殖民地和附屬國。他們力圖在大英帝國和英國建立自己的經濟統治，摧殘自己的“伙伴”和“朋友”的利益。美帝國主义進一步伸入殖民地威脅維持高額利潤的利益，愈益引起抵抗英國

⊖ “Labour Monthly”, II. 1952, p. 85.

壟斷組織的伸入。

英美矛盾尖銳化的必然性就是从这里產生的。

英帝國主義對美國愈益依賴、帝國主義者對各殖民地人民爭取自己解放的民族解放鬥爭的勝利的恐懼，對殖民制度崩潰的恐懼，使澳洲、南非洲、加拿大產生這樣一些有勢力的資產階級集團，它們寧願服從美國壟斷資本家。尽管力圖維持和加強帝國，英帝國主義日益明顯的對美國的依賴，推動那些資產階級集團這樣做。甚至暴露了美帝國主義的軟弱，暴露了亞洲人民民族解放運動愈益強大的美國軍隊在朝鮮的失敗也推動了自治領的一部分反動資產階級上層分子服從美帝國主義。美國和英國的自治領——澳洲和新西蘭簽訂侵略性的太平洋軍事協定的事件，特別明顯地暴露了英帝國主義的削弱和它對美國的依賴。同時依據美國的願望，不僅把英國排斥在太平洋協定之外，而且不管英國怎樣要求，也不允許它派遣自己的觀察員到檀香山參加協定參加者的代表會議。

澳洲、新西蘭、加拿大、南非聯邦的一部分資產階級竭力反抗美國打進自己的國家，並且為保持和加強跟英國本部的聯系而鬥爭。

英美在亞洲的矛盾尖銳化了。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指望日本重新軍國主義化和把它變成在亞洲佔統治的主要工具，這日益引起了英帝國主義和簽訂了太平洋協定的美國“同盟者”——澳洲和新西蘭的不滿。美帝國主義的削弱和它在亞洲的侵略政策的聯產愈暴露出來，它愈加瘋狂地和魯莽地投入新的冒險。美帝國主義在亞洲的政策愈遭到失敗和破產，英美的矛盾就愈尖銳。華爾街在亞洲的政策給英國的經濟利益以沉重的打擊，這加強了英美壟斷組織的鬥爭。

英美的矛盾越是尖銳化，美國的“竊取”大英帝國、成為它

的繼承者的意圖就越加公開和明顯了。

美國資本正在巩固它在印度的地位。它終於把泰國从英國的勢力範圍內分裂出來，並且把这个國家事實上變成自己的殖民地。它加緊滲入印度尼西亞去排擠英國。

英國對美國的經濟的和政治的依賴性，決不能消除英美矛盾的極端尖銳化，而是以英美矛盾的極端尖銳化為前提的。

總之，保守黨人所支持的工黨政府對鎮壓被壓迫人民的民族解放鬥爭的殖民政策，貫串着依靠加緊剝削殖民地和附屬國的人民使英帝國主義擺脫危機的意圖。右翼工黨分子希望拯救英帝國主義免於死亡，只是促進加強英國對美國的依賴性。代替艾德禮政府的保守黨政府，繼續實行這種政策。同時美國壟斷組織要英國經濟破產和大英帝國進一步削弱的路線加強了英美的對抗。

* * *

工黨前外交大臣貝文和摩里遜採用了最巧妙的聾感宣傳企圖使英國工人相信：為了拯救英國免於滅亡，必須維持英國帝國主義對殖民地和附屬國的統治。右翼工黨分子對英國工人（他們的生活水平比戰前時期大大降低）說，放棄帝國主義的統治和殖民地制度將意味着原料和糧食不再從亞洲和非洲流入英國，消滅了資本輸出的收入和其他收入來源，意味着英國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極端下降，甚至會餓死。

這種宣傳直到現在對大部分英國無產階級起着不小的影響。

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工業壟斷組織，其後是殖民壟斷組織，使英國資產階級能夠收買英國工人階級的上層分子來維持這個壟斷組織。

1882年恩格斯寫道：“事實真像是這樣的：在英國還保持工

業壟斷時，英國工人階級在一定程度上分得了這一個壟斷的利益。這種利益在工人中間的分配是很不公平的：最大一部分被特權的少數人攫去了……”^①。

英國資產階級力圖用工業壟斷組織的利益、後來用殖民壟斷組織的利益去關心工人的特權階層，從豐富的殖民地的獵物中拿出一点点東西布施給他們。

英國資產階級力圖用自己的殖民統治和奴役的思想體系傳染給廣大工人。英國資產階級竭力利用殖民統治，為了通過工人貴族和工會官僚，把廣大的工人羣眾更牢固地束縛在自己的思想體系的鎖鍊當中。

馬克思在1870年4月9日給邁爾和符格特的信中指出，英國對愛爾蘭的殖民統治是英國資產階級對英國無產階級保持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統治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馬克思寫道，英國工人“……對它（愛爾蘭工人——德伏爾金），覺得自己是統治民族的一員，因此成為貴族和資本家對付愛爾蘭的工具，這樣就鞏固了貴族和資本家對自己的統治……”

報刊、教會的宣傳、滑稽雜誌人工地支持和加強，簡言之，統治階級所擁有的一切手段都蓄意支持和加強這種敵對（愛爾蘭工人和英國工人之間的敵對——德伏爾金）。英國工人階級雖有組織，但沒有力量，其秘密就在於這種敵對。資產階級之所以能保持其權力，其秘密就在於此。資產階級完全懂得這一點的”^②。

1870年愛爾蘭的情況可以說明整個英國殖民帝國的情況。英國資產階級開始通過自由黨和保守黨、後來通過右翼工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一版第16卷第2編第275頁。

② “馬恩通訊選集”第117—118頁1949年解放社版。

黨分子和工會官僚一直對英國工人羣眾貫輸這種思想，根據這種思想，英國工人羣眾對大英帝國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千百萬被壓迫的人們說來，是統治民族的成員，並享受這種統治的成果。

工黨首領力圖用這種胡說對工人貫輸帝國主義思想體系。

列寧寫道：“帝國主義的思想體系，並且已侵入到工人階級中間去了。工人階級與其他階級之間並沒有隔着一條萬里長城。”^①

在英國擁有極大的殖民地領地、極高的殖民地賦稅和大規模收買工人的特權上層分子，帝國主義思想體系大規模地侵入到工人羣眾中間，這是現在還保持着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弱點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工黨的帝國主義的思想體系過去和現在一直敗壞着英國工人的意識。

較大部分英國工人的生活水平高於歐洲大陸的資產階級的國家的工人的生活水平的時代早已過去了。在帝國主義時代，特別是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英國工人階級的貧困化取消了英國工人比歐洲大陸工人生活水平較高的這種特權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壟斷組織向工人階級的進攻、物價的上漲和賦稅壓迫的加強，更加嚴重地迫使英國工人羣眾陷入貧困和災難的深淵。英帝國主義極嚴重的危機、英國殖民制度的崩潰將會而且一定會產生英國工人擺脫工黨的帝國主義思想體系的結果。瘋狂的軍備競賽是依靠進攻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和依靠掠奪殖民地人民來進行的。美國竭力縮減收購殖民地的原料——皮毛、橡膠、錫、銅等等的結果，是英國殖民地壟斷組織售給美國商人的殖民地的原料的新的跌價。這種跌價意味着美國資本在

^① “列寧文選”兩卷集第1卷第1014頁，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

爭奪英國殖民地的最尖銳的鬥爭中，決不打算讓英國壟斷組織回到從前的“繁榮時代”。

不管工黨的首領們怎樣留戀過去，留戀像摩里遜說的“欣欣向榮的老牌帝國”，回到從前的“繁榮時代”是不可能的。在已經翻身或正在奮起為擺脫帝國主義束縛而進行奮不顧身的鬥爭的殖民地人民的強力打擊下，大英帝國搖搖欲墜了。

鼓吹英國人比“有色”民族優越的老調，傳播關於保持和加強殖民地統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幻想，而且把它說成是提高英國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方法，這是對英國的勞動者的真正的利益的最嚴重的背叛。散佈這種謊言乃是英國右翼工黨分子的最大罪過之一。這種謊言的目的，在於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使工人羣眾處於渙散和服從金融寡頭的權力的狀況。無論如何不應當過低估計工黨的思想體系對工人羣眾的腐蝕作用。

正是那些工黨大臣對殖民地和附屬國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實行攻擊，把在馬來亞和其他國家內爭取民族解放的英勇的戰士說成是“強盜”、“恐怖分子”、“掠奪者”。

因此，英國共產黨的工作具有特殊的意義，它以英國無產階級和爭取自己解放的各殖民地人民的團結來反對工黨的以英國工人反對殖民地和附屬國人民為目的的調唆。

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一個壓迫其他民族的民族不可能是自由的原理，共產黨向英國勞動者闡明，英國工人階級和殖民地的人民在他們的民族解放鬥爭中的聯盟，乃是在英國本國社會主義取得勝利的條件。

英國共產黨不僅在英國工人面前揭露了右翼工黨分子在保護殖民地剝削的可恥的作用，而且還在民族解放鬥爭中實際支持被壓迫的人民，這事實是具有重大意義的。

1947年召開了英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第一次代表會議，會

上除了英國共產黨的代表以外，還有印度、錫蘭、緬甸、馬來亞、南非洲、澳洲、加拿大等國的代表。

英國共產黨在1948年發布的關於非洲問題的宣言中，提出要求取消英屬非洲殖民地的英國專政，從那里撤銷武裝力量和警察，以非洲的行政機關代替英國的行政機關，取消在非洲全部領土上的不平等的立法，建立民主的當地的政權。

1949年在利物浦召開的共產黨代表大會上，代表大會的代表在發言中說要和非洲厄努格的英屬殖民地的礦工團結起來，當時他們的遊行示威遭到英國政府當局的開槍射擊。英國共產黨執行委員會在決議和呼聲中說，要和爭取馬來亞解放的戰士團結起來，同時要求在這國家內停止戰爭，召回英國軍隊，給馬來亞以獨立。

1951年3月英國共產黨執行委員會發表了專門的宣言，它揭露了工黨政府在伊朗政府將英伊石油公司國有化問題上的帝國主義政策。執行委員會祝賀伊朗人民爭取石油工業國有化、反對英國和美國在伊朗的帝國主義的壓迫的鬥爭。執行委員會在聲明中說道：“伊朗罷工工人的鬥爭和全伊朗人民爭取民主自由、爭取掌握自己國家的財富的權利的鬥爭，是和英國工人階級的真正利益一致的。”^①

共產黨執行委員會嚴厲地斥責了英帝國主義在埃及的武裝干涉，並支持埃及人民爭取自己的獨立、反對英國軍隊在蘇彝士的侵略行動的鬥爭。1952年1月召開了英國共產黨代表會議，討論關於近東人民反對英美帝國主義統治的解放鬥爭的問題。埃及、伊拉克和近東的其他國家、同時還有巴基斯坦、南非洲的共產黨和工人黨的代表參加了代表會議。代表會議對於近東人

^① 1951年3月31日“真理報”。

民在進一步開展解放鬥爭有着巨大的意義，這一鬥爭在最近幾年中具有了巨大的規模。代表會議通過的決議中提出要求：“從埃及和蘇丹、從塞浦路斯、外約旦、伊拉克以及從近東的一切基地上完全撤退英國軍隊。”^①

代表會議着重指出了近東人民反帝國主義統治鬥爭的意義和這一鬥爭與英國無產階級反對侵略戰爭的密切聯繫。

共產黨在反對為英帝國主義服務的右翼工黨的殖民政策和思想體系的鬥爭中，是英國工人階級的真正利益的代表。

擺在英國共產黨面前的最重要的任務是：揭露右翼工黨分子的帝國主義思想體系和消滅這種思想體系對羣眾的影響。在這鬥爭中，共產黨的綱領“英國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具有重大的意義。綱領指出，英國共產黨是英國人民的民族利益的唯一的真正的代表和保護者。

同時，綱領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在和帝國主義思想體系及其在殖民地問題上的政策的鬥爭中武裝了黨，並和工黨保守黨兩黨在殖民地問題上的政策相對立，提出了爭取大英帝國的各族人民的自由和獨立、以及建立英帝國內獲得解放的各族人民合作和互助政策。“英國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的綱領包括了從新的條件中產生出來的許多新的情況和要求，這種新的條件的形成是由於戰後殖民地制度的危機尖銳化、以蘇聯為首的強大的社會主義和民主陣營的形成以及美國壟斷組織加緊伸入到大英帝國各國的結果。

綱領揭穿了工黨關於英國共產黨彷彿想破壞大英帝國的捏造。和工黨及保守黨力圖在加緊剝削和壓迫殖民地和附屬國的基礎上挽救正在崩潰的英帝國主義的思想體系和政策相對立，

① “Daily Worker”, 7, 1, 1952.

共產黨提出了另一個綱領。這一綱領要求被壓迫的和附屬國的民族的獨立以及消滅殖民地的剝削和壓迫。同時綱領主張在各族人民平等的基礎上鞏固和加強目前帝國的各族人民的經濟聯系，在這種聯系的基礎上，提高英國人民和目前帝國的各族人民的物質和文化水平。從而揭穿了工黨關於這方面的宣傳：消滅殖民地的剝削和帝國主義壓迫的制度就意味着對英國人民的經濟崩潰，並且會斷絕供給英國的原料和糧食的來源。

事實上，正是以前的工黨政府和目前的保守黨政府所實行的英帝國主義的政策，毀壞了大英帝國。軍事鎮壓和掠奪落后的各族人民的政策，產生了對英國統治的仇恨，引起了殖民地和附屬國的被壓迫的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武裝鬥爭。帝國主義反對朝鮮、中國和越南的軍事冒險的政策，引起了亞洲各族人民對帝國主義日益增長的仇恨。

保守黨人的殖民政策，也和右翼工黨分子的殖民政策一樣，在殖民地戰爭中浪費了英國的人力和物力。它使英國日益依賴美國。這種政策只是加深了英帝國主義的危機。

把英國變成了美國的小伙計以後，保守黨人和右翼工黨分子實行的不是本國的政策，而是美國的政策。由於這種政策，英國人民受盡苦難，並且威脅着大英帝國本身的生存。

“儘管這樣，英國宣傳機關仍然硬說毀壞大英帝國的似乎是共產黨人。然而大英帝國的統治集團不能不看見極為明顯的事實，這些事實證明，大英帝國的領地不是在被共產黨人奪去，而是在被美國億萬富翁奪去。”^① 右翼工黨和保守黨關於英國服從美國的一切政策，軍事鎮壓馬來亞人民、加緊剝削非洲各部落和

① 馬林科夫“在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第19頁，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

民族、鎮壓近東的民族解放運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在朝鮮參加美國的武裝干涉和反對人民中國的政策，毀壞了大英帝國。英國服從美國億萬富翁和對外貿易服從美元的政策、軍備競賽和破壞與蘇聯以及人民民主國家的貿易關係的政策，加深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籠罩英國的原料和糧食的危機。

根據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國際環境的變化，共產黨的綱領“英國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提出了一系列的原則性的重要的原理，這些原理是列寧的民族殖民地問題的理論在英國條件下的應用。

共產黨為實現民族自決直到民族分立的原則而鬥爭。它支持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人民為擺脫帝國主義統治、為獨立和自由的鬥爭。

同時，英國共產黨估計到這些事實：美國壟斷資本的擴張政策，它在資本主義國家內的統治地位，它伸入到大英帝國，它對英帝國主義是“老伙計”。正如英國共產黨副主席帕姆·杜德所指出的，英帝國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人民“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必然不但是反對英帝國主義的集團及其當地伙伴的剝削和統治的鬥爭，而且同樣是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當地幫手的鬥爭。為了取得勝利，在這鬥爭中，為自己的民族獨立鬥爭的各族人民必需緊密的聯合和合作。”^①

綱領不僅提出了帝國內被壓迫的各族人民爭取獨立的鬥爭，而且提出了這些人民和英國人民在勝利以後在英國人民民主制度中的相互關係的問題。

很明顯，在英國建立人民民主制度的條件下，帝國內各族人

① “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中文版第87期第12頁（1951年5月5日出版）。

民不会把英國看成是敌人，而看成是朋友。人民民主的英國对目前帝國的人民不会实行殖民剝削和种族統治的政策，而將实行友好互助的政策。

在党的綱領“英國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寫道：“共產党要使英國人民与英帝國各族人民在平等权利的基礎上建立巩固的友誼，以結束今天英國人民与帝國各族人民之間由於殖民战争和压迫而形成的不正常关系。这种具有历史性的正义行动，会有助於根除过去的怨恨，並且会在一个新的、民主的基礎上大大地增强英國的力量。

目前帝國內各族人民之間所有基於政治、經濟和軍事奴役的一切关系必須結束，而代之以基於完全的民族独立和平等权利的关系。这样就要求把所有武裝部隊撤出殖民地和附屬國，並且把主权交給人民自由选举出來的政府”[⊖]。

这样，在擺脫英美帝國主义权力統治的帝國內的各族人民和英國人民之間就会建立起完全不同的关系——兄弟般的团結和經濟上的友好合作的关系。現在的英帝國的各族人民为了和美國壟断資本斗争一定会在兄弟般的联合的基礎上团結起來的。綱領寫道：“这样就为英國人民和帝國內解放了的各族人民提供一个新的、密切的、兄弟般的联合的基礎。只有在这个基礎上才能建立今天参加帝國的各族人民的真正的友誼，这友誼促進互惠的經濟的联系和合作的發展，並且促進反对美帝國主义的侵略而共同捍衛他們的自由”。

英國共產党給自己提出的任务是：“給予各殖民地以民族独立，使現存的不平等的帝國主义型的帝國变为强盛、自由、平等的民族联合”。人民民主政府將徹底廢除保守党人和右翼工党分

⊖ “英國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第12頁，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

子的帝國主義的政策。現在起來反對英國殖民地統治和力圖擺脫這種統治的各族人民，在英國無產階級取得了勝利，消滅了殖民剝削以後，將力求和英國人民的友好和兄弟般的合作。可見，新綱領澈底揭穿了右翼工黨在帝國的問題上對共產黨的誹謗。綱領向英國人民指出完全新的美好的遠景：消滅由於帝國主義統治和依賴美國所造成的經濟崩潰和愈益貧困化。

這一綱領是共產黨為消除工黨的思想體系對英國勞動羣眾的影響而鬥爭的強有力的武器。

第七章

右翼工党分子与帝国主义侵略计划

一 “防御”幌子下的军备竞赛政策

大家知道，1945年议会选举时，人民群众投票反对保守党，首先就是谴责它的反苏路线。这一路线体现了英帝国主义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仇恨。

由于准备竞选纲领，出席1944和1945年两届工党年会的代表们竭力强调苏联的胜利在粉碎法西斯主义中的作用，赞扬苏联人民的英勇精神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各项成就。工党首脑们在“面向将来”的纲领和竞选演说中，都提出了同苏联友好合作的政策的诺言。右翼工党分子欺骗了那些相信他们的声明的人民群众。

工党领导曾经拥护旨在反对苏联的1925年洛迦诺协定。当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军队侵略西班牙人民（法西斯分子把这一战争看作是将来进攻苏联的一次预演）的时候，工党的首脑又赞成“集体不干涉”西班牙的投降主义政策。他们支持张伯伦和达拉第同希特勒缔结的慕尼黑协定，由于这一协定，捷克斯洛伐克被出卖给德帝国主义了。工党的领导人物和张伯伦一起，坚持对德国法西斯采取“绥靖”政策，指望着推动德帝国主义去进攻苏联。

工党分子罗·巴克斯顿毫无疑问是经张伯伦同意并代表张伯伦政府，在工党首脑的委托下，于1939年7月末，即第二次世

界大战爆發前几天，根据“秘密外交”（用他自己的話來說）的方法，和德國駐倫敦的大使館進行談判的。从苏联外交部所公佈的文件^①可以看出，罗·巴克斯頓曾經提出一个計劃，根据这一計劃，“英國願意同德國締結划定利益範圍的条約”。这种“划定利益範圍”包括：英國放棄对波蘭的保証，廢除法苏之間的互助条約，使希特勒德國在东方自由行动。巴克斯頓的計劃就是直接建議德帝國主义开始進攻苏联。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联合內閣的工党閣員曾經支持拖延和破坏开辟第二戰場的政策。

工党領袖敌視苏联的态度公开地表现在：远在1944年，他們就在工党的年会上通过了一项決議，根据这一決議，工党黨員不得参加以加强英苏友好为目的的英國社会团体的活动。

右翼工党分子自己表白他們是苏联的“朋友”，这种表白有多少价值，英國資產階級是明明白白的。豈止这样，正像資產階級的报刊講的，英國的統治階級認為工党政府的組成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他們的打算是：工党將比保守党更便於進行反苏政策。

例如，1945年8月5日的“觀察家报”坦白地寫道：工党政府能够比保守党“更有效地”推行反苏政策。英國壟斷組織的另一刊物“經濟学家”雜誌在1945年8月4日曾寫道：保守党公开反苏的“路綫”会遇到“天然的困难”，“会受到”人民羣众的“攻击”。“經濟学家”雜誌着重指出：工党政府就有所不同了。在实行反苏政策时，工党政府不会有这些障碍，並且“能用強硬的口吻來進行談判”。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的文件和材料”第2卷第111—113頁，1948年莫斯科中文版。

美國前外交部長（國務卿）貝納斯在自己的“坦白地說”一書中，違反了他自己的意願，揭穿了工黨的鬼話：彷彿是蘇聯政府的“頑固態度”才迫使貝文逐漸採取反蘇立場的。貝納斯敘述1945年夏天，召開柏林會議時，根據杜魯門的指示決定採取直接反蘇方針的美國代表團，當時怕遇到以艾德禮和貝文為首的英國代表團的反抗。這是英國議會選舉以後的事情，貝納斯及其同事都還清楚記得工黨分子在選舉運動時提出的誓言：保證結束仇視蘇聯的政策，並實行和蘇聯友好合作的政策。可是同艾德禮和貝文第一次會見的時候，貝納斯就很滿意地發現了這些“社會主義者”原來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工黨的領袖很快就同美國的外交代表找到了共同的語言。

1945年8月，貝文以外交大臣的資格第一次發表公開演說時，就攻擊蘇聯，並且威脅各人民民主國家。他宣佈他的政策就是要不讓“共產主義”在歐洲“取得勝利”。工黨政府簽訂波茨坦協定以後，立刻就同杜魯門和貝納斯一起，採取了破壞這一協定的方針。早在1945年11月9日，工黨的機關報“每日先驅報”就聲言，德黑蘭、雅爾達和波茨坦協定“以後再沒有任何意義了”。

毫無疑問，沒有整個右翼社會黨人、特別是右翼工黨分子的幫助，華爾街就無法着手實現它對歐洲各資本主義國家進行經濟奴役和建立世界霸權的綱領。

“馬歇爾計劃”是第一個極為重要的措施，按照美國財閥的打算，實行了這一措施就會使歐洲各資本主義國家服從美國。

美國國會通過的1948年“援外法案”，向全世界表明了美國壟斷資本家的真實意圖。根據這一法案，在根據“馬歇爾計劃”而接受“援助”的國家里，美國在決定幣值、紙幣發行、工資、物價、各種對內政策等問題方面，都有決定權。這一法案要求這些國家“鼓勵和促進商品交換的擴大，加強這些國家間和其他國家

間的互助，採取共同行動來消除阻碍彼此之間和其他國家商業發展的關稅壁壘。”實現消除關稅壁壘的要求，必然為美國商品充斥歐洲市場开辟道路。

根據這一法案，美國有權在某種程度上，對“歐洲經濟合作各國”的對外貿易政策實行監督。正是根據這一法案以及根據1950年美國國會所通過的、成為“馬歇爾計劃”一個繼續的“安全”法案，美帝國主義才得以使自己的附屬國服從竭力減少同蘇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歐洲各人民民主國家的對外貿易的要求。根據1948年法案，美國得到了干涉歐洲帝國主義國家和它們的殖民地之間關係的權利。

這一法案要求英國向美國供應南北羅得西亞的石綿、鉻、鈷、銅和鈳，英屬圭亞那和哥倫比亞的鐵礬土，馬來亞的錫，緬甸的鉛和鋅，錫蘭的石墨。

根據這一法案的條件，美國有權支配馬歇爾化國家的一定數量的通貨，其總額相當於根據“馬歇爾計劃”而得到的商品的价值。這些商品本身又必須按照不低於市場的價格出賣給居民。最後，馬歇爾化國家根據1948年的法案，必須向美國人提供“對美國有利的”一切情報。這樣，在美國情報機關的面前就展開了獲得馬歇爾化國家的軍事機密和其他機密的無限的可能性。

這就是根據“馬歇爾計劃”而得到的“無償而慷慨的援助”的代價。

1948年4月3日的法案，使美國有了侵犯歐洲資本主義國家民族主權的可能性和權利。120億（在“馬歇爾計劃”有效的4年以內）的“援助”變成了一筆“投資”，這筆投資預示着空前的利息——從經濟上和政治上統治世界上曾經一度極為富足、極為強大的國家。在“恢復歐洲”和“經濟援助”的幌子下，這一計

划要使西欧各國服从美國的壟斷資本，它成为使西欧各國走向經濟軍事化和極力加强軍备競賽的跳板。

但是，如果說把那些早就出賣給資產階級的西欧右翼社会党的首領吸引到自己方面來並沒有花去美國壟斷組織特別大的气力，那末，要使羣众（其中包括右翼社会党的普通黨員）相信：美“援”的實現好像是为了他們的利益，这是並不簡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工党的全部宣傳机器都开动起來了。

帮助華尔街执行馬歇尔計劃，成了工党政府和工党的極為重要的对外政治任务之一。“馬歇尔計劃”被吹嘘成拯救欧洲資本主义的手段。在美國國會討論關於援外法案的过程中，資本主义國家的人民羣众隱隱約約地知道了馬歇尔計劃掠夺性的条件的时候，右翼工党分子趕緊於1948年3月在巴黎組織了一次右翼社会党人代表會議“討論馬歇尔計劃”，实际上是为了帮助西欧右翼社会党人更好地給充滿不滿和憤怒情緒的欧洲各國人民硬套上美國枷鎖。这對於美國壟斷組織來說是非常適合时宜的，因为这一法案很快（4月3日）就由美國國會最后通过了。在右翼社会党人的國際代表會議（它永远是秘密的，为的是不讓会上准备的那些骯髒事情傳揚出去）上，摩根·菲利浦斯和工党國際問題書記希利竭力來“調和”資本主义國家之間的矛盾。他利用了这样的事实：右翼社会党首領們既参加“社会党國際會議委員會”的代表會議，同时又加入本國政府。事实上，这样“調和”矛盾的結果就是，强迫欧洲國家把自己的陣地一个接一个地交給肆無忌憚的美國壟斷資本家。

右翼工党分子在使“馬歇尔計劃”奴役斯堪的那維亞半島國家方面的“功績”是特別大的。早就同英國工党分子有联系的挪威、丹麥右翼社会党人的政府以及同英國壟斷組織有勾結的這兩國的資本家集团，在不小的程度上是由於工党政府的努力，才

同意加入“馬歇爾計劃”奴役性條約的体系的。

使美國壟斷資本奴役西歐各國的“馬歇爾計劃”，被宣布為“民主社會主義”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正像工黨分子趕緊把“民主社會主義”勝利的可能性同“馬歇爾計劃”的“援助”联系在一起一樣。根據華爾街全權大使的指示來“分配”“馬歇爾計劃”的經費的“歐洲經濟合作組織”，被摩根·菲利浦斯叫做“制定國際社會主義計劃的組織”。貝文甚至用聖經上的語言說起話來，有一次演說他居然把“馬歇爾計劃”稱做“甘露”。毫不足怪，早在1948年10月，國務院發言人的“綸音”就從華盛頓西奈山上[⊖]發出來了。他讚揚右翼社會黨人特別是右翼工黨分子，讚揚他們在實現“馬歇爾計劃”方面的“勞績”。在國務院的聲明里公開承認，假如沒有右翼社會黨人的效勞，“馬歇爾計劃”是不可能實現的。

當然，工黨領袖不僅關心美國財閥的利益，而且關心英帝國主義的利益。

在“馬歇爾計劃”開始生效的1948年春天到1950年11月，英國從這一時期“援助”西歐各國的92億美元當中得到了26億。每年英國根據“馬歇爾計劃”而得到的幾億美元，在工黨執政者看來，是一個可以用來彌補英國財政赤字的“幫助”。英帝國主義指望，作為美國爭取世界霸權的小伙計，總可以撈到一點好處。事實上，這些小恩小惠意味着使英國的經濟依附美元，讓美國壟斷組織奴役英國，使英國破產。對於英國來說，“馬歇爾計劃”的不可避免的結果必然是（而且已經是）經濟困難急劇尖銳化，財政赤字日益增長的危機，以及在軍備競賽的影響下英國經濟的瓦解。

⊖ 典出自舊約全書出埃及記第19章。大意謂以色列人離開埃及來到西奈山，耶和華於火中降臨西奈山，摩西傳諭百姓沐浴齋戒三日，來西奈山接受十誡。——譯者

当由於生產过剩的危机成熟（1948年年底）和欧洲各資本主义國家的經濟对美國的依賴性大大增長，美國的壟斷資本开始向西欧的工業發動進攻，当一系列的工業部門（法國的汽車和航空工業、意大利的机器制造业和造船厂、英國的造船工業等等）开始縮小生產的时候，右翼工党分子却更加热心地歌頌“馬歇尔計劃”。“馬歇尔計劃”並不能把美國資本主义从已經到來的使西欧工農業遭到破產的危机中拯救出來，“馬歇尔計劃”的破產並沒有使華尔街的右翼社会党人感到狼狽。

1949年下半年，面对着对外貿易急剧减少的情况，美國採取了加緊擴充軍备的方針。華盛頓不再掩蓋“馬歇尔計劃”作为使欧洲資本主义國家在軍事上和政治上服从美國的武器以及作为准备侵略戰爭的武器的性質了。在美國部長和國會議員的演說中，軍备被吹噓为拯救資本主义的手段。右翼工党分子欢迎这一政策，宣布它是“社会主义的武器”。

假如沒有右翼社会党人特別是右翼工党分子的援助，“馬歇尔計劃”是不能强加在欧洲各國人民的头上的。人民羣众並不信賴公开的反动分子和侵略的宣揚者。但是，欧洲資本主义國家里当时却有不少人相信勃魯姆和艾德礼之流，这些家伙要人們相信：“馬歇尔計劃”是“社会主义的武器”，是擺脫貧困的方法；美國关心欧洲各國人民的福利，关心西欧經濟的恢复。叛賣本國的民族利益，把“馬歇尔計劃”变为右翼社会党人信仰的象征，这是因为以工党領袖为首的右翼社会党人是華尔街的僱傭的代理人，是站在帝國主义和反动势力立場上的，是反对進步和民主力量的。这一点說明了右翼工党分子同其他的右翼社会党人一起並在他們的領導下，毫不猶豫地支持侵略性的軍事条約和拚命進行軍备競賽的緣故。

工党上層分子對於中欧和东南欧各國人民擺脫金融寡头的

政权，是抱着和英美資本巨头同样的仇視和恐懼的态度的。他們把“馬歇尔計劃”看作是一个在美國領導下，結成欧洲帝國主义者联盟來反对社会主义陣营的手段。貝文和艾德礼欢迎並且执行了美國的“冷战”政策。右翼工党分子遵循着英國壟断資本家的政策，硬是不願意消除人为的國際緊張局势，反对和平調解苏联和資本主义國家之間的爭端和分歧的路綫。

作为美英妄圖統治世界者的推銷員，工党大臣竭力准备和加強軍事联盟。繼“馬歇尔計劃”之后建立軍事集团中下一个環節，就是五國（英國、法國、比利时、盧森堡和荷蘭）的“西方联盟”。这个联盟成立那一天，杜魯門曾拍电祝賀，这个联盟是由於貝文和美國國務院的努力而建立起來的。在这个集团中英帝國主义企圖發号施令；建立以蒙哥馬利为首的西方集团的司令部当然體現出英帝國主义在这个战后的第一个軍事集团中的領導作用。

右翼工党分子宣布“西方联盟”是“民主社会主义”当前的一项“成就”，他們力圖像对待“馬歇尔計劃”所作的那樣，欺騙英國的人民羣众。

但是，對於右翼工党分子的領袖來說，这样作也还是不够的。英美帝國主义者再一次使用了右翼社会党人——这一回的目的是要建立侵略性的北大西洋联盟。北大西洋公約（和“馬歇尔計劃”以及“西方联盟”一样）之所以成为可能，是由於工党政府的对外政策，其次是由於实现本國壟断資本要求的西欧其他國家的右翼社会党人的对外政策。陶里亞蒂寫道：“奉行罪惡的战争政策的人們——从貝文到斯巴克，从勃魯姆到薩拉盖特和舒馬赫——在任何地方，都是社会民主党分子。”^①

① 見1949年12月4日“真理報”，

1949年春天在美帝國主義指揮下組織北大西洋集團，是在右翼社會黨人所慣用的謊言和惡意宣傳的掩蓋下進行的。好像按照口令行動一樣，從“每日先驅報”到“新政治家與民族”的工黨報刊都談到，北大西洋公約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事件”，並且在簽訂這一公約時，貝文、斯巴克、拉馬迪以及其他的右翼社會黨人部長都起誓發願說，這個公約好像是“防禦的”公約，它的目的是“保衛和平”。

準備侵略戰爭的行動就這樣一個一個地取得了工黨首領的贊同，都用“防禦”、保衛“民主社會主義”的利益等等作口實。

在各國人民日益反抗侵略和戰爭政策的面前，美國反動集團不得不加緊在口頭上保證自己的非侵略的和平意願。“美國統治集團為了掩蓋他們的侵略政策，力圖拿對付民主陣營的所謂‘冷戰’來冒充和平防禦政策，並以無中生有的所謂蘇聯發動進攻的危險來嚇唬他們本國的人民。大西洋集團的頭子們的政策的一個特點，就是使用蠱惑人心的愛好和平的漂亮字句來掩蓋侵略計劃和已在進行的戰爭。問題在於人民不久以前曾遭受過流血戰爭的一切痛苦，今天要驅使他們去進行新戰爭，驅使他們去進行對愛好和平人民的戰爭，並不是太容易的事。因此，侵略性的大西洋惡狼才那麼費盡力氣地設法披起羊皮來。

在這種情況之下，如果低估了今日侵略者假惺惺的和平偽裝所發生的惡毒作用，那是很危險的”[⊖]。

為了替英國加入大西洋公約和軍備競賽作辯護，右翼工黨分子使用了最笨拙的詭辯術；他們不是故意隱瞞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的和平外交政策，就是用最粗魯最惡意的方式來曲解

⊖ 馬林科夫：“在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第21頁，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

这些事实。他們以“同共產主义作斗争”的必要性來辯护出賣英國民族利益的行为。北大西洋集团各國所進行的軍备競賽，被工党領袖描繪成“走向欧洲和平的最好的道路”。工党政府为了在1950年馬尔加特年会上否決要求恢复英苏友好、禁止原子武器和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参加联合国要求的議案，趕緊就对外政策問題向这次年会拟定了一个“补充报告”。在这个“补充报告”中，起草人企圖把外交关系緊張的过错硬推到苏联的身上，而用与工党政府“無关的”諸如世界物价上漲、原料缺乏等等之类的因素來解釋英國人民生活狀況由於軍备競賽的結果而不断惡化的原因。尽管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物价上漲、原料缺乏和軍备競賽，正是由於英美壟断組織的政策和它們貪得無厭的侵略野心而引起的。

为了在羣众面前替軍备競賽的政策作辯护，艾德礼趕緊出面帮腔。艾德礼不顧公認的事实，竟宣布苏联好像沒有裁減軍备——沒有使自己的軍隊复員，並且在战争结束后还擴大自己的武装力量。斯大林揭露了这个工党首領的捏造。斯大林在和“真理报”記者的一次談話中解釋道：假若艾德礼首相精通財政学或經濟学的話，那末他就不難了解：沒有一個國家，包括苏联在內，能够在尽力發展民用工業的時候，在進行需要數百億預算支出的巨大建設的時候，在繼續推行同樣需要數百億預算支出的有計劃地減低消費品價格的政策的時候，並且投資數千億以恢复德國佔領軍所破壞的國民經濟的時候；还能同时增加軍隊、擴大軍事工業。不難了解，这种胡塗政策必將招致國家的崩潰。

第四個五年計劃和1951年、1952年計劃完成的總結，駁斥了这个工党首領的捏造。苏联執行着和平政策，社会主义國家的經濟政策是完完全全適應着和平政策的。

蘇維埃國家在和平建設上花費了几百億盧布。在進行軍備競賽和擴大軍事工業的條件下，要完成這些民用工程是不可想像的。第五個五年計劃是進一步提高生產力和蘇聯人民生活水平與文化的五年計劃，是進一步向需要和平發展條件的共產主義逐步過渡的五年計劃。與這種和平發展相反，在北大西洋公約國家里有的是軍備競賽和軍事工業的擴大及其一切後果。

事實上，無論是美國的工業或是英國的工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都沒有完全轉移到和平生產上來。這一點本身就意味着非生產的消費具有特別高的水平，而人民羣眾消費的水平是很低的。

認為“大砲和黃油”都可以獲得的說法，是一個彌天大謊。就像不能同時擴大民用生產和軍事生產一樣，不能同時擴大人民羣眾的消費和軍事消耗一樣。物價上漲和賦稅增加、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和民用消費縮減，這是資本主義國家常有的現象。正因為如此，進行軍備競賽的英國和美國一樣，總是在減少民用部門投資的條件下增加軍事部門的投資。

為了掩蓋自己對蘇聯進行的捏造，右翼工黨分子便冒充為“和平的擁護者”。但是，這種說法已被駁倒了，因為正是右翼工黨分子否決了蘇聯關於立即締結蘇聯、英國、美國、中國和法國之間的和平公約的建議。右翼工黨分子為了滿足壟斷組織的要求，否決了蘇聯關於裁減軍備和禁止原子武器的建議。

在大戰結束以後，蘇聯大大地減少了武裝力量，目前它在數量上已不超過戰前水平。在戰後一個極短的期間，蘇聯政府就從那些在反對希特勒和日本軍隊的軍事行動中曾調去軍隊的那些國家里，撤出了自己的軍隊。

蘇聯最高蘇維埃在1951年3月12日，通過了一個關於保衛和平的法令，並且宣布宣傳戰爭是最嚴重的罪行。

在聯合國中，蘇聯一貫捍衛旨在消除國際緊張局勢、預防新戰爭和保衛和平的路綫。在聯合國歷屆會議上，蘇聯堅持不渝地為立即停止朝鮮的軍事行動、為在最短期限內把和談進行到底而鬥爭。

右翼工黨分子所以無中生有地非難蘇聯，就因為他們在執政時反對和平調解國際問題。

早自1948年起，英國就有許多地區被美軍佔領。在英國的領土上，有好幾十個美國軍事基地，其中一大部分都設在英國國內的東部地區，就是說設在比較靠近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的地區。

在執行侵略計劃中，西德起着主要的作用。美國壟斷組織力圖把西德變成一個軍事跳板，把它重工業變成一個軍備的供應者，把它的居民變成一個砲灰的供應者。

工黨上層分子非常了解，公開地重新武裝西德和復活德國軍國主義是明顯地同英國人民的利益相對立的。關於希特勒對西歐的侵犯，關於法西斯野獸對歐洲各國人民殘忍的屠殺以及僅僅由於蘇軍才防止了德國對英國的侵犯的威脅，人們的記憶猶新。英國人民是反對復活德國帝國主義的。因此工黨的部長常常發表聲明來掩蓋右翼工黨分子的政策，事實上，右翼工黨分子已在一步一步地滿足美國關於重新武裝西德的要求。

例如，1950年3月28日貝文曾在下議院聲明：“我們——美國、法國和英國——已表示，我們自己是反對德國重新軍國主義化的，現在我們仍然站在原來的立場上。”摩根·菲利浦斯也用同樣的精神，在“社會黨國際會議委員會”的會議上發表了演說。可是在貝文聲明以後還沒有過去三個月，北大西洋集團各國的外交部長在倫敦舉行的五月（1950年）會議，正如會議的公報所聲明的，就通過了關於恢復西德軍隊和加強西德軍事工

業作為“反對蘇聯的堡壘”的決議。

在貝文和艾德禮一再保證他們反對重新武裝西德以後，1950年9月英、美、法三國外長華盛頓會議却再一次秘密討論了關於重新武裝西德的問題。在會議的公報中確認了1948年西方三個國家所通過的西德佔領法規，宣布了擴大三國在西德的武裝力量和“修改”西德“軍事工業方面的禁令和限制”，公布了組織“快速警察部隊”和“德國參加聯合軍事力量”。

1950年12月，艾德禮—杜魯門會議和同1月艾奇遜、貝文、舒馬赫在倫敦和布魯塞爾舉行的會議，都通過了關於西德重新軍國主義化的補充決議。這是右翼工黨分子為外國帝國主義服務的新的行動。

英國共產黨政治委員會在1950年12月29日的宣言中，曾就布魯塞爾北大西洋公約理事會關於建立“北大西洋軍隊”、關於使英國以及其他歐洲國家在經濟上服從美國經濟支配的決議這樣寫道：“美國並沒有受到任何威脅。相反，美國卻威脅着世界各國的人民。侵略性的世界大戰正在準備。布魯塞爾的軍事計劃意味着英國民族獨立的終結……在英國誰支持這一決議，誰就是叛徒。英國每一個愛國公民的職責，不論他的政治觀點如何，就是要拒絕這個意味着使我國自殺的建議。”^①

當工黨在1951年大選失敗和保守黨組成政府以後，工黨上層分子在德國問題上的立場並未改變。兩黨的對外政策仍在繼續。工黨的議會黨團並未反對波恩片面的“一般條約”和關於建立“歐洲防務集團”的巴黎條約，而這些條約就意味着正式復活德國軍國主義，吸引西德參加北大西洋聯盟，把西德的國防軍變為“歐洲軍”的主力。工黨領袖在下議院討論關於批准波恩條約

^① 1950年12月30日“真理報”。

和巴黎協定的問題時所提出的附帶條件，並沒有改變主要之點——在原則上贊成這些復活德國帝國主義的文件。

在聯合國中，工黨政府採取了破壞蘇聯關於禁止原子彈、關於裁減軍備、關於簽訂五大國和約的建議。

工黨政府曾宣布自己是新中國的“朋友”，贊成在外交上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它却不顧英國的實際利益，而支持美帝國主義向人民中國發動戰爭的路綫。它支持美帝國主義強佔中國自古以來的領土——台灣和不顧一切國際法規而用空軍轟炸中國領土這樣一些侵略行為，它支持美國人及其僕從國所提出的、宣布中國為侵略者這一可恥的聯合國決議。它支持華盛頓政府策劃的不許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的一切詭計，而批准國民黨傀儡出席聯合國。它投票贊成聯合國關於宣布禁止同中國進行貿易的決議。

工黨政府在舊金山順從地簽訂了所謂的对日和約，從而破壞了它在1947年同其他國家一起對於日本所承擔的義務。這些義務就是要在日本實現民主改革，消滅軍國主義者的影響，完全解除日本的武裝，消除它進行侵略戰爭的可能性。

舊金山條約把復仇主義和軍國主義化的政策強加在日本身上，保證美國軍隊無限期的佔領日本，向美國武裝力量提供軍事基地。工黨政府簽訂這一條約，順從地實現了美英壟斷資本家的要求。工黨政府支持了美帝國主義在亞洲發動戰爭的一切措施。

英帝國主義和美帝國主義一起，參加了侵略朝鮮人民的戰爭。當美國武裝干涉者1950—1951年冬天在朝鮮遭到失敗的時候，工黨政府採取了一系列的步驟來挽救杜魯門—艾奇遜破產了的政策。艾德禮急忙趕到華盛頓去和杜魯門會談。這次會談的目的，就是討論如何拯救日益破產的帝國主義在遠東政策的

措施。

英國資產階級這兩個政黨在對外政策上的一致性，已多次由保守黨和工黨的領袖加以証實了。

保守黨和右翼工黨分子兩黨的對外政策，就是在1951年保守黨上台執政以後也曾多次地表現出來。在好幾個月的過程里，工黨首領對於保守黨的對外政策，連一句譴責的話也沒有說過。實際上，它們贊成了大西洋聯盟理事會羅馬會議（1951年12月底）和里斯本會議（1952年2月）關於加強軍備競賽、關於建立“歐洲軍”、關於恢復作為“歐洲軍”核心的德國法西斯武裝力量的決議。工黨政府是美帝國主義實現軍國主義化政策和進行“冷戰”的支柱。正像波立特所寫的：“美國沒有英國的支持，什麼時候也不能實現自己的侵略計劃”^①。

這種支持是英國資產階級的兩個政黨——保守黨和工黨所給予的。工黨領導人物無論何時只能執行英國壟斷資本所實行的對外政策。

二 宣揚帝國主義者之間的團結。 英美矛盾的尖銳化

包括右翼工黨分子在內的右翼社會黨人的世界主義“理論”，是壟斷資本的政策在思想上的一个掩護。在“非共產主義世界團結一致”的掩飾下宣揚消滅民族主權和建立“超民族政權”，是替美國和英國奪取世界霸權的野心作辯護。

右翼社會黨人首先是在“歐洲聯邦”口號的形式下宣揚消滅各國人民的主權的。这个口號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很久就出現在帝國主義的報刊里，後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被搬運

① “Daily Worker”, 2. IX. 1950.

出來，形形色色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堅持这一口号。

列寧在“論歐洲聯邦口号”一文中對歐洲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進行聯合的思想作了極深刻的分析，從而揭露了這一口号的反動實質。列寧表明，帝國主義的經濟條件，即輸出資本和在“先進的”“文明的”殖民強國之間瓜分世界，使歐洲聯邦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是無法實現的，就是反動的。列寧表明，資本主義發展在帝國主義制度下不會導致資產階級國家的聯合，而會導致它們為了銷售市場、原料產地和投資範圍而彼此展開鬥爭。列寧寫道：“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除了工業中的危機和政治中的危機而外，便不能有別的什麼辦法來恢復常被破壞的均勢。

當然，各個資本家間與各個強國間的暫時妥協是可能的。在這個意義上講來，建立歐洲聯盟，作為歐洲資本家相互間的妥協也是可能的……關於什麼問題的妥協呢？不過是關於怎樣共同鎮壓歐洲社會主義運動，共同保衛所搶得的殖民地……。”^①

列寧揭露了考茨基、托洛茨基以及其他關於資本主義國家平衡發展和聯合的可能的資產階級理論，表明“歐洲聯邦”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即令是可能的，也只能是作為反動資本主義國家暫時的陰謀勾結，首先是為了反對革命無產階級，鎮壓社會主義運動，其次是陰謀瓜分殖民地。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條件下，對“歐洲聯邦”所作的世界主義的宣揚，成了機會主義者和社會沙文主義者手中的一個欺騙羣眾的手段。社會民主的叛徒在工人階級中散布和平解決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是可能的這種錯覺，以便強迫工人為了“自己的”資產階級的利益去流血犧牲。

^① “列寧文選”兩卷集第1卷第903頁，莫斯科中文版。

列寧對歐洲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進行聯合的思想所作的分析，對於揭露“歐洲聯邦”“最新”草案的實質具有重大意義。

當代的右翼社會黨世界主義者為了捍衛帝國主義，加緊利用“歐洲聯邦”這一口號，也像他們加緊利用考茨基和霍柏森的“超帝國主義”或者“聯帝國主義”的思想一樣。

考茨基證明，帝國主義這種階段的到來是可以設想的。那時，帝國主義競爭將為資本主義國家的和平合作所代替。他散布着這樣的神話：建立帝國主義國家的聯盟，把各國的托辣斯聯合成世界統一的托辣斯來共同剝削全世界是可能的。他斷言，這種“國際聯合金融資本”似乎會放棄戰爭和軍備的政策，會放棄競爭和鬥爭。考茨基這種“超帝國主義”理論所追求的目的，就是要轉移工人對當前尖銳問題的注意力，用帝國主義者之間的持久和平是可能的這種幻想來安慰他們。考茨基欺騙羣眾，力圖使他們關心似乎是新的、未來的“超帝國主義”這種捏造的遠景。在英國的土地上宣揚類似的理論的，是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者霍柏森。

霍柏森在1915年出版的“走向世界政府”一書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言論中，都宣揚消滅民族主義和建立“國際政府”。同時，他宣稱英國政府就是這種政府的榜樣，而英帝國就是各國未來的世界“聯合”的榜樣。

考茨基—霍柏森的“超帝國主義”理論，是直接地公開地捍衛帝國主義，為它作辯護。列寧表明，帝國主義的性質，資本主義國家在帝國主義制度下不平衡發展規律的作用，使戰爭成為必然的產物。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聯盟只可能是暫時的。列寧指出：“……在資本主義下，為實行分割實力範圍，分割利益和殖民地等等，除了計算各個參預分贓者底實力，即它們各自擁有的一般經濟、財政、軍事等等實力而外，再也不能設想出什麼其他

的根据。而这些参預分贓者所有的实力又变得各不相同，因为在資本主义下，各个企業、各个托辣斯、各个工業部門、各个國家彼此平衡發展是决不可能的。”[⊖]

考茨基和霍柏森宣揚，沒有資本主义集团和國家之間的矛盾和斗争的和平的“超帝國主义”是可能到來的。和这种說法相对立，列寧对在帝國主义制度下資本主义發展不平衡的規律作出了深刻而全面的分析。列寧寫道：“所以，資本主义现实中的（不是英國牧师或德國‘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鄙俗的市儈的幻想中的）‘联帝國主义’或‘超帝國主义’联盟，不管这些联盟採取那种形式，不管是一个帝國主义联盟去反对另一个帝國主义联盟，还是一切帝國主义強國結成一个总联盟，都不可避免的只会是前后兩次战争中間的‘暂时休战’。和平的联盟是准备战争，同时又是从战争中脱胎出來，互相制約、根据同一种帝國主义联系，同一种世界經濟和世界政治相互关系而引起和平斗争形式与不和平斗争形式彼此交替的情形。”[⊖]

資本主义在其帝國主义階段，不能不使为了爭夺市場、为了奴役和剝削其他各國人民的斗争尖銳起來。列寧着重指出，考茨基用來作为自己的“超帝國主义”理論的根据的“金融資本集团國際錯綜結合日益加強，事实上並不能証明帝國主义者之間矛盾的削弱，而是証明他們的尖銳化。

考茨基和霍柏森的“超帝國主义”或者“联帝國主义”的理論對於帝國主义最大的帮助就在於，这种理論的傳播在工人中散布了一种錯覺，認為那种沒有战争和軍备競賽的、似乎是和平的帝國主义新階段是可能到來的，从而使工人羣众脫离了爭取消

⊖ “列寧文选”兩卷集第1卷第1024頁。

⊖ 同上書，第1024—1025頁。

滅帝國主義的鬥爭。同時，“超帝國主義”的理論必然在羣眾面前，為社會沙文主義者支援戰爭的政策作辯護。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的資本主義總危機第二個階段這樣一種新的歷史環境下，右翼社會黨人搬用了考茨基—霍柏森的“超帝國主義”理論，來支持和辯護美帝國主義奪取世界霸權的意圖。

右翼社會黨人頌揚“和平的”“人道的”美帝國主義及其似乎在“馬歇爾計劃”中表現出來的“寬宏大量”的根據。還是考茨基—霍柏森關於“國際聯合金融資本”和平合作的思想的老一套。

工黨執行委員會前任主席賽·華生在1950年10月的馬爾蓋特工黨年會開幕式上發表的演說中，特別鮮明的表示了這種和平“超帝國主義”的看法。他宣布，資本主義現在已達到“具有和平性質”的發展階段。帝國主義矛盾再也不存在了。它宣布共產主義是富於侵略的。在這次年會上貝文附和了他的論調。貝文宣布，美國無論如何不是侵略者，同時他不相信，美國什麼時候會變成侵略者。進步報刊都認為這個聲明是偽善的極端的表現。在工黨政府的支持下，美國在這聲明以前幾個月對朝鮮發動的武裝干涉，很明顯地駁倒了貝文的這一說法。

摩根·菲利浦斯在1951年7月右翼社會黨“國際”法蘭克福大會上所作的報告中，也宣揚了好像已經失掉侵略性的“和平的”資本主義。右翼工黨分子希利和斯特拉徹在“新費邊主義概論”中附和了這種論調。這決不會妨礙菲利浦斯、希利和斯特拉徹在同一個時候替軍備競賽、侵略性的北大西洋公約和美國的發動戰爭的各種政策作辯護。這樣，考茨基—霍柏森的超帝國主義理論就以一種工黨化的形式，變成了粉飾和辯護美英帝國主義侵略的武器，變成了誹謗和平民主陣營的武器。

超帝國主義這種殭死的抽象教條，目前又以最新的美國化

的形式替右翼工党分子以及其他右翼社会党人的資產階級世界主义作辯護。帝國主义現代的辯護士，不論他們怎樣巧妙地用尽一切手段宣揚帝國主义目前似乎成了和平的帝國主义，但总掩盖不了它掠夺的侵略的性質。

* * *

还在第二次大战以前和大战期間，工党主义的思想家就提出了“超民族”政权的口号，並認為这种政权就是英帝國主义的职能。使一切帝國主义者在英國的領導下結成联盟，当时这种宣傳具有公开地反对苏联的性質。右翼工党分子建議各國帝國主义者，在反对共產主义的掩飾下結成統一的集团。

列寧寫道：“……作为資本主义經濟联盟基礎的全世界帝國主义的联盟，为了保护沒有祖國的資本而自然地不可避免地結成联盟，它已經用世界史上許多重大的、最重要的篇章証明了：資本把保护各國資本家反对劳动者的联盟，看得高於祖國和人民的利益。”^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工党主义的思想家达尔頓等人曾宣揚在英國的領導下建立超民族政权，以便組織反对進步和民主的統一战綫。

在第二次大战时期，諾尔·伯克尔在一本工党論战争的目的的正式文集^②里寫道，在建立“新的世界秩序”时必须实现一个条件：“由英國來領導”。在宣揚“世界政府”的后面隱藏着英國壟斷資本夺取世界霸权的意圖。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右翼工党分子有了他們目前所宣

① “列寧全集”俄文版第27卷第330頁。

② “The Leaders of the British Labour Party on Labour's Aims in War and Peace”, p. 126.

揚的一切基本的世界主义口号。

在战后时期，“欧洲联邦”的口号成了壟断資本各个集团的口号。在大战結束以后不久，这些集团的政治代表在“欧洲运动”的名称下建立了一个特別的組織，欧洲反动势力形形色色的派別——从法西斯分子到右翼社会党人，都匯合到这个組織中來了。

联系这一問題，不妨回憶一下工党对待“欧洲运动”这一組織的、使人一目了然的歷史。1947年夏天工党年会上，对参加“联合欧洲运动”提出了譴責。可是，在当时就已經十分明顯，工党分子反对“联合欧洲”运动的立場完全是由於考慮到和保守党進行大選競爭而不得不这样干的。

1948年夏天，工党年会通过了關於支持“欧洲联邦”的決議。这时右翼社会党人的巴黎代表會議也通过了这一口号。这是在貝文声明（1948年2月）支持“欧洲联邦”口号以后几个月的事情。

1949年4月在倫敦举行了“欧洲运动”的經濟會議。部長亞歷山大代表工党政府在會議上表示祝賀。这样，在1947年遭到工党分子譴責的那一个“欧洲运动”，現在正式得到了他們的承認和祝賀了。

繼亞歷山大發言之后，保守党的領袖們發表了演說，他們宣佈工党和保守党在同美國組織軍事联盟（大西洋集团），在實現“联合欧洲”的欧策以及其他問題上的对外政策是一致的。

这样，为了保衛“联合欧洲”（成者就叫做“欧洲联邦”）口号，以动人的一致發表言論的既有保守党分子，也有右翼工党分子，这一事实本身就指出了这一口号的帝国主义的反动性質。

1949年8月末至9月初於斯特拉斯堡举行的欧洲理事会的會議上，在右翼社会党人斯巴克主持下，法西斯分子、右翼

社会党人、摩里遜和保罗·雷諾都共同努力來巩固为各种矛盾所腐蝕的欧洲資本家的理事会。当时，在英國的右翼工党分子和保守党人和在法國的戴高乐和摩勒，奧地利的夏尔夫和費格尔，在法蘭克福的新“國際”和美國的壟斷資本家之間，存在着一种有意安排的分工。右翼社会党人以維護“社会主义利益”，艾奇遜、戴高乐和英國的保守党人以“保衛財產和文明”的利益——大家在一起以資本主义的西欧联合起來免除共產主义的必要性來替同一个“联合欧洲”的口号作辯护。

对工人階級的仇恨，在革命运动面前、在資本主义國家共產党的威力面前、在关心制止新的世界大战的各國人民强大运动面前所感到的恐懼，因此要求建立資本主义統一的國家联盟來鎮压資本主义國家民主运动的号召的本性是同样的。資產階級在社会主义的各种成就面前、在殖民地和附屬國人民解放运动的規模面前所感到的恐懼，促使帝國主义資產階級、右翼工党分子、右翼社会党人手忙脚乱，号召“力量联合”。联合欧洲和世界的反动势力——这就是帝國主义的右翼社会党奴僕始終不懈努力以赴的事業，他們利用“民主社会主义”的幌子來掩盖自己的活动。

当然，右翼工党分子及其帝國主义主子清楚了解，苏联並不打算進攻任何人，苏联是最强大的和平保衛者。但是，壟斷資本家及其右翼社会党嘍囉們所懼怕的也正是这一点，他們公开声明，資本主义國家联合的目的就是为了反对共產主义。

英國、法國、比利时、荷蘭和盧森堡在1948年3月建立的西方联盟，被右翼社会党人宣布为欧洲資產階級國家联合的起点。

右翼社会党人企圖把宣傳联合欧洲反动势力是为了建立特殊的“第三种力量”，为了建立似乎是站在苏联、各人民民主國家和美國之間的西欧國家集团而斗争。右翼社会党人費了不少筆

墨來証明：他們建立“联合欧洲”是想在东方和西方之間“架起一座橋樑”，在社会主义和美國“个人主义的資本主义”之間起“綜合”作用。

现实很快就把这种虛偽的“第三种力量”的真实內容揭露出來了。華尔街直接支持和千方百計地促進欧洲資本主义國家联合計劃的事實表明，“第三种力量”在反对社会主义和民主陣营的斗争中，事实上是帝國主义陣营的一个組成部分。

美國既然支持建立西方联盟，支持“联合欧洲”計劃，那就是放棄了自己的帝國主义意圖——右翼工党分子的这个結論，乃是一个企圖欺騙人民的胡說八道。恰恰相反，正是美帝國主义贊同“联合欧洲”这个事实本身証明，“联合欧洲”的口号是符合美國壟断資本的目的的。組織“西欧統一”始終被華尔街看作是一个結成反对爱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的軍事集团的工具，看作是使欧洲資本主义國家在經濟上、政治上和軍事上服从美國的手段。

“第三种力量”被实际生活揭露得这样地快，这样地徹底（特別在大西洋公約簽訂以后），現在右翼工党分子尽管还空談“第三种力量”來欺騙羣众，但他們已公开承認，脱离美國的什么“第三种力量”在西欧是不存在的。

由於“舒曼計劃”而在1950年夏天用“欧洲統一”的名目發表的工党的正式宣言，公开承認在兩個陣营之間是沒有什麼第三條道路的，工党要尽一切力量为帝國主义陣营的利益反对社会主义与民主的陣营而工作。宣言的起草人声明說：“作为位於歐亞大片土地西部边疆的一个地理上的中立集团，第三种力量这个概念是沒有好处的，是危險的”。工党領袖赤裸裸坦白表示（这是由於“舒曼計劃”，英美帝國主义者之間的矛盾使他們不得不这样作），他們要牺牲英國的民族利益而尽一切力量來促進帝

國主義集團的組成和巩固。在上述文件中，工黨的領導人物承認“第三種力量”的空談的意義是什麼。我們在這個文件里讀到：“假如第三種力量意味着政治團結”，也就是一切反動的、帝國主義的、反革命的、法西斯的、半法西斯的以及右翼社會政黨、集團和派別（宣言上寫的“世界各國受過教育的分子”，就是指這些政黨和派別而言），為了反對國內的進步力量和愛好和平的民主國家而進行的團結，“那末，第三種力量就是一個寶貴的概念。”帝國主義反動勢力的一切力量，在右翼社會黨人看來都是“受過教育的分子”，右翼社會黨人就同這些力量結成統一戰綫，來反對進步和社會主義的力量。

可見，根據右翼工黨分子的自白，宣揚似乎是站在美帝國主義和蘇聯之間而事實上是完全為美國服務的“第三種力量”，是為了欺騙人民。這是美國資本主義壟斷組織的一支思想武器，右翼社會黨人之所以運用它，是因為他們不敢直截了當地向工人們說出事實上自己在努力爭取的東西：“我們贊成由一小撮英美的財閥來統治世界。”由此就產生了“第三種力量”的謊言，其目的就是要把“第三種力量”的辯護士為華爾街服務這一點掩蓋起來。

1948年秋天以前，工黨首領還聲明說：他們把“聯合歐洲”只是作為一個政府完全地或部分地由右翼社會黨人組成的國家的聯盟。他們把這些國家的聯盟還描繪成一個“在西歐範圍內建成民主社會主義”的手段。但是，到了1948年9月，工黨的一個官方小冊子就聲明過，他們同意讓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甚至具有法西斯政府的國家加入“聯合歐洲”。根據這一點，希臘和土耳其的政府和阿登納的波恩政府參加了“歐洲理事會”。看來，現在該輪到其他的法西斯政府——西班牙和葡萄牙政府的份上了。

各种“联合欧洲”计划的主要目的，在“欧洲理事会”上和会外喧嚷和爭吵的主要目的，可以归结为这样一点：帝国主义为了反对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而勾结起来。右翼社会党人竭力协助帝国主义者，用虚伪的、他们捏造的“苏联侵略的危险”的叫嚣，来削弱和掩盖帝国主义阵营中日益尖锐的矛盾。不论美帝国主义者如何利用小恩小惠、大西洋联盟和美軍对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军事占领的办法，来力求解决或者削弱这些矛盾，但是，矛盾並沒有消除，矛盾尖锐化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欧洲反动分子和右翼社会党人都尽一切力量来“联合”资本主义的欧洲，叛賣和出賣本国的民族主权和独立以换取美元。在美帝国主义的壓力下，建立了“欧洲支付同盟”和“欧洲煤鋼联盟”。美帝国主义竭力爭取批准“欧洲防务集团”和“欧洲軍”的条約。它把这一切都叫作“欧洲联合”、消滅民族主权和建立“世界政府”方面的“步骤”和“阶段”。像其他国家的右翼社会党人一样，右翼工党分子也在奔波忙碌着，目的是为了在大西洋公約的掩飾下和美國“好心腸”的領導下，帮助实现“欧洲联合”。但是他們並沒有因此就消除而且也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国家之間的矛盾，消滅资本主义国家在帝国主义制度下經濟和政治發展不平衡規律的作用，廢除現代资本主义基本經濟規律的要求。

实现所謂的“欧洲联合”遇到资本主义国家之間愈来愈尖锐的矛盾。其中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基本矛盾的英美矛盾已經更加尖锐起来。美英的利益在各个大陸上都在發出冲突，美國正在尽量利用这个伙計在經濟上、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弱点，以便更多地排挤和掠夺它，更深地打入英帝國內部。

“事实說明：英國从來沒有一个敌人像它的美國‘朋友’那样給它这么嚴重的打击，並且从它的手中把它的帝國一片片地蚕

食了去。这位‘朋友’和英國屬於同一个集团，他把英國領土用作空軍基地，从而使英國處於一种痛苦的——我想說是危險的——境地；但他竟裝做是拯救英國免被‘苏維埃共產主义’复滅的救主。”^①

在战后的年代里，出現过許許多多英美競爭者之間的尖銳冲突的例子。在远东和近东，在非洲和西欧，美英帝國主义之間都存在着尖銳的矛盾。爭夺銷售市場、原料產地和投資範圍的斗争不断地在進行着。总之，斗争的基本路綫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是一样的。

早在兩次世界大战之間的时候，市場問題就成了資本主义極其重要的問題。这是市場相对穩定的后果，而这种穩定又是世界資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第一階段的結果。市場問題在資本主义总危机第二階段的条件下变得愈來愈尖銳了，这时候，世界資本主义市場的相对穩定已为絕對縮小所代替了。

拥有六億人口的遼闊的領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擺脫了資本主义体系，这也就意味着他們脱离了資本主义的世界市場。

統一的、無所不包的世界市場的瓦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經濟影响在經濟方面最重要的結果。这种情况决定了世界資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進一步加深。

两个互相对立的、平行的世界市場形成了。这是两个陣营——社会主义与民主的陣营和帝國主义与反动势力的陣营並存的經濟上的結果。

社会主义陣营的國家形成了自己的与資本主义市場平行的世界市場，从而在經濟上結合起來了，實現了經濟上的合作和互

① 馬林科夫“在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上關於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第19頁，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

助。在日益縮小的資本主義世界市場上，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競爭和爭奪市場的鬥爭大大地加強了。美國——現代資本主義的主要國家——提出的任務是壓制其他歐洲國家的工業，強迫他們購買美國商品。美國在奪取銷售市場鬥爭中主要的對手是英國。但在反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出口進攻的鬥爭中，英國殖民地和自治領的市場是英帝國主義的主要支柱。從1932年開始，英國同自己的殖民地和自治領的貿易就是在最惠的、優先的關稅的基礎上進行的。這就為英國同自己遼闊的帝國進行貿易，造成了一種最惠地位，這樣一來，美國的商品就不容易進入這個帝國了。因此，美國也提出了利用英國經濟依賴性的任務，以便破壞最惠關稅的制度，把英帝國廣闊的市場奪取過來歸自己所獨佔，打退英國工業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這種在虛偽的“貿易自由”的口號下向英國對外貿易體系所發動的進攻，成了華爾街對外經濟政策中最重要的一方面之一。在英國借自美國的戰後（1946年）第一次貸款（為數37億美元）的條件中，就包括了關於逐漸消滅帝國內部最惠權的條款。在根據“馬歇爾計劃”簽訂的雙邊協定中，在1948年哈瓦那國際貿易代表會議所通過的所謂國際貿易憲章中，都提出了這個要求。在1947年於日內瓦、1949年於安特衛普和1950—1951年在多爾基先後舉行的國際貿易代表會議上，美國一直要求取消英國的最惠關稅制度。結果，僅在流通範圍很小和品種很少的、並且在本質上不會損害英國輸出利益的一部分商品方面，廢除了最有利於英國的一些關稅。

在英國和美國之間進行的貿易戰爭，有時是隱蔽的，有時是公開的，在這種戰爭中，美國利用了經濟壓力和政治壓力的一切槓桿，利用了“馬歇爾計劃”和北大西洋公約，利用了英國對美國的依賴地位和軍事供給制度，來破壞英國的對外貿易。

和進攻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一樣，進攻英國對外貿易陣地最重要的工具之一，是要求停止同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進行貿易。這一要求在美國國會通過的巴特爾法案中，已宣布為一項給予軍事貸款和供應的條件。這種加與英國對外貿易的強制性的限制，為英國對外貿易的整個體系正在造成並且已經造成極為嚴重的震動，加強了英國對美國的經濟依賴性，使英國貿易差額的情況大為惡化，破壞了英國的經濟。

美國加緊破壞英國通貨——英鎊的國際陣地，是美國壟斷組織進攻英國經濟的一個組成部分。在自己的貿易政策中，英國所依靠的是最惠關稅制，在通貨方面它所依靠的是英鎊區。參加英鎊區的國家（幾乎包括英帝國的一切國家和許多其他的國家）都在倫敦保留有黃金儲備，進行國際結算用的是英鎊，而不是美元。英鎊區是英國對外貿易的支柱。由於美國最大限度地擴大輸出和竭力減少輸入的路綫，加入英鎊區的國家對美元感到日益增長的需要，不得不擴大同英國的貿易合同，因為為了購買英國商品，這些國家所需要的不是他們缺少的美元，而是它們在出賣英國商品時所得到的英鎊。這就引起了英美矛盾的進一步尖銳化。

除了貿易和通貨戰爭以外，還有爭奪原料（橡膠、錫、羊毛、棉花、銅等等）產地的鬥爭。美英爭奪石油的鬥爭全力展開了。英美帝國主義之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存在的協定（根據這一協定，英國給予美國在遠東的行動自由，同時保全自己在近東的主要陣地），事實上已被破壞了。美英石油壟斷組織爭奪伊朗石油的尖銳鬥爭已經展開了。美帝國主義力求消滅英國石油托辣斯在近東的陣地。在爭奪石油的鬥爭中，競爭者居然採取了恐怖和暗殺的手段（殺害了伊朗首相哈茲馬爾、黎巴嫩的前任首相拉阿德·雪里赫，殺害了英國的傀儡、約旦的國王阿卜杜

拉等人)。美國和英國之間還進行着爭取埃及統治權的鬥爭。關於在英帝國所屬各國內投資問題上的矛盾，上面已經談過了。

在英美帝國主義之間，存在着爭奪地中海地區軍事戰略陣地的尖銳鬥爭。地中海在英帝國主義眼里，始終是把英帝國同亞洲的殖民地聯繫起來的一條極為重要的生命攸關的神經。因此，直布羅陀、蘇伊士運河、馬爾他島以及英國艦隊的其他根據地始終具有特殊的意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帝國主義在西班牙（在這裡建立了許多軍事基地和空軍基地）、意大利、希臘和土耳其落了戶。它在法屬北非也生了根。這個美國海軍和空軍基地的系統，是用北大西洋軍事聯盟的名義建立起來的。同時，它還窺視着英國的交通系統，因為這個交通系統在戰爭中隨時都有被切斷的可能。因此，在英美帝國主義之間產生了尖銳的衝突。這個衝突是在下列這個問題上發生的：誰應該作北大西洋集團地中海聯合艦隊的總司令——是美國的海軍上將還是英國的海軍上將？

儘管在非洲殖民地中，歐洲帝國主義者也力圖尽可能緊密地聯合起來，但是，英美帝國主義之間在非洲也進行着尖銳的鬥爭。美國的資本和影響侵入南非採取着日益廣闊的規模。按照美帝國主義者的意願，太平洋公約必須把澳大利亞、新西蘭和日本包括在一起，以便使這些自治領逐漸脫離英國。美帝國主義把日本的壟斷組織恢復起來作為英國在東方市場上的競爭者，把德國的壟斷組織恢復起來作為英國在西北歐的競爭者。華爾街強迫英國進行的軍備競賽本身，被華爾街看作一個破壞英國經濟的手段——軍事生產的增長必然使英國的輸出減少，破壞英國在世界市場上的國際貿易陣地。

在使西德軍國主義復活問題上，也暴露出了這些矛盾，為了“調和”這些矛盾，美帝國主義使用了各種進行經濟壓力和政

治压力的手段——以減少或者停止軍事“援助”，減少或者停止購買战略物資，減少或者停止向英國出售缺乏的原料相威脅。

因此，美國的妄圖統治世界的人們以及他們的僕从國發表了無數的聲明，說“聯合歐洲的問題”首先並且主要的是“西德的問題”。他們把恢復由美帝國主義者指揮和控制的德國國防軍，看作是建立一支能夠同歐洲各民主國家作戰的軍隊的途徑。

國際帝國主義在結成軍事集團的政策中，力求利用一切反動勢力。因此，在西班牙建立美國的軍事基地，把希臘和土耳其變為帝國主義反動勢力和威脅巴爾干和平的支柱等等。但是，華爾街並不指望西班牙、土耳其和希臘會成為國際帝國主義在歐洲的一個比較可靠的堡壘。

法國的人民羣眾堅決地為保衛民族獨立，為反對外國帝國主義而鬥爭，法國的力量在多年反對越南人民的戰爭中消耗殆盡了。因此，按照美國壟斷資本家的估計，法國並不是一個同歐洲民主力量作鬥爭的可靠的支柱。

國際反動勢力把自己主要的希望，寄托在恢復德帝國主義的武裝力量上面。因此，華爾街指望着由希特勒的將軍，被釋放的戰犯，黨衛軍來充當德帝國主義未來武裝力量的骨幹。因此在“歐洲鋼鐵聯營”中，把希望寄托在德國重工業上面。但是，正是從這裡產生了美國、英國和法國在这一切問題上激烈的糾紛和尖銳的矛盾。

工黨政府曾以參與建立“大西洋軍隊”和籌備建立“歐洲軍”的方式，來竭力促進西德帝國主義復活的準備工作。這一點表現在1950年北大西洋聯盟所舉行的、工黨政府的代表也曾出席的布魯塞爾代表會議的決議中。但是，這些決議完全沒有削弱北大西洋聯盟各國之間，特別是英美之間，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矛盾。

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還表現在關於用什麼形式來實現“統一的歐洲”的爭論上。英帝國主義者主張“職能的聯合”，即“在英國的領導下”建立一系列的全歐壟斷組織，而把政治上聯合（和關稅壁壘的消滅）的問題置之不理。英帝國主義既不願意又懼怕把自己同“全歐聯邦”聯繫起來。事實上，它只不過是英美“合作”體系中的一個小伙計，它害怕被大洋彼岸的那個更有經濟力量的伙計完全併吞下去，本來對這個伙計的依賴就已經夠嚴重的了。英帝國主義想建立的是一個作為本國壟斷組織的附屬品的全歐壟斷組織體系。

“伙計們”之間的矛盾尖銳到什麼程度，從圍繞着“馬歇爾計劃”而鬥爭的歷史中可以看出來。“馬歇爾計劃”是根據美國壟斷組織和將來會作為他們的同盟者而活動的西德壟斷組織的利益提出來的。“馬歇爾計劃”的目的，是要把西歐的冶金和採煤聯合到統一的超托辣斯中去，這個超托辣斯在德國壟斷組織的指揮下和美國的領導下，具有“超民族的權力”。其實從“職能聯合”的擁護者的觀點來看，“馬歇爾計劃”也就是“在西歐的範圍內”建立起右翼工黨分子所主張的那種超托辣斯。可是工黨政府急忙反對英國參加“馬歇爾計劃”，因為這同英國壟斷資本的利益是矛盾的。英國冶金業壟斷組織參加這種“超托辣斯”，意味着他們對德國的冶金業處於一種從屬和依賴的地位，就有使英國壟斷組織的利潤下降的危險。

可是，工黨政府又竭力要為復活德國軍國主義創造經濟基礎，因而它對“計劃”本身並沒有表示反對，只是提出自己不參加這個計劃。

主張立即實現“全歐聯邦”的法國右翼社會黨人，執行着華爾街的直接指令。華爾街的意願是把英國套在“全歐聯盟”里面，以便不費多大力氣就把它和它的帝國併吞掉。“全歐聯邦”對英

帝國主義將是一個嚴重的打台。因此，在右翼社會黨人的代表會議和“歐洲理事會”的會議上，在英國的右翼工黨分子和直接間接地執行華盛頓指令的法國與比利時社會主義的叛徒之間，都發生了尖銳的沖突。為了回答建立“歐洲聯邦”的要求，工黨政府的代表達爾頓聲明：“堅持歐洲聯邦就是要炸毀歐洲理事會。”貝文在1950年11月14日在下議院發表演說時曾支持達爾頓，他聲明說，英國反對歐洲的任何一種聯邦組織。當時也在下議院發言的外交部議會秘書戴維斯說道：首先，“歐洲理事會”仍舊應該是“社會輿論的集議場所”，即各式各樣反動分子的清談館，它現在就是這樣的所在。這些圍繞着“聯合歐洲”問題的矛盾和糾紛，在1952年10月於米蘭舉行的右翼社會“國際”代表大會上都充分地顯示出來了。於是右翼社會黨人不斷地用謊言和惡意的宣傳來力求掩蓋的東西也暴露出來了。這就是一切“歐洲統一”的鼓吹者唯一的共同之點是希望在組織和準備新戰爭方面勾接起來。可見，“聯邦主義者”和“職能主義者”之間的爭論表現出帝國主義陣營內部的尖銳矛盾。這些矛盾在發展的進程中越來越尖銳起來了。

儘管由於戰爭與通貨膨脹的情況和經濟軍國主義化把新的世界經濟危機人為地推遲了一些，但已不可避免地迫近了。危機預示着，那些已被軍國主義化和被美國的統治所嚴重破壞的馬歇爾化國家的經濟將受到毀滅性的打擊。但是，同新的經濟危機一起到來的，是西歐壟斷組織高額利潤下降的威脅，而這種下降則是美國壟斷組織用各種政策加緊造成的。一時的軍事—通貨膨脹的工業擴大，曾把西歐各國的壟斷資本家暫時地聯合起來，因為這樣作除保持和擴大美國壟斷組織最大限度的利潤外，也保證他們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利潤。這一點，首先也說明華爾街為什麼能夠強迫西歐的政府接受自己的意志——

由英國、法國、以及其他馬歇爾化國家支持對朝鮮的武裝干涉，要這些政府對人民中國貿易採取禁運（禁運直接同英國的利益相矛盾）等等。但是，日益迫近的經濟風暴的第一記打擊已經聽得見了。如果說在1952年英國重工業和軍事工業的壟斷組織比1951年提高了利潤，那末，消費品生產工業部門的壟斷組織所得到的利潤却少於1951年。對英國的打擊特別嚴重的世界貿易額的絕對減少，在1952年已經開始了。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在英國和在其他的國家一樣，已經出現了工業生產量降低的現象。

產生大西洋公約伙伴間的日益增長的矛盾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存在於引起高額利潤破產的日益迫近的危機當中。依賴美國的結果，由於華爾街竭力限制歐洲商品輸入美國的政策而日益嚴重的美元缺乏的現象，都以前所未有的規模顯示出來了。因此，西歐國家資產階級中越來越多的一部分人對於擴大同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的貿易，對於同蘇聯取得協議的傾向日益加強了。因此，英美之間、法美等國之間的矛盾尖銳化了，大西洋軍事集團內部的鬥爭加強了。但是，這一切都表明，建立“統一的西歐市場”和“聯合歐洲”的指望，是毫無根據的，是短命的。因此，就產生了由於批准“歐洲防務集團”和“歐洲軍”而出現的越來越尖銳的鬥爭和日益增長的矛盾。因此，由於朝鮮戰爭、由於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等等而產生了種種糾紛。德國和日本的工業在世界市場上競爭日益劇烈，在這方面也起了作用。在這種帝國主義陣營各種矛盾日益尖銳的情況下，建立“全歐議會”和“全歐憲法”的世界主義草案的虛偽性和不現實性，就越來越清楚地顯示出來了。

列寧主義教導說，資本主義本身有兩個趨向：一個是民族運動的覺醒、民族國家的建立和反對民族壓迫的鬥爭；另一個

是國家之間联系的加强，資本、經濟生活、政治等等的國際統一的建立。“對於帝國主義，這兩個趨向是不可調和的矛盾，因為帝國主義若不剝削殖民地，若不用強力把殖民地束縛在‘統一的整体’範圍內，便不能生存；因為帝國主義只有靠兼併手段和夺取殖民地才能使各民族互相接近，而如果不实行兼併手段和夺取殖民地，那它就根本不成其为帝國主義。

對於共產主義，却恰巧相反，這兩個趨向不过是一件事情的兩方面，就是被压迫民族擺脫帝國主義压迫的这件事情的兩方面，因此共產主義知道：各民族在統一的世界經濟中的联合，只有根据相互信任和自願協定的原則才能实现；各民族自願联合的建立，只有經過使殖民地离开‘統一的’帝國主義整体而分立的道路，只有經過使殖民地变为獨立國家的道路才能达到。”^①

为替建立“欧洲联邦”的必要性作辯護，右翼社会党人提出了“大經濟空間”的旧理論，这种理論是德帝國主義的經濟學家早在威廉二世时所努力制定的。

这一理論的實質在於断定小獨立國家的时代已經过去，說現在的技術發展和大規模生產的条件使得它們已無法存在。所謂消滅它們的獨立性和限制、消滅它們民族主权的必要性的說法，就是从这里產生出來的。

从現代的技術水平很高和各民族在經濟上趨向接近的事實，作出了一个反動的結論：必須用服从大的帝國主義國家的办法，來消滅小國家的民族獨立。右翼社会党人掩蓋了这一情况：美帝國主義爭取消滅民族主权和建立世界霸权的斗争，不能不意味着極端地加强對於欧洲獨立國家的剝削和民族压迫。这样

① 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第83—84頁，1949年莫斯科中文版。

一來，“大經濟空間”理論就為帝國主義最富於掠奪性的侵略以及加強對民族和殖民地的瘋狂壓迫作辯護。美帝國主義爭取建立世界霸權，爭取以強制手段統一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因而使帝國主義所固有的不可調和的矛盾，達到了空前尖銳的程度：一方面是各國人民反對民族壓迫，要求建立民族國家的趨向；另一方面是僅僅用加強剝削、殖民地佔領和軍事侵略的辦法來加強各民族之間聯系的趨向。

現時的右翼工黨分子不但不掩蓋反而竭力證明，“聯合歐洲”計劃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幫助歐洲帝國主義者用犧牲殖民地和附屬國人民利益的辦法來減少經濟上的困難。

當右翼工黨分子替加強剝削殖民地的“歐洲經濟合作計劃”作辯護，他們首先指望，用歐洲殖民國家聯盟的辦法來消滅殖民地各國人民的民族解放鬥爭；其次他們指望歐洲帝國主義者共同行動，以便提高從殖民地取得的利潤，擴大從殖民地榨取的原料和糧食的数量。右翼社會黨人用“民主社會主義”的幌子，把他們這種對殖民地加強剝削的打算掩蓋起來了。

當然，每一個歐洲殖民國家依靠共同行動來加強對殖民地剝削的目的，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保證本國壟斷資本家最高的利潤。

殖民剝削者聯合的企圖表現在亞洲被壓迫人民民族解放鬥爭的一致性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帝國主義者在聯合國中共同反對印度尼西亞的人民。只有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在聯合國中保衛印度尼西亞人民的利益。

在法帝國主義反對越南人民的戰爭中，帝國主義者也勾結起來了。英帝國主義送去武器、提供交通工具运送法軍，它是盡一切可能參加了這次戰爭的。

在力求團結歐洲各殖民國家來共同利用非洲殖民地的資源

以及鎮壓非洲各國人民方面，帝國主義者也勾結起來了。這一反對殖民地國家勞動人民的帝國主義聯盟，在多次殖民地國家的、“統計非洲大陸及其資源”的會議上，表現出來了。

反對美帝國主義也是歐洲帝國主義者在剝削殖民地方面聯合起來的一種傾向。在西歐殖民國家多次討論非洲殖民地的會議和代表會議上，表現出歐洲殖民國家和美國之間的這些矛盾。

英帝國主義力求通過工黨政府，來領導實現帝國主義者用以鎮壓非洲人民和進行軍備競賽的陰謀。但是在這裡，美帝國主義也力求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利用歐洲國家的非洲殖民地。因此，美國壟斷組織加緊向歐洲國家的非洲殖民地輸出资本，奪取法國和比利時在非洲殖民地中的一系列的障地。但是，這就使帝國主義的矛盾尖銳起來。

以工黨領袖為首的右翼社會黨人經常宣傳，要歐洲的殖民剝削者聯合起來一同鎮壓殖民地的人民。右翼工黨分子承認美國在準備戰爭來反對那些業已擺脫帝國主義統治的或者正在爭取本身解放的亞洲各國人民的鬥爭中，應該起領導作用。

* * *

貝文在1945年11月23日的演說中，提出了一個建立“世界政府”的世界主義的總綱領。貝文在演說中聲明說，必須召開“世界大會”，這個大會將制定“世界法律”和建立“世界政權”與國際警察。

實際上，這個演說就是一個建立英美帝國主義世界霸權的綱領。

列寧寫道：“簡單地說來，‘世界霸權’就是帝國主義政策的內容，帝國主義戰爭是這一政策的繼續。”^①

① “列寧全集”俄文版第23卷第24頁。

在美國具有資本主義世界中經濟上和財政上優勢的條件下，宣揚“世界政府”就意味着替美國的世界霸權作辯護。英帝國主義對這些計劃的支持，它對於華爾街的依賴以及它變為美國的小伙計，都使美帝國主義建立資本主義世界霸權的打算乍一看來，好像是十分現實的。但是，資本主義的世界在現在已經不是整個世界，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了。這一情況，也就是除帝國主義和反動的世界以外還有社會主義和民主的世界存在這一情況，使美帝國主義建立世界霸權的如意算盤實際上成了幻想。這就是為什麼結成了大西洋聯盟，指望着用軍事力量來反對民主國家，反對那些不願服從新出現的獨霸世界的野心家的國家。

華爾街力求通過大西洋公約、太平洋公約等等形式，把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組成軍事聯盟，來實現得到右翼工黨分子支持的美國的“世界政府”的口號。

因此，北大西洋公約剛剛締結，右翼社會黨的報刊就宣稱：北大西洋公約是一個實現“世界政府”這一世界主義願望的步驟，這決不是偶然的。

右翼社會黨人宣揚“大西洋各民族友好”，把“世界政府”的理想同組織“國際警察力量”聯繫起來了。這種國際警察力量是反對什麼人的呢？顯然，在該國的反動政府認為有必要使用這種力量來鎮壓罷工、鎮壓工人階級、以及其他民主階層羣眾性的發動的情況下，這種力量就會用來反對資本主義國家里的無產階級。組織這種警察力量的目的，還在於鎮壓和摧殘那些不屬於無產階級但爭取和平、反對戰爭和維護民族主權的階級和階層。這種國際警察力量還可能用來鎮壓和平定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老實說，除在軍事上勾結起來反對社會主義和民主陣營以外，無論前一種或後一種任務都是大西洋聯盟的極重要的

因素。

但是，問題還不僅是這樣。帝國主義者提出的任務是鎮壓人民運動，鎮壓爭取和平的民主鬥爭，鎮壓工人階級在大西洋公約各國以及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中反對資本的鬥爭。

右翼社會黨人支持和辯護大西洋公約和美帝國主義在西歐的各種政策，它扮演著新出現的獨霸世界的野心家（他們正在步著曾經兩度企圖建立世界霸權的德帝國主義者的後塵）的直接幫兇。

歐洲資本主義國家服從美帝國主義的結果，只能是民族鬥爭更加尖銳化，各國人民越來越要求擺脫美帝國主義的壓迫。不管它是“馬歇爾計劃”、北大西洋公約或是任何限制民族主權和進行民族壓迫的形式。

斯大林在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的演說中說道：“從前資產階級被當作民族的首領，它維護民族的權利和獨立，把民族的權利和獨立看得‘高於一切’。現在，連‘民族原則’的影子也沒有了。現在，資產階級出賣民族的權利和獨立來換取美元。民族獨立和民族主權這面旗幟已經被拋棄了。毫無疑問，正是你們，共產主義和民主的政黨的代表們，必須舉起這面旗幟，打着這面旗幟前進，如果你們願意作自己國家的愛國者的話，如果你們願意成為自己民族的領導力量的話，除了你們以外，再沒有人會舉起這面旗幟了。”^①

右翼社會黨人在猛烈地抨擊民族主權和各國人民獨立的掩飾下宣傳著“統一的歐洲”和“世界政府”的口號。這種背叛民族的宣傳在英國和在其他資本國家一樣，使得右翼社會黨人脫離了不願屈服於外國帝國主義的廣大羣眾而陷於孤立。

^① “斯大林在蘇聯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第6頁，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

人民羣众热爱祖國，是自己國家的愛國者。在目前的情況下，工人階級是民族的領袖，是民族獨立和本國主權最徹底的保衛者。它把農民、知識分子和城市居民中小資產階級的階層團結在自己的周圍。工人階級是徹底反對反愛國主義、反民族的世界主義思想体系的。

資產階級及其右翼社會黨人，宣揚為了服從“美國生活方式”而拒絕本民族的文化遺產。每個國家的無產階級，都是本民族、本國人民在歷史發展進程中所創造的一切優秀成果的繼承者。

英國共產黨揭露了英國資產階級各個政黨的叛賣民族的行為，並反對它們所執行的使本國服從美帝國主義的政策。共產黨舉起了資產階級及其右翼工黨走狗所拋棄的民族獨立和民族自主這面旗幟。

在“英國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的綱領中指出：“共產黨聲明：保守黨、自由黨和工黨的領袖們以及他們在報章雜誌和英國廣播公司里的代言人，正把英國的利益出賣給金元帝國主義。黨號召一切真誠的愛國分子團結起來捍衛英國的民族利益和獨立。

我們為一個自由、強盛和獨立的英國而奮鬥。我們不要祖國向任何外國屈服低頭，我們要的是與承認並尊重英國民族利益的一切國家友好相處，結成平等的同盟。”^①

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工人階級是祖國民族獨立和民族主權的保衛者，同時它又把國際主義和各國工人階級在爭取消滅資本政權的鬥爭中不可分割的聯繫和團結，同資產階級的世界主義對立起來。工人階級的國際主義同它的愛國主義是緊密地聯系

① “英國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第 10 頁，1953 年人民出版社版。

在一起的。

列寧主義對於將來建立在世界各國資本主義被消滅和社會主義取得勝利的基礎上的民族融合的問題提出了符合國際主義的解決辦法。這種解決是對無產階級以及全體進步人類都有利的。這個學說，是一支反對各種以辯護美帝國主義統治世界的意圖為目的世界主義理論的有力武器。

工人階級的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同壟斷資本及右翼工黨奴僕的反動的世界主義和沙文主義是針鋒相對的。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及共產黨從生產力業已超過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範圍這一事實出發，得出結論說：必須推翻資本主義政權，消滅資本主義所有制，代之以社會主義的所有制。

同時，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又有社會主義已經取得勝利的國家——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這個令人鼓舞的榜樣。

社會主義使各個民族團結起來。由於消滅了資本主義、壟斷組織和對人的剝削現象，社會主義在平等和友愛的基礎上來團結各個民族。

工人階級的國際主義是以各國人民平等和友好為出發點的。1948年4月，斯大林在招待芬蘭政府代表團宴會上的演說中曾說道：“許多人不相信大民族與小民族之間的關係能夠成為平等的關係。但是我們蘇維埃人認為：這樣的關係是能夠有的，而且是應當有的。蘇維埃人認為：每一個民族，不論其大小，都有它自己的、只屬於它而為其他民族所沒有的本質上的特點、特殊性。這些特點便是每一個民族在世界文化共同寶庫中所增添的貢獻，補充了它，豐富了它。在這個意義上，一切民族，不論大小，都處於同等的地位，每個民族都是與其他任何民族平等的。”^①

① 斯大林著“馬克思主義與民族、殖民地問題”第381頁，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

社会主义本身帶來了各國人民的友誼，他們的聯合是建立在民族文化、藝術和文學全面發展的基礎上的。社会主义就是和平和各國人民的兄弟友誼，它同戰爭和对帝國主义所具有的壟斷組織的服從是对立的。

苏联沒有資產階級的民族。在旧的資產階級民族的廢墟上產生和發展着新的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民族比任何一个資產階級民族是要團結得多的，因為他們沒有毀壞着資產階級民族的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他們比任何一个資產階級民族都具有更大的全民性。

社会主义保證各國人民的民族文化、語言和創作得到自由的全面的發展，他們的真正的平等和兄弟友誼。在將來，在社会主义取得全世界勝利的時期，民族逐漸融合的条件將要在社会主义國際主义的基礎上創造出來。斯大林曾指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範圍內勝利的時期和社会主义在一个國家內勝利的時期的區別，首先在於前者消滅一切國家里的帝國主义，消滅征服異民族的野心以及對於民族奴役的威脅所感到的恐懼，根本消除民族猜疑和民族仇視，把各國民族在統一的世界社会主义經濟體系內聯合起來，從而創造為一切民族逐漸融合為一個整體所必需的实际条件。”^①

列寧主义關於社会主义各民族在將來的世界社会主义經濟中融合的學說，關於社会主义民族和資產階級民族的理論，是揭露各種各樣反動的以及其他世界主义夢囈的有力武器。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 11 卷第 295 頁，1955 年人民出版社版。

第八章

“民主社会主义”的破產以及工党的危机

一 英國無產階級的战斗的傳統

馬克思列寧主義教導說，基礎是特定社會的經濟制度。而政治、法律、宗教、哲學、藝術觀點，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政治、法律等制度則構成社會的上層建築。

每一個社會經濟制度都有與它相適應的上層建築。隨着特定的經濟基礎發生變化和消滅，與它相適應的上層建築也就會一起發生變化和消滅。隨着新的基礎的建立，與這個基礎相適應的上層建築也就會建立起來。

上層建築對基礎並不是消極的，而是積極的。上層建築一經產生，就成為巨大的積極力量，幫助基礎的形成和鞏固。在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上層建築在消滅舊的經濟關係、衰朽階級和形成並鞏固新的社會主義制度方面，起着巨大的積極作用。

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上層建築對基礎的積極作用的原理，對於了解現代資本主義發展的特點具有重大的意義。

建立新的社會主義制度以及與之相適應的上層建築的物質前提，早就完全成熟了。在這種條件下，腐朽的垂死的資本主義的舊的上層建築，積極保護舊的衰朽的基礎。現代資本主義的上層建築及其基礎已經腐朽透頂，並成為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極大障礙了。因此，資產階級上層建築極力保護資本主義社會衰朽的經濟基礎，其結果只能是各資本國家經濟上政治上的困

難、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危機愈來愈深刻，愈來愈尖銳，最後必然引起革命爆發。

但是不管某一個或所有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基礎和上層建築已經怎樣腐朽了，資產階級國家是會自動滅亡的。資產階級國家只有在以現代社會最先進的階級即無產階級為領導的人民羣眾的打擊下，才會滅亡。因此，資本主義社會全部國家的、法律的、政治的上層建築——教會、學校、軍隊、監獄——都被利用來瓦解、破壞、使無產階級失去領導，鎮壓無產階級及其組織。這也就說明了。

現代英國是作統治地位的政治、法律等觀點及與它們相適應的制度極端頑固守舊，壓迫和扼殺工人階級的顯明例証。

實際上，消滅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用社會主義社會制度來代替它的前提，在英國早就成熟了。英國先於其他一切國家即從十五世紀起就特別殘酷和徹底剝奪了自由農民，並使他們變為無產者。早在十九世紀中葉，城鄉絕大多數居民都已成了雇傭工人。馬克思關於 1870 年的英國寫道：“這是唯一的國家，在那裡已經沒有農民，而土地所有權集中在少數人手里”^①。

1941 年英國總共有 28 萬個農場主，其中只有 12 萬農場主不利用雇傭勞動。小農場主占自由居民 0.5% 弱。而且，大部分小農場主自己沒有土地，而是向地主租種土地。16 萬資本主義農場主中，有 10 萬是大農場主，他們不但經營巨大的資本主義農業，而且還常常參加收購農產品的壟斷組織。

1941 年農業工人計有 70 萬，比農場主約多 2 倍，比不利用雇傭勞動的農場主多 5 倍。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農業人口的比重都不像英國這樣小。而任何一個資產階級國家的雇傭工人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 13 卷第 1 編第 345 頁。

在居民中的比重也不像英國这样大。

共產黨在農業方面面臨的主要任务，就是組織農業無產階級起來为自己的經濟和政治的利益与要求而斗争。

任何一个資產階級國家無產階級在全体居民中的比重都不像英國这样大。根据共產主义刊物的材料，英國三分之二居民是雇傭工人，而根据最近的調查材料，雇傭劳动者（包括職員在內）占全体居民85%。

在法國和意大利，工人階級的基本羣众是跟着共產黨走的，而在英國情况就不同了，大部分英國無產階級还处在資產階級思想体系的影响之下。

英國工人运动之所以落后，狄金和摩里遜及其他右翼工党分子之所以还能假借工人的名义進行活动，是因为几十年來英國一直在工業和貿易上占居壟断地位，而且一直是一个大殖民帝國。其次，还因为資產階級思想体系、資產階級政策、資產階級政党、資產階級法律等等制度（包括学校、教会、刊物、王权在內）对工人羣众有强有力的影响。

英國工人階級之所以迟迟未能擺脫右翼工党的膿瘡，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英國統治階級的特別灵活和圓滑。

斯大林在与英國作家威尔斯的談話中說道：“大体上應該說：在一切統治階級中間，英國的統治階級，無論是貴族階級也好，或資產階級也好，从自己的階級利益看來，从保持自己的政权看來都是最聪明、最圓滑的。……不論在美國，也不論在德國，更不論在法國，我都想不到資產階級方面会有这样圓滑的階級战略。为了巩固自己的統治，英國統治階級从不惜实行若干的讓步和改良。”^①

^① “与英國作家威尔斯的談話”第22頁，1932年人民出版社版。

英國資產階級特殊的圓滑，在战后时期完全表現出來了。右翼工党分子以特別巧妙的手段把一些旨在巩固英國資本主义的措施冒充为社会主义。

为了鉗制羣众使他們不走上階級斗争和消滅資本政权的立場，工党政府实行了某些改良。这些改良当然絲毫也沒有改变資本主义的基礎。不但如此，这些改良的目的还在於巩固資產階級的統治。这些被右翼工党分子冒充为“社会主义”措施的改良，是欺騙羣众的相当重要的手段。

英國共產主义刊物把这些改良与1906年至1914年期间劳合·乔治政府的同样的改良作了正确的类比。劳合·乔治政府当时曾实施了养老金法（70歲以上）、疾病和失業保險法。劳合·乔治政府企圖用这些細小的改良來巩固英國資本主义的地位。

正当英國資產階級的統治的处境比劳合·乔治政府时代危險得多的时候，工党政府也干了同样的勾当。毫無疑問，工党政府在它执政的最初兩年內所实行的改良，使得右翼工党首領暂时減弱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时在羣众中有过的革命思想。在这些改良的掩蓋下，壟斷資本向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展开了進攻，大規模地掠奪人民。

列寧寫道：“自由資產階級從來都是一只手拿出改良，另一只手又把它收回去，取消得干干淨淨了，利用改良來奴役工人，來分化工人，來永久維護对劳动者的僱傭奴役。因此，即使改良是完全真誠的，事实上也变成資產階級用來腐化墮落及削弱工人力量的工具。世界各國的經驗都証明，工人相信改良主义者，結果总是要受騙的。”^①

① “列寧全集”俄文版第19卷第334頁。

列寧對於自由資產階級和一般改良主義者所實行的改良的特征的這種說明，也完完全全地適用於工黨分子的改良。工黨分子一只手實行了某些旨在欺騙工人的改良，而另一只手則逐漸把它們奪回去，來迎合英國壟斷資本的要求。右翼工黨分子之上台執政及工黨政府6年來的活動證明了英國資產階級在戰後時期又要弄了它的特殊圓滑和善於欺騙人民的手法。

右翼工黨分子之所以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和戰後仍然在羣眾中保持住自己的影響，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英國沒有被法西斯匪徒占領過。

斯大林在1946年3月與“真理報”記者的談話中指出，共產黨的影響在為法西斯主義統治過或為法西斯匪徒占領過的歐洲各國的增長，並不是偶然的。共產黨人影響的增長，是因為在法西斯統治歐洲的年代里，正是共產黨人表明了自己是反對法西斯主義，為各國人民爭取自由的奮不顧身的、勇敢而可靠的鬥士。正因為這樣，千百萬勞動者、普通人在反抗法西斯主義的鬥爭火焰中檢驗了共產黨人，終於了解到並且敢於作出結論說：共產黨人是完全值得人民信任的。

在不曾為法西斯匪徒占領過，不曾為法西斯主義統治過的英國，右翼工黨分子就有可能把自己冒充為反法西斯主義的鬥士。在1945年大選中，工黨便是打着徹底消滅法西斯主義的旗幟出現的。這絲毫也沒有妨礙右翼工黨分子以執政黨的身份把法西斯戰爭罪犯從監獄里釋放出來，甚至為了監禁過他們而向他們道歉。右翼工黨分子的這付反法西斯主義的假面具，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英國羣眾中保持他們的影響，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的。

工黨首領為了欺騙羣眾而散佈一種理論，說工黨具有一種特殊的本性，工黨是不列顛精神、“不列顛思惟方式”的特殊產

物。在威廉斯看來，階級斗爭“是与英國人的立憲性格格格不入的”。达尔頓宣稱，英國人具有一種互不仇視的特殊性格。總之，散佈這些形形色色的論調的目的，是要證明英國工人階級按其本性來說，是与階級斗爭格格不入的，它具有一種馴順地服從現存條件即資本家的性格。

用這種借口進行欺騙的本身便已證明，右翼工黨分子為了把羣眾掙制在自己的影響下，竟不惜採用詭辯術、採用荒謬的冒險的捏造。

英國是階級斗爭特別是無產階級反對資本的斗爭尖銳化的顯明例証。英國無產階級從工業革命時期起便創造着自己的歷史。恩格斯寫道：“英國工人階級的歷史，開始於十八世紀下半葉發明蒸氣機和紡織機的時候”^①。英國工人階級在自己的歷史上，與資本作了几十年的斗爭。英國無產階級擁有世界上最老的工會組織，並在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的几十年來為建立自己的組織和資本展開了激烈斗爭。

馬克思主義者不止一次地着重指出工會的巨大重要性，它是工人在反對資本的斗爭中的經濟組織，是工人的階級團結的萌芽。列寧指出工會是工人階級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的一個巨大進步，因為它是工人由渙散和孤立無援的狀態進到工人階級團結的萌芽。

波立特在1951年出版的題名為“致一個工會會員的公開信”的小冊子中寫道：“我們正是以英國工人在世界上最先建立工會而自豪。”

十九世紀上半葉英國職工運動的歷史，是建立工人的組織的歷史，是無產階級為自己的經濟利益而斗爭的歷史。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3卷第301頁。

憲章派運動是與資本作奮不顧身的鬥爭的傑出榜樣。這個運動是作為爭取實現“人民憲章”六條（包括秘密投票、廢除代表的財產限制、男子普選權等等要求）的運動而產生的，而且它一開始就是工人運動。

憲章派運動激起了羣眾性的罷工，大規模的示威遊行和武裝暴動。它是無產階級的還不發展的政治運動。但是，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總是把它評價為英國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傑出榜樣。列寧在嘲笑第二國際和“第二半國際”的首領時寫道：“怪聰明的人們！他們怎樣也猜想不到，從國際革命發展的觀點看來，從憲章運動轉到匍匐拜倒於資產階級面前的韓德遜之輩，或者是從瓦林轉到雷諾得爾，或從威廉·李卜克內西和倍倍爾轉到舒德庫姆、謝德曼和諾斯克，只不過好像汽車從幾百俄里長的平坦的公路上‘轉’到這條公路上的爛泥塘，轉到幾俄尺長的水溝里去罷了。”^①

英國無產階級在與資本作鬥爭中不止一次地表現了堅強的战斗精神。因此，右翼工黨首領高談什麼英國人民具有彷彿和尖銳的階級鬥爭傳統格格不入的“特殊性格”，這是對英國的真實歷史的捏造。

在事實的顛扑不破的邏輯面前，工黨思想家想盡辦法兜圈子。艾德禮、威廉斯等人甚至承認十九世紀在英國進行反對資產階級統治的革命“似乎還是可能的”。據說現在却不然了。因為資產階級大部分都已變“好”並且也“同意社會主義”了，而無產階級按照他的“英國性格”來說，情願走改良主義的、妥協主義的道路，不願進行反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至於談到什麼現代英國無產階級和階級鬥爭格格不入的斷言，那麼它只是對歷史

① “列寧全集”俄文版第33卷第314—315頁。

事实的粗暴無礼而已。在英國，帝國主义时代的標誌是階級矛盾和階級斗争的急剧尖銳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从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这个时期的特征，是資本向工人進攻，工人階級生活費用不断上漲，無產階級的貧困化日益加深。結果是工人反对資本的階級斗争日益尖銳化了。不管工党首領怎样阻撓，罢工斗争在普通工人中間开始了。工会首領不是出於对工人羣众的恐懼而被迫卷入積極的斗争，就是丧失了自己的威信。礦工的罢工斗争开始於1905年。1911年是鐵路員工罢工的一年。1912年展开了全國礦工的罢工。1914年建立了礦工、鐵路工人和运输工人的三角联盟情况顯然是向总罢工發展。但是蓬勃高漲的工人运动暂时被战争打断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結束及战后的最初几年，標誌着工人运动的强大革命高漲及罢工斗争的空前發展。讓我們回憶一下事变發展的情况因为从今天的观点看来，这个时期是非常有教益的，並且是值得作为現在帝國主义侵略思想的鼓吹者的可怕和同意的。

英國工人階級为了回答帝國主义者对年輕的苏維埃共和國的干涉，在1918到1919年期間起來反对帝國主义者，要求停止干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國工人階級的革命高潮正是由於“不准干涉苏維埃俄國”的运动的發展而在1920年到了頂点。1920年春季，國際帝國主义煽动汎波蘭進攻苏維埃俄國，引起英國工人羣众的羣情激憤。1920年5月10日，倫敦造船工人為抗議貴族波蘭向苏維埃共和國实行强盜進攻而發起了罢工，1月下半月当紅軍顯然已打敗了波蘭的时候，英帝國主义出來拯救波蘭白匪，1920年7月21日，英國政府發佈了反苏俄战争的宣言，並在8月3日向苏維埃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英國工人階級

奋起抗議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的這種威脅。

工人羣眾在遞給政府的幾千份抗議書中，要求不准干涉蘇維埃共和國。8月8日，在工會理事會領導下，在全國每一個城市都舉行了反對與蘇俄作戰的示威遊行。建立了“中央行動委員會”，並在全國建立了地方“行動委員會”。1920年8月，英國工會執行委員會召開的全國代表會議，通過一項議案，宣佈堅決“反對對蘇維埃政府作任何形式的軍事和海上干涉”。全國代表會議責成“中央行動委員會”工作到保證承認蘇維埃政府時為止，並“號召羣眾採取局勢所要求的任何一種停工形式來影響政府的對外政策”^①。

列寧關於“行動委員會”的建立說道：“這是英國全部政治中的偉大變革。與議會並列……產生了自己作主的依靠工人的工會的‘行動委員會’，而英國工會會員計有600多萬。為了回答政府對蘇俄作戰的企圖，工人們宣稱他們不容許這樣做，並說：我們也不許法國作戰，因為法國人靠英國的煤炭過活，如果煤炭生產停工，這對法國就是一個重大的打擊。”^②

正如列寧在1920年8月11日所寫的：“英國在總罷工面前已經喪魂落魄了，因而勞合·喬治宣稱，他建議波蘭接受我們的停戰條件……。”^③英國（然後是法國）帝國主義對蘇俄實行公開英法干涉的計劃，由於英國無產階級的打擊而被撕毀了。英國政府終於不敢實行自己的戰爭威脅。1920年8月英國無產階級所表現的這種出色的革命主動性，乃是对現代戰爭挑撥者的嚴厲警告。

① 引自“Labour Monthly”，March, 1952, p. 115。（着重點是我加的——德伏爾金）。

② “列寧全集”俄文版第31卷，第282頁。

③ 同上書第241頁。

“行动委员会”是与议会并列产生的机关。“行动委员会”之所以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在英帝国主义者 1920 年夏季重新组织干涉的计划被撕毁以后日益削弱并停止了自已的活动，这应当归罪于领导“行动委员会”的改良主义首領的叛賣行为，他們力图使“行动委员会”丧失领导，取消它。在 1920 年刚产生的英国共产党，在组织“行动委员会”中起了不小的作用，但它的力量还很薄弱，还不足以把“行动委员会”变成群众行动的常設机关。

1926 年 5 月的总罢工，是一次极大的社会冲突，它特别有力地表明了，英国改良主义者所吹嘘的“社会和平”、階級妥协的时代已一去不返了。工党和工会的首領在工人階級齐心一致的壓力之下，被迫参加了总罢工，但他們極力破坏总罢工。在使全國癱瘓的总罢工开始的几天之后，他們就叛賣了工人階級。总罢工的被破坏，絲毫也沒有降低以巨大的英雄主义精神对英国資產階級作斗争的英国工人階級这一偉大發动的历史意义。总罢工是由於工人階級竭力保衛自己的先進的隊伍——礦工免受資本和保守党政府的進攻而爆發的。英国工人階級親身体驗到資本家政权是通向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总罢工的進程和結局，不能不使英国工人階級了解到，議會、憲法、英王及資產階級的其他权力机关，都是資產階級用來反对無產階級的擋箭牌。

总罢工的教訓之一，就是工会和工党的旧式首領暴露了自已是資本的代理人。而共产党表明了自已彻底忠实於工人階級的唯一政党。英国工人在总罢工时期，当各个政党的政綱和綱領都受到实际考驗的时候，不能不相信：共产党是能够大胆、坚决、徹底捍衛工人階級利益的唯一政党。

几乎有 200 年历史的英国工人階級，在 1920 年和 1926 年

表明了，它具有和資本作斗争的無窮的力量和勇气，具有与資本作斗争的坚定的决心。如果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國資本家能够保持他們的階級統治，那么，这决不是由於無產階級有什么特別的“和平的”，“適應的”性格，而只是由於右翼工党分子和工会首領利用自己的宣傳和思想，利用自己的分裂工人並向資本屈服的政策，破坏和欺騙了这支强大的力量。英國資產階級社会的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宗教和教会、政治的以及其他的思想以及政治制度，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帮助工党政府、右翼工党分子把工人羣众鉗制在自己的影响下，並使英國無產階級在壟斷資本的進攻面前变得軟弱無能。

但是，这些鎖鍊並不能永远把英國無產階級束縛住。战后时期發展的教訓証明：現在英國正在成熟着促使工人階級擺脫工党思想、擺脫对統治階級卑躬屈膝的地位、挺起胸膛來掌握祖國的命运並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条件。

二 工党內部矛盾的尖銳化及其政策的危机

几十年來的經驗無可辯駁地証明：右翼社会党人的上台执政，他們作为执政党所進行的活动，暴露了他們的本來面目。这种活动的目的不可避免地是反对無產階級的利益而为資本家的利益服务的。其結果是右翼社会党遭受政治破產，党内矛盾增長並發生危机。

工党在战争以前的情况也是这样的。工党在1929年到1931年时期上台执政的下場，是工党政府倒台，以麥克唐納为首的大部分工党閣員都轉向保守党分子的营壘，工党隊伍內部危机尖銳化。

工党在1945年大选时發表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綱領；說是要改善國家經濟狀況，增進人民福利，在对內政策上实行社会改

革，並在對外政策上擁護國際合作和和平。工黨滿口答應要實現社會主義並執行與蘇聯友好的政策。

工黨既不能緩和也更不能解決英帝國主義的危機，因為這種危機的基礎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總危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殖民制度危機的極端尖銳化。

工黨用自己的政策鞏固了壟斷組織的實力。從這一點看來，工黨確實是完成了英帝國主義托付給它的任務。以前，英國無產階級所受到的剝削從來沒有像在工黨執政時這樣厲害，資本從工人階級那里榨取的利潤從來沒有像在工黨執政時這樣多。後來代替右翼工黨分子的保守黨政府更變本加厲，他們在加緊剝削工人階級、保證利潤的增長方面大大超過了工黨政府。

如果說在1945年議會大選時和在太選後不久，保守黨人曾打着“自由經營”的旗幟，而右翼工黨分子則高呼着凱恩斯主義的“調節”和“國家干預”的口號，那麼，現在情況就有些異樣了。保守黨人“從優點方面”估價了工黨政府所實行的“國家干預”的方法以及資本主義國有化對於壟斷組織的好處。國家服從於壟斷組織，國家政權利用一切手段和槓桿向工人階級進攻，這在保守黨執政的條件下，採取了露骨的而且是更加殘酷的形式。

充滿着仇視進步力量，仇視和平民主陣營情緒的工黨政府，沒能解決任何一個矛盾，它開始加緊實行國家經濟軍事化作為它的最後手段。由於軍備競賽，經濟軍事化，由於和蘇聯及人民民主國家實際上斷絕了貿易聯繫，因而物價不斷上漲，無產階級貧困化增長，國內市場萎縮。工黨的“民主社會主義”的破產，在擴大軍事生產，使英國人民的利益服從外國資本的方針上面特別明顯地表現出來了。

在最近幾年來的發展進程中，更加明顯地暴露出“民主社會

主义”的破產。工党虛構的与馬克思主义的、共產主义的道路不同的，建成社会主义的“第二条道路”，原來只是繼續执行壟斷資本独佔統治的政策的一种說法而已。所有这一切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工党內部的深刻不滿，使工党右翼上層分子和黨員羣众即普通工人之間始終存在着的矛盾急剧尖銳化起來。

工党上層分子只是靠他們經常欺騙工人，模糊工人的階級意識，才暫時还能站得住脚。

工党执政6年以來，党内矛盾即通过工会集体入党的工人羣众和英國資產階級这个第二政党的上層分子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了。工党內部矛盾和斗争的这种尖銳化，必然会引起而且已經引起了工党內部危机的發生。

早在1948年到1949年时期，由於工党政府宣佈“冻结”工資政策以及实际工資的急遽降低，工人羣众也就是照集体會員制資格加入工党的工会，就已开始明顯地暴露出不滿情緒。

採用战时的非常措施——强迫仲裁制來鎮压罢工运动，动用軍隊來打击罢工，宣佈任何罢工都是非法的，这一些做法都只是加强了工人的不滿情緒。当粮食和消費品价格由於英鎊貶值而再度上漲的时候，工人羣众的不滿情緒曾通过許多职工代表會議（礦工、电气工業工人、商業雇員等等的代表會議）的議案表現出來。他們要求取消“冻结”工資，廢除通过强迫仲裁禁止罢工的第1305号法令。在1950年职工大会布萊敦代表大会上，不顧总委員會領導怎样反对，通过了一項要求取消“冻结”工資政策的決定。

布萊敦代表大会以后，工会首領和企業主簽訂了一个提高工資的妥协性協定，根据这一協定提高的工資，無論如何也赶不上物价的上漲。

然而，即使是这种手腕，也不能消除工人日益增長的不滿情

緒。鐵路工人、碼頭工人、機器製造業工人及其他部門的工人，都起來反對政府的工資政策，反對禁止罷工。罷工鬥爭加強了，鐵路工人、碼頭工人、機器製造業工人都開始舉行罷工了。工人的憤怒竟到達了這樣的程度，以致使總委員不得不通過一項決定，要求政府取消第 1305 號法令。

1951年7月第1305號法令的取消，毫無疑問是英國工人階級的勝利。現在，在取消禁止罷工的法令以後，像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一樣，制止工人罷工和破壞罷工的任務落到工會上層分子的头上了。

實行讓步的顯明目的，就是想緩和羣眾情緒，但是，這個打算並沒有實現。工人羣眾由於物價上漲、實際工資降低，住宅、學校和醫院等等建築費縮減而產生的不滿和憤怒，一年比一年增長了。這表現在工會代表會議和工會地方分會的決定中，表現在工黨地方組織交給工會年會和工黨年會的議案中。1947年到1951年時期，工會和工黨的領導力圖禁止討論工黨政府在這些問題上的政策，如果這樣做辦不到，就不准通過斥責工黨政府在這些問題上的政策的議案。1950年和1951年，由於加緊軍備競賽，物價急劇上漲，工黨政府的預算對資本家愈來愈有利，而使勞動者負擔愈來愈加重，結果，使羣眾的義憤和不滿特別加強了。1951年職工大會代表大會和工黨年會所通過的絕大多數議案，都是要求改變工黨政府的政策的。

羣眾對工黨政府對外政策的不滿，也愈來愈激烈了。

早在工黨政府執政的最初幾年里，工人羣眾對工黨政府反蘇的對外政策的不滿，就已表現在英國議會的工黨黨團的內部鬥爭中。1945年到1949年時期議員中的所謂“後座派”，反映了工人羣眾的深刻不滿，這一派反對工黨首領在希臘問題上的政策和工黨政府對北愛爾蘭的政策，反對摩里遜一貝文的反蘇路

綫等等。工党議會党团內部的这个反对派，决不是工党內部的澈底的真正的左派集团、左翼，这样的左翼毫無疑問正在羣众中形成。工党領導用紀律处分的办法、用压制、开除出党的办法，終於迫使反对派議員馴服下來。

1950年2月23日大选时期，工党領導竭力压制大部分反对派分子。工党領導干脆就不准許他們向新議會提出他們的候选人。

但是，工党政府用这种方法压制了前下議院的“后座派”以后，絲毫也沒有消除新議会的工党党团內部的意見分歧。工党議員不能不反映羣众的深刻不滿。这表现在工党代表新的“騷动”中。

然而，工党右翼領導終於用威脅办法迫使“騷动”的代表沉默。这是因为工党党团的反对派虽然反映了对軍备競賽、为外國帝国主义服务的政策的深刻不滿，但它本身具有上層性質。大部分反对派分子由於陞官發財思想、無原則性、害怕失去自己的代表資格，寧願順从領導的政策。工党領導威脅反对派分子說，如果他們批評工党政府的对外政策，他們在未來的大选中的候选資格就不会被批准。对那些在市政选举中工党提出的候选人也实行了同样的威脅。用这种方法終於把“后座派”压制下去了。

工党上層分子中間的小集团的形成，从前和現在都是工会和工党內部反对反民族政策，争取与苏联友好的羣众运动增長的反映，从來都是工党內部矛盾尖銳化和危机加深的征兆之一。

愈來愈多的工党組織和工会組織起來反对工党政府的对外政策。自从美國开始对朝鮮進行干涉以后，这个运动便开始具有愈來愈廣泛的規模。在1950年的工党代表會議上，几乎有半数組織通过議案批評工党的对内对外政策。

例如，1951年2月25日召开的倫敦17个工党組織的代表會議，决定成立一个反对工党政府对外政策的委员会。

1951年春季，在倫敦、曼徹斯特和伯明翰召开了反对战争會議，参加會議的总共有450名代表，代表着32个工党区組織，12个工会理事会和100多个工会分会。在这些代表會議上，一致駁斥政府的对外政策。

在斯德哥尔摩宣言上簽名的33万倫敦人中，大部分是工党党员。在倫敦成立的40个和平委员会中都有工党党员参加。

1951年5月召开的發电站工人工会代表會議主張提高工資，限制利潤。会上以212对81的多数票通过了一項決議，拥护和平公約，反对复活西德和日本的軍國主义，主張美國佔領軍撤出英國，並頒佈法令禁止軍事宣傳。

全國鐵路工人工会代表會議也通过了一項反对工党政府对外政策的議案。

英國各个大工会在1951年通过了几項決議，主張立即停止朝鮮战争，禁止原子武器和裁減軍备，把台灣归还給中國並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参加联合国，美國軍隊撤出英國，發展和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國家的貿易，反对复活西德和日本軍國主义等等。这些工会包括有：机器制造工人联合会、全國鐵路工人工会、建筑工人工会、消防隊工会、汽車工業工人工会、木器工人联合会、全國縫紉工人工会等等。

工党的几十个地方組織於1951年春季和夏季，要求召开非常大会討論政府的对外政策。

許多工党党员为了抗議工党政府的政策而取消了自己的市政选举的候选資格。

在1951年9月召开的英國职工大会會議上，提出了几百項議案，要求改变工党政府的对外政策。在总委员会的压力之下

並由於总委员会耍了手腕，相应的綜合性的議案被否決了。而且，还採用了慣用的威脅、压制、集团票等等方法。尽管这样，在大会上抗議复活西德和日本軍國主义的議案，仍然得到了机器制造工人联合会、全國鐵路工人工会、电業工人工会、消防隊工会、鍋爐制造工人工会的支持。要求停止“冷战”的議案，得到了全國鑄工工会、电業工人工会、全國鐵路工人工会、化学工人工会、汽車工業工人工会、电影机器匠协会、机械与造船業繪圖員协会、消防隊工会的支持。所有这些事实表明了廣大英國工人階級羣众对工党政府的反人民政策的極端不滿，表明了劳动者爭取和平反对新战争挑撥者的斗争。

但是，参加和平运动的不只是工会和工党的組織，而且还有廣大知識分子和中等階層的代表。不列顛保衛者代表會議以16万成員的名义反对复活西德的軍國主义。全國掀起了召开羣众大会和举行示威遊行的浪潮，來反对征召后备兵、釋放战争罪犯，复活西德的軍國主义。按照波立特的說法，“人民行动起来”。

对工党政府的对外政策及其軍备競賽政策的不滿，十分强烈地表現出來了。这一运动表現在英國工会和苏联工会的和平友好的書信往返当中。在英國，这个运动是由联合几个城市的工会的工会理事会領導的。运动开始於1949年倫敦工会理事会和莫斯科工会的友好通信。苏格蘭工会和苏維埃烏克蘭工会之間，伯明翰、被法西斯空軍炸毀的考文垂市工会和斯維尔德洛夫斯克的劳动者進行了和平友好通信。1949年12月，泰因河畔的新堡的劳动者和頓河岸罗斯托夫的劳动者進行了書信往返。

1951年11月，共有成員20万人的倫敦126个工会合作社組織和社会組織，向莫斯科工会會員發表願意和苏联友好並建

立持久和平的宣言。1952年4月23日，在康威霍尔（倫敦）的羣众大会上，传达了莫斯科工会理事会主席团的回信。每逢11月7日和5月1日的節日——这已成了一种傳統——英國無產階級的代表就到我國來了解苏联工人階級的生活和工作、爭取和平的斗争，了解我國的共產主义建設。他們訪問集体農庄、國营農場和工厂，从而对社会主义國家的生活有了具体的印象，並且怀着热烈爱慕和維護与苏联、与社会主义和民主陣营的和平和团結的决心离开了苏联。

訪問过苏联的代表的言論，揭露了資產階級报刊和廣播电台每天宣傳的關於苏联的謊言。这特別使英國的統治階級感到可怕。

甚至連反动雜誌“經濟学家”也不得不承認，“有許多工人堅決不相信大臣們關於俄國人活动的声明。好几个有組織地訪問过俄國的工会代表团，在最近18个月以來，否認苏联作战争准备，並把苏联工人全力投入民用建設这件事吹得天花乱墜。遺憾的是，确实有許多工人相信这些傳說甚於相信白廳的总结报告或英國刊物上發表的報導”^①。關於社会主义國家的謊言落空了，这使得軍备競賽政策和反苏政策的拥护者失去了立足点。

工党一工会的上層分子压迫和平保衛者，压迫一切透露苏联真实情况的人。早在1950年夏季，工党执行委员会就宣佈積極参加和平运动是和工党党籍不相容的。1950年春季，維斯普和西德萊頓党組織有500个黨員因拥护地方委员会要求斥責政府的对外政策而被开除出党。1949年成立的团体“社会主义同盟”和威尔士和平委员会委員被开除出党。执行委员会宣佈積極支持和参加英國和平委员会和其他和平組織，是和工党党籍不相

① “Economist”, 17. III. 1951, p. 583.

容的。同时，职工大会总委员会拒绝给拥有60万工会会员的英国伦敦市工会理事会及积极维护和平和工人阶级利益的人登记。诸如此类的压制手段，暴露了右翼领导对党内危机，对英国人民和党内和平力量的壮大的恐惧。

对群众运动的恐惧达到了这样大的规模，以至阁员们被禁止对对外政策问题独立发表意见。

禁止在英国召开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解雇访问过苏联的工人，迫害维护和平的社会活动家蒙尼卡·费尔顿夫人，迫害一切透露苏联真实情况的人，以及其他等等——这些手段都是用来反对和平运动，反对工党和工会内部的一切反对派的。

早在1952年10月工党年会以后，工党执行委员会就禁止党员参加1952年12月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尽管这样，在人数众多的整个英国代表团里，几乎有一半是工党党员。

普通工人和工党上层分子之间的分化正在加速进行着。工党内部的矛盾急速尖锐化了。工党“民主社会主义”的破产，对于广大劳动群众说来，愈来愈明显了。

工党政策和工党领导的危机到来了。从前就存在着的工党上层分子各个集团的勾心斗角，现在尖锐化了。1951年4月，工党的三个大臣——劳工大臣比万、贸易大臣威尔逊、粮食部议会秘书弗里曼提出了辞职书。联合24名工党议员的比万集团，出版了两本小册子，这两本小册子将成为反对工党官方领导的反对派的政纲。

这两本小册子里申斥的不是工党政府所实行的军备政策本身，而只是军备的规模和速度，小册子认为，美国所实行的军备竞赛，置资本主义世界于面临原料危机的境地；必须在最近两年内“和俄国达成协议”。靠降低军备竞赛的速度来实现我们从1949年和1950年工党纲领中早已知道的“国际援助”落后国家

的計劃，被當作是擺脫危機的方法。比萬集團由於害怕殖民地人民民族解放運動的強大增長，建議英國和美國成為各殖民地國家的“朋友”。小冊子的作者接着建議不要堅持武裝西德的政策。

無論是這兩本綱領性的小冊子，無論是比萬集團的全部政策都證明了比萬集團一方面毫無疑問反映了羣眾的不滿情緒，另一方面它提出了一項任務，——把憤慨不滿和焦慮不安的羣眾吸引到自己方面來，不使他們轉到反對資本爭取社會主義的實際鬥爭方面去，轉到共產黨方面去。

在比萬集團的著作“只有一條道路”中，正是這樣宣佈的：比萬及其朋友退出政府的目的，是為了鞏固工黨，和共產黨作鬥爭。

比萬集團提出較溫和的軍備的口號、“國際援助”的計劃等等，其目的是要把憤慨不滿的但究竟還是落后的工黨羣眾吸引到自己方面來。同時，比萬集團反映了並正在反映着國內反美情緒的增長。

比萬集團的出現是工黨危機的一個徵兆，是工黨普通黨員情緒的反映，對這一點是無論如何也不應當估計不足的。

對於工黨右翼領導以及英國資本主義說來，局勢是危險的。工黨上層分子面臨着這樣的景況：工黨的整個體系及其和集體入黨的工會的联系，使得羣眾沒有可能影響黨的政策，它在激憤的羣眾面前可能會立即顯得軟弱無能。這意味着英國資產階級的第二大黨——工黨的崩潰，並且是對英國資本主義統治的整個體系的一個打擊。

而工黨領導無疑是取得了保守黨人的完全同意，並且按照壟斷資本的指示，耍弄手腕的。工黨領導採用了保護資本政權的受過考驗的方法——兩黨制度。

兩黨制度一方面造成在大選中“人民自由表達意見”的假

象，另一方面它为資產階級兩個基本政党之一保持着組織政府的可能。在英、美实行的这个制度意味着在虛偽的詞句和对羣众的娓娓动听的諾言的掩盖下，統治階級要达到这样的目的：使在某一时期处於反对党地位的另一政党，來代替原來那已經威信扫地的执政党，因而反对党不对前任政府的活动負責。列寧關於美國的兩党制度寫道：“他們用兩個資產階級政党之間進行不可开交的和毫無意义的决斗的手段，欺騙了人民並誘使人民脫离开迫切的利益。”[⊖]

英國資產階級在它統治的几百年以來，特別圓滑地实行了在兩個維護資本統治的政党之間進行这种“毫無意义的决斗”制度。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結束，自由党和保守党是英國資產階級的兩個基本政党。在資本主义总危机發展進程中，起而代替自由党成为資產階級第二政党的，是以社会主义旗帜为掩盖的工党。政治上的秋千制度，一个政党向上盪，另一个政党向下盪，而且，在这种制度下，威信扫地而暫時引退的政党便扮演着反对党的角色。这种制度對於正是处在自己的統治最危急的关头的資產階級說來，是特別有好处的。

列寧曾經指出，由於長期歷史經驗而神聖化了的兩党制度，对資產階級有特別的好处，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表現得特別明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的時候，英帝國主义最老的政党保守党，由於它的極端反动的对内政策和敌視苏联的态度，在羣众心目中弄得声名狼籍。工党首領怀着蠱惑人心的动机出來批評保守党人的敌視苏联的政策，向人民許下諾言，要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實現社会主义。英國劳动者相信了工党首領的冠冕堂皇的諾言，在議會大選时，投票拥护工党。於是工党分

⊖ “列寧全集”俄文版第 18 卷第 374 頁。

子獲得了压倒多数的議席。

工党政府也由於它所实行的政策在羣众心目中丧失了威信。右翼工党分子失去了自己在羣众中的影响，这对英國資本主义統治的整个体系來說，是極其危險的。於是保守党又重新登上了舞台。1951年10月大选中，一部分居民投票拥护保守党人，是希望保守党作为反对党，会执行和威信扫地的工党政府不同的政策，会执行和平和改善人民狀況的政策。英國共產党綱領指出：“右翼工党領袖們所起的破坏作用是保守党人在1951年大选中獲勝的主要原因。”^①

保守党人为了欺騙羣众，不惜許下种种諾言。同时，两个党还瞞着人民約定它們採取兩党政策。这种政策的基礎是不会由於一个执政党为另一个执政党所代替而發生变化的。結果是保守党取得了勝利。

資產階級議會制的使命，是要为資本主义保證这样一种忠实可靠的政权：無論是人物、机构、政党的更換，都不会动摇这个政权。

右翼工党分子所实行的政策，實質上是壟斷資本的政策，並且他們認為以后保守党人也將执行这种政策，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正是在这一点上，他們的意圖和保守党人及美國壟斷資本家的意圖和要求是一致的。美國的廣播电台和报刊，和英國壟斷資本家的廣播电台和报刊一样，積極暗示保守党人必定獲勝，並預言他們將獲得絕大多数議席。

为了帮助保守党人在大选中取得勝利，連在議會中代表一个小集团的自由党也出动了。根据壟斷資本家的要求，他們認為保證保守党人獲得多数議席已是时候了，自由党在大部分选区

① “英國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第15頁，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

取消了自己的候选人，並号召自己的拥护者投票拥护保守党人。在英國佔統治地位的反民主的选举制度之下，由於投票結果是在选区範圍以內統計，而不作全國範圍內某一个政党对候选人的投票統計，所以自由党这个中間小集团却給了保守党人以不少的帮助。

正如英國共產党报刊所強調的，事变的整个進程証明了：工党首領和保守党人实际上是串通起來用照例的选举决斗來欺騙羣众，結果——工党將遭受失敗，保守党將取得勝利。

然而，大選結果並沒有使工党和保守党首領如願以償。英國共產党机关报在評價大選結果時寫道：“大選結束了，但是危机繼續着。大選並沒有解决抉擇問題，也沒有擺脫現行政策”即保守党人和右翼工党分子的兩党政策“給英國帶來的災難。”^①

1951年10月25日大選後的議席分配是这样的：保守党獲得了321席，工党——295席，自由党——6席，其他政党——3席。

可見，任何一種信任投票，如果在投票時有20名保守党人缺席，都可以使保守党政府遭受失敗而導致新的大選。但是，無論工党和保守党首領恰恰都是害怕新的大選的。進一步的軍備競賽，保守党政府的新預算縮減用於社会需要的开支，軍事撥款的重新增加，勞動者的新負擔；物價的飛快上漲——所有這一切都引起了羣眾的不滿和憤慨的進一步激增。這種憤慨情緒在新的大選中會使保守党人失敗，而使工党分子獲得多數議席。

三 工党危机的進一步發展

保守党政府的上台執政，使右翼工党分子有可能用新的手

^① “Labour Monthly” № 12, 1951, p. 555—556.

法來欺騙羣眾，轉移羣眾對自己的不滿。

保守黨政府只是繼續並加強了工黨分子的政策。因此工黨右翼領導通過自己的全部政策在議會內外支持保守黨人。

這表現在工會和保守黨[⊖]領導的全部政策上。大選（10月31日）過後的幾天，職工大會總委員會就宣佈自己願意和政府“友好合作”。這就是說，工會領導者將不遺余力阻止工人和資本作鬥爭，在壟斷組織的進攻和軍備競賽面前瓦解無產階級。

1951年11月，總委員會通過了一項議案，應許英國金融寡頭政府“以共同協商的辦法”和大臣及企業主們協作，這是十分合壟斷資本家口味的，這是直接反對工人的利益的行動。

工黨領導所貫徹的也是同一條路線。1951年11月6日，艾德禮在下議院發表演說時宣稱：“反對派將是警覺的，但不是黨派性的”。用議會的語言來說，這就是說繼續兩黨政策並支持保守黨政府。

賈茲克爾也根據同樣的精神發表了演說。接着就是摩里遜在討論對外政策問題時發表的聲明：“我並不認為，在艾登的聲明中有許多值得爭論的地方……我們認為是正確的那個政策正在被實現着，而且我並沒有看到有任何重大的離開這一政策的地方。”1952年3月3日，艾德禮在“每日先驅報”的一篇文章里也說了同樣的話：“我認為，無論我們的政府是怎樣的，它大體上都將貫徹工黨政府所採取的政策。”自然，這種政策並不是右翼工黨分子的唯一發明。應當到英國金融寡頭的宮廷中去尋找這種政策的制訂者。而這種直接支持政府向工人階級公開進攻和實行軍備競賽政策的行動，乃是供認右翼工黨分子和保守黨人的政策是一致的。

⊖ 似應是工黨。——譯者

但是，工人階級開始了堅決反對保守黨政府反動措施的廣泛運動。特別是維護和平的鬥爭愈來愈加強了。於是工黨領導便急忙來支援保守黨政府。

這表現在工黨和工會右翼首領的實際行動中。職工大會總委員會反動領導不反對政府準備向工人階級進攻：它同意政府恢復戰時法令——“僱傭管制”法令的建議，根據這個法令，工人被強迫派到軍事部門工作。總委員會敵視在莫斯科召開的國際經濟會議，建議英國工會不要派遣代表參加會議。

面對着日益發展的反對保守黨政府政策的罷工運動，“全國勞工委員會”（由工黨、職工大會總委員會、合作黨的代表組成）號召工人不要進行反對保守黨人政策的罷工鬥爭，而應當讓工黨議會黨團去和保守黨人作鬥爭。為了保護軍備競賽和向英國工人階級及殖民地人民重新進攻（這次是由保守黨人直接實行進攻）的政策，工黨又採用了它的老手法：把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對立起來，以便既癱瘓經濟鬥爭，也癱瘓政治鬥爭。

但是，工黨和工會的改良主義首領並沒有能夠破壞工人階級的鬥爭。1952年2月機器製造業工廠工長設菲爾德區行動委員會召開的代表會議，號召大家反對保守黨政府縮減社會開支的措施。出席大會的有來自全國各地（倫敦、蘇格蘭、北愛爾蘭、約克郡）的250名代表。大會要求提高工資到每星期30先令，要求和世界各國建立和平和貿易關係，並大大削減軍費開支。全國鐵路工人工會的許多區委員會，要求召開工黨特別大會，以便組織反對保守黨政府的鬥爭。全國各地的礦工、冶金工人、鐵路工人都起來反對總委員會和工黨右翼領導的政策。巴羅工會委員會在1952年3月初通過了若干項議案，斥責擴軍備戰、服從美國的政策，主張五大國締結和平公約，各國人民和平友好，重新舉行大選。

1952年3月保守党的新預算批准以后，爭取和平反对备战、反对保守党政策的羣众运动更加加强了。三个最大的铁路工人工会要求从朝鮮撤退軍隊，維護和平，提高工資。在倫敦、格拉斯哥和其他城市，召开了羣众大会，反对战争和保守党政府对工人階級的進攻。机器制造业工人切斯特菲尔德区委员会为了反对保守党人的經濟政策，召开了一次特別代表會議。在議會大選以后，南威尔士和蘇格蘭的礦工通过了若干議案，反对总委员会“和托利派合作”的政策。

1952年春夏兩季召开的大多数职工代表會議所通过的議案，反映了对保守党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的深刻不滿。工会和合作社組織的6个年会通过了反对重新武装西德的議案，13个代表會議通过了拥护五大國締結和平公約的議案，11个职工代表會議通过了反对重整軍备政策的議案，8个工会代表會議通过了主張东西方廣泛貿易的議案，28个工会代表會議通过了要求提高工資的議案。这些議案和1952年5月發佈的总委员会向职工大会的总结报告是非常懸殊的。

每当替軍备競賽作辯护，支持工党政府的“压低”工資政策並辱罵苏联的报告刚一發表，立刻受到許多工会（电气工人工会等等）的斥責。1952年的春夏秋三季標誌着和总委员会的路綫直接对立的工人羣众战斗情緒的增長。千百万工人要求提高工資，罢工斗争在加强着。普通工人和总委员会領導之間的裂痕的加深，在馬尔加特职工大会第八十四次代表大会上表现得特別明顯。

尽管工会官僚仍然还从組織上掌握着工会，但是代表大会上的各个工会代表团不能不反映羣众的積極性及对軍备競賽和备战政策的憤懣。按照進步雜誌“世界新聞与評論”的說法，“总委员会的委員在整个代表大会过程中，像坐在火山口上一

样。”[⊖]就是在大会会场上也常常尖锐地表现出对工会上层分子反人民政策的愤慨不满。

总委员会在代表大会的若干重要问题上都遭到了失败。首先，大会不顾总委员会委员的激烈反对，仍然以多数票通过了科学工作者协会提出的议案，要求通过联合国保证缔结关于禁止使用大量杀人武器的新的国际协定。其次，总委员会在关于与和平民主阵营各国进行贸易的问题上，也遭到了失败，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议案，其中宣称：“代表大会相信，和中国、苏联及其他东方各国的广泛贸易关系，对改善目前国际局势会有重大的帮助”。这项议案和总委员会的整个路线显然是矛盾的。但是，事先已经知道，最大的工会——矿工工会、铁路工人工会、机器制造工人工会等等是支持这项议案的。为了不至于在表决时再度处于少数地位和遭受照例的失败，于是总委员会决定支持这项议案，因而这项议案就一致通过了。我们都还记得，在1951年职工大会第八十三次代表大会上，这项议案曾以多数票遭到了否决。这证明在群众中发生了深刻的进步，迫使工会上层分子只好看风转舵。这在讨论和表决关于工资的议案时表现得特别明显。绝大多数工会代表会议都反对总委员会和保守党政府一致主张的“压低”工资政策。总委员会在合并关于工资的各项议案时，把拒绝“压低”工资的那些比较温和的要求归并为一个议案，把坚决和直接反对政府的经济政策并反映对提高资本家利润愤激的那些要求归并为另一个议案。起初，总委员会打算反对这两项议案，但是它感到在这种情况下自己必然会遭受失败，于是便采取了随机应变的手段。它支持第一项比较温和的议案，反对拒绝保守党政府“压低工资”政策，要求“保护工会

⊖ “World News and Views” No. 36, 1952.

會員的生活水平”的比較堅決的議案。

總委員會只是用這種方法才在表決時免於遭受失敗。它只是採用了壓制代表團領導者的辦法，才使自己的報告得到同意。

總委員會在代表大會上表決關於國有化的議案時遭到了失敗。儘管總委員會堅決反對，代表大會仍然通過了反對把國有化的企業發還給舊業主，並要求代替保守黨人執政的新政府擴大國有化的議案。同時，議案還要求以後在進行國有化時應當實現“國有化企業管理的民主化”。

這樣一來，職工大會代表大會證明了總委員會上層分子和工會會員羣眾之間存在着裂痕。正如波立特所說的，“總委員會的政策與羣眾的目的和意圖之間的鴻溝，比任何時候都深了”^①。

這次代表大會的進程表明：反映在工黨政府破產中的英國改良主義的危機，正在加深着。

這在1952年10月於莫坎比召開的工黨年會的進程中，表現得特別明顯。

提交給代表會議的各項議案，證明了工黨內部危機的進一步加深。這些議案主要是由工黨地方組織提出來的。其中有五項議案主張發動反對保守黨政府的全國性運動，有35項議案主張制定工黨的新黨綱，有44項議案主張反對和重新審查重整軍備的政策，有8項議案涉及不斷增長的失業現象問題，有68項議案有關對外政策問題，而且，除了一項議案以外，所有議案都反對保守黨人和工黨右翼首領的對外政策，有12項議案要求改變政府的住宅政策，有11項議案主張擴大國有化，有22項議案反

^① “Daily Worker”, 6 IX. 1952.

对廢除國有化以及其他等等。

可見，地方組織的情緒是坚决反对工党右翼領導的。

这一点立即就在工党年会得到了反映。首先，从地方組織被选入工党执行委员会的7名委員中，有6名是从比万反对派集团中选举出來的。並且，摩里遜和达尔頓都遭到了失敗。右翼的失敗立即影响到年会的整个進程。一般代表們在这里也坚决反对右翼領導。結果使得代表會議本身和工党上層分子处於尖銳冲突的局面中。由於西塞尔福工党地方組織提出了一項議案，要求採取坚决措施來推翻保守党政府，不限於羣众斗争（罢工和遊行示威）；劳瑟和狄金發表演說威脅反对派。狄金以分裂工党，停止工会从財政上支持工党來脅迫反对派。狄金的演說充滿了对“紅色分子”的仇恨，引起部分代表羣情激憤，高唱英國工人的战斗歌曲“紅旗”。

代表會議否決了採取坚决行动反对保守党政府的要求，但是，贊成這項議案的几乎有200万票。

羣众对反苏政策、軍备競賽、英國之服从於外國統治的不滿情緒，强烈地影响了那一屆年会。

工党地方組織代表巴特尔西反映了大部分代表的情緒。他談到了英國工人階級在14个國家干涉苏維埃俄國时期的英勇斗争。他宣佈工人决不支持反对苏联的帝國主义战争。鑄工联合会的代表談到了“行动委员会”，当时碼頭工人曾不讓裝載武器的輪船开往汎波蘭去反对苏維埃俄國。

正当艾德禮、摩里遜、賈茲克尔、狄金和其他右翼工党分子支持和美國建立軍事同盟，締結大西洋公約的政策，工党地方組織和許多工会的普通代表起來反对反苏政策，拥护和平政策，主張縮減軍备，反对英國服从美國的統治。

年会通过了要求擴大东西方貿易的議案。議案要求不許利

用英國軍事力量在东欧或其他地方改变領土。議案駁斥了那些把被压迫各國人民反对帝國主义統治的斗争看成是“受苏联唆使的陰謀”的人的立場。因此，代表會議指出，羣众的情緒是反对战争，争取和苏联和平友好，反对擴軍备战，而和保守党人密切勾結的工党右翼首領，却支持保守党人的政策。

在莫坎比年会上，有一个反对政府在馬來亞、中东和朝鮮的政策的力量强大反对派，它远远超出了比万集团的要求的範圍。右翼領導由於害怕在付表决时会遭到失敗，便形式上主張把此类問題的議案轉交給执行委員會。可是这並沒有改变以下这个事实：在工党內部，羣众远远超过了比万派所主張的在某种程度上裁減軍备、減輕英國对美國的依賴的要求。

从职工大会代表大会中吸取了經驗教訓的右翼工党分子，只好不反对要求擴大國有化的議案。

在關於國有化問題的議案中，执行委員會建議制定一个应当由新任工党政府实行國有化的各个部門的名單。議案中附帶說明道：对保守党政府現在正在廢除國有化的那些企業（是指部分汽車運輸業和煉鋼企業而說的）的業主，不应当付給任何补偿費。議案駁斥了付給資本家以过多的补偿費的做法。議案中指出，賠償費“应当对消費者和工人說來是公平的”。莫坎比工党年会以及职工大会代表大会都通过了的要求擴大國有化的議案，証明了工人羣众要求实现的是有利於人民的真正的國有化，而决不是以前工党政府所实现的那种國有化。

从工党实现对資本家有利的國有化中吸取了慘痛教訓的工人羣众，要求实现新型的國有化。劳动羣众需要的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性質的國有化。右翼領導見風轉舵並打算在自己上台执政的时候，如果迫不得已，就实行新的國有化措施，但只是为了資本的利益。当时，即1945年，右翼工党分子达到了欺

騙羣眾的目的。現在，全部問題仍然在於，什么样的政府，為哪個階級的利益實現國有化。

同時，事變的進程還證明了：希望實現有利於人民的真正社會主義的國有化的工人羣眾，已提高到新的階段。他們既不願意重復欺騙的手段，也不願意再重復破產了的工黨政府的政策。這種主張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國有化的要求證明：英國共產黨綱領“英國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以及人民政府必需實現有利於人民的國有化的思想，對於工人羣眾發生了多么巨大的影響。

工黨莫坎比年會的結果是怎樣的呢？右翼首領無論是在執行委員會里（由於建立執行委員會的制度不民主），也無論是在工黨議會黨團里都保持了自己的領導地位，而在年會以後，則用最後通牒的辦法迫使比萬支對派正式解散自己的集團。但是這顯然不但沒有消除甚至也沒有緩和工黨的危機。工黨的危機是總局勢——英帝國主義危機的加深，服從華爾街的政策，軍備競賽，羣眾的日益貧困化的結果。工黨的危機表現為罷工鬥爭的加強，工黨普通黨員愈來愈多地參加維護和平的鬥爭，退黨的人愈來愈多。右翼首領和羣眾之間的矛盾愈來愈加深，從組織上形成一個工黨左翼的前提和條件正在成熟着。在莫坎比年會上工會戰鬥分子和工黨地方組織的聯盟得到了鞏固。這一聯盟的進一步鞏固是不可避免的，這將使工黨右翼領導垮台。



陸